

1979年10月创刊

1984年

近代史研究

6

(双月刊)

总第二十四期 11月出版

-
- 北方局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陈 康 (1)
共产国际和东征讨蒋战略·····向 青 (35)
上海招牌工会的兴亡·····姜沛南 陈卫民 (45)
民主革命时期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王荣刚 (79)
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石源华 (95)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述论·····孙彩霞 (118)
历史上的华工出国·····彭家礼 (128)
十九世纪华工与华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贡献·····张 钊 (166)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起
“倒清拥李”的密谋事件·····夏良才 (193)
谈清末北洋六镇的编练·····任恒俊 (201)

· 问题讨论 ·

从冯桂芬到郑观应

——洋务思想家试析·····雷 颐 (211)

海外民国史资料一瞥——访美札记·····李宗一 (223)

· 书刊评介 ·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评介·····于世明 (235)

· 读史札记 ·

两则反映宜章暴动日期的资料·····冯资荣 (249)

赣西南特委的成立和演变·····周 明 (250)

“九·一八”事变时的沈阳东大营

·····孟繁宗 高景生 谢 文 (255)

一九八三年国外出版中国近代史

论著索引·····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261)

北方局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陈 廉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这一过程中，红军主力部队开赴华北起了决定作用，而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华北地方党，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放手发展与深入巩固的方针，对华北根据地的创建作出重大贡献。本文分四个段落作一概述。一、抗战前的北方局；二、从七七事变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三、从六中全会到1940年4月北方局黎城会议；四、从黎城会议到1942年底。

一

抗战时期的华北，系指陇海路以北的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及豫北、苏皖北部一部的地区。这个地区，早在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李大钊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以北京为中心，在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党的组织。1924年底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1925年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反帝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斗争，到1926年7月，北方地区党员发展到两千多人^①。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北方局，并派王荷波、蔡和森前往主持，以王荷波为书记，管理

^① 见《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年）第117页。

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机关驻天津。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底和1928年，河北玉田及山东阳谷、海阳、牟平等地爆发了武装暴动。1928年初北方局撤销，由顺直省委管理北方党的工作。1930年春，重新成立，并兼顺直省委。1931年1月四中全会后又行撤销，改称顺直省委（亦称河北省委）。1933年3月，孔原（田夫）以中央代表身份着手恢复北方局。1935年春，孔原调上海，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兼负北方局工作。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岁月里，北方党在北方局或顺直省委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由于路线错误，起义失败，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到1935年春夏，华北党只剩下一个河北省委及其所属若干城乡组织，山东、山西等地，只有少数干部坚持活动，党组织基本解体。斗争虽然失败，但坚持了党的旗帜，撒下了革命种子。

1935年下半年，华北出现了抗日高潮。北方局积极开展了党的工作。首先，以平津为中心，组织了“华北救亡会”、“救国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学生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战线组织或党的外围组织，推动和领导了以学生运动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派遣张友渔等对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进行宣传联络，通过北平市委周小舟经吕振羽同南京政府进行了国共合作的非正式的初步洽谈，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另外，还大力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除了调整领导成员，加强了河北省委所属的京津两市委、冀东、冀中、冀南、沧州、冀鲁豫边、石家庄、白洋淀（保定）等特委外，还通过直南特委同山东党取得联系。又从党中央上海办事处接收了山西省工委的组织关系。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残余的存在，这时的华北工作，仍局限于狭小范围，方针政策没有根本转变。

为加强北方局领导，进一步开展华北地区工作，刘少奇根据

中央1935年冬的决定，于1936年3月到达北方局驻地天津。以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这时，党的中心任务是贯彻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左倾关门主义残余的存在，成为开展工作的最大障碍。刘少奇到后，重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组织部长彭真，宣传部长陈伯达，秘书长林枫。接着，派员重建和恢复了各地的党组织。1936年4月，派黎玉到济南，建立了山东省委（对外称工委），书记黎玉，成员有赵健民、林浩、景晓村。6月，派李宝森到太原恢复山西省工委，11月又派李菁玉任书记。1936年秋，经中央批准，营救了薄一波等六十多名干部出狱，陆续派往各地。12月后派张友清、徐子荣、赵振声（又名李葆华）、赵仲池等到太原，组成新的山西工委，书记张友清。1937年春，派李运昌到天津，组建新的河北省委，李任书记，9月后马辉之任书记。各省委（工委）恢复建立了所属地区的特委、市委。为发动华北抗日救国运动，北方局通过《火线》等党刊发表了刘少奇的一批文章，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端正了各级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改变了党的策略，纠正了“飞行集会”之类的冒险行动，正确地组织平津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发动群众抵制日货。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在“一二九”运动的基础上，于1936年4月，将平津学生联合会改为学生救国会，成立了平津各界救国会。为开展统战工作，北方局曾派彭雪枫、张友渔、梁寒冰、刘贯一等对一些友军进行了联络，争取合作。北方局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均等应阎锡山邀请，以共产党员身份，回到太原，组成一个直属北方局领导、专做山西白区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经与阎“九月谈判”，取得了合法地位。阎将1936年10月成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交薄一波主持，指定薄同其亲信梁化之为负责人，任薄与雷任民、宋劭文等七人为常委。薄接收了“山西军政训

练委员会”，创办了“军政训练班”、“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培养了大批知识青年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

经过以上工作，华北党提高了政治水平，恢复与发展了党的队伍，建立了各地省委、特委领导机关，深入发动与巩固了群众抗日救国运动，初步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到抗战前夕，华北地区共有党员五千^①。这一切，均为抗战爆发后发动与坚持华北抗战，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良好的基础。

二

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北方局立即动员与组织军民实行抗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7月8日中央指示，党在平津华北应立即执行下列方针：1. 坚决保卫平津和华北，立即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动员全体爱国军民抵抗日本进攻；2. 立即与政府当局及各地方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战线；3. 立即在平津、平绥以东地区及平汉津浦线开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8月党的洛川会议决定，全党应不放松一刻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晋察冀绥四省边沿地区创造根据地。9月25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游击战争，发动华北党，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组织游击队。根据中央指示，在抗战初期，北方局的工作方针是，全党搞武装，抓政权，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

七七事变后，面对南京政府企图妥协的危险，北方局采取种种措施推动华北抗战。事变第二天，北平市委即动员“中华民族

^① 关于抗战前华北党员人数，本文系根据刘少奇1943年3月发表的《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和1980年第8期红旗杂志发表杨尚昆《怀念少奇同志》一文。彭德怀1944年对孙平谈话则说，总共不超过三千，何数准确待查。

解放先锋队”及“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宣传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形式，宣传抗战，支援守军作战。还通过二十九军与地下党有联系的何基沣等影响宋哲元实行抗战，反对妥协。“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的口号响彻华北。

7月底平津沦陷之后不久，日军便向华北内地大举进攻，全国抗战形势确定。北方局认为，华北党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军队，建立政权，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抗战。为坚持持久抗战，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北方局首先大力进行了撤出城市、转进乡村的工作。指示河北省委：党在平津的组织，立即转入长期的秘密工作，目前主要任务是援助平津附近乡村的反日游击战争，干部人员除必需留在平津者外，应退到乡村，组织游击队打游击。在冀东，应准备迅速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全国抗战，并在冀东坚持游击战争。北方局号召每个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农村打游击去。根据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将平津唐地区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团体骨干分子，除留少数有条件长期隐蔽坚持城市作秘密工作外，大部转至太原、延安、晋察冀边区，一部退到冀东、平西和山东。

1937年8、9月，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杨尚昆（北方局书记）、彭真（组织部长）、李大章（宣传部长）、林枫（秘书长）等，以及北方局机关，分别从延安、北平相继到达太原。9月，在太原召开了河北、山西、绥远、山东、察哈尔等华北地区省委书记及部分市委、特委书记会议，讨论了配合八路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枪，建立根据地等项任务与政策。同月，八路军将领过太原时，北方局在太原成成中学召开会议，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与我军行动方针。少奇提出华北、太原将要失守，我军应分散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武装50万；会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强调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要方式，华

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9月底、10月中，红军三大主力陆续开赴华北前线，到达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与地方党会合。随后，首战平型关，接着，在长城内外，正太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派出工作团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辟了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等游击根据地。这时，北方局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建立统一的军政领导机关，创建根据地。10月20日，致电聂荣臻，要求晋察冀全区应立即进行民选，组织县政府委员会，筹组边区政府，设立边区农会、工会，成立军区。10月22日、27日，致电贺龙、关向应、任弼时、邓小平及各师政治部与华北各地党，提出了各类地区的工作方针。指出，在敌占区域，共产党八路军应以自己名义公开直接地去动员群众，如有友党友军，应联合他们，以“战地动员委员会”名义动员。在未被敌占领区，应争取公开地位，用抗日救国、改善民生的口号去动员组织群众，建立人民自卫队，逐步改造政权。在已失与未失地区，都应大力发展党，在各县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建立群众团体，八路军要努力扩大军队，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加入八路军。为解决干部问题，北方局以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名义，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学兵队，训练上千干部输送各区与延安。为开辟华北根据地，周恩来经与北方局讨论，于11月1日向中央建议，将华北划分为绥西、绥察边、晋南、晋西北、冀察晋、直南、直中、冀东、山东等九个战略区。中央及军委批准这一提议，此后北方局、总部基本按此方案划分了战略区，组织了军区，建立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太原沦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结束，以我党我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针对这一变化，11月15日北方局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目前我党在华北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

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①。在这时，北方局提出了“誓死保卫华北、保卫山西”，“坚持华北抗战，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抗战到底，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口号。

太原沦陷前夕，北方局随八路军总部迁往临汾附近，不久少奇返延安参加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北方局由杨尚昆主持。1938年初，少奇从延安返回，在临汾附近召开了山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阶段、新任务的报告，动员干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独立自主地发动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2月，日军进攻临汾，北方局转到晋西，随115师师部驻孝义，对外称总政后梯队。转移前后，接中央通知，少奇返延安，参加中央3月政治局会议。3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北方局负责人胡服住延安，负责华北领导，尚昆率北方局人员在晋西南，朱瑞在冀晋豫，彭真在晋察冀，都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各地工作。8月后，尚昆亦去延安开会，北方局机关的领导活动一度中断，对各区指导，主要由在延安的少奇（后有尚昆）进行。

1938年4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华北八路军便以山区根据地为依托，向冀南、冀鲁豫、冀鲁边等平原地区和冀东、大青山区挺进，波浪式与跳跃式相结合，开辟了广大新区。党中央、北方局（以刘少奇名义）有力地指导了这一战略行动。4月20日，毛洛（甫）刘致电彭（真）聂及朱彭（德怀），指出目前晋察冀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基础上去继续发展”。要加强部队整训，肃清根据地内部土匪，整理冀中部队。在整理就绪之后，可分出一部兵力向冀东、热边发展^②。4月21日，毛、洛、刘致电129师刘、徐（向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5页。

^② 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32页。

前)、邓：“目前在河北山东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①9月26日，毛、朱、彭、胡(服)致聂转宋(时轮)邓(华)及冀东特委：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克服困难，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目前主要力量放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力量放在白河以西。

1938年秋，蒋介石慑于华北我军之迅速发展，乃陆续派遣官兵北上，与我争夺华北，限制我之发展。9月，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由豫北进入冀南，到处收编土杂武装，建立第二政府，并与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策划反共，建立冀鲁联防。12月，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两万入鲁。针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北方局除派刘伯承、彭德怀与之多次谈判，争取合作外，曾发出多次指示，强调加强实力，坚持阵地。指出：党在河北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实力，加强武装部队、临时政权和群众组织(1938年6月7日毛泽东、洛甫致邓小平、朱瑞、聂荣臻、彭真等)；冀南应加紧建立各地政府，推选与委派县长，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钟麟)商讨交涉(8月8日毛、刘致徐向前等)；晋察冀、冀中、冀南均应迅速建立与巩固统一的军事行政系统，使鹿来不致容易被拆散(8月20日毛、王(稼祥)、刘致聂荣臻)；目前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若干游击兵团，组织不脱产的自卫军，改造地方机关成为民主政权，迅速召开各群众团体代表会议，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8月24日洛、毛、刘致朱瑞)；张荫梧计划夺取正太路以北地区，要发动民众机关团体维护边区政府与司令部，无边区政府介绍

^① 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53页。

信，任何人不得进入边区，进行军政活动（9月7日毛、朱、刘致聂）；必须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得以任何交换条件取消（10月27日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等致朱瑞）等等。

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北方局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第一，大力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战略区党的领导机构。

经中央指示或批准，1937年9月底，北方局派李葆华、王平、刘秀峰前往晋东北，组织晋察冀临时省委。11—12月间，正式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委员会，领导成员有聂荣臻、黄敬、赵振声、刘秀峰等，负责指导北岳、冀中、平西、冀东等地区党委。1937年10月，冀中区成立了保（定）东、保南两特委，不久石家庄沦陷，平汉路东西分割，冀中形成一独立区，乃将两特委合并为保属省委，书记张君。1938年初改为冀中省委，书记鲁贲，副书记张君。4月又改为冀中区党委，黄敬任书记。1938年8月，北方局将原冀中的保属特委南移石家庄，成立平汉线省委，书记李菁玉。9月后又迁阳泉，移辽县，与129师师部会合。10月组成冀豫晋省委临时领导机构，1938年2月正式成立冀豫晋省委，主要领导成员有李雪峰、徐子荣、何英才、安子文、彭涛等，李雪峰任书记。8月改为晋冀豫区党委（亦称太北区党委），李雪峰任书记，领导太行、太岳两地区党委。1937年10月，120师进入晋西北后，北方局成立了晋西北临时省委，1938月底，改称晋西北区党委，赵林、罗贵波任正副书记，领导晋西北、雁北、大青山地区党委。七七事变后，山西省工委改称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副书记林枫。太原失陷前后，省委移临汾，后进吕梁山^①。1938年夏秋之交，改称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书记，驻孝义。1938年3月，129师东进纵队进入冀南南宫地区后，成立了冀鲁豫省委，7月改称

冀南区党委，李菁玉任书记。山东省委于1938年5月依中央决定改称苏鲁豫皖省委，书记郭洪涛。原驻天津的河北省委于7月冀东暴动后撤销，工作人员大部进入冀东，12月底成立了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坚持平津唐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平津唐点线委员会，专一领导敌占城市的地下党，并改归长江局领导，负责到1938年秋。整个华北各地区的党的领导机构已趋健全。

党的领导机构建立后，大力进行了恢复与发展党的工作。到1939年12月，华北地区党员约二十九万五千人。

第二，运用多种方式建立地区统一战线。

在我军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如晋察冀、晋东南，我军进入后不久，就以共产党八路军名义派出县长，建立民主政权与群众团体，在此基础上，吸收友党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参加，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我军与友军插花共处地区，如晋西北，则组织了“战地动员委员会”（绥远称“军民联合抗战委员会”），联合友方，共同工作。通过这种统战性的半政权机关，动员与组织群众，建立武装，筹集粮款。在友党友军为主体的地区，则同进步人士合作，争取合法地位，公开的权利。如鲁西北，特委与国民党专员范筑先合作，以“政训处”名义开展工作，开辟了鲁西北地区。在山西，我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由我党主持了以阎锡山为会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以进步人士续范亭为主任，共产党员南汉宸、程子华为部长，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通过这两个组织，在山西各地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展了革命力量。

与进行公开统战工作同时，北方局还通过华北联络局、豫鲁联络局，派朱瑞、张友渔等，率领一批干部，对程潜、石友三、高树勋、李宗仁、于学忠、韩复榘等进行了联络，争取友好合作。

第三，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当日军进攻长城沿线时，北方局正确地估计到山西、太原不保，国民党必将退出华北，我党必须独立地坚持华北抗战的局势。于是，九月在太原召开了多次会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数十万人枪，组织强大集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持久抗战的任务。为帮助各地开展游击战争，中央、北方局此时派出一大批红军干部，分赴河北、山东，开办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当1938年2、3月日军集结主力进攻晋南、晋西、晋西北，占领黄河渡口，严重威胁西安和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主力须作战略转移准备时，毛泽东、胡服于3月24日电示华北各地区党委、部队，立即扩大武装，组建地方部队，准备主力转移后，坚持华北抗战。要求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再建四个支队，晋东南建六个支队，晋西南建三个支队，平汉路东组织若干支队。每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并具体规定，组织工作由各师及北方局领导人贺肖关、陈罗杨（尚昆）、刘徐邓朱（瑞）会同各省委负责。在此精神指导下，抗战开始后不久，各地党即组织地方游击队、自卫队，建立了无数支地方武装。4、5月以后，各地区主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猛烈发展。

华北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晋察冀方式。在敌人占领区，国民党政权垮台，我军进入后，地方党委与军队配合，以自己名义，派出工作团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委派县长，建立政权，自上而下建立各级领导机构。北岳区、晋东南，以及晋西南、晋西北的部分地区，属于这一类。第二种，山西方式。山西省委与北方局白区工作委员会以阎锡山名义，通过“牺盟会”、“动委会”和专署主任的合法身份，发展武装，委任县长，建立政权。太岳区、晋西南、雁北、晋绥边、晋西北和晋东北的部分地区，属于这一类。到1938年上半年，山西地区除北岳区、太行区外，归地方党通过“牺盟会”和“动委会”组织与领导的武装，有四个决死纵队，两个政

卫队，十三个游击支队，一个工人自卫队，共51个团，在太原失守前，约4万多人，后发展到10几万人。当时山西共划为七个行政区，一百零五个县，其中四个专员公署和七十个县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所掌握。第三种，山东、冀东方式。由地方党发动人民武装起义，组建军队，开辟根据地。冀中地区的开辟，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

在党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各地区党委，与八路军紧密配合，为开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1. 晋绥、晋西

晋绥地区，包括晋西北、雁北、大青山，是由八路军第120师和抗日决死队第二、第四纵队开辟的。

1937年9月28日，120师主力进入神池、八角堡地域。之后便战斗在雁门关和宁武、神池地区；次年春，粉碎敌军围攻，收复7座县城。师部组织了700多人的工作团，由关向应率领，以兴县为中心，在14县开展工作。晋西北临时省委（对外称120师政治部民运工作部）与工作团配合，通过“牺盟会”、“动委会”向各县派出县长，建立政权与群众团体。太原失守后续范亭率山西省“总动委会”机关转到晋西北，与我党配合，共同开辟了晋西北。与此同时，9月底，120师以716团2营为骨干组成雁北支队，赶赴平鲁、左云、右玉地区，10月4日收复平鲁县城。山西省“总动委会”组织的察绥游击队，于年底进入平鲁一带。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派赵仲池、郑林等在平鲁、右玉等地组织游击队。这几个方面的力量，以雁北支队为主，共同开辟了雁北地区。1937年底，晋西北省委成立了晋绥边特委，赵仲池任书记。1938年8月，120师遵军委、总部指示，以第715团和独立第4支队，组成大青山支队，9月初挺进大青山，晋西北省委成立了大青山工委，书记李井泉，后为武新宇、杨植霖。在绥西、绥中、绥南三个地区设立分工委。晋西北和大青山根据地初具规模。

晋西地区，为115师第343旅和山西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共同开辟。1938年2月，115师师部率343旅由洪洞进入汾阳、孝义地区，3月9日，进行了午城、井沟和汾离公路战斗，粉碎了敌人围攻，开辟与巩固了晋西中部地区。山西省委于此时由临汾进入乡宁山区，建立了离（石）中（阳）、洪（洞）赵（城）、乡（宁）吉（县）、（汾）河东四个特委，组织了政卫一支队、二支队和洪赵支队，开辟了晋西的南部地区。山西省委向晋西我军活动区委派了县长，建立了政权。晋西事变后，晋西部队与领导机关转入晋西北，晋西地方党转入地下。

2. 晋察冀地区。

晋察冀地区，包括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

北岳区，是115师独立团、骑兵营和120师第359旅开辟。1937年9月底，115师和120师第359旅进入晋东北、察南和冀西区。平型关战斗后，部队分散游击，师部组织了工作团，由罗荣桓率领，在平山一带发动群众。主力部队转进晋西后，留独立团和骑兵营坚持晋察冀。晋察冀临时省委在阜平成立了“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各县成立了工农青妇群众团体，在阜平、易县一带组织了40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11月聂荣臻奉总部令成立了晋察冀军区，统辖四个分区，省委按分区的划分，以涞原、五台、阜平、平山为中心，建立了四个特委。以晋东北山西第一行政区主任、共产党员宋劭文和“总动委会”的名义，向各县委派了县长，建立了39个县政府（含冀中已开辟地区）。1938年1月，在阜平召开了全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宣布撤销“总动委会”，成立了宋劭文为主任的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冀中区，是晋察冀的平原根据地。1937年8、9月，平汉线省委（后为保属省委）在安新、高阳、无极、正定等县，组成了自卫团、河北游击军、晋察冀抗日义勇军。10月，原东北军第53军

第691团，由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于晋县小樵镇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经与冀中保属省委联系，到高阳与河北游击军会合。1938年4月，保属省委召开党代表大会成立冀中区党委，会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同月，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了冀中军区，辖四个分区（9月又组建第五分区）。区党委在各个分区建立了特委。5月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到10月，冀中根据地包括了44个县的广大地区。

冀东区，是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冀东地区应迅速发动武装起义，坚持游击战争，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为加强领导，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先后派遣李运昌、胡锡奎、李楚离及红军干部李润民等进入冀东。冀热边特委（前后书记为王平陆、李运昌、胡锡奎）在迁安、玉田、滦县、遵化等县建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发展会员15000余人。在迁安、丰润、滦县一带组织了游击队。1938年6月，八路军宋（时轮）邓（华）纵队进入蓟县，7月6日开始，各地暴动。参加的群众约20万，组成部队10万^①，配合八路军攻克县城9座。起义后部队转移平西，遇敌攻击，受到损失。9月底，特委重新整理部队，建立政权，保持了冀东根据地。

平西区，七七事变后地方党组织了国民抗日军，活动于平郊、平绥铁路线两侧。1938年3月，邓华支队（由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组织）挺进平西，开辟了宛平、房山、宣化、涿鹿、怀安、昌平等地，地方党成立了三个县的民主政权，三个党的工作委员会。

^① 起义部队共10万，组成三路军，其中第一、第三路军为其他党派和进步人士组织，第二路军为特委领导，共约7万。

平北区，宋邓纵队东进时留下一个大队在白河西活动，地方党建立了昌（平）滦（县）密（云）联合县政府。

1938年底成立了冀热察区党委后，统一了冀东、平北、平西三地的领导。

3. 晋冀豫地区

包括太行、太岳、晋豫边三个区域，系由129师及115师第344旅、抗日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开辟。

1937年10月18日，129师进抵晋东南平定地区，经过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战斗，打开了局面。中共平汉线省委按北方局指示亦于此时由河北中部进入阳泉，后与师部会合，改称冀豫晋省委。此时，地方党已通过“牺盟会”掌握了以沁县为中心的第三行政区16个县政权及冀西部分地区。师部与省委进入后，师派出秦（基伟）赖（际发）游击支队、骑兵营、先遣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分赴晋中、冀西、晋冀边、冀豫边、太南等地开辟根据地。师政治部与省委组织了工作团，开赴沁县、长治、晋城、屯留等10余县工作。师主力第386旅向敌交通线展开，掩护开辟根据地工作。经数月努力，省委组织了20多个县委，成立了晋中、冀西、太南、晋豫、冀豫边等特委。恢复建立了平定、榆次、太谷、寿阳、和顺、辽县等县政权。冀西地区通过杨秀峰主持的统一战线的“冀西民训处”，建立元氏、赞皇等七县政权。全区组织了2万地方武装。同时改组成立了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统一领导晋冀豫区的政权工作。到1938年5月，晋冀豫根据地包括晋东南、冀西、豫北三个地区的30多个县的政权。

太岳区，为抗日新军决死队活动区。1937年11月，决死队第一纵队于太原失守前进入该区。薄一波利用山西省第三行政主任之合法身份，组织大批工作队到农村组织各界救国会、自卫队，选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县长、公安局长，在沁县成立了军政训练班，招收培养知识青年。冀豫晋省委于11月在沁县成

立了以安子文为首的太岳工委，1938年7月改为太岳特委，领导太岳12县的地方工作。特委在各县建立了县委，组织了太岳游击队。

1938年2月下旬，敌军进攻晋南，晋豫边特委协同活动于豫北、晋南的129师唐天际支队，组织了晋豫边游击支队，开辟了中条山地区。

1938年4月，太行区军民粉碎了敌人九路围攻，根据地初步巩固。之后，总部与省委重新划分区域，4月，成立了晋冀豫军区，统辖五个军分区，特委辖区也相应调整。6月间省委决定加紧建立政权，从7月起，全区开展了以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改造政权为中心的群众运动。9月，省委提出统一全区政权、武装与财经的任务，全区工作开始走向统一。

4. 冀南地区

冀南地区，由129师开辟。1937年10月，北方局派马国瑞回冀南，成立冀南特委，恢复各县组织，在南宫一带组成第五路军。1938年1月，129师以一个营兵力组成东进纵队，由陈再道、李菁玉率领进入冀南，3月派宋任穷率骑兵团，5月派徐向前率三个团相继进入，打开了冀南局面。部队进入后，冀鲁豫省委于1938年2、3、4月间，成立了冀南及各县“动委会”，组织了县级各界救国会，选举产生了统战性的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建立了30余县政权。8月，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了八大施政纲领。9月成立了全区农、妇、工等救国总会。军事方面相继成立了5个军区，1939年1月，正式成立了冀南军区。

5. 冀鲁豫地区。

冀鲁豫地区，在抗战初期系指直南、豫北及鲁西南的部分县区。抗战前，王从吾等在此地活动，党的组织普及大名、南乐、内黄、濮县等30余县。七七事变后，北方局恢复建立了直南特

委。初期归北方局直接领导，1938年春划归冀南的冀鲁豫省委。1937年10月，山东省委决定成立鲁西南工委。特委恢复后，首先对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进行了统战工作，利用半公开的地位，发展了党，组织了群众团体。10月，在内黄、南乐、清丰地区成立了民军二路第四支队，在曹县组织了抗日自卫队。1938年春，直南与鲁西南组织了约30万人参加的冀鲁豫边区救国会。1938年8、9月间，129师青年纵队、东进纵队进行了漳南战役，解放了漳河南百里地区。开辟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等地，特委在这个地区建立了安、内、汤3个县政权，7个县级党组织，组成3支游击队。1939年2月，冀南区党委将边区划为直南、豫北两地委，7个县委，3个工委。

6. 山东地区

山东抗日根据地，系由山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所开辟，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进入后得到巩固。包括冀鲁边、鲁西北、泰山（山）西、（微山）湖西、清河、鲁中、鲁南和胶东等区。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太原参加了北方局召开的华北省委书记会议返回后，在济南召开省委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在山东发动、组织人民抗战的指示，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会后全省各地纷纷起义。

11月，津南特委与鲁北特委合并为冀鲁边工委（书记于文彬），在盐山、庆云、乐陵等县发动起义，组织了“人民抗日救国军”。之后，1938年7、9月，由129师工兵连组成的津浦支队，343旅685团2营组成的第5支队，肖华率第343旅机关，相继进入，开辟了津南、鲁北所属15县地区，控制了乐陵、庆云两县城。9月成立了津南专员公署，建立了8县政权。1938年夏，冀鲁边工委改为冀鲁边区党委，马国瑞任书记。

1937年9月，山东省委派张霖之赴聊城，同国民党山东第六区专员范筑先建立统战关系，重组鲁西北特委（书记赵健民、后

为刘宴春），建立了寿张、阳谷等9县政权，组织了以堂邑游击队为基础的第十支队，开辟了鲁西北地区。

1937年12月，省委派张北华到泰西发动群众，1938年元旦在夏张镇起义，成立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不久成立了泰西特委，建立了肥城、东平、平阴三县政权。

1938年3月至5月，苏鲁特委和鲁西南工委（书记白子明）分别在丰、沛、肖、单、金乡等县建立了游击队，6月在丰县合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7月，苏鲁豫皖省委将两地党组织合并，成立苏鲁豫特委，书记王文彬。

1937年11月，省委成立了清河特委和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12月，清河黑铁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昌邑、潍县北部和寿光牛头镇起义，组成鲁东游击第七、第八支队，开辟了清河区。

1937年9月，鲁中工委成立，书记董炎。山东省委机关于十月转入徂徕山，次年元旦，以泰安“民众自卫团”为基础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后分两路向费县、博山发展，开辟了鲁中区。

苏鲁特委（书记郭子化）利用同李宗仁统战关系，以“动委会”名义，在沛、滕、峄等县开展工作。1938年3月，发动起义，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开辟了鲁南区。7月，省委成立了鲁南特委。

1937年12月，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文登天福山发动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接着，蓬莱、黄县、掖县起义，1938年2、3月攻克三县城，成立三县政权，7月成立了北海专员公署，开办北海银行。八月胶东特委改为区党委，王文任书记。

1938年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指示省委：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依此，省委于

年底对起义武装进行了整顿。除冀鲁边与鲁西北的部队，共编为八个支队。这支武装，在地方党委领导下，成为开辟与坚持山东根据地的基本力量。

从抗战开始到1938年10月这段时间，是华北根据地的开辟、创立时期。到1938年9月，全华北共建立了103个县民主政权。

三

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将其战略进攻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的政策由容共抗日转为限共、反共，敌顽我三角斗争尖锐化，华北抗日根据地处于敌顽夹击之中。

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确定在华部队向持久战略态势转移，确保占据地区。从11月开始，实行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方针。继9、10月集结三万兵力扫荡北岳区后，对冀中、冀南、鲁中、晋冀豫等区进行了数万人的连续扫荡。与敌军进攻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了限共、反共活动。1938年11月，鹿钟麟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派要员到冀中妄图收编我第三纵队，策划冀中独立四支队柴恩波部叛变。1939年6月，张荫梧部奉命进入冀中，在深县袭击我后方机关，并公开张贴布告，声言奉中央令取消我冀中主任公署。山东秦启荣于1938年3月、8月，制造了太和惨案，雪野事件。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朱怀冰部进入冀西，进犯太北。石友三部在冀南向我进攻。1939年，是华北地区顽我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我处于敌顽夹击的困难时期。既要前门抗虎，又要后门拒狼。

党中央预见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严重形势，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进一步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任务。为巩固华北，

党中央加强了北方局领导机构，调整了军事力量。

1938年11月9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一、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二、以郭洪涛、徐向前、黎玉、张经武为北方局山东分局委员，郭洪涛为书记；三、以聂荣臻、彭真、关向应、程子华为北方局晋察冀分局委员，彭真兼分局书记。遵照中央决定，六中全会后，杨尚昆率北方局机关于1938年底进入晋东南，随八路军总部行动。同年12月，苏鲁豫皖省委改为山东分局，晋察冀分局成立。

在军事方面，加强了山东、冀鲁豫和冀中、北岳区。遵中央、军委决定，山东方面，1939年1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1938年12月底，115师第685团进抵鲁西南，1939年1月进入湖西区，与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成立了苏鲁豫支队。3月，115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343旅第686团，由晋西进入鲁西，不久又东进鲁中、鲁南。冀鲁豫方面，2月，第115师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一部，到达鲁西南曹县，3月初将活动于直南、鲁西南的黄河支队、344旅特务团、冀鲁豫五支队，合编为冀鲁豫支队，统一了直南、鲁西南等冀鲁豫区的武装力量。晋察冀方面，遵中央1938年底决定，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师直属队、教导团、358旅第716团、715团，于1939年1月25日，由晋西北进入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三纵队、发展自己三项任务。120师359旅留晋东北，坚持恒山山脉地区，并归晋察冀军区指挥。1939年1月，晋察冀军区奉总部命以第四纵队为基础组成冀察热辽挺进军，肖克任军长，统一指挥冀东、平西、平北地区部队，为保障115师向冀鲁豫、山东发展，并巩固冀南和鲁西北，第129师师部率第386旅，于1938年12月下旬进入平汉路东，活动于冀南、鲁西北、

冀鲁边地区。

在这期间，北方局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巩固华北”的方针，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人民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粉碎了敌顽夹击，巩固了根据地。巩固华北的斗争，主要从反扫荡、反磨擦和巩固内部三个方面进行的，反磨擦斗争是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心。

在对敌斗争方面，继“集总”于1939年2月1日发出以游击战坚持平原，巩固山岳地带的战争指导原则之后，2月12日，北方局发出《对今后华北工作指示》，指出：1. 坚持华北长期抗战，为我党既定方针，必须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2. 一切工作以争取斗争胜利为中心，适合战争需要；3. 加强分区委地委独立指挥能力，各地区配备千人至千五百人的基干武装，坚持各区游击战争；4. 对平原地区及接敌区，要准备主力退出后转入隐蔽斗争；5. 加强自己队伍的组织与训练，使之配合军队作战。在此方针下，各地区加强了地方部队与人民武装的建设。

在反磨擦斗争方面，1939年初，集总与北方局对反磨擦斗争作了全面部署。1月9日，朱德、杨尚昆、朱瑞致中央书记处：鹿（钟麟）有取冀南，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之意，我须维持冀南，击破鹿之企图。办法是：1. 利用朱彭名义向蒋孔阎卫程致控告电；2. 积极向友军联络，争取同情，孤立鹿及其部下顽固分子；3. 晋察冀、冀南利用“一、二八”周年纪念日，在“拥蒋反汪”口号下游行，通电全国；4. 各部队、游击队应以适当兵力，积极向敌伪军活动，求得多打胜仗；5. 冀南各军应采取一切方法阻止与破坏鹿之扩展企图，对各地挑衅，必要时采取正当自卫手段。1月19日，朱德、杨尚昆等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对我军采取限制政策，华北各地，如冀中、冀南、津南、山东，磨擦日渐增加。近蒋下令各战区，禁止未奉军委令军队开往

他区，否则即行解散缴械，主要目的在制止我进入华中地区。近鹿致电朱德，要我基干部队撤出华北，归还二战区序列，游击队归其指挥。我应做下列布置：1. 积极向敌后活动，在冀南、冀中努力粉碎敌人进攻；2. 调整新编之部队，加强教育，增强战斗力；3. 115师直属队及686团迅速进入冀鲁边、山东，帮助整军。张（经武）黎（玉）部队及685团仍留现地，与雪枫部配合；4. 各部队加强对友军联络工作，争取同情；5. 深入与巩固各地群众工作；6. 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减少借口。1939年5月，杨尚昆著文分析了统一战线现状，磨擦表现、原因，提出了对策。强调坚持国共合作，有力反击顽军进攻，明确指出扩大自己力量是巩固团结、坚持抗战的有力保证。6月，公布了《解决河北问题的八大纲领》，提出了坚持抗战、武装民众、组织由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共同委员会、民主选举与减租减息、统一行政撤销双县长、双专员等主张。1940年1月12日，北方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统一战线反磨擦斗争的策略与政策，强调实行自卫原则，对来犯者坚决打击。在中央、北方局与总部的指示、部署下，华北我军进行了多次反顽作战，终于打退顽军进攻，4月，顽我双方达成协议，划区而治，华北主要地区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局面，局势走向平静。

在对敌与反顽斗争中，北方局大力进行了巩固内部、发展革命力量的工作。正当顽我斗争紧张之际，11月北方局发表了杨尚昆的《华北党目前的任务》一文，提出全华北党目前的任务是，在长期艰苦的连续的战争中，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在任何困难环境下坚持华北抗战。为此，必须广泛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树立地方武装，扩大正规军；开展民主运动，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实行村、区、县、专区的民选；彻底实行减租减息，适当改善民生；开展生产运动，组织互助合作社，克服经济困难；开展

敌占区工作，摧毁伪政权，缩小敌占区^①。在1939年和1940年春，华北党在巩固内部方面，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第一，从1939年起，军队开始分期分批整训。着重整顿编制，补充员额，健全政治制度，建立与健全军区、军分区领导机构，加强地方武装。第二，从8、9月开始，普遍审查干部，整顿支部，轮训骨干，巩固党的组织。第三，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整顿群众组织，建立与健全农、妇、青等救国会。第四，从上而下民主选举各级政府委员和县长、区长、村长，改造基层政权，开展民主运动。第五，初步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民生、实行民主、稳定财政经济的具体政策，如统一累进税，减租比例，选举法，劳动制度，等等。由于深入发动了群众，各方面进行了巩固工作，胜利地进行了反扫荡和反顽斗争。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巩固与扩大。

晋绥根据地，在120师主力进入冀中后，形势紧张。1939年春，晋西北遭敌五路围攻。3月至6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宣布解散“动委会”，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不准我军自行筹集粮款。12月发动晋西事变，向我进行武装进攻。晋西北区党委积极进行了推行合理负担、开展减租减息、整顿救国会等发动群众的工作。到1939年秋，晋西北和晋绥边各级群众团体领导机构相继成立。九月开始组织“牺盟会”和群众团体反击顽方，逮捕反动骨干分子，清洗新军中反动军官。晋西事变后，彭绍辉358旅及决死队第2、第4纵队，115师晋西支队，于1940年1月在临县消灭了赵承绶、郭载阳两个军的主力，将顽军全部赶出晋西北。大青山骑兵支队也于1月向傅作义部自卫反击。在绥中、绥西消灭了傅的“自卫军”总部及其主力第十团。至此，晋西北和晋绥边地区完全成为我党领导的根据地。1940年1月，成立了晋西北军政

^① 原文见《抗战以来选集》第2集上册，第58页至62页。

委员会，贺龙、关向应任正副书记；晋西北与晋西南两区党委合并，组成晋西区党委。林枫任书记、赵林任副书记。2月1日，在兴县召开了18个县的县长会议，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续范亭任主任）。颁布了晋西北六大施政纲领。接着，整顿了各级政权。绥远地区，建立了绥中、绥南、绥西三个专署，8月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后改为行政公署。

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遭受敌人频繁残酷的围攻扫荡。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共五个月时间，连续五次围攻冀中，3月至12月多次合击、扫荡北岳区。120师与晋察冀军区部队配合，进行了邢家庄、齐会、上下细腰、大龙华、陈庄、雁宿崖、黄土岭等战斗，大量歼灭敌人，粉碎了敌人进攻，巩固了根据地。晋察冀分局领导北岳、冀中、冀热察三个地区党委，大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仅北岳区，在1939年9月下旬反围攻时，就组织了20多万农救会员参战。粉碎围攻后，动员2万新战士归队，1万农民入伍。与反扫荡同时，进行了反顽作战。1939年6月，冀中部队将进入冀中的张荫梧部主力歼灭2千。北岳区于12月将进入雁北的白志沂保安团消灭，接着将国民党新二师、晋绥军政干部学校等部驱逐出境。由此，晋察冀的北岳和冀中两区完全为我控制。在对敌、反顽斗争中，加强了政权建设。1939年全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推行了统收统支，累进的合理负担，公粮税收制等有利于改善民生、保障供给的具体政策。到12月，边区政府辖有北岳、冀中2个行政主任公署，9个专员公署，67个县政府。到1940年2月，则辖有75个县政权。冀热地区，在1939年和1940年，开辟大块新区。1939年3月，成立了平西专员公署。5月前后成立了平西地委。11月区党委、挺进军确定了“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方针，以平西为中心，派出干部开辟了平北十三陵地区。1940年，区党委建立了昌（平）延（庆）怀（柔）、昌怀密（云）等四个县政权，在冀东建立了六个县政权。

晋冀豫与冀南根据地，是1939年日军围攻扫荡的重点区，也是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主要地区。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日军两次扫荡冀南。1939年1月和7、8月，两次扫荡太行。我军在反扫荡后，于12月发起邯（郸）长（治）战役。对邯长公路进行大破袭。攻占涉县、黎城两县城，坚持了根据地。与敌军扫荡同时，顽军乘机向我进攻，我军反击。1940年1月，太岳部队打击了进攻我军的27军，消灭了暂2旅，巩固了太岳区。太行部队打击了孙楚独立8旅，反击了朱怀冰，于3月在林县地区消灭朱属97军主力，巩固了太行区。冀南地区，我军于1940年2月至5月，集中了冀南、冀鲁豫、冀中三个地区的部队，在冀南、直南、鲁西南进行了三次讨伐石友三战役。经过反顽作战，我控制了冀南、太行、太岳共71县地区。在这期间，晋冀豫和冀南区党委，努力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健全领导机构，反对第二政府。1939年元旦，晋冀豫区成立了建立各种统一的群众团体领导机构的筹备会，接着整顿了群众团体。8月，北方局设立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太行区党政军民工作。1940年2月，鹿（钟麟）石（友三）南撤，太行、太岳、冀南三区连接。为加强领导，北方局与集总决定，太行、太岳分立，晋冀豫设立太行、太岳、冀南三个行政区。党的组织，每区设立区党委。行政组织，冀南为主任公署，太行为山西第三专署，太岳为三专署办事处。军事组织，每区设军区，将活动于太南地区的344旅、新1旅、决3纵及地方游击队合编组成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军事上统一于129师，党的组织直属北方局，而以太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之。政权统一于联合办事处。到1940年秋，晋冀豫地区共有太行、太岳、冀南3个行政区，15个专区，115个县政权。

冀鲁豫地区，经1940年春多次讨石战役，基本控制了鲁西南、直南、冀鲁豫边地区。反顽战役后，直南新建立了大名、濮阳、长垣等7县政权。成立了直南专员公署。4月1日，成立了冀鲁豫

区党委，张玺任书记。统辖直南、豫北、鲁西南3个地委，15个县级单位。4月30日，八路军第二纵队到达冀鲁豫，与冀鲁豫支队合编，成立了冀鲁豫军区。1941年1月，成立了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由此，冀鲁豫成为独立的战略区。

山东根据地，自115师入鲁、山东纵队成立后，得到巩固与发展。115师开辟与巩固了鲁西、冀鲁边、鲁南区。鲁西区，1939年1月，成立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3月，115师师部率686团进入。经樊坝、陆房、梁山等战斗和反顽战役，将运西、泰西、运东、鲁西北4个地区联成一片，1940年4月15日，召开52县各界代表会议选举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同日成立军区，辖4个分区。11月，山东分局将湖西区划入，冀鲁边区，到1939年夏，开辟了津南、鲁北15县地区，1940年秋后又开辟了惠民、阳信、无棣等县区。继津南专员公署后，又成立了鲁北专员公署，区党委辖津南鲁北两个特委。鲁南区，1939年10月，686团与地方游击队开辟、扩大了抱犊固山区，12月开辟了郯（城）马（头）平原区，鲁南建立了6个县政权。1940年4月，成立鲁南区党委，赵博任书记。10月成立军区，辖3个军分区。同时，山东纵队扩大与巩固了鲁中、清河、胶东等区。鲁中区，第一、第二支队在沂蒙和泰山区坚持与扩大了根据地，4月，原统辖鲁中、鲁南、鲁东南3个地区的第一区党委（书记林浩）撤销，成立鲁中区党委。清河区，第三支队开辟了小清河北和垦区，1939年4月，成立了清河特委，景晓村任书记。胶东区，1939年春，撤离蓬黄掖三县城，之后开辟了平（度）、招（远）、掖（县）边沿的西海区，大泽山南部的南海区，1939年9月，成立山东第三军区，3、4、6月成立了北海、南海、东海等特委。1940年特委改为地委，9月成立西海地委。胶东区党委辖东海、北海、南海、西海四个地委。北海专署也于1940年4月重新成立。

在这期间，山东分局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一度让

步过多，曾于1939年1月撤销了胶东北海专员公署。经中央4月致电批评，5月指示了山东工作方针，及时纠正。5月20日，分局作了《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决定》，强调改正忽视建设根据地的错误，加紧建立政权。从下半年起，各种领导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到1940年底，全山东共建立了95个民主县政权，14个专员公署，1个行政主任公署（鲁西），3个军区（胶东、鲁西、鲁南），冀鲁边、鲁西、鲁南、鲁中、清河、胶东等6个区党委。各行政区的各界救国会，也于1940年3月后相继成立。10月底8月初，召开了省各界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山东各界救国联合总会及工、农、青、妇救国总会。1939年10月，分局书记郭洪涛调离山东，朱瑞继任。

从1938年10月六中全会后，到1940年春，这一年多时间，是华北根据地巩固的发展时期。

四

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根据地扩大，整个华北敌后战场的基本区域为我控制，两年多来国共两党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结束。这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大发展之后，根据地需要进一步巩固，组织需要整顿，政策需要落实。由于顽军磨擦，在干部中出现了左的情绪，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因此，纠正左的错误，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成为当时极其迫切的政治任务。1940年春，党中央和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政策》等一系列有关政策与策略的文件。多次指示北方局与集总，今后华北地区应作深入的工作，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此后，华北根据地便由巩固的发展时期进入深入巩固，全面建设的新阶段。

反顽战役刚结束，北方局便于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称黎城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与转入巩固建设

阶段后根据地的各项政策问题。杨尚昆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会议澄清了干部中对统一战线的模糊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深入工作，全面建设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建军、建党、建政三大建设任务，批判了妨碍执行政策、建设根据地的左的错误思想。8月间，批准公布了《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领》，发表了杨尚昆在党校作的《巩固抗日根据地及其各种基本政策》的讲话。这两个文件，对根据地各种政策作了系统、具体的规定与说明。根据黎城会议精神，晋冀豫和冀南普遍进行了整编、整训军队，整顿党组织，制定施政纲领、条例，恢复发展工商业，统一财政经济等项建设工作，成绩显著。

但黎城会议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一，忽视了群众工作。第二，忽视了地方部队建设，出现了编并地方武装的情况。第三，虽然提出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但没有估计到群众运动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没有把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提到应有位置。加上发布了《人权保障法》，在群众没有深入发动的地方，这一法令实际起了束缚群众运动的作用。以致在黎城会议后，政权建设工作紧张地进行，而群众工作却出现消沉状态。为推动整个华北工作，9月15日到10月初，北方局召开了全区性的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政策问题。会上，杨尚昆作了《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彭德怀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根据地建设问题。两个报告除对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如政权制度、武装政策、统一战线、土地政策、财政政策、经济建设等等作了具体说明外，着重指出，“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摆在目前华北党面前的严重任务”^①，而建设根据地、决定政策，必须正确了解今天中国革命的性质，以

^① 见《抗战以来选集》第2集上册第202页。

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为原则，以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为立足点。要进一步依靠工农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保证基本群众优势，深入减租减息，“正确的解决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是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环节。”^①为具体指导各地工作，1941年3月，北方局专题讨论了冀南工作，分析了冀南形势，检查了冀南执行政策上的左右偏向，解决了落实政策的具体问题。4月5日，又趁晋冀豫边区成立临时参议会筹备会，准备7月召开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之际，发表了《北方局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主张》，进一步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

为适应新的形势，北方局调整了大行政区的管辖区域，健全了领导机构，加强了统一领导。经中央指示或批准，北方局与集总决定，晋西北地区，1940年11月成立了晋西北军区，统辖六个军分区；1942年9月底，成立了晋绥分局与晋绥军区，晋绥两区进一步统一。晋察冀地区，分局、军区和边区行政委员会，统辖北岳、冀中、冀热边三个行政区。晋冀豫和冀南区，1940年4月，以太岳特委为基础建立了太岳区党委，6月成立了太岳军区（辖三个军分区）太行、太岳分立。4月，成立了领导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地区党委的太行军政委员会。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晋东南第三、第五专署协议，建立了冀太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三个区的政权工作。9月，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领导太行、太岳、冀南3个区党委，晋冀豫与冀南两区统一。1942年11月，成立了中条山区的晋豫边区党委，12月并入太岳区。冀鲁豫区，1941年6月与山东鲁西区合并，7月组成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共辖7个地区，62个县，归北方局、集总直接领导。山东区，1940年8月6日，省各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行使政府职权的山东战时工作推

^① 见《抗战以来选集》第2集上册第172页。

行委员会，黎玉为首席代表；1941年2月成立了统一军事领导的新的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到1942年底，山东建立了鲁南、鲁中、冀鲁边、清河、胶东五个行政主任公署，18个行署统辖的专员公署，滨海、湖西两个省直属专员公署，92个县政权。

北方局黎城会议和9月会议的召开，统一领导机构的建立，推动了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根据地建设。

在党的建设方面，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1939年的整顿巩固，从1940年夏起，着重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地方党委包办政权、群众工作不深入的情况，北方局强调转入深入巩固时期，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深入发动群众上面，党政分开，转变作风，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为解决新时期的转变领导作风问题，1940年9月前后，各地区陆续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检查了工作。为使农村支部真正成为群众斗争的核心，战斗堡垒，北方局要求农村党组织必须把群众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根据地农村共产党员应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每个共产党员要团结三至五个或三至五家党外群众。依此精神，各地区继续整理农村支部，仅鲁西地区，1941年统计，共整顿412个。

在政权建设方面，主要是制定施政纲领，实行三三制，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各行政区的政权机关建立后，接着通过与颁布了地区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性的条例条令。山东临时参议会于1940年8月7日通过全省战时十大施政纲领，1941年1月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冀太联合办事处于1940年8月成立时，公布了施政纲领二十条和优待军属条例、人民武装组织条例。在此同时，在组织上整顿了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县以上政府均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府委员中只占三分之一。从1940年6月起，全华北地区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民主选举运动，对区、村政权进行了改造。

在军队建设方面，1940年1月至6月主要整训，中心内容是进

行时事政策与阶级教育，轮训干部。在整训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编。第129师部队，除原385旅、386旅及第2纵队之新1旅归师建制外，又新编了新四、七、八、九、十、十一等6个旅。晋西北成立了新军总指挥部，彭（绍辉）358旅改为独立2旅，晋察冀军区，补充了三万一千新战士。山东纵队于1940年9月，编成5个旅，两个基干支队。10月，115师编为6个旅。整训、整编后，主力部队有新的发展与提高。但这时对地方武装建设尚未引起高度重视。1941年11月北方局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各区建立数百支以占全体总人口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为标准的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之后，地方武装逐步加强起来。

在财政经济和劳动政策方面，北方局通过1940年两次高干会议，1941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1941年对晋冀豫边区提出的十五条主张，确立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具体政策与制度。这些政策是：第一，劳动政策。主张调节劳资双方利益，适当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业生产。规定，工人工资以实行能养活一个至一个半人为标准；工作时间除公营企业实行八小时外，私营企业一般保持九至十小时。第二，保护与发展私营工商业政策。确保一切抗日人士土地财产所有权，允许一切人民均有营业营利之自由，任何团体机关不得限制与没收，不得干涉与侵犯。欢迎海内外人士向根据地投资，开办实业。坚决纠正乱没收商品，工人要求过高的行为。第三，土地和农业政策。减租一般以二五减租为原则，最高租额不应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减息一般以分半为标准，利息一般一分半。租佃人与借债人必须交租交息。除此，还提出了扩大耕地面积，开发水利，发展农付业生产等政策。第四，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全部脱离生产人员不得超过根据地内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其中军队占百分之二，其余人员占百分之一。第五，财政税收政策。实行统筹统支，量入为出，预决算与会计制度。征收公粮由随需随征，

改为一年一征。征收原则，按收获量实行统一累进税，按收入多寡规定纳税比例，合理负担。取消不合理的田赋税收，纠正地富负担过重现象。第六，贸易政策。对敌占区实行统制贸易。根据地内实行自由贸易。第七，锄奸政策。不放过一个奸细，不错办一个好人，凭证据，禁肉刑。以上这些政策的确定与实行，纠正了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右两种偏向，团结了根据地的各个阶层，发展了生产，巩固了根据地。从1940年下半年起，根据地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基本群众的优势进一步树立，各阶层更加团结，地富分子稳定，社会安定。整个华北根据地，出现了工作上深入，政治上巩固，经济上升的新局面。在此基础上，胜利渡过了1941年、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

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使华北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期间，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全面蚕食、封锁，频繁的围攻扫荡。针对这一形势，北方局连续发出指示，召开会议，动员华北党和军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根据地。1941年3月，发出关于敌占区、接敌区工作指示，强调军队与群众武装配合，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八月，北方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及战争准备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和军队，深入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扫荡。11月召开扩大会议，确定加强地方武装建设，要求建设数百支游击队，百万不脱产民兵。1942年1月，总结了各地经验，指示各地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辟新区。5月4日，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指示，强调对敌斗争要以武装斗争为主，正规军要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力量，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活动，深入敌占区。根据中央、总部和北方局指示，1942年以来，各战略区实行了主力地方化，敌进我进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党政军民统一行动，全面加强了对敌斗争。鉴于平原地区斗争形势不利，北方局于6月22日，6月30日，

7月28日，分别对冀南、冀鲁豫、冀中区的对敌斗争政策及指导思想问题，作了专题指示。8月，发表了彭德怀、北方局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意见，强调坚持平原根据地，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从1942年冬季起，整个华北战场开始扭转了敌进我退局面，形势逐步好转。

1942年8月，杨尚昆赴延。8月29日，中央批准，北方局委员为杨尚昆、彭德怀、刘锡伍、罗瑞卿、滕代远，杨为书记，杨未回前，由彭德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彭赴延安，邓小平代书记。1945年8月20日，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北方局撤销。

五

华北根据地的创建，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华北地区党政军民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成果，是以军队为骨干的人民战争的胜利。北方局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实行了正确的方针，经验是丰富的。

在开辟、创立时期，实行了坚持独立自主、放手发展自己的方针。抗战爆发后，北方局抓住日军南犯，国民党南逃，敌后空虚的大好时机，动员与组织华北党撤出城市、转入乡村，组织游击队，发动武装起义，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红军主力进入后，密切地配合部队，宣传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及时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不受国民党限制，放手委任县长，自上而下的建立了政权，组织了群众团体。经验证明，开辟、创立根据地，首先是领导机关要明确树立以我为主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长期建设根据地，在根据地扎根的思想，反对右倾，反对流寇主义，反对“抓一把”。第二，必须有一支由党领导的人民的武装，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通过对敌斗争发动群众，把对敌斗争和发展自己结合起来。第三，必

须及时建立政权和群众团体，联合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由于北方局和“集总”比较好的解决了这几个问题，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了群众，大刀阔斧的开辟地区，因而，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便开辟创建了华北根据地。

在巩固的发展时期，实行了巩固内部、加强实力的方针。巩固的根本在于，切实实行减租减息，放手地扎实深入地发动群众，以此为中心，整训军队，提高战斗力；整理支部，训练党员，巩固和发展党；建立与健全政权及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大力发展群众组织。在发展壮大人民力量基础上，粉碎敌顽进攻，坚持了阵地，巩固扩大了根据地。

在结束了根据地区域内的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之后，实行了深入巩固的方针，进行了全面建设。建设根据地的关键，在于深入工作，正确的制定与执行党的政策，通过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优势；调节各阶级利益，团结各阶层，调动各方面抗日建设的积极性，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根据地。

在严重困难时期，广泛组织群众武装，使主力地方化，党委统一领导，组织各方面力量，全面对敌斗争，实行人民战争，敌进我进的方针。

华北党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共产国际和东征讨蒋战略

向 青

在党史、革命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急时期（即革命走向失败的历史时期），是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总结的。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紧急时期的经验教训，是深入分析和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经验教训的重要途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紧急时期，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而引起的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争论，是一个涉及整个革命力量重新布署、新形势下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问题，是一个革命战略问题，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中，大多强调当时奉军威胁武汉，或继续北伐可以同冯玉祥形成夹击的形势，从而肯定当时坚持北伐、拒绝讨蒋的战略。《周恩来选集》（上册）出版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工作者都学习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所撰写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这份送给党中央的意见书，是代表了正确的革命战略的。那时的党中央拒绝这一建议，毫无疑问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考察那时的决定，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坚持继续北伐、拒绝东征讨蒋，实际上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而且这也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东征讨蒋是在“四一二”政变后提出的革命战略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同他发动“三二〇”

事变时不同。蒋介石发动“三二〇”事变时，事前十分诡秘：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他的反革命面目已经暴露，有关蒋介石叛变的消息已广为传闻，而且也见诸于中外报章。至于蒋介石在上海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发生一场决斗，也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四一二”政变前，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派人到武汉去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和联系武汉党组织^①，要求武汉政府派兵支援。但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在上海发表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在上海工人阶级准备同蒋介石进行决斗的历史条件下，粉饰太平，散布和缓空气，从而便利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麻痹了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更为严重的是，汪陈宣言之后，陈独秀追随汪精卫前往武汉，说党中央要到武汉去讨论上海问题，实际造成了党中央从上海撤出，抛弃了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但是，党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并没有放弃同蒋介石进行斗争的努力，尽管他们没有得到武汉的支援，但他们自信“上海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势力最集中最雄厚最有经验的地方，上海工人在历史上做过二个很大的功绩，……如果能够继续（战斗）下去，中国革命运动有无（限）新希望，……。”同时，他们认识到：“我们可以认清上海的冲突（是）不能免的，如果上海的工人能与江、浙、武汉左派势力联合，一致把新右派势力打倒，则中国革命运动前途将大放光明，……。否则，我们工人力量都将大受打击，所有工会、学生会都将被打倒。”^②“四一二”政变前，尽管党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对于同蒋介石决斗富有信心和勇气，但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武汉方面的支援，相反的武汉方面却给他们大浇冷水，千方百计地制止他们的革命行动。

^①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中共中央派往武汉的代表为述之，子璋。

^②见罗亦农报告：《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

“四一二”政变前，党中央在武汉举行了讨论上海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召开时，以罗易为首的国际代表团已于四月二日到达武汉，陈独秀也已于四月九日到达武汉。会议大约是四月十日举行的，罗易、鲍罗廷、魏金斯基均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争论十分激烈，魏金斯基坚持认为蒋介石还可以挽救，不要去打击他。罗易等认为反对资产阶级是对的，不过蒋介石还可以争取，因此，主张派国际代表团中一人前去上海会见蒋介石，以便争取和蒋介石继续合作。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国同志异常气愤，说：你们如果派人去上海同蒋介石会谈，我们就把他禁锢起来，不让他到上海^①。结果这次会议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了一个计划，主张反蒋而又反对从军事上打击蒋介石。武汉政府则按兵不动，坐观上海时局发展。这次会后，党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魏金斯基来上海传达党中央会议精神，并要求李立三、陈延年、魏金斯基会合在上海的赵士炎、周恩来，组成五人特务委员会执行解决上海问题的任务。可是李立三、陈延年、魏金斯基到南京时，“四一二”政变发生了，他们赶到上海后，又接到了陈独秀的电报，电报反对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造成了“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党组织的动摇^②。

但是，中共中央在武汉会议上关于上海问题的决定以及“四一二”政变后陈独秀的来电，并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党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在上海召开了特委会议，出席会议的同志激昂地陈述了他们的主张，强调不能再对蒋介石退让了。会议认为应当举行武装暴动，并要求武汉政府迅速

①关于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会议讨论上海问题时所发生的争论，见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0日），冯菊波记。

②关于陈独秀来电反对我党在军事上打击蒋介石，见李立三在1927年4月16日特委会议上的发言。他说：“现在不是军事上犹移，已发生政治上的犹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出兵讨蒋。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是十分动人的，他从客观实际出发，总结了历史经验，阐明了自己的主张，提出了具体方案。周恩来指出：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下去）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指“四一二”大屠杀）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指汪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在）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都将）很大。周恩来又指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周恩来的发言，指明了政治方向，也指出了党中央武汉会议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指出不要由于怕蒋介石军事力量太大，而使自己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说明解决蒋介石军队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的。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革命战略，即先解决蒋介石的军队，而后可以北伐。周恩来的发言为到会同志所赞许，所以会上决定向武汉党中央发电，“发电名义——个人签名”，即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罗亦农均以个人名义签名，亦即五名特务委员中，除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外都签了名，而且党的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也签了名。会议决定“电文起草——决定恩来担任。”^①于是，周恩来撰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说：“蒋氏之叛迹如此，苟

^①见《特委会议记录》——传达中央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再犹豫，图谋和缓……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左倾军队日益惶惧”，“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因此，“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周恩来所撰写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是阐明出师讨蒋的革命电文，也是闪烁着真理光芒的历史文献。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很快就被那时的中共中央拒绝了。

二、坚持北伐拒绝东征是革命紧急时期的右倾错误

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革命斗争的锋芒必须对准革命的主要敌人。只有打击革命的主要敌人，才能分化瓦解敌人营垒，团结巩固革命阵线。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惧怕革命的主要敌人，不敢同主要敌人进行战斗。毫无疑问，“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已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南京政权已成为反革命中心，因此，革命斗争的主要锋芒应当对准蒋介石，主要打击方向应当是南京反革命政府。然而，大革命紧急时期，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却坚持北伐、拒绝讨蒋，回避同主要敌人进行战斗，以北伐掩盖其惧怕东征。因此，左派惶惧，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分子则“继蒋而起”，反革命叛乱不断发生。

应当指出：“四一二”政变后，强烈要求东征讨蒋的绝不仅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党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者。那时，整个革命营垒和全党革命同志都强烈要求东征讨蒋。当蒋介石叛变的消息传到武汉时，毛泽东曾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了《讨蒋通电》。通电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指出如不去

此“民众之蠢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在长沙，湖南工农商学各界六百余个团体四月十四日举行了十余万人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高呼“打倒蒋介石”、“彻底铲除压迫农民运动的军阀势力”等口号。湖南很多县的农民都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的群众示威大会。湖北省农协在讨蒋电文中写道：

“敝会誓率全省一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联合全国革命同胞，与此獠决一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①

但是，那时党中央为什么会作出了同整个革命营垒和全党革命同志迫切愿望相反的决定呢？毛泽东在谈到大革命紧急时期中共中央所作出的决定时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说：“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同时，毛泽东指出：“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②毛泽东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陈独秀的“独裁”和共产国际的命令，都是当时党中央作出背离整个革命营垒和全党革命同志迫切愿望的决定的重要因素。“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的政策、策略是十分重要的。纵观共产国际在大革命紧急时期的指导方针，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非出于共产国际的预料之外，所以蒋介石刚刚政变，共产国际立即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战略路线”。例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仅仅三天，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真理报》就发表了署名为斯捷茨基的文章。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加速事变的到来。……党的战略路线是，在集聚足够的力量以前，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组织获得巩固以前，避免同资产阶级（指蒋介石）开战。”斯捷茨基

^①《革命生活》日刊，1927年4月18日。

^②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第139页。

文章说得很清楚，“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战略路线”不是别的，而是“避免同资产阶级（指蒋介石）开战”。这也就是明确指出：不许上海工人阶级武装反抗蒋介石，也不准武汉政府东征讨伐蒋介石。那么能否说斯捷茨基的文章就代表了共产国际呢？其实这一文章的内容就表明它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因为除了共产国际而外，还有谁能给中国共产党规定“战略路线”呢？四天之后，共产国际第一书记布哈林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文章。认为：“现在公开同蒋介石交火”是不正确的，上海工人阶级应当“把武器藏起来暂不接战”，“及时将工人武装撤出战斗”。这就是说“不让别人解除自己的武装”^①，而由自己自动解除武装。正是由于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避免同资产阶级（指蒋介石）开战”的“战略路线”，所以，共产国际代表才在新形势下继续坚持妥协退让的策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也即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写信给蒋介石，说“早就想去会见你”，“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我们将愿意访问南京”，“第三国际……将提供帮助”^②，等等。四月二十二日，第三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团发表《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虽然宣称“现在蒋介石已经是民族的叛徒了”，但宣言却说：“我们看到蒋介石及他的代理人一切非法行动，是异常愤怒的，但是还希望他对于从国民革命而转到公开叛逆的道路，尚能稍事犹豫。”^③《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清楚地说明了他们在蒋介石政变十天之后也还是怀抱幻想。这就难怪他们在“四一二”政变后，坚持反对上海工人

①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载1927年4月19日《真理报》。

②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第三国际代表团罗易写给蒋介石的信，由武汉国民党新闻社发布，1927年4月14日由中国出版社出版。

③《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载《向导》周报第194期，1927年5月1日出版。

阶级从军事上打击蒋介石和武汉政府出兵讨蒋了。这时的蒋介石也主动地适应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软弱立场，他在“四一二”政变后继续装模作样，作出一种似乎并不反对共产国际的样子。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革命政府，当天晚上举行了一个大型宴会。据一位参加宴会并目击蒋介石在会上讲演的苏联军事顾问说：在蒋介石军队中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都被邀请去参加宴会。“蒋介石说，似乎鲍罗廷曾答应回苏联去，但他没有遵守诺言。他说：‘我曾给共产国际发了一个电报，询问鲍罗廷是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们没有答复我。问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态度如何？他们也一直不答复我！’……但是，几乎刚过一分钟，蒋介石发觉自己说得太过分以后，便捶胸顿足，向在场的人发誓说他不做凯末尔和墨索里尼。”^①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迅速地坚决地坚持继续北伐、拒绝讨蒋，这是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上述立场分不开的。这就是既反对蒋介石，又惧怕蒋介石，还对蒋介石抱有幻想。陈独秀由于坚持继续北伐、拒绝讨蒋，这就同党内积极要求东征讨蒋的革命同志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早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即“四一二”政变后四天，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这正是党在上海坚持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召集会议、起草电文强烈要求东征讨蒋的时刻，也即周恩来撰写《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的时候。这就是说，陈独秀等根本无视上海同志的正义要求，而匆忙地作出了《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决议说“为了扩大和深入中国革命，必须给奉军以决定性打击。”在谈到蒋介石叛变时，说战胜蒋介石要待武汉政府“有一个巩固的基地”，从而把东征讨蒋和建立巩固基地对立起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②即在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作出之后

^① “不做凯末尔和墨索里尼”指绝不反对共产国际。引文见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南京政府的成立”一节。

三天，武汉政府在武昌东湖誓师第二次北伐，继续北伐，拒绝东征讨蒋的右倾战略付诸实施。所以这时尽管党内思想混乱，争论不休，但这已无可挽回了。

事实正如周恩来在《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中所说的，反对东征讨蒋势必造成“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左倾军队日益惶惧”，“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所以继蒋介石“四一二”之后，李济琛“四一五”在广东反共。第二次北伐之后不久，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叛变，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叛变，直至“七一五”汪精卫反共。所有这些叛变都是“继蒋而起者”，所有这些叛变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所有这些叛变都是受蒋介石反动政权这个反革命大本营影响的。但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却竭力表白继续北伐、拒绝东征讨蒋战略的正确性。说：“何时可以妥协，何时需要转为进攻，要看具体条件。共产国际执委会特别认为，有些同志由于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而提出的一种策略是极不明智的。这个策略要求提早发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的起义，或者向他们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如果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进攻，那么他们就会被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武装力量所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精华就会在决无任何胜利可能的战斗中丧失殆尽。”^①但历史事实证明：上海工人阶级的精华并不是由于在“四一二”政变后发动进攻而“丧失殆尽”的，相反的却是由于不断地妥协退让而几乎“丧失殆尽”了。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急时期，曾经发生过是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的争论。这一争论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332～333页。

而是一个涉及革命力量布署、革命打击方向的革命战略问题。周恩来所撰写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提出了正确的革命战略，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但在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坚持继续北伐、拒绝东征讨蒋，实际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表现。但是中共中央的坚持继续北伐、拒绝东征讨蒋的战略是同共产国际的战略路线分不开的。我们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绝不可以肯定继续北伐、拒绝讨蒋的战略，因为这样做就会否定东征讨蒋的革命战略，而忽视了继续北伐、拒绝东征讨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

上海招牌工会的兴亡

姜沛南 陈卫民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我国新兴的工人运动中曾经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形形色色的招牌工会纷纷出笼，蜂拥而来，尤其是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其数量之多，声势之盛，远远超过真正工人组织的工会团体，大有喧宾夺主之态。这种风行一时的招牌工会，“的确是工人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的极大障碍”，中共为反对招牌工会而进行的斗争，“是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著成效的”^①。可见招牌工会问题在早期工人运动中的严重性。

鉴于前人对工运史上这个重要问题的论述，往往一鳞半爪，语焉不详，或者各执一端，立论偏颇；本文拟对上海招牌工会的兴起过程，它们兴起的原因和作用，它们同共产党领导的真正工会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它们怎样走向堕落和最后覆灭等问题，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一、招牌工会的兴起及其作用

上海招牌工会的兴亡史，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夏中共成立，招牌工会迎合时代潮流，乘虚而起，抢先占领工人运动阵地。第二阶段是从中共成立到1923年“二七”惨案，招牌工会的数量继续增长，但与中共领导的真正工会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双方激烈争夺工运领导权。第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1页。

三阶段是从“二七”以后到1925年五卅运动，各招牌工会逆历史潮流而动，纠集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破坏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堕落成为可耻的工贼组织，终于在五卅群众运动的高潮中被淹没。以下先对第一阶段的有关问题加以论述。

（一）招牌工会兴起的过程

大家知道，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我国近代工业的较大发展，我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开始跃登政治舞台，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工人们经过“六三”大罢工的锻炼，已不愿忍受公所、行会、同乡帮口及青洪帮等旧式组织的束缚，开始寻求和酝酿成立新的组织来加强团结，改善自己的处境。其时真正关心和愿意帮助工人的一批新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处在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的阶段，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组织工作。一些资产阶级人士及投机分子便利用这个空隙，乘虚而入，抢先在工人运动阵地插上许多工界团体的招牌，冒充新式工会组织，企图鱼目混珠，影响工人归附于他们。

在上海，从1919年5月起，一年之间相继成立的这一类工界团体达十个以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 中华工业协会，由国民党人冯自由、曹亚伯先后担任理事长，是在1919年4月发起，实际活动则从5月开始，到这年年底由留日归国学生黄介民（后来也成为政客）等主持该会工作。这是资产阶级政客和知识分子在上海搞起来的第一个工界团体。该会标榜“团结工界，振兴吾国实业，解除工人痛苦”。在五四运动中，该会曾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发表通告，主张“提倡国货，不用日货，不作日人之工”；接着又通告罢工工人，鼓吹“严守秩序，万勿暴动”，并在沪西、沪东召开工界大会，宣传他们的主张。6月该会通电主张拒签巴黎和约。8月，该会决定筹办义务学校，使贫苦工人得以就学。10月，该会曾讨论筹办工商储蓄银

行。11月，又召开紧急会，理事黄申芾等提议力争派代表参加华盛顿国际劳工会议，并要求按照商会例，工界应有选举国会议员之权，决定联络各工团一致进行^①。

1920年3月，张国焘（当时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后叛变）曾在中华工业协会一度担任总务主任，5月陈独秀也曾被该会推选为教育主任。据张回忆：“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发展组织……他并说明这是孙〔中山〕先生很重视的一件工作”。该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主张而已”^②。

2. 中华工界志成会，1919年6月中旬成立，是杨树浦各纱厂工头和昌明学校校长明润生发起组织的，以“提倡国货，振兴工艺，实事求是，无党无偏”为号召。该会成立后，推定大隆铁厂厂主严裕棠为名誉董事，决定招股一千股（每股5元），自造织机，筹办模范布厂，至9月间，制成布机一台投入生产^③。

3. 中华工会，1919年5月下旬开始筹备，“六三”罢工时曾决议各码头不起卸日货；7月初正式成立，发表宣言和章程，高唱劳动神圣，声称其宗旨为：“联络全国工界同人之感情，谋工人一切之福利，求达工业自给之目的”。该会会长陈家鼎，系湖南籍国民党政客，外出要坐三人小轿，还有随丁一名，曾任广东中国国民

① 参阅《五四运动在上海——1919年大事记》，载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② 本段参见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3月17日、5月19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76页。

③ 《民国日报》，1919年6月16日、30日；7月7日、14日；9月8日、29日。

策进永久和平会的评议长。副会长李荣魁，是虹口李荣记老板。总务科长陈国梁是北海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他在法租界开设民益中西新衣号和祥兴饭馆（12月，他与陈家鼎闹翻，退出中华工会，另组中国工会，会长吕静斋是某制药厂经理）。中华工会自吹有四万多会员，但它除了发一些通告外，在工人中很少实际活动^①。

4. 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1919年9月成立，排场很大。8月先开大型茶话会讨论筹备工作，国民党人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应邀到会演说，还有曹亚伯、陈家鼎等发言，均表示支持与鼓励。9月14日开成立大会时，据报到会约千人，该会会长是跟广东政界有密切关系的资本家卢炜昌，上海广肇公所董事，中华爱国公司的发起人。副会长为裁缝行业的王亨利和机器行业的杨广才。该会自称有会员四千余人^②。

5. 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1919年8月成立。该会主要发起人兼总务主任李恒林，是基督教徒，美商慎昌洋行电机工工头，又是江苏电气工业会社代表；书记长陈月夫是汇通公司执事兼中华电器材料公司经理；文牍主任庞子贤为基督教中华布道团总干事（该会成立大会就是借慕尔堂举行的）；工业部主任朱筱麋为英商电车公司总头目。该会在外商企业、洋行以及电料行、丝厂的电器工人中有一些活动，吸收了三百多名会员。该会后改称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还制定了行规十二条。这是受工头、小业主控制的新式行会组织^③。

6. 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于1920年4月2日借青年会殉道堂开成立大会，到会员二百多人，来宾有吴稚晖、陈独秀、曹亚伯、李恒林等人，前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陈的讲题为《劳动者底觉悟》^④。该会会员限于广东籍的轮船乘务员、机工和栈房工

①②③ 参阅《五四运动在上海——1919年大事记》，载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④ 参阅《五四时期陈独秀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载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头、装卸工等，是受工头控制的新式同乡帮口组织^①。

此外，还有上海职工公会，中华工界联合会，中华劳动公会，中国工会等有名无实的工界团体。

1920年上海工人首次纪念国际劳动节，就是由上述中华工业协会以次六个工界团体和上海药业友谊会（中药店店员的自发组织）联合发起的。筹备工作由黄介民等主持，陈独秀被聘为顾问，并在筹备会上演讲劳工运动要旨^②。五一纪念大会，到会工人有四、五千，因军警横加干涉，数易会场，最后开会时只剩下数百人，仍精神抖擞，挥舞红色纸旗，高唱劳动歌曲，并决议各工厂企业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临末高呼“劳工万岁”而散^③。会后由七团体联名发表《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中国通谍之答书》^④，前者抗议反动军警的蛮横压迫，后者向革命的苏俄政府表示敬意。这次纪念活动，固然是出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等的推动，也反映了当时第一批工界团体的政治态度是倾向进步的。

但从这些工界团体的立会宗旨和组织状况来看，很明显，它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工人组织的阶级工会。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力谋改变这种状况，一面出版通俗的工人小报《劳动界》，向工人群众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吁请觉悟的工人不要相信招牌工会，另组真正的工人团体；一面派李启汉、李中等同志深入到工人中去进行组织活动，在沪西小沙渡筹组纺织工会，在沪东杨树浦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10月发起，11月正式成立）。机器工会是职业工会，还不是产业工会，但它是在共产主

① 参看《民国日报》，1920年9月3日；1924年7月24日。

② 参阅《五四时期陈独秀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载上海《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③ 上海《新闻报》1920年5月2、3日。

④ 《民国日报》，1920年5月3日。

义者帮助下我国工人自己组织的第一个阶级工会。会章中明白规定会员限于各业机器工人，工头不得入会，凡非工人只能当名誉会员；并规定该会的目的，首先要“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①。接着，12月初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章和机器工会的基本相同。

当时共产主义小组的力量还很微弱，只能采用宣传和示范的方式来推动工人运动逐渐走上正轨，自然不可能阻止招牌工会的发展。从1920年秋到1921年夏，上海又陆续冒出工商友谊会、中华劳动联合会、驻沪参战华工会、首饰工业会等第二批工界团体，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工商友谊会。

上海工商友谊会，于1920年7月开始筹备，10月10日正式成立，名义上是上海店员的组织，实际上是工商混合（即劳资混合）的团体。它所标榜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互助，提倡储蓄，兴办实业”，与中华工业协会、工界志成会等宗旨相仿。所不同的是，该会成立初期曾获得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和革命青年赵醒侬（不久后入党）等的帮助，以新青年社名义代该会编辑店员周刊《上海伙友》。该刊内容有鲜明的阶级性，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该会的主要负责人童理璋是一个善于钻营的投机分子。他出身于店员，五四运动时曾参与组织救国十人团，成为上海地字七十二团代表，1920年5月当选为全市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评议员^②。他还曾代表一个唐姓店主发起组织山东路商界联合会，担任该会职员。他发起组织工商友谊会，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他与陈独秀接近，是利用陈的声望以资号召；待到羽毛渐丰，他就“同陈某绝交”，从第8期起自行接办《上海伙友》，一味宣扬劳资协调、店员要提高人格、安份守己等论调^③。他还假借团体之名，到处招摇撞骗，图谋私利；后

① 《劳动界》第九册，1920年10月10日出版。

② 上海《时报》，1920年5月19日。

③ 《上海伙友》影印本。

来在政治上也日趋反动，1924年投靠国民党右派集团，破坏革命运动，成为臭名昭著的工贼。

童理璋及工商友谊会的逐步堕落，是招牌工会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例，但这是以后发生的演变。在招牌工会兴起阶段，一般说来，政治态度还是比较好的。1921年4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启汉等出面，曾邀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工商友谊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筹备纪念五一劳动节，后因受到中外反动派的压迫，纪念大会未开成，但在5月1日仍有一部分人在工商友谊会集合，由李启汉率领，在沪西和闸北散发了很多传单^①。

（二）招牌工会兴起的原因

在我国早期工人运动中，最先出现的不是像西欧各国工人自发组织的那种工联主义团体，而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发起组织的各式招牌工会，究其原因，只能说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群众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种压迫，经济地位特别低下，文化知识十分落后，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所以在五四运动中虽有所觉醒，并有突破旧式组织的强烈愿望，但还很难自行发起建立新式工会。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深感自身的力量不足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抗衡，需要笼络工人群众给以一臂之助（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联络海员，组织秘密团体，为其携带武器），因此时机一到，他们便运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先恐后地打着“工界”的招牌（工界二字很含混，可以解释为包括工厂主和工人，这是中国产业不发达，阶级阵线不清楚的一种反映），发起组织为他们效劳的团体。这个时机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潮流。上海招牌工会的兴起，正是迎合了这股潮流。例如由陈家鼎领衔的中华工会成立通电中说：“敝会同入，内察众

^①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1921年4月21日—5月2日。

情，外观大势，迎世界之潮流，应时势之需要，一本至诚，组织斯会”^①。曹亚伯在中华工业协会一次常会上声称：“工会为一国实业进化基础，欧美早已成立，吾人宜亟起直追”^②。后起的工商友谊会，也宣称该会的成立是“世界之潮流，大势之趋向”，是为了“救国救民”^③。尽管这些通电和声明，不一定是由衷之言，但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当革命怒潮滚滚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是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招牌工会的兴起，确是当时时代的畸形产儿。

资产阶级人士热衷于组织许多工界团体，从其主观愿望上说，似乎不外乎两条。一是经济原因，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劳资双方曾结合在一起，共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使民族工商业获利甚丰，因此资产阶级人士希望通过工界团体的组织，进一步笼络和训练工人，为提倡国货、振兴实业而效劳。如前所述，一些招牌工会对此并不隐讳，几乎都把它作为自己立会的宗旨。在中华工会的通电中，除说明该会“纯为发展工业，振兴国货，宽裕工界生计”外，还说欲达此目的，“全赖有完善工会，陶养工人，扩张工业，力谋改良，以求精进”^④。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会长卢炜昌在成立会上说：“工人宜着力于道德上做工夫，勿畏劳苦，言必有信”^⑤。工商友谊会负责人童理璋也大肆鼓吹：“我很希望资本家与伙友同舟共济，则目的不难达到”^⑥。凡此种种，无非是在“实业救国”的美名下，鼓吹劳资协调，要工人为资本家多干活，并提高技术，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二是政治原因，工人处

① 《民国日报》，1919年8月30日。

② 《民国日报》，1919年8月24日。曹亚伯其人，于1921年初携款潜逃（据租界工部局同年1月13日警务处日报）

③ 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6月25日。

④ 《民国日报》，1919年8月30日。

⑤ 《民国日报》，1919年9月16日。

⑥ 《民国日报》，1920年7月30日。

于社会的最低层，一向被上流社会的老爷先生们瞧不起，但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能量，使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于是他们在“实业救国”之外，又高唱“劳工神圣”的口号，企图通过工界团体的组织，把工人运动纳入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斗争中去，使工人阶级继续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在“六三”大罢工中，中华工业协会和中华工会等，主张“不作日人之工”，“各码头不起卸日货”，却不赞成工人把罢工扩大到其他外商企业中去，尤其反对工人在本国企业中罢工（非但不应该罢工，而且还要加工），并一再通告罢工工人要“严守秩序，万勿暴动”。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评论“六三”大罢工说：“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有知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组织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了罢市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星期评论》第三号）这些都反映了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利用工人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军阀卖国政府的政治斗争，又害怕工人“过激”，越出他们所允许的范围。他们在五四运动后急急忙忙组织许多工界团体，正是为了欺骗和控制工人，防止工人阶级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三）对招牌工会作用的评价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就对招牌工会展开猛烈的抨击。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二册（1920年8月22日出版）上撰文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象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新的工会〔按指那些工界团体〕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所以他呼吁觉悟的工人赶快联合起来，组织自己的团体。《劳动界》第九册（1920年10月10日出版）上，刊

出李中在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工会“不要变为资本家利用的工会”，“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招牌工会名称的由来，盖源于此。《劳动界》第二十三册（1921年1月16日出版）刊载怪君（即柯庆施）的一篇短文，进一步指责由资本家或流氓政客把持的“一般挂了工会招牌的工会”，“我们的工会万万不要这般畜类来鬼混”！这些批评旨在唤醒工人群众与招牌工会划清阶级界线，为组织真正的工会开辟道路，这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当时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把攻击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及其招牌工会，完全否定招牌工会的作用，甚至骂倒一切，则是既不策略也不适合革命全局的需要。而在实际行动上，共产主义小组对一些招牌工会仍在做联络争取工作，如陈独秀在1920年10月再次应邀到电器工会去演讲，李启汉在1921年4月仍邀请中华工业协会、工商友谊会等联合筹备纪念五一节。这种宣传上的骂倒一切和行动上的联络争取，是颇不协调的，它反映了新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政治上的幼稚性，对招牌工会缺乏全面的评价和明确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对招牌工会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方针，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

继承上述传统，过去一些工运史论著对招牌工会的作用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不宜笼统地全盘否定，而应当仔细分析招牌工会在各个发展阶段所起的不同作用，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平心而论，招牌工会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主要不是在它们刚刚兴起的时刻，那时它们还有某些进步作用，而是在它们阻碍工人建立和发展阶级工会的时刻，尤其是在它们堕落成为工贼团体的时刻。

招牌工会就其本来意义上说，是指只挂招牌、不干实事的有名无实的工会。其特点是冒名全国的多，招牌很大，内容空虚；再就是工商不分，劳资混合，开口闭口是“工界”，混淆阶级阵

线，对于前一种弊病，国民党老右派马超俊也无法否认。在他主编的一本书中说，中华工会“从名义上看，该会俨然像是一个全国的总工会，而其实则空无所有，列名于该会为会员的，多数不是工人……该会并无基层工会，或其他团体为之隶属……冠有‘中华’的全称，诚属夸大的虚构”。又说，中国工会、中华工界联合会、以及中国劳工联合会等“皆为有联合之名，并无联合之实者”^①。马超俊只是从形式上批评招牌工会，那是“恨铁不成钢”；他当然不敢触及招牌工会的后一种弊病，即它的阶级实质问题。如前所述，招牌工会应正名为冒牌工会，它们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或御用人员（政客、流氓、工头等）冒用工会之名，企图拢络和控制工人群众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效劳。邓中夏同志在谈到五四运动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唱“劳工神圣”，组织中华工业协会时，明确指出：“这一类事实，无疑的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争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企图”^②。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但由此而全盘否定招牌工会，说招牌工会有好几十，“群众是一个都没有，这都是市侩和流氓办的。”^③这种说法未免失之偏颇。实际上，在招牌工会兴起阶段，虽有市侩流氓如陈国梁、童理璋等混迹其间，搞些招摇撞骗的勾当，但较多的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国民党政客）主持其事，参加的工人固然不多，也决不是一个都没有，如果那样，资产阶级去欺骗谁呢？不应忽视的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妥协性一面，还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一面，他们发起组织的工界团体，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六三”大罢工，与工人阶级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及军阀卖国政府；并创办工人义务学校，发起纪念劳动节，鼓吹提高工人地位、改善工人待遇等等。这些活动在当时

① 马超俊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第138、139页。

②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9页。

③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0页。

上海的报纸上也是“日不绝书”，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工人运动将兴未兴之际，客观上有助于被压在最低层的工人群众冲破中外反动派不许组织工会的禁令，有助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中去组织真正的工会团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招牌工会在初期所起的某些进步作用，是不宜一笔抹煞的。

二、真假工会的矛盾和斗争

如果说前一阶段招牌工会的兴起，是利用了新旧交替混沌初开的时机，钻了现代工人运动的空隙，因而获得一帆风顺的发展；那末，当进入第二阶段，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正的主人进入了工运阵地，招牌工会独占的局面开始被打破，真假工会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和斗争。

（一）招牌工会发展演变的趋势

在这一阶段，招牌工会在数量上继续有所增加，单是1922年新成立的就有：中国劳工同盟会，湖南驻沪劳工会（或称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上海职工俱乐部，女子工业进德会，安徽驻沪劳工会，上海工会，粤侨工界联合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中国机器工会上海支部（亦称上海机器工会，总会在广州），还有浙江、江西的驻沪劳工会，等等。连同原有的招牌工会，总数达三十多个。其时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真正工会还不到十个。招牌工会就是采取以数量取胜的办法，企图压倒真正的工会；而在质量上却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例如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持的资格最老的中华工业协会、工界志成会等这时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外省驻沪劳工会，或外省工会驻沪办事处，实际上是更少群众参加的挂着工界招牌的同乡帮口，在招牌工会的主持人中间，市侩流氓的成份不断增加。新成立的安徽驻沪劳工会，为要求恢复湖南劳工会事，竟送一个打拱作揖的电报给惨

杀劳工的军阀赵恒惕，希望他“提携劳工……时加奖饰”。这真是工人阶级的莫大耻辱^①！还有一个女子工业进德会，是由女流氓穆志英负责的，该会居然制订出五条会规：“本会会员，凡系作工丝厂者：（1）不得无故罢工，妨害职业；（2）不得吵闹车间，紊乱厂规；（3）不得偷丝窃茧，败名损德；（4）不得擅进帐房，寻事滋扰；（5）不得与管事者争吵，致伤和气”^②。这明明是厂主束缚工人的厂规，哪里是什么工会会规！这样赤裸裸地为资本家效劳的工界团体，在1922年虽说是少数，但却反映了招牌工会向工贼团体演变的趋势。

（二）中共进驻工运阵地及对招牌工会的方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决定集中力量，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辅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号召工人按产业组织工会。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出现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在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万工人进行了一百多次罢工，其中在上海就有七万多工人进行了四十八次罢工。这些罢工中提出的要求，都有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一般条件，而斗争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工会组织问题上，工人在罢工前后力争组织工会的权利，以便联合起来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量。这是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出现的特点，也是党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的结果。在此期间，上海真正的工会，除原有的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和沪西纺织工会外，又在劳动组合书记部辅导下，先后成立了上海烟草工人会（即英美烟厂工会），浦东纺织工会（即日华纱厂工会），邮务友谊会，海员工会，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由烟草工人会转化而来）等等，这是一批新生的按产业组织起来的阶级工会，是真正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会，虽然它的组织

^① 《向导》周报，第10期，1922年11月15日出版。

^② 参阅《女子工业进德会章程》，民国日报，1923年5月1日。

还不够健全和巩固，在中外反动派的压力下，时起时落，但它代表了工会运动的方向，有广阔发展的前途。

怎样对待已有的各式招牌工会以至旧式的行会帮口组织呢？中共对这个问题曾作过多次研究。在“一大”作出的《第一个决议》中，明确规定：“组织产业工会为我党主要目标”；“党应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精神”，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至于现存的同业工会，我党可派党员参加，作为加以改组的第一步”^①。随后，根据中央局1921年11月通告，各地党组织努力加强劳工运动，打算在上海“联络水手公所，沪宁铁路工会，电器工会；设法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以树立上海总工会之基础”，还打算在广州“组织全省建筑工会；改组机器工会，前由国民党人主持，今后拟运动使入吾党势力范围”^②。这就是对于原有的各种工会，党组织准备进行联络和设法改组。

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专门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决议中说，“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遍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并具体规定：“为工人们目前利益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准备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但是，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还规定共产党员应在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或基督教团体所组织的工会中（以至在旧式行会和由资产阶级用以欺骗工人所组织的团体里）进行活动，增长自己的势力，直到取得领导权为止^③。这个决议案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各种非无产阶级工会（包括招牌工会）

① 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② 参阅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载北京《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③ 同②，并参阅《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载《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的方针，即联络他们进行一些有利于工人的共同斗争，在斗争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并到它们中间去发展进步势力，把它们改组成为真正的工会，无论是进行联络或设法改组，目的都是要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根据上述方针，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上海招牌工会做了大量的联络争取工作。半年多时间里，比较重要的联合活动有五、六起。如1921年11月初，书记部率领真正的工会（机器、印刷、烟草、纺织工会），联合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等招牌工会，共十二个团体联名发表《上海劳工宣言》^①，反对商教联席会议包办所谓的国是会议，排斥和侮辱工人。1922年1月8日，书记部又联络一些招牌工会，共十余团体联合召开工界外交大会，反对华盛顿会议侵犯中国主权，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②。3月间，书记部联合中华劳动联合会、工商友谊会、湖南驻沪劳工会等团体，筹备和举行被湖南军阀杀害的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追悼会^③。4月中旬，书记部又联合电器工界联合会、劳工同盟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工商友谊会等，发起组织“浦东纺织工人经济后援会”，募集金钱和食物支援日华纱厂罢工工人^④。五一节前夕，书记部邀请上海各工团派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国劳工同盟会、工商友谊会及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均有代表前往参加^⑤。五一节下午，书记部和各工界团体又在上海联合纪念劳动节，会上宣传了“三八主义”（八小时工作等），三呼“劳动万岁”，会后在闸北一带游行

① 《时事新报》，1921年11月2日。

② 《民国日报》，1922年1月7—10日。

③ 《民国日报》，1922年3月9、27日。

④ 《民国日报》，1922年4月20日。

⑤ 《民国日报》，1922年4月21日。

庆祝^①。

书记部发起和参加上述一些联合活动，是为了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同时把在招牌工会影响下的一些工人争取过来，以加强全市工人的团结，发展真正工会的组织。但当问题涉及到工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时，招牌工会便竭力进行抵制，于是真假工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三）真假工会斗争的几个回合

1921年10月下旬，由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发起，召开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共商对付商教联席会议的办法。书记部为了一致对外，并辅助工人组织真正的工会团体，也加入了这个联席会议，并提出五项具体主张：否认商教的国是会议；预备召开真正工人、农民的国是会议；发布全国劳工宣言，谴责侮辱工人的赵某；暂设全国劳工的总通讯处于上海，作全国真正工人总工会的基础；快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真正工人的代表团，以作成立上海真正工人总工会的基础。前三项被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立即付诸实施；而在怎样组织上海各工团的总机关问题上，以书记部为代表的真正工会同招牌工会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招牌工会主张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凡属工界团体均可加入；书记部则主张成立“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其成员限于产业工会，防止那些非真正工人的、全国名义的及工商混合的团体借用各工团的名义来加入。经各工团联席会议筹备会的委托，书记部起草了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章程草案。但在11月12日联席会议上审议章程草案时，招牌工会五团体——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会，工商友谊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联合起来反对真正工会的五团体（书记部和机器、印刷、烟草、纺织工会），本来是五票对五票，相持不下，招牌工会却利用中华工界协进会代表担任执行主

^① 《民国日报》，1922年5月1日、2日。

席的机会，强使会议否决书记部的章程，接受招牌工会非法起草的“上海工团联合会”章程。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异议，认为主席既委托工界协进会杨某投票，主席已无表决权，岂有一个团体而发生两个表决权之理。杨某蛮不讲理，气焰嚣张地说：“组织〔各业工会〕代表团与本会当初发起召集的会议，性质不同，既是不同道，请异议者快退出这个会议去。”^①至此，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李震瀛愤然退出联席会议，临去前当众声明：“我们只知帮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对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的团体，皆为最猛烈之攻击。”并提醒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注意，不要“叫一班非工人的工会利用了”^②。

11月15日，书记部在《劳动周刊》上郑重发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③，再次批评了招牌工会，希望上海真正的工人继续努力，莫被那些招牌工会所利用。同一天《民国日报》上还发表了只眼（即陈独秀）写的《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指名批评了中华劳动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呼吁上海工人“赶快团结起来和冒充工人反对工人的奋斗。”^④

这一场斗争，表面上似乎是“各业工会代表团”与“工团联合会”两个名称之争，实质上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关于工会组织领导权问题的斗争。招牌工会的代表也看出了这一点，惊呼两种名称“性质不同”，“不同道”，所以他们顽固地抵制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合理主张，企图继续霸占工运阵地。但他们毕竟理亏心虚，加上内部有矛盾（如电器工界联合会态度摇摆，一度派代表参加各业工会代表团会议），所以上海工团联合会迟迟未能成立。童理璋操纵的工商友谊会，于1922年1月中旬另行发起组织劳动同盟会，使之成为“中央之机关”，因态度狂妄，无人响应，

①②③ 参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载《劳动周刊》第14号。

④ 转引自《劳动周刊》第14号。

童理璋的野心也未能得逞^①。

经过这场斗争，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千方百计巩固已有的印刷、烟草、纺织、机器工会，以各业工会代表团的名义开展联合活动，并深入到海员（水手公所）、日华纱厂和邮务工人中去发动斗争，组织新的工会，以增厚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与此同时，又尽可能地联合招牌工会中某些团体，进行共同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以扩大工人运动的声势。

在上海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高涨声中，上海一些招牌工会也应邀派代表去广州，参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大会过程中曾发生过真假工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主持会议的共产党人处理得当，大会仍然取得了成功，尤其是书记部的地位大为提高，会上通过了“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的决议^②，即公认书记部为全国工运的临时领导机关。半年前书记部曾在上海各工团联席会上提出：“暂设全国劳工的总通讯处于上海，作全国真正工人总工会的基础”，这个受到冷遇的建议，现在却在全国的劳动大会上实现了。半年前要书记部“退出”联席会议的上海招牌工会，现在也承认了书记部的领导地位；半年前反对书记部起草的各业工会代表团章程的上海招牌工会，现在也接受了（至少在表面上）大会通过的按产业组合的工会组织原则案。这不能不说是书记部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是招牌工会遭到的重大失败。

然而，上海招牌工会并没有真正认输，他们只是在工运高潮期间暂时隐忍一下。过了几个月，形势逆转，首先是在上海，租界帝国主义者于1922年6月逮捕了李启汉，查禁了《劳动周刊》，7月封闭了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烟草工会和浦东纺织工会也被军阀当局查封，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虽然全国各地罢

^① 《民国日报》，1922年1月20日；1922年2月8日。

^②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74页。

工运动仍继续高涨，党在上海工人中的活动却不得不转入地下，受到极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招牌工会又嚣张起来，公然反对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被封后迁往北京，上海另设秘密的分部）发起的劳动立法运动。这是又一场争夺工会组织领导权的斗争。

1922年8月，所谓中华民国国会在北京重开，宣告要制订宪法。书记部乘机号召全国各地工会进行劳动立法运动，要求国会取消“暂行新刑律”及“治安警察条例”（军阀政府颁行）中有关压迫工人的条款，接受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①。书记部明知那些国会议员声名狼籍，根本不可能通过有利于工人的劳动法案，但他们既已开会，正好利用这个合法斗争的机会，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以扩大影响，同时迫使国会表态，借以揭露军阀政府的假民主。这个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唐山、郑州和长沙各工会均召开大会，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惟有上海各工团迟迟不表态。书记部总部指派袁达时（书记部上海分部主任，后叛变），与沪上各工团接洽^②。当时已受到压制的少数进步工会，如浦东纺织工会、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印刷同志会及印刷工人互助会等，借某宅开会表示赞同，决定筹组劳动立法大同盟^③。而招牌工会各团体，在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却一致决定通电反对，并推童理璋等起草通电稿。当天到会的有工商友谊会，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国工会，中国劳工同盟会，中国机器工会上海支部，女子工业进德会，上海职工俱乐部，粤侨工界会，船务栈房工会，还有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等地驻沪劳工会等，号称三十余工团^④。

招牌工会反对劳动立法运动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劳动组合书

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转引自《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2期。

② 《民国日报》，1922年3月31日。

③④ 《民国日报》，1922年9月11、12日。

记部非劳动者所组织，没有资格代表全国劳动界提出劳动法案；二是非法国会没有资格制订宪法；三是黎元洪僭称总统，没有资格公布国会议决的法律。三条“没有资格”，其核心是第一条，后两条只是一种陪衬。因为招牌工会头头们明知，书记部对军阀政府不抱幻想，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正是为了跟军阀政府作斗争；但他们却装作不知道，借以贬低书记部，抬高他们自己。他们反对劳动立法运动，却不敢涉及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这十九条的主要内容为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八小时工作制及休假权、女工产假八星期、保障最低工资等等^①。也就是要保障工人阶级政治上经济上应有的权利，限制军阀当局和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上海招牌工会自作聪明，把攻击目标集中在书记部的代表资格问题上，企图避开劳动立法运动的实质；殊不知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深得工人之心，已成为各地罢工斗争的纲领。招牌工会把自己放在书记部的对立面，适足以证明他们所代表的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招牌工会企图继续霸占工人运动的阵地，因而与真正的工会发生了一场又一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时一些招牌工会，在政治上继续追随国民党，打着爱国的旗号，反动面目尚未完全暴露。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真正工会同招牌工会之间仍保持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统战关系，尚未公开决裂，双方斗争的胜负，要到下一阶段才见分晓。

三、招牌工会的演变和堕落

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遭到直系军阀的血腥镇压，各地进步工会大多被封闭，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①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76、77页。

上海工人运动的消沉期，也长达一年半以上。1923年的上海，在中外反动派的高压下，原先由共产党建立或者有党的影响的进步工会，绝大多数遭到封闭和摧残，党的活动受到严密的监视与限制。当时，“在上海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印刷工会〔改称印刷工人联合会〕，一个机器工人俱乐部和—个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改称金银业工人互助会〕，后来成立了一个店员工会〔店员联合会〕，人数却是很少”^①。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当局，“对于各团体之结社开会，均派员严密侦察”^②。一旦发生罢工，捕房警署即不问情由，任意拘捕工人。

在此期间，各种招牌工会——冒牌工会活跃起来，企图利用共产党和进步工会受到压制的机会，乘机夺取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它们是利令智昏，由暗中排斥共产党到公然反对共产党，由此逐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一）“二七”以后排斥共产党，乞求反动派保护

招牌工会堕落的第一步是，屈服于中外反动派的压力，申明自己与共产党无关，是“纯良”“正当”的团体，是主张“和平自救”^③，反对罢工斗争的，以乞求反动当局的谅解和保护。当“二七”惨案发生后，汉口方面曾派工人代表来沪策动罢工，一时风声鹤唳，空气甚为紧张，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宣布戒严，租界当局也严加防范。这时，安徽驻沪劳工会等招牌工会分子慌忙表态，说什么工人“本身衣食就不足以敷衍，一旦歇业，或稍停工，不啻夺其饭碗而致于死地……所以罢工二字非吾人愿，更非吾人所愿闻”。该怎么办呢？他们说：“吾人宁以个人之赤手空拳，以公理法律为利器与万恶的军阀奋斗”^④。他们与军阀吴佩孚、

①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21页。

② 《民国日报》，1923年2月25日。

③ 《工人自救会成立宣言》，《民国日报》，1923年4月19日。

④ 《民国日报》，1923年2月27日。

肖耀南“奋斗”的办法，就是发一通空泛的抗议电。他们多次集议，认为在此“工潮激荡之际，当取镇静态度”^①，于是决定推派代表去北京请愿，要求军阀政府迅立工会法，“以维劳工而安民生”。他们在请愿书中，说什么对于劳工问题，“纵政府之力，足以屈服于一时；而大局飘飘，终难维系于不弊”，“政府为顾全国体计，改良社会计，维持民生计，对此头脑纯洁有益社会之劳工，宜迅立工会法，而优待之，并将相当的保育政策，顺势而利导之，以助其健全之发育”^②。也就是说，政府要消弭工潮，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得采取一些安抚的措施。这是被军阀的血腥镇压吓破了胆的一些奴才的乞怜，哪里是什么“奋斗”！

这些招牌工会又以援助被难的京汉铁路工人为由，发起组织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为全国工人大团结之预备”^③，并宣布先行成立自救会上海部，积极筹备，以“实行工人和平自救之大策”^④。很明显，招牌工会企图以所谓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来取代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工运中的领袖地位。租界帝国主义者起初不了解招牌工会分子的一番苦心，误以为工人自救会系书记部李震瀛等发起，不准该会开会。各招牌工会急忙备函向租界工部局刑事检查科“呈明真象”，内称：“兹遍查各工团，均称与彼〔按指李震瀛〕不识，此不生关系之铁证也”。又说，工人自救会“如果与李震瀛有关，请贵科尽情检查，倘有确证，自应发封”云云^⑤。在此以前，该会已另函呈报法领事与法租界捕房，“伏乞准予备案保护”^⑥。参加工人自救会的，据称有十八个工团，大多数仍为老的招牌工会；新的招牌工会有上海纺织工会

① 《民国日报》，1923年3月3日。

② 《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请愿书》，《民国日报》，1923年4月10日。

③ 《民国日报》，1923年2月19日。

④ 《民国日报》，1923年3月30日。

⑤ 《民国日报》，1923年3月29日。

⑥ 《民国日报》，1923年3月15日。

（负责人为投机分子徐锡麟，他曾担任浦东纺织工会代表，后堕落成工贼）和浙江驻沪劳工会，此外还有中国机器工会上海支部，中华海员总会上海支部（这时已被国民党坏分子陈炳生控制，陈是海员总会会长，因在广州犯有杀妻罪避居上海），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负责人为高级职员邝公耀，后成为工贼）等。以上各工团相互推选陈炳生、王亚樵、陈国梁（中国工会）、陈广海等为自救会的负责人^①。

1923年夏，当全国人民猛烈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之际，上海各招牌工会也起劲地电请孙中山恢复总统职权，通电反对曹锟贿选，乘此时机，他们又另起炉灶，于七月初发起成立所谓“全国工界救亡大会”，据称到会二十余工团，每一工团推选代表一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结果却选出委员四十人（报上公布执委名单只有三十六人），除了上述工人自救会四个负责人，还有徐锡麟、穆志英、徐畏三、王光辉、邝公耀、关民生等人。此外，童理璋等也参加了一些活动^②。这些招牌工会分子借口“征求全国各处各业劳动团体代表”对救亡运动的意见，企图“组织一个全国劳动联合的团体”^③。他们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要控制上海以至全国的工人运动。

共产党和进步工会，在招牌工会尚未公开反共的时候，仍在可能范围内跟他们搞一些联合活动，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例如纪念1923年五一节大会，本是一些招牌工会发起筹备的，事前曾报请淞沪护军使署获得允许，这天下午，上海二十余工团、五百余人在北四川路青年会操场开纪念大会，与招牌工会站在一起的陈炳生及招牌工会分子陈国梁等，对军阀当局准许开会一再表示感恩戴德，并大肆宣扬“劳资合一”等论调；但进步工会——机器工人俱乐部代表等却在会上演说，抨击军阀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

① 《民国日报》，1923年4月5日；又据该报6月10日报导，陈炳生于6月初辞去自救会委员长职务去外地。

② 《民国日报》，1923年7月2、21日。

③ 《工界救亡会二次宣言》，《民国日报》，1923年8月2日。

狂。根据进步工会的建议，大会决定推派代表要求上海军阀当局遵守约法，保障工人集会罢工的自由权，恢复所有被封工会，释放被捕劳工领袖；并决定通电声讨惨杀工人的吴、肖、赵恒惕，定期追悼京汉路被害工友等^①。此后，机器工人俱乐部还参加了全国工界救亡大会的活动，共产党员欧阳笛渔是该会的执行委员之一^②。

1924年1月20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开会讨论纪念“二七”一周年问题，其时与招牌工会混在一起的张子余、周无为（此二人在1923年11月被开除出共产党）等已在西门斜桥抢先成立京汉路二七纪念会筹备处，意在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经党内讨论，大家认为“与其弄成两个二七纪念会唱对台戏的局面，还不如我们加入斜桥这个筹备会，而在其中起领导作用”^③。随后王荷波等同志即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及上海学联名义参加筹备会，在招牌工会分子徐锡麟主持的“二七”周年纪念大会上，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刘华同志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会上并散发了书记部编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印件，冲破了招牌工会对“二七”纪念活动的操纵包办^④。

（二）纠集成立工团联合会，堕落成为工贼团体

招牌工会堕落的第二步是，一些老的招牌工会分子与共产党的叛变分子及国民党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纠合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共反革命的工具。

原来在“二七”以后，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工团联合会有几个不坚定分子避居上海，因日久脱离群众监督，又受到国民党右派人士马超俊等反共宣传的影响，由动摇以至叛变。如原为共

^① 《民国日报》，1923年5月1、2日；北京《工人周刊》第94期，1923年5月23日出版。

^② 《民国日报》，1923年7月2日。

^③ 茅盾《回忆录（六）》，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④ 《各工团召开二七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24年2月8日。

产党员的郭寄生、周无为、陈天（湖北工团联合会负责人）等人，于1923年11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还有一个党员张子余（可能即为张志余，系中国劳工同盟会代表）也因动摇叛变而被同时开除出党^①。至于原京汉铁路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本为党外积极分子，“二七”后与北方的张德惠一样投靠国民党右派，堕落成为无耻的工贼。这些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叛变分子，逐渐被上海招牌工会的市侩流氓所同化，他们和湖南劳工会残余分子王光辉、谢作舟等人（马超俊称他们为同志）一样，也在上海挂起驻沪办事处的空头招牌，靠招摇撞骗过日子。以上这帮分子，在1923年还标榜拥护孙中山，待到孙中山接受中共的帮助，于1924年1月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时，他们就同反对改组的国民党右派（冯自由、马超俊等）相结合，实行反动，公开成立了以反共为宗旨的上海工团联合会。

上海工团联合会于1924年2月下旬发起筹备，筹备主任王光辉，副主任杨德甫，交际主任徐锡麟，交际员陈国梁等，庶务陈广海等，起草员谢作舟、徐锡麟^②。3月8日即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有上海纺织工会（徐锡麟），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海员工会，中国机器总会上海支部，粤侨工界联合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丝纱女工协会（穆志英），中国工会，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工会，宴业工会，湖南劳工会，湖北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及粤汉路工会驻沪办事处，安徽、江苏、浙江驻沪劳工会，还有所谓全国工界救亡大会，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等二十余团体。会上选出执行委员多人，主要负责人为：徐锡麟、王光辉、谢作舟、陈广海、陈国梁、杨德甫（杨不久离沪由郭寄生代替）等^③。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13页。

② 《民国日报》，1924年2月28日。

③ 《民国日报》，1924年3月9日；又据该报（1924年12月8日）报道，工团联合会还聘请国民党右派或接近右派的何世楨、张知本、黄介民（原为中华工业协会负责人）等担任法律顾问和教育顾问。

国民党老右派马超俊很赞赏这个工团联合会，在他主编的一部书中说，工团联合会所属共有三十二个工会，除上述各工团外，尚有上海船务栈房工会，参战华工会，西式木器工会，中国劳工同盟会，上海履业工会，“其会员总数当时号称三十余万人”。并吹捧说：“以往上海工团，咸各自为政，益形涣散，至是有上海工团联合会之创立，乃能具有团结力量，实足为工运发展的朕兆”^①。

由改良主义者陶孟和主编的《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则认为上海工团联合会“所含之工会，性质极为复杂……会内分子既不纯一，同情心当然不厚，此其势力所以不敌激进派之〔上海〕总工会也”。并承认“该会主要人物，多与国民党右派相接近”^②。

邓中夏同志直截了当地把上海工团联合会，称为流氓工会的大联合^③，确实是击中要害。就总体而言，上海工团联合会的成立，确已成为上海各色招牌工会——冒牌工会走向彻底堕落的标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破坏罢工斗争。工团联合会起先还标榜无政府主义（湖南劳工会残余分子一度信仰过），主张“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只要工会，不要政党”等等，借以反对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似乎他们是最关心工人的经济利益的。但当工人发起罢工要求改善待遇时，他们立刻撕下假面具，干起破坏罢工的罪恶勾当。小的罢工撇开不谈，单说1924年上海两次最大的罢工，丝厂罢工和南洋烟厂罢工，还有1925年2月日本纱厂的大罢工，每次都遭到工团联合会一些工贼丧心病狂的破坏。

1924年6月下半月，虹口十四家丝厂一万四千余女工，为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尽管厂主勾结军阀当局进行镇压，工人们仍

① 马超俊主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册，第261页。

② 《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第8页。

③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20页。

坚持斗争。在共产党人向警予等帮助下，女工们提出增加工资为五角，规定工作时间为十小时，释放被捕工人，承认工会等十六项条件，并发出宣言，不达目的决不上工。向警予同志又发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全国学生总会，闸北市民协会等团体支援女工罢工。但是工团联合会的一分子——丝纱女工协会（其前身为女子工业进德会）的会长穆志英，却背着广大工人私自前往南京，通过她的幕后指使人、江苏省议员吴彝伯，同资本家的代表、省议员陈仁厚进行秘密谈判，擅自把工人要求降低为增加工资一分，使罢工遭到失败。工贼穆志英却得到资本家的“优待”，在丝茧公所内附设丝茧女工会议处（丝纱女工协会改称），每月领取津贴三百元。穆志英回敬资本家的条件是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罢工，工人如果罢工即为破坏会章，一律开除出会^①。

同年9月9日，南洋烟草公司七千余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恢复被开除工人的工作，取消一切苛章，并开除制订苛章的高级职员邝公耀和李援（两人均为国民党右派分子，曾把持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为资方效劳，1924年2月被工人逐出工会）。资方指使工贼破坏罢工，勾结巡捕房拘捕工人，收买流氓强拉工人复工。罢工工人向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开除邝、李两工贼的国民党党籍，该部右派负责人张继、叶楚傖蓄意包庇，推诿不理。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罢工。在斗争的紧急关头，上海工团联合会的头目王光辉、郭寄生两人窜到该厂，与受资方雇佣的王祈发相勾结，用武力夺取了一度为工人掌握的工会领导权，王、郭两人被聘为工会书记，月薪大洋八十元，在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和工贼的联合进攻下，罢工失败，9月底，1700余工人被开除出厂^②。

① 《民国日报》，1924年7月3、8、9、19、30日；并参阅《妇女周报》71号向警予文。

② 《民国日报》，1924年9月10日，10月3日；《响导》周报83—85、94、96期；《中国工人》第1、2期。

对于1925年2月上海各日商纱厂三万五千余工人的大罢工，工团联合会一些工贼也伸出黑手进行破坏。他们以调解为名，组织所谓“上海维持日商纱厂工友罢工后援会”，公然与共产党人向警予等组织的“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唱对台戏，妄图“引工人趋于正轨”，避免“风潮蔓延，影响治安”。他们投靠淞沪护军使署和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双方达成协议：“一、官厅承认工团联合会为正当的诚意的调解，于必要时可酌量保护其进行。二、工团联合会须随时侦察工潮之状况，向交涉署报告。三、工团联合会须设法抑止工人之暴动。”^①工团联合会头目王光辉，甚至向日方人员提供罢工情报^②。安徽驻沪劳工会还向工人进行欺骗宣传，诬蔑罢工工人“难免强悍狡黠，品性不齐，或受共产主义从中唆使利用……工潮一发不可收拾”^③。最卖力的是工团联合会所属上海纺织总工会的头目徐锡麟，竟纠集一些流氓成立纺织工会沪西支部和沪东支部，阴谋分裂罢工队伍，包办与日本厂主的谈判事宜。在罢工中组织起来的真正工人团体——内外棉、日华、同兴、丰田、大康、裕丰纱厂工会，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否认上海纺织总工会及各支部之组织，严正警告徐锡麟等以后不得再造谣诬蔑^④。由于这次罢工斗争的矛头针对日本侵略者，得到社会各界包括一些民族资本家的同情和支持，更由于这次罢工得到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纱厂工人中已有党的核心组织），工人的罢工终于获得相当胜利。工团联合会的破坏阴谋未能得逞，只是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工贼嘴脸。

第二，破坏革命运动。在工团联合会成立之前，一些招牌工会在表面上还是反帝反军阀的，现在他们却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当局息息相通了。最突出的例子是他们在1924年公然制造了“双十

① 《申报》，1925年2月20日。

② 《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3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安徽驻沪劳工总会致各厂工友代电》，《新闻报》，1925年2月23日。

④ 内外棉纱厂等工会启事，《申报》，1925年2月26日，3月2日。

惨案”，打死了共产党员黄仁同志。10月10日下午，上海各民众团体借天后宫举行国民大会纪念双十节，讨论救国方针。全国学生总会代表郭寿华在会上演说：“我们国民，要一致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①言犹未尽大会执行主席喻育之（江苏省教育会会长）和坐在主席台上的童理璋（工商友谊会头目）就迫不及待地阻止发言，工团联合会属下的履业工会头目徐畏三及一群流氓涌上前去痛打郭寿华，童在一旁也大呼“打！打！”在会场担任纠察的上海大学学生黄仁、郭伯和、林钧等见状上前拦阻，也遭到流氓的毒打，被打伤的有十二人，其中黄仁同志因伤过重而死亡。童理璋还亲自打电话叫来警察，将被打伤的学生关押在一小屋内，准备解往警察厅治罪，后被愤怒的群众破窗而入，救出了受伤学生。事后工商友谊会等团体，竟在报上刊登启事，将坚持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学生诬为“肇祸者”^②。为此，上大学生会和全国学生总会发出通电，揭露双十惨案是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共同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要求国民党肃清一切内奸，惩凶抚卹。国民党上海市一、二、五、六、九区党部一些左派人士，也致电孙中山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本党立即惩办祸首喻育之、童理璋、徐畏三等，不得给予优容”^③，在各方面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才决定开除喻育之、童理璋的党籍。

1925年2月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时，工团联合会属下的中华工会有一个头目叫孙宗昉，竟代表“上海反共产男女同盟会”到上海县公署呈请立案，并在罢工工人中散发传单，诬蔑共产党，但群众不相信那些鬼话，把工贼赶跑了^④。

① 《民国日报》附刊评论，1924年10月12日。

② 《上海各工团联席会议后事》，《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7日。

③ 《民国日报》，1924年10月15日。

④ 《孙宗昉三出风头》，载《响导》周报第126期；《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24页。

由上可见，麇集在上海工团联合会内外的一些招牌工会已完全堕落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工具，堕落成为反共反工人的工贼团体。

（三）中共与工团联合会的公开决裂

在工团联合会成立之初，中共上海地委还曾打算加以改造。地委在1924年5月举行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报告说：“上海工团联合会虽是几个招牌工会所组成，与工人没有多大关系，但影响于工人的宣传和组织是很厉害的；并因上海地位的重要，还影响到全国，所以我们不得不竭力想法改组。上海地方已决定在二、三月内，组织或恢复十个左右的工会加入改组”^①。根据这个方针，共产党所领导的店员联合会、机器工人俱乐部、金银工人互助会、及浙江旅沪工会等一度加入工团联合会，建议修改章程，进行整顿，工团联合会头目中一部分人，如孙庸武（常委兼文书主任）等赞成整顿，于1924年10月1日从南市斜桥旧会址迁往虹口岳州路新会址，召开会议，决定修改章程，推选孙庸武、周无为、郭景仁（店员联合会负责人，当时为中共党员）三人为修改章程委员。但工团联合会多数头目反对整顿，如他们赖在斜桥旧会址，反诬孙庸武将会牌、图、记、簿册等私行移出^②。虹口的工团联合会未能战胜斜桥工团联合会的顽固派，到1924年底即停止活动。中共改造上海工团联合会的设想未能实现，后来才决定另行筹组上海总工会。

1925年5月初，围绕着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问题，中共领导的进步工会与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工团联合会实行公开决裂。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复兴和逐步走向新的高涨，根据广大群众的愿望，中共决定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二次劳大，由党领导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

^①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第33页。

^② 《工团联合会开始分裂》，民国日报，1924年10月4日。

团体发起召集。可是，当四大团体登报召集之际，上海工团联合会下属的三十三工团立即通电反对，其他一些地方的工贼团体也表示异议，它们说什么这次大会“用心险恶”，“不能令其代表全中国之无产阶级”云云^①。但他们的诬蔑攻击，无损于这次大会的毫末，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强调了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强调了工农联合，并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上海等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大会特别通过了铲除工贼的决议案，列出了全国各地罪恶最著的工贼名单。十九名工贼中上海占了头四名：王光辉，徐锡麟，郭寄生，童理璋；与上海有关的（即曾在上海活动过的）还有冯自由，马超俊、杨德甫等人^②。二次劳大的决议，特别是工贼名单的公布，给了上海工团联合会致命的打击。回顾1922年第一次劳大时，上海一些招牌工会还曾派出代表去参加，经过三年的演变，它们终于堕入了深渊，走到了尽头，历史是无情的，这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

四、招牌工会的垂死挣扎和覆灭

在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中，上海招牌工会作了一番垂死挣扎，最终被工人群众的怒潮所淹没。当新兴的上海总工会宣布成立并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后，工团联合会的一些工贼说：

“工团联合会是代表三十余万工人的组织，有三年的历史，难道还不如三天历史的上海总工会吗”^③？他们无耻地要求代表工界加入工商学联合会。可是对于工贼们的工团联合会，不仅工人切齿，连中小商人也知道他们没有群众和惯于招摇撞骗的丑史，所

①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1页，并参阅《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二册第356页。

②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69页。

③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16页。

以大家不许他们加入工商学联合会。6月4日，上海总工会借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所召开各工会代表大会，推选代表参加工商学联合会，有纱厂、印刷、电车、码头等五十二个工会代表二百余人。由李立三同志主持，各工会代表报告各厂罢工情况，统计罢工者已达十八万余人。其时工贼陈国梁等闻讯赶至，欲借大会进行煽动，各工会代表遂向彼等质问：“此次罢工风起云涌，你们即自称工团联合会，有何工会加入罢工？陈支吾无以为对，良久始谓码头工人亦为该会一分子，码头工人代表即起而否认，大呼我们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先生！”^①于是打倒假工会之呼声如潮涌，陈等乃狼狈退出，并宣称：“明天召集全体大会以示信”。6月5日，工团联合会果然在南市沪军营召开所谓工界大会，稀稀拉拉只到了一百多人。适值洋务工人一千余人也在同处开会，工贼乘机妄指洋务工人为自己的会员，以图掩饰，上海总工会代表即当众宣布工团联合会破坏南洋烟厂罢工等罪状，群众大愤，高呼“打倒工贼”！“肃清内奸”！结果工贼陈国梁、黎世良（船务栈房工会交际员，也是工团联合会委员）被打伤，余则抱头鼠窜而去^②。工团联合会的组织从此分崩离析，它属下的一些团体纷纷要求加入上海总工会，除了早已加入的上海海员工会外，老招牌工会中华电器工业联合会（会长李恒林，有会员四百人）等也转到了上海总工会的大旗下。

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上海总工会，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截至7月28日为止，总工会属下共有117个工会，217,804名会员。其时原属工团联合会的一些残余小团体，仍要求加入上海总工会，以便领取罢工救济费。为了改造这些团体，使他们摆脱工贼的控制，上海总工会特规定四项入会条件：（1）由彼方宣布工团联合会领袖王光辉、郭寄生、徐锡麟、童理璋、朱仁斌、陈国

① 《热血日报》，1925年6月6日。

②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16页。

梁、陈钟柔等罪状；（2）登报申明脱离工团联合会；（3）加入本会后须照本会章程改组；（4）救济费办法，各工厂工人在各厂工会领取，厂外的经调查属实后另行设法解决。总工会声称：

“此系加入本会之根本条件，彼方如有诚意，当然无不接收之理”^①。经过分化瓦解，工团联合会及其下属一些招牌工会的组织，至此已全部烟消云散，彻底覆灭。

国民党老右派马超俊主编的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五卅大罢工既实现，上海所有工厂大都组成工会，都隶属于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上海总工会遂成了“工界的权威”，“这时原有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乃相形见绌，黯然无光，因为工团联合会的工团本身，如所谓某省工会，或某某工会驻沪办事处者，或在沪并无基本会员，或所拥有会员又为畸零职业工人，而产业工人实居少数，这样的基层力量，自无法与上海总工会对抗”。这倒是说了几句老实话，可是笔锋一转，接下去马上说：“但是工团联合会的各工团领导者，多为久于工运的纯正人士，此际在实力上虽无法与总工会对抗，但在主持工运的风格上，却能具有监视的作用”^②。这就是说，尽管工团联合会的组织已被冲垮，但主办工团的一些工贼仍在“监视”着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伺机反扑。

在帝国主义、军阀、大资产阶级及工贼流氓的联合进攻下，上海总工会于1925年9月18日被戒严司令部封闭。该司令部并下令取缔一切工会组织，以示“公允”，因此上海工团联合会也于9月29日被解散。不过上海总工会虽然被封，但仍秘密存在，仍能秘密指挥各业工人作种种斗争，因为总工会已深入工人坎之中，这是敌人无论如何封闭不了的，所以后来就有几次总工会自动启封的事，而上海工团联合会早已名存实亡，既遭军阀解散，从此连

^① 上海总工会致韩觉民函，1925年7月31日。

^② 《中国劳工运动史》第二册，第486页。

“名”也不存了，在历史上彻底消失了。可是流氓工贼并未消失，他们仍以别种方式为反动势力效劳，一旦气候适宜，他们又会改头换面另组团体。但他们不敢再恢复原来的名称，因为那些名称臭味太重，已被广大群众所唾弃！

* * * *

综观上海招牌工会的历史，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它只生存了短短的六年，恰恰是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其所以兴起，是因为迎合了革命的潮流；其所以覆亡，则是违背了革命的潮流。尽管革命的潮流有起伏有曲折，归根到底，总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招牌工会的兴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条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律。

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带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盟坚持爱国、进步和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民盟的前身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它成立起，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时组成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团体在酝酿成立组织时，曾向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表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以及国民党左派”，并愿与中共“保持合作”，我党代表团“深表赞同”^①。民盟和我们党的合作关系在革命斗争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历史关节点上，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盟始终坚持斗争，对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抗战时期始终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的喝彩”^②。在国共所代表的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民盟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民盟成立的当天就发表了十条纲领，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明确提出：“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① 中央党校出版社：《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265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48页。

“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①，对我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以有力的支持。这一时期，民盟拥护抗战、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主要是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民盟不仅多次发表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召开党派会议，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政治主张，还坚决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派出参政员访问延安，和中共代表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正是在抗战、团结、民主的一致目标下，民盟和我们党并肩战斗，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争取和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民盟多次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要求和平，指出“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②。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还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举行反内战大会，积极支持反内战的昆明学生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接受中共和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要求，签定了停战协定，同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坚持民主的原则是民盟和我们党的共同战斗目标。抗战结束后，民盟反对国民党不许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接受日军投降，指出“凡是爱国抗日的军队都可以就近解除敌人的武装，都可以就近接受敌人的投降”^③。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民盟又和我党代表团共同合作，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坚持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合法地位等重

① 《民主同盟文献》第4页。

② 文史资料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02页。

③ 时事研究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言论集》第72页。

大的原则问题上，采取了和我党一致的态度。

“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是政协会议上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首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我党原则上认为应首先“政治民主化”，然后才能“军队国家化”。为了不使政协会议破裂，我党有原则地作了让步，认为国共两党“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主张两者“并行前进，归于一途”^①，“政治民主化做一些，军队国家化做一些，两者并行，逐渐达到一个民主宪政的政府”^②。我们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民盟的拥护和支持。早在一九四五年民盟临时全国大会就明确指出：“联合政府是实现军队国家化，彻底消弭内战、平息党争的唯一枢轴”^③。政协会议前民盟则表示军队国家化“必须与政治民主化并行之”^④。民盟二中全会也主张“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双管齐下，相提并进，”^⑤这和我们党的主张是互为呼应的。在政协会议上，民盟提出：军队国家化就是“任何党派的军队都要整编，不是只要一个党交出军队，也不应把其他军队看成就是国家的军队”^⑥，直接揭露和反对了国民党妄图取消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阴谋。

改组国民党政府问题是政协会议的关键问题。只有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才能真正实施和平建国纲领，整编全国军队，制定和实施宪法。民盟和中共代表一起，坚决反对国民党把国民政府委员会变成无权可行的清议机构。在会上，民盟提出了改组政府的三项原则，其中心思想是使各党派代表都能真正参加政府领导，使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构。民盟和中

① 四川人民出版社：《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157页。

② 江苏人民出版社：《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第57页。

③ 《民主同盟文献》第56页。

④ 四川人民出版社：《停战谈判资料》第371页。

⑤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65页。

⑥ 《政治协商会议资料》第210页。

共还一致认为旧国大代表无效，应重新选举，并坚持在政府改组后召开国民大会。

地方自治问题也是政协会议上争论的重大问题，这实质上是保存还是取消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重大斗争。我党坚持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保障解放区民主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而国民党“以日本投降后，解放区名词应成为过去”为由，否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否认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合法地位。民盟则积极支持我们党的“地方自治”主张。在政协会议前，民盟就提出“及早实施地方自治制”^①。民盟代表在政协上提到“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问题”时指出，应承认中共“抗日的历史性和“中共设施与政治的进步性”，“从法律上承认”解放区，并应“加以鼓励、支持和发展”^②。通过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共同努力，政协会议通过“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省制”的原则，这就挫败了国民党妄图取消解放区的阴谋。

在政协会议中，民盟与我党在政治上互相信任和合作，双方达成了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的谅解。尔后，民盟又与我党一起向国民党提出，要求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会中保证中共、民盟共同保留三分之一否决权；在未来的国民大会中，中共、民盟共同保留四分之一的否决权。由于民盟和我党的密切配合，政协会议通过了五项协议，实质上否决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内战政策，否定了国民党封建买办法西斯训政的法统。

政协会议后，我们党坚持政协路线，坚决反对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坚持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民盟也积极参加维护政协决议的斗争，指出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是“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内战之举，贻祸于子孙”^③，并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国

① 《停战谈判资料》第371页。

② 《民主同盟文献》第93页。

③ 《民主同盟文献》第147页。

外根源，明确指出“中国的内战，美国要负责任”^①，坚决拒绝参加伪国大和伪政府。民盟和我党的政治合作，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在维护政协路线的同时，民盟还积极参加和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支持“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参加上海各界组织的“二九”惨案后援会，支持并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如果说民盟维护政协路线的斗争，配合了我党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团结和教育了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使国民党陷于完全孤立，那么，民盟积极参加和支持一九四六年冬天兴起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则是和我党并肩作战，为在国统区形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在和国民党开展斗争中，民盟和我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从李公朴等六十人被打的校场口事件，到民盟主席张澜被殴伤；从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被捣毁到西北民盟机关报被封闭、报社人员被杀害的“西安血案”；从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到杜斌丞被枪杀，民盟的血和共产党人的血流到了一起。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的办事处被迫先后撤离，民盟也被国民党加上“中共之附庸”的罪名而遭受了政治迫害。十月，国民党诬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企图颠覆政府”^②。在国民党法西斯主义高压之下，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由此可见，从抗战时期民盟成立起，到解放战争中的民盟被迫解散，民盟和我党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苦斗中，患难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生死在一起。

^① 《中国民主同盟言论集》第82页。

^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五）第719页，155页。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民盟的斗争，大都是处在国共还在谈判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寻求避免战争、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召开了伪国大，我党还是尽最大可能争取实现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再次提出只要国民党遵守政协决议，“两党仍可重开谈判”^①，“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重大问题”^②。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各办事处被迫撤离，标志国共两党“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大门”^③。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斗争虽然是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分裂，还处于谈判中。党在这一时期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中，一方面坚持原则，坚决维护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也“始终委屈求全，在历次谈判中做到仁至义尽”^④。而民盟则以“中间党派”姿态出现，表示在国共之间保持“超然独立的立场”，但对于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独立”和“中立”，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并不是不辨是非曲折的乡愿”，公开声明民盟“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亦就是民主与反民主。凡是民主的都是朋友，凡是反民主的，都是敌人”^⑤。民盟二中全会更明确指出，民盟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⑥。把民主作为辨别是非、区分敌友的标准，这就使民盟在实际政治斗争中，保持了毫不含糊的原则立场。民盟的斗争历史表明，在国共两党斗争中，民盟确实分清了“民主的朋友”和“民主的敌人”，确实站在民主的朋友一边，和民主的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伪国大召开后，民盟已经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

①③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第442页，492页。

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五）第719页，155页

④ 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见《解放日报》1947年3月3日。

⑤ 《民主同盟文献》第64页。

⑥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66页。

裁、卖国的本质。不少民盟领导人公开发表讲话，指出“在内战中的中国人民根本不能超然中立”，“今天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之分，第三方面这一名词应成过去”^①。一九四五年九月召开的民盟第一届马来西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明确地提出，现在“民盟要和中共以及其他民主人士携手”，“根本推翻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派的联合政府”^②。这成为民盟三中全会开始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先声。

一九四七年十月，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后，我们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在我党的帮助和影响下，民盟也很快实现了这一历史转折。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召开的民盟三中全会公开申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③，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从此民盟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开展国统区的反蒋运动，争取国民党官兵起义，开展护厂护校活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民盟热烈拥护和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创建新中国作出了努力。

彭德怀同志在解放后曾经说过：“民盟和中国共产党是患难朋友，是创造新中国的朋友，也是建设新中国的朋友。在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反动派艰苦斗争的时期，民盟和我们密切合作，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残酷的斗争中曾有很大贡献”。“这些英雄奋斗的事迹，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④。解放前民盟和我党密切合作的历史表明，彭德怀同志对民盟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

① 《民主同盟文献》第163页。

② 民盟编《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第38页。

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

④ 见民盟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考文件》。

(二)

民盟作为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它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民盟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一些共产党员，而其主体则是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民盟在解放前的一段时期中，能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国民党拉拢利诱不能移，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淫威不能屈，历经种种艰难而不变，矢志和我党共同战斗，这不仅反映了民盟所处的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也显示了民盟作为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的历史特点。

中国革命是发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歧视，因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作为民盟主体的一大批受压迫、受剥削的知识分子，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负有责任感。因此，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必然逐步成为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同时，民盟自身的弱点也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实行合作。作为阶级联盟性质的民盟也程度不同地带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慢性，这就使它们本身不可能形成独立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要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只能向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寻求支持和合作。因此，民盟的历史特点决定了他们只有走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是根本对立的，而蒋介石集团正是集中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战以后，国民党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政策，反革命面目益加暴露，在经济上，他们要建立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在政治

上要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这就把自己放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他们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①。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加速了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醒。民盟主席张澜曾发表讲话指出：“国民党内的当权者多半是法西斯残余的军阀、封建的官僚的混合体”，并且从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官僚资本买办资本”这一本质上，认识到“中国目前的内战，实质上系民主与反民主之战”，认清了中国人民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从而表示民盟“要加紧团结全国各阶层的广大人民一致奋起”^②。民盟当时还指出，抗战胜利后，“在中国人民面前仍然存在着两个前途，一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去的旧秩序旧中国前途，一是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秩序新中国的前途”，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民盟明确回答：“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人民要求和争取民主的一个联盟的战斗体，它必然是中国要求和平争取民主的大多数的一部分。它绝不能站在极少数那边去，也不能站在中间”^③，而只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参加我们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对民盟成员殴打、监禁、屠杀；对民盟刊物限制、禁止、捣毁；对民盟组织攻击、瓦解、摧毁，更促进了民盟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作。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正确地提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消灭一般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2页。

②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245页。

③ 《中国民主同盟言论集》第7页。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相反，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按其性质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使新民主主义纲领代表了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①。民盟当时的纲领虽然不同于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已和我们党实现了在部分民主纲领中的政治合作。在政治上，他们赞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各民主阶级联盟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垄断资本和封建经济，主张国家的计划经济，赞成我们党当时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外交上，他们主张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支持我们党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民盟纲领已经部分地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②，这就形成了民盟和我党密切合作的政治基础。

应当看到，抗战结束后，我们党在不放松用武装夺取政权的同时，也努力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是要求国民党同全国民主力量成立联合政府”，“特别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又曾经多次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以图避免内战，并且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③。这一时期，由于还不具备全部实现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条件，因此我们党的斗争就是部分实现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斗争，这集中表现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建立联合政府。我们党当时提出的部分符合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政治主张，不仅争取和团结了民盟，而且又尽可能地把民盟的斗争提高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7页。

② 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是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纲领。参见拙文《论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民主同盟》，刊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13页。

斗争所要求的政治水平，推动了民盟和党的政治合作。

一九四七年十月，在我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后，我们党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全部实现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政治上，我们党从过去武装自卫的口号转变为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斗目标；在经济上，从过去揭露和反对官僚资本转变为直接提出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并从带有不彻底性的土改政策转变为提出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外交上也明确提出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正是在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影响下，民盟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项主张也实现了历史转变。一九四八年一月召开的民盟三中全会提出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独裁政权，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毁灭美蒋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从而使民盟和我们党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去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

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也是一条爱国、进步、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有过很多的曲折、反复和失误，然而民盟终究在不断抵制和克服内部各种错误倾向和消极影响中前进，最终走上了和我们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

民盟成立初期是由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组成的松散的政治集团。他们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立场。青年党、国社党为失意政客所把持，由于处于在野地位，也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他们更多是借抗日民主口号以营私；职教社成员大都感奋于民族危亡，

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民主自由，是国统区抗日民主斗争的一支力量；而救国会、第三党早就积极拥护和支持我们党的抗日民主斗争，反对国民党的投降、独裁，在国统区积极配合了我们党的斗争，代表了参加民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前进方向。民主政团当时所包括的三党三派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主张都不尽相同，除了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各个派别还有自己的纲领，各派领导中的政治倾向更有异趣。然而，当时各派都程度不同地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特别是民族矛盾作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暂时掩盖和缓和了各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因而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路线，从民盟成立初期就占主导地位。

民盟和我党的政治合作是通过民盟内部的分化和斗争逐步实现的，这种分化和斗争以民盟三次重要会议为标志。一九四四年九月，民主政团同盟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改变了民盟党派联盟的性质，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和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进步知识分子加入民盟，这对民盟的进步和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九四五年十月召开的民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判了青年党把持盟务，企图把民盟变成青年党工具的错误，并采取有力措施限制青年党在民盟中的派别活动，这促进了民盟和我党的政治合作。民盟的三中全会基本上接受了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是民盟和我们党全面合作的历史转折点。从民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到民盟三中全会，民盟内部分化和斗争达到高潮。前有政协会议和伪国大召开时，青年党和国社党在国民党反动派拉拢利诱下，相继从民盟中分裂出来；后有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政治迫害，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的爱国、进步和革命引起了民盟内部的分化和斗争，而这种分化和斗争更加促进了民盟的爱国、进步和革命。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第一，必须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

民盟成员和民盟中包括的一些政治团体，大多是因为国难家仇的激励，在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背景下走到一起来的，在他们身上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软弱性，这只有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中才能得到克服。民盟能实现与我们党的全面合作，就在于他们投身民主革命运动中，把自己的命运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因而从民主主义者走上了拥护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最早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民族危亡和人民苦难激励下，毅然决然地走出书斋，投入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直至英勇献身，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扬：“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周恩来同志也赞誉杜斌丞“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②。从爱国主义出发，逐步接近共产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民盟中许多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经历。这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只有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才有光明的前途。

第二，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民盟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沈钧儒等五十五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的宣言中。在这之前，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接受尚未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的领导，主要是接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在斗争中，我们党和民盟建立起政治合作，特别在政协会议上达成了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彼此协商的谅解，我们党的领导人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84、1385页

② 民盟《中央盟讯》1982年第1期第30页

常会见民盟领导人，交换意见，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和民盟领导人经常保持接触，宣传我们党的主张，支持和鼓励民盟斗争；一大批在我们党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参加了民盟，成为民盟的骨干力量，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直接参加民盟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帮助民盟工作，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民盟接受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从而使民盟从爱国、进步走向革命有了可靠的保证。

正是在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下，民盟才能在抗日时期坚持民主、团结、抗战的斗争中，在解放战争初期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抵制和批判青年党、国社党所代表的投靠国民党的反动倾向以及一些右翼代表人物所鼓吹“走第三条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从而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表明在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任何阶级和任何组织要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党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

民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它所联系的知识分子是广泛的，其中许多是社会上有影响的学者、教授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对于民盟和民盟所联系的广大知识分子，我们党历来重视他们的革命作用，把他们作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一九四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时，指出“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包括“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①，以此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中，把民盟成立前的第三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3页。

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教育社作为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还肯定了民盟在抗战中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表示对这一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①。支持和帮助民盟斗争，正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民盟成立时，我党就给予热情鼓励和支持，称之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一九四五年一月，民盟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我党的《新华日报》因发表这一宣言而被扣压。二月毛泽东同志又指示当时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的秦邦宪同志：“《民主同盟宣言》请予发表、广播。当《新华》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②。当民盟在国民党法西斯高压下被迫解散时，我党又鼓励民盟继续奋斗。

在联合民盟与国民党作斗争中，我们党对民盟高度信任。早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就提议召开国事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③。在党的“七大”上又提出，“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④。政协会议前，我党让出自己代表名额，大力支持民盟参加政协会议；政协会议期间，我党代表团和民盟代表朝夕相处，共商大计。周恩来同志还向民盟表示，中共和民盟在拟议中的国府委员的三分之一否决权名额，怎样分配都可以，体现了我们党对民盟的极大诚意。一九四八年三月，我们党又指出：“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89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6页。

③ 《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3册第10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68页。

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① 在政治上给予民盟以充分的信任。

我们党还十分关心爱护民盟成员。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国民党捏造《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诬陷“中共经常派遣代表列席民盟干部会议”，民盟“准备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五月五日周恩来同志为党中央起草指示指出，这是国民党为了“陷害民主人士和群众团体”，指出我党“蒋管区大城市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②。一九四八年八月党中央又发出指示，指出在蒋管区“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就会“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③，并帮助民盟各地方组织转入地下，使民盟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保存了力量。解放前夕，我们党还帮助援救被捕的民盟成员，挽救了许多民盟成员的生命。正是我们党对民盟和民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给予极大的信任和帮助，并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从而使他们能和党团结一致，为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解放事业，不惜流血牺牲，奋斗到底。

解放前民盟和党密切合作的历史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一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必然地要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只有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

^{②③}《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70页，311页。

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

石源华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集团所推行的“东亚联盟运动”是其全部卖国投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适应了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扶助汉奸政权、实行“以华制华”的战略需要。这个运动所标榜与鼓吹的所谓“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东亚解放”，“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既是毒化、奴化沦陷区的中国人民的麻醉剂，也是汪精卫政权赖以生存的自欺欺人的精神支柱。

一

“东亚联盟运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产儿。这个思想运动的产生、发展、变化都直接受到日本侵华政策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它在中国沦陷区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东亚联盟运动”的受胎萌芽，始于“九一八事变”后，建立伪满洲国之时。它“发源于日本国内参加满洲事变者人士之中”^①，其突出代表是石原莞尔。石原莞尔一九二八年起在关东军任职，“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使那支军队成为日本有名的、向大陆扩张的急先锋。石原和板垣征四郎大佐一起承担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使日本能迅速而有效地将她的势力扩展到整个满洲的广阔地区。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力量作了估计，制订了压倒这些军队的作战计划，然后着手说服他们关东军本身的指挥官和东京军事当局相信发动满洲战役是英明的”。甚至在没有得到日本军方和政府的直接批准的情况下，就在中国东北断然

发动事变。“他们把满洲当作一个堡垒，既可用之来对付南面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还可用之来对付北面的苏联”；又“把满洲看作一个战略供应地，能补充日本矿产资源之不足”，“以战养战”就是他们用来描述所谓满洲战略的“名言”^②。正是石原莞尔这样一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祸首，最早发起了“东亚联盟运动”。

一九四三年五月，石原莞尔所写的《告维新期中同胞》一文中有《东亚联盟运动小史》一节，供认了他们发起这个思想运动的原因及其经过。他说：在他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后，“在满的汉族同志，对于满洲建国的独立衷心不安”，“因为自己虽得讴歌王道乐土，但是从本国分离出来终是不免要遭受‘汉奸’之讥的！这对于民族精神迅速勃兴的中国同志真是一个难堪的苦痛。于此，中日两国所熟思深虑的事情，就是彻底整顿中日两国的关系了，其检讨的结果”，“遂以结成东亚联盟为满洲建国的目标”。因此，“东亚联盟运动决不是书桌上的空论，乃是以满洲建国为轴心的同志运动的实迹”^③。很显然，“东亚联盟”思想的宣传正是日本侵略者抛向伪满汉奸的一个诱饵，它完全是为着适应伪满洲国建立的需要。一九三三年，由关东军所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协和会发表成立声明，最早公开亮出了“东亚联盟”的旗号：“满洲协和会使基于王道主义的建国精神广泛地彻底地普及于国民，且纠合持有确乎信念之国民，排击反国家思想乃至反国家运动，以期完成民族协和之理想乡。同时，最后之目标，使此民族协和运动及于混沌状态之中国本土，进而使之扩展于全东亚，团结成东亚联盟，确保东洋文化之再建与东洋永久之和平”^④。这个声明表明：日本侵略者不仅要在东北，而且要在中国全土乃至全东亚，推行这个运动，以控制这些地区，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以及所谓满洲国等在内的“东亚联盟”的政治经济集团。

“东亚联盟运动”的第二阶段，始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

日本首相近卫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近卫声明说：“帝国所祈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希望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⑥。这表明：已经深深陷入中日战争泥坑的日本侵略者企图摆脱困境的迫切心情。“东亚联盟运动”的发起者石原莞尔此时也因此而成为日本军部的反扩张主义派，他指出：“中国有非常坚强而一致的意志来抵抗日本使用武力”，“因此，除非现在就解决目前的局势，否则我们就不免要陷入一场持久战”，“如果我们不能制订出一项合适的政策来解决冲突，相反继续盲目追求我们自身利益的话，我们将永不可能希望远东会得到和平”^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三九年日本国内的“东亚联盟运动”大为活跃，“一年之间，日本各地府县，东亚联盟协会支部建立了很多”，主要活动是“剖解中日事变的根源”和“议论”“改变东亚局势”，“日本东亚联盟协会，成为一个有力的运动体”^⑦。

与此相呼应的，是伴随着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从重庆出逃和汪伪政权的酝酿、建立，“东亚联盟运动”也在日本侵略军驻各地机关的分别策动下，在中国沦陷区发展起来。由于日本占领军对中国的各块沦陷区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因此，这个阶段的“东亚联盟运动”表现着区域性的特点，名目繁多，互不统辖，争斗不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在日本大使馆岩井英一的一手操纵下，“兴亚建国总部”在上海成立，以“拥护和平救国运动，彻底实行中日亲善，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为三大要旨，并成立了宣传、青年、劳动、专门、特种五个委员会以及“组党

准备委员会”，着手组织在野政党，后因汪精卫派的坚决反对而作罢^⑧。一九四〇年五月，华北“新民会”领袖缪斌在北平创建“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出版《东亚联盟》月刊，标榜“根据大亚细亚主义，主张东亚联盟之结成，共谋亚细亚民族之发展，其条件为政治独立，经济提携，军事同盟”^⑨。在武汉，以伪湖北省政府何佩瑤为首，在日军占领下，于五月恢复了民国初年的官僚政客集团“中国共和党”，打出“全民主义”的旗帜^⑩，主张“吾国与友邦携手，以求东亚联盟之巩固”^⑪。在广州，同时出现两个互不相关的组织，一个是以汪精卫派伪广东省政府教育厅长林汝珩为中心，于一九四〇年九月成立了“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另一个是以原广东“治安维持会”头目彭东原为首，发起组织“大亚细亚主义中国协会”，内设国内部与国外部，自称为汪伪国民党的“友党”，“主张亚洲诸国以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提携，俾实现共存共荣之宏愿”^⑫。在伪首都南京，情况也类似，一方面，在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支持下，前维新政府时代成立的“大民会”，发表《更新宣言》，鼓吹“贯彻大民主义”，“促进善邻提携”，“协力谋设东亚新秩序”^⑬，准备大发展；另一方面，汪精卫集团也鼓吹“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思想，并企图建立沦陷区统一的“东亚联盟”组织。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周化人与伪满洲国“东亚联盟运动”的狂热鼓吹者中山优沉瀝一气，忽而上海，忽而南京，酝酿发起组织。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汪伪集团建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这个半官方组织，由周学昌、周化人、刘仰山、戴英夫、汪曼云等二十三人为理事，并在这个组织的《简章草案》中规定：“凡与本会目的相同之国内外团体，应实行与之联络及互助”^⑭，明确地表示了要在沦陷区统一这一思想运动的意向。

“东亚联盟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紧接着一九四〇年底签署《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进行的。这一阶段

的主要特征，是“东亚联盟运动”由分散的、区域性的活动变为统一的、以汪精卫为领袖、以汪伪国民党为中心的活动。一九四〇年三月，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直接拉拢蒋介石投降，竟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政权不予正式承认，这使汪精卫之辈非常难堪。直到十一月，日蒋之间的秘密交涉失败，日本才决定承认汪伪政权，并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对于新中央政府，重要的是使其专事协助帝国加强综合作战力量，而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主要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指导，使它向我占领地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为了强化汪伪政权，该会议同时决定：“对帝国在华的各种机关，坚决实行改组或撤销，并加强实际措施方面的统制作用”^⑤。根据侵华政策的这种变化，日本侵略者向汪精卫提出了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这一全国性组织的要求，汪精卫则以解散日方在各地所支持的“兴亚建国总部”、“共和党”、“大民会”等在野政党、团体为交换条件。这些政党、团体直接听命于日本各地驻军或特务机关的指挥，对汪精卫常有不恭敬、不服从之举动，使汪精卫十分恼火，一心想取消这些组织，但又怕触动日本侵略者，迟迟不敢下手。这次，趁日本方面提出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机会，坚决要求取消这些组织，而让他们的负责人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批准^⑥。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汪伪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为“统一全国意志集中全国力量之必要”，“以完成和平统一，促进东亚联盟勸勉全党同志，策励全国民众”^⑦，决定建立统一的“东亚联盟”组织。在此前后，“兴亚建国总部”、“共和党”、“大民会”相继宣布解散，并集体加入汪伪国民党。汪精卫发表谈话，称这种解散为“积极的发展”，是为了“集合全国才力，造成中心”，“克服一切困难，达到共同目的”^⑧。会议决定增补华北“中国东亚联盟协会”缪斌、“兴亚建国总部”

袁殊、陈孚木、“共和党”何佩瑢、石星川、“大民会”孔宪铨等党派、团体主要头目为中央委员。这样，就为由汪精卫派独家主持“东亚联盟运动”扫清了道路。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日本方面又派出“东亚联盟议员促进联盟考察团”一行二十人，来到沦陷区活动，就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问题作最后的商定。这个考察团在南京、上海活动了一周后，返回日本。不久，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正式建立，汪精卫自兼会长，陈公博、温宗尧、陈群、陈璧君、徐良、诸青来、赵敏松为常务理事，梁鸣志、褚民谊、江亢虎、顾忠琛、张永福、徐苏中为常务监事，汪伪政权的实力派周佛海任理事会秘书长，周学昌、周隆庠任副秘书长，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分别任指导、宣传、社会福利三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汪伪政府各部部长及各省政府主席均为理事。总会会址设在南京宁海路原“大民会”旧址。同一天，日本首相拍电视贺，说“贵国之东亚联盟运动完成全国性统一的发展，基于东亚解放之见地，诚不胜感激之至”^①，汪精卫致谢词说：“远承电飭，弥用兴奋，谨当竭其心力，以达到东亚永久和平之共同目的”^②。

自此之后，“东亚联盟运动”作为日本侵略者控制驾驭汪伪政权的重要一环，随着日汪之间交往活动的涨落，时起时伏，不断有新发展，直至战争的结束。一九四一年五月，总会出版了《东亚联盟月刊》，作为机关刊物，以后这个刊物又与汪伪国民党宣传部的理论刊物《大亚洲主义月刊》合并，更名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作为宣传的指导中心。并陆续在南京、上海、湖北、广州以及苏淮特别区等地建立了分会，在分会之下又设支会、小组以及各种特殊的政治团体。如广州分会之下，先后在番禺、汕头、南海、三水、中山、顺德、花县、东莞、增城、从化、潮阳、潮安、澄海、宝安、博罗、新会等十多地建立支会，发展会员；又如湖北，不仅建立地方性的分会，而且还在分

会之下建立了“湖北分会军人同志会”，专门在伪军军官中进行活动；苏淮特别区分会则将该地区的伪青年团、少年团、妇女会等组织统辖起来，全面地控制了该地区的所谓“民众团体”。“东亚联盟运动”从思想上、理论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沦陷区的占领与统治。

二

日本侵略者把“东亚联盟”当作钓饵，抛向我国的抗日阵营，民族败类汪精卫之流则是自动上钩，咬住“东亚联盟”这个口号，作为叛国投敌的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对于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日派首领汪精卫本人也供认不讳：“我个人当事变发生时，在武汉，在重庆，都尝到了痛苦。在那个时候起，就注意言论了。日本的言论，自事变发生以来，是由东亚协同体进为东亚新秩序，更进而为东亚联盟的理论。日本是先进国，提出了各种理论，并使其发展，中国从而响应，而努力的使其诚意发展”^②。

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理论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逐步向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东亚联盟”思想呼应、靠拢以至最后融为一体的过程。

他们最早亮出的旗号是“和平救国”，其代表作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发表的《艳电》。当时，汪精卫集团以香港为基地，以《南华日报》为主要阵地，辅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与抗战派进行所谓“和战之争”。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国际援助之不可靠，愈战愈强是假的，阵线论早经破产，抗战已经证明是不能救国了”^②。认定：抗战是共产党的阴谋，必将导致亡国，只有实行“和平”才能“救国”。在这个阶段，汪派只是主张对日“和平”，还没有从理论上对中日关系作出综合的论述。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中华日报》在上海复刊，汪精卫集团的宣传中心也随之移到上海。汪精卫在该报复刊第一天的报上发表了《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全面地阐述了汪派的所谓“和平理论”。以此文为起点，汪派在理论宣传上就开始与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东亚联盟运动”相呼应了。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应该怎样呢？汪精卫解释说：“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着着前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与中国为敌。……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而根据平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根据这样的根本观念，汪精卫对数十年来的中日关系作了颠倒是非的判断：“中日关系所以不能改善，且日趋于恶劣，系误于一种循环论。例如日本说：中国排日，是九一八事变的起源；中国说：日本侵略，是排日的起源；日本说：中国要抛弃以夷制夷政策，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中国说：日本要放弃对于中国的野心，才能使中日关系好转。诸如此类，都是互相期待，互相责备，以致愈弄愈糟”。这就完全否定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性。汪精卫别有用心地造谣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被共产党完全利用了”，攻击中国共产党“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公开表示要以清末卖国贼李鸿章为榜样，说“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以补救一些。”他说：“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野心，而且伸

出手采，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也不伸出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了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②这篇文章虽还没有直接提及“东亚联盟”口号，但其基本思想是与日本侵略者“东亚联盟”的理论完全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汪精卫集团的这一派投降主义理论都是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进行宣传的。开始是只言片语地摘引孙中山的话，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汪精卫在《三民主义理论与实际》的演说辞中，更是公开打出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为旗帜，俨然一副“中山信徒”的架势，歪曲孙中山的主张，来掩饰美化自己的卖国理论。诚然，在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中，确曾对日本民族寄予极大希望，希望中日友好，共同建设东亚。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在赴北京途中，曾绕道日本，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等演说，主张“中日两国就目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国侵掠政策。”^③但是，孙中山的反帝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期望的中日合作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日本援助中国，废除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④，其中自然也包括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说：

“照我们的口头禅，中国同日本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是兄弟之邦，就几千年的历史和地位讲起来，中国是兄，日本是弟，现在讲到要兄弟聚会，一家和睦，便要你们做弟的人，知道你们的兄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奴隶了，向来很痛苦，现在还是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动力，便是不平等条约，还要你们做弟的人替兄担忧，助兄奋斗，废除不平等条约，脱离奴隶的地位，然后中国同日本，才可以再来做兄弟”^⑤。当场有人问日本同中国之间的“二十一条”是不是也要改良，孙中山坚决地说：“所有中国同外国所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要改良”。“二十一条要求也当然是在要改良之列。中国的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倘若美国对日本也有二十一条的要求，你们日本是不是情愿承受呢？当

然是不情愿的，既是自己不愿意，拿出恕道的和公平的主张出来，当然不可以己所不愿意的要求来加之中国。”^②孙中山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应该指出，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本性是缺乏认识的，他对帝国主义强盗要求“恕道”与“公平”的主张，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的空想。汪精卫利用了孙中山思想中的这个弱点，根本抛弃他的反帝立场，歪曲原意，大肆鼓吹“大亚洲主义”来为自己的投降卖国行径辩护，并煽惑人心，拖人下水。由汪精卫开头，一时间《中华日报》等汪派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批宣传“大亚洲主义”的文章，其中尤以汪伪宣传部副部长周化人写得最多，曾有“大亚洲主义专家”之称。他们反复宣传这样一些观点：“中日永久和平，必须建筑在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面”；“使中日两国利害趋于一致，转变对立的形势为平行的发展”；“大亚洲主义的精神，从正面发挥仁义道德的东方文明，以代替功利思想，……日本不以战胜国自居，则中国必极感动，以‘不念旧恶’或‘以德报怨’的中国道德出之，重建中日真正亲善之邦交，树立中日和平之百年大计。”^③汪精卫集团的这种宣传，在民族投降主义分子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些既有意于落水当汉奸、又想保持“中山信徒”桂冠的叛国分子都把“大亚洲主义”奉若神明，以此作为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和防御人民反对的挡箭牌，跟着汪精卫“名正言顺”地当了汉奸。

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最早文件，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汪精卫的《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它表明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训词中，汪精卫第一次提出了“东亚联盟运动”的四大纲领，即：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并阐明了“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的关系：“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之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实现”^④。

在汪精卫所正式颁布的“东亚联盟运动”四大纲领中，“政治独立”被赫然列在首位，这是他们的“爱国”表现吗？不！只要读一读汪精卫就这个问题对日本“东亚联盟议员促进联盟考察团”的解释，就真相大白了。他首先肯定“政治独立”并不妨碍日本在“东亚联盟”内处于指导者的地位：“照兄弟看来，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东亚而有联盟之设立，则日本以其先进国之资格，对于后进国居于指导者之地位，是无可疑义的。”接着，他说明了把“政治独立”作为四大纲领之一的苦心孤诣：“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然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之用之于亲日，而不用之于抗日”；“以中国今日所处危急的地位，一般民众所为朝夕徬徨，焦思忧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安危存亡，只是与之谈联盟，是不会有所深感的。我们必须使大家知道，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东亚联盟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提起大家积极的精神，以一样的精神用之于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也用之于促进东亚联盟，舍此别无他道。”^⑩这再明白不过地说明：“政治独立”是用来欺骗中国民众的，没有这一手，“东亚联盟”会一天也搞不下去。请看！汪精卫对他的主子是多么的忠心！针对日本方面怀疑“中国政治独立了，会不会改变方针，与欧美联合”的问题，汪精卫拍着胸膛，保证说：“这是绝对不会的，因为联盟纲领，明明白白有军事同盟的一条。军事外交相为表里，有了军事同盟，外交方针绝不会不一致，现在英美只希望我们两个国家厮打下去，和平运动，根本就和英美路线不相容”，“就算英美的方针改变了，我们为了东亚，为了共同的利害，既然联盟，自然要永远的站在一起，英美方针改变，我们两国对英美的共同方针，可以改变，但绝不是我们两国对英美的方针，会背道而驰”。汪精卫再次表明心迹：“还都以来，兄弟常常感觉自己力量微薄，自己所领导的

政府，也是力量微薄，然而有一点，可以自慰并以告慰于友邦人士的，我们的信仰始终如一。信仰就是力量之所从出，只要本着我们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继续不断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力量，发展力量。”^③如此“政治独立”，难怪日本侵略者也要拍手称好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目标下，鼓吹“黄色人种革命”，要把英美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因而，把“东亚联盟运动”推行的范围大大扩充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

首先，进一步抬高“大亚洲主义”的地位。他们不仅把它视为“东亚联盟理论之渊源”，而且视为“东亚民族革命之指导原理，东亚民族对抗外来侵略主义之自卫手段。”^④他们认为：

“大亚洲主义”是东方的民族主义，是王道的，讲仁义道德的，而西洋的民族主义是霸道的，讲功利强权的。周化人说：“西洋思想的最大流毒为功利思想，功利思想的根源，则为西洋的大民族主义。西洋的每一个民族都自认为最优秀的民族，都想征服别的民族，所以俄国的大斯拉夫民族想征服欧洲，德国的日耳曼民族也想征服欧洲，法国的大条顿民族也想征服欧洲，英国的大撒克逊民族也想征服欧洲，因为他们的大民族主义都是不相容的，所以战争永无已止，彼此的冲突无法避免。此种大民族主义威胁世界的和平，至巨且大”；“我们东方的思想，是与天地万物共存的，万类各生其生，各长其长，各不妨碍”，在作了这样的“东方西方民族主义区分后，提出要“清算”和“排除西洋的功利思想的民族主义。”^⑤他们声称：由于日本对英美开战，“中国自从和平运动发起以来所遵守而申明的大亚洲主义，已经由理论时代而进入于实行时代”^⑥。“大亚洲主义”是汪派理论宣传上的主要资本，这个时期他们又进一步从东方文化角度进行阐发，就

更增加了这种宣传的欺骗性。

其次，宣传集团国家的思想，把“东亚联盟运动”与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所颁发的第五十号宣传要点《关于东亚联盟运动》明确指出：

“世界政治现势趋于集团国家之倾向，此非集团经济以求自给自足，军事外交文化各方面之协力，亦有其必要，而地理上历史上之关系皆为重要之因子，东亚联盟之结成，实为必然之趋势，在此世变日亟之际，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⑤这实际上是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口号的论证与发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规定：“东亚联盟在消极方面排除外来侵略势力所加于东亚各民族之政治压迫、经济榨取，以恢复东亚各民族之独立自由。积极方面在复兴东亚之文化，创造新的社会秩序，以求得全东亚之安全发达，而贡献于世界之和平兴隆。”^⑥他们还娓娓动听地对沦陷区人民说：“东亚联盟之目的在自卫而非为侵掠，换言之，在求东亚各国兼相利交相爱，以谋东亚民族之共存共荣，在使世界人类各本于其自然之特质发挥其特长，以推动世界之进步”^⑦。

再次，鼓吹“黄色人种革命”，赋予“东亚联盟运动”以新的含义。汪精卫说：“百年以来英美两国挟其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双方并进之国策，美洲的红种，非洲的黑种，澳洲的棕色人种，次第受其摧残，不但国土沦丧，连人种也几乎沦亡。亚洲的黄种，亦同样受其厄运。自从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东亚共荣圈等口号，东亚诸民族认识一条光明正大的道路，向着共存共荣的将来，致其最大的努力”^⑧。如果黄色人种解放能够实现，那么世界人种的解放，也将“于此奠定其基础”。汪精卫极力赞扬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对于“黄色人种革命”的意义，他说：

“菲律宾已脱离美国的羁绊了，马来已脱离英国的羁绊了，我想荷印以及缅甸等处的民族解放之期，也不在远。澳洲以及印度解放

之期，也接踵而至。整个世界的地图，从此将洗去凄惨的颜色，显出光明灿烂的异彩”^③。在鼓吹这种谬论时，汪精卫集团十分阴险地利用中国人民对英美帝国主义百年来侵华行为的痛恨，摆出一副“反帝爱国”的面庞，以售其奸。例如一九四二年八月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一百周年，汪伪行政院宣传部专门发出第八十二号宣传要点，要求各报社各通讯社各杂志社以及各宣传机关“著文宣传，以增强国人反英美之情绪，而其热诚于保卫东亚之努力”^④。这个宣传要点指出：“英美帝国主义一日不打倒，则中国之独立自由一日不得确保”。“现在友邦发动大东亚战争，正中国解脱英美侵略势力千载一时之良机。我人应以愤激来表示痛心，应以奋斗来湔洗过去之耻辱。”英美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自然是要反对的，然而，汪精卫集团的“醉翁之意”却是在借反对英美之名，行日汪勾结之实。

最后，他们把所有这些宣传归结到“中国之存亡安危与东亚之存亡安危不可分离”^⑤。他们把中国的前途寄托于所谓“大东亚圣战”，恐吓中国人说：“此次战争若不幸而为英美所败，则整个东亚民族，将随印度民族及非洲的黑色人种、澳洲的棕色人种，同受奴隶的待遇，整个东亚将永久为英美的次殖民地，没有翻身的希望。反之，如果战胜了英美，则百年以来的侵略势力，一扫而空，东亚得到解放，中国得到自由平等。”^⑥为此，他们发起所谓“精神总动员”来担负“新使命”；“中国之解放，有待于东亚之解放，而东亚之解放，有待于大东亚战争之完遂，又有待于中国进一步分担其责任。”^⑦这样，他们就把其整个理论的落脚点，放到要中国人民为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扩张政策效力之上了。

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再到“东亚解放”，实现所谓“黄色人种革命”，形成了汪精卫集团一套完整的投降主义理论体系。汪伪政权在进行以“东亚联盟”为中心的这种宣传运

动方面，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们捕捉各种时机，例如“国府还都”、“中山逝世”、“太平洋战争爆发”、“国庆”等“纪念日”。举办各种宣传周，突击宣传；每逢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胜利，就强迫沦陷区人民举行群众性庆祝集会乃至提灯晚会；他们重视报刊、电台、电影、戏剧、歌咏、美术、街头宣传各种形式的宣传；他们甚至还组织各种“突击宣传队”到民间，乃至穷乡僻壤演讲及散发传单、分贴各式漫画、举行鼓动性的演出，来进行这种欺骗宣传，自欺欺人。汪伪政权本身也正是在日本侵略者刺刀的扶植下，靠着这种荒谬的理论支撑，度过了五年五个月，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最肮脏的一页。

三

当“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之时，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曾公开向中外记者宣布了“东亚联盟运动”的性质：“（一）为以国民党为中心而发动之国民运动。（二）为以大亚洲主义为指导原理，以共同宣言为基本精神，以东亚联盟为具体方案之思想运动。（三）为唤起东亚各大民族，建设民族协力共存之新体系之国际运动。”^④在这里，林柏生是把增厚和强化国民党的所谓“中心势力”放在首位来考虑的。实际上，“东亚联盟运动”对内的意义，正是为了强化汪精卫集团在沦陷区的法西斯统治。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成立是以沦陷区内“兴亚建国总部”、“大民会”、“共和党”等党派、团体的解散为前提的。除了在华北的“中国东亚联盟协会”，如同政治上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一样，仍然自成一体，直接听命于日方外，汪精卫集团通过“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成立，首先基本上统一了它所控制的沦陷区的党派、团体，这对于他实行法西斯的统治是重要的一环。林柏生明确指出：“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不是一个政党，而

是以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之人民而推动之国民组织。中国今日对内对外最迫切需要的，无过于中心势力之树立，此次运动发展之结果，无疑的将增厚和强化中心势力的基础组织”，“它是党的外延”，“应该透过各阶层的职工组合”，成为“唤起全民联合东亚各民族共同奋斗之运动机构”^④。

林柏生在公开场合的这些表述，统统一字不差地来自汪精卫请人起草的《东亚联盟中国协会设立要纲》^⑤一文。阅读这个在当时是绝密的内部文件及其附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东亚联盟运动”在强化汪伪政权的法西斯统治方面的作用。《要纲》指出：“东亚联盟运动”“对内的意义，要在实现国内之统一团结，组织并训练民众，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一政一民一元化的境地”，为此，“东亚联盟中国协会之组织，在统系上：应在一个领袖统率之下，一个主义指导之下，集合各种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激发全民一致的积极协力，消弭相抵相消的无谓纷争。”并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即汪精卫为“领袖”，“有绝对权力”。《要纲》特别强调：“东亚联盟运动”，“在性格上，目的效果上，应该对应日本的新体制运动的大政翼赞运动。”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汪精卫集团要走日本式的法西斯化道路。

“大政翼赞会”是日本统治阶级各派系、各阶层的代表和走狗所组成的统一的法西斯团体。一九四〇年，陷于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境地的日本反动政府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团体以及工会等群众组织，而把各种反动组织中的大部分成员网罗到“大政翼赞会”中。这种高度集中的法西斯组织形式深为汪精卫集团所赞赏。他们提出了推行“东亚联盟运动”的相应的组织办法。首先是领袖问题，“翼赞会”是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时首相近卫文麿为主脑的；《要纲》提出：“我们无疑的应以汪先生为唯一最高的领袖”，“翼赞会”在“近卫公的秘幕

中，有一个‘昭和维新会’，由后藤隆之助主持，收容有名的学者教授，是一个理论的研究机关与计划机关；另有一个‘国民运动研究会’，由风见章主持，根本要、林广告等为辅作，收容有为的共党转向分子，是一个暗中推动实践的核心行动”（原稿如此）；《要纲》也提出：必须“最先确立”“保持绝对秘密的”

“领袖的参谋团与执行领袖命令的党团”，并要“网罗社会上有特种地位的人物，如学者、仕绅、产业领袖及党政方面的元老等”组成中央评议会与地方评议会，“铨衡能从事实际运动的，具有组织的领导的才能的”，“对运动能有热切的心志，对总裁有效忠的精神，能代表各方面的”中坚分子组成“中央干部委员会”，“承接总裁的命令，统揽全会的工作”。“翼赞会”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并在城乡普遍组织所谓“邻组”，由邻近的十户左右组成，作为基层组织，“邻组”成员互相监督，“邻组”之间互相监视，都得随时向警察机关报告群众对侵略战争和多项政策的态度，形成了严密监视和统治人民的法西斯网，把广大日本人民及其家属紧紧控制起来，投入侵略战争的苦难深渊；《要纲》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地方设支部，“支部以下或设分部，或即以小组为最基本的下层组织。此种小组在日本等于大政翼赞会之最基本组织的邻组；亦即相当于吾之‘保甲’。唯‘保甲’系地方自治之最基本单位。此种小组，则可以职业类别而分，如工人第×小组，青年第×小组，盖欲其能发挥作用与力量，此编制小组最为直接，也兼有职业代表制的长处（如自由职业者等，可编入特种人民部所属。）”实际上，是兼用日本的“邻组”与中国的“保甲”两者，来强化法西斯统治。

汪精卫要袁殊起草的这个《要纲》，尽管是个草案，在“东亚联盟运动”具体推行过程中，有些规定有所变化，如总会领袖称会长而不称总裁，总会领导机构是理事会、监事会及秘书处，

而没有成立评议会、干部委员会等，但从总体上观察，这个《要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东亚联盟运动”正是按照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在中国沦陷区推进的。

汪精卫集团推进“东亚联盟运动”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发动所谓“新国民运动”，两者的关系是：“东亚联盟为新国民运动之必然之归趋，而新国民运动则为东亚联盟之具体的实行。”^④因此，要考察“东亚联盟运动”对内如何强化法西斯主义统治，就不能不注意到所谓“新国民运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汪伪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展“新国民运动”，最初是为适应当时正在沦陷区进行的“清乡”的需要提出的，是强化法西斯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按照汪精卫的设想，“清乡”不仅是军事战、政治战，也是思想战，即所谓“清乡必先清心”^⑤。汪精卫曾打了一个颇为动听的譬喻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理，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⑥妄图在军事扫荡政治镇压的同时，通过这种“思想战”，把沦陷区人民毒化为适合于“东亚联盟”需要的“新国民”。太平洋战争后，这个运动便与“东亚联盟运动”合流而成为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一九四二年元旦，汪精卫正式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要》，提出八个方面的要求，实际上是把“东亚联盟运动”对内方面的要求具体化。其核心精神是要求中国人民“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要有勇气来承认缺点，矫正缺点，尤其是劣点，更要有勇气来扫荡廓清”，“去其旧染之污”^⑦，以培植适合于“大东亚战争”所需要的所谓“新精神”。二月一日，汪精卫再次发表《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的演说，进一步阐述这个“新精神”。他指出“新国民运动，要注意到每一个人，都能发生力量，增进力量，同时还要注意到每一个人，都能将发生增进的力量，组织起来，使成为整个团体的力量”，“每一个国家”

也要“将发生增进的力量，组织起来，使成为集团国家的力量。”他要求中国人民把“一切一切的自由”，“统统收起来”，换上一个“协力的自由”，也就是“不要问能享受多少自由，只要问能贡献多少力量”，“贡献犹如耕耘”，“要耕耘得又快又勤”^⑩。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民拿出所有的力量去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出力。为了实现这个“精神总动员”，他们又摹仿德国希特勒的做法，在沦陷区发起所谓向汪精卫“宣誓”活动，胁迫人们宣誓画押，“誓词”为“誓以至诚接受最高领袖之指导，服膺三民主义，励行新国民运动，完成中国革命，实现东亚解放，尽忠竭力贡献一切”，“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一切制裁。”^⑪从三月十一日开始，在日伪的刺刀胁迫下，有数十万人参加这种“宣誓”^⑫。通过这场丑剧，汪精卫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以一九四二年五月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成立为标志，“新国民运动”由宣传阶段进入组织实施阶段。为了全国的法西斯化，汪精卫集团首先把重心放在青少年身上，他说：“新国民运动将由青年之组织与训练出发，而扩展及于一般民众，使青年之爱国心与爱东亚相同”，又说：“一国的革新，完全在青年”，“日本的强盛，德国意大利的复兴，是靠青年”^⑬。汪精卫计划仿效德国组织法西斯青年挺进队和日本组织青少年团的做法，“选拔有觉悟之青年学生，就其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予以根本之训练与改造”，并以这些“经过训练之青年学生为干部，逐渐推广，普及于一般民众”^⑭。为此，七月四日，“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⑮；七月九日，又由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〇〇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⑯，完全实行军事编制，“遵奉领袖汪先生为最高统帅”，其“设立改组解散

由领袖以命令行之”，“重要干部由领袖指派之”，“决议事项之最后裁决权属于领袖”^⑤，并正式发出《国民政府训令》，要求“中央及地方各机关，务使深体斯旨，紧密联络，积极整备，以利进行。”^⑥

八月，由汪伪国民党宣传部长林柏生主持，首先在伪首都南京举办第一期训练班，学员六十人，以“东亚联盟”与“新国民运动”的理论进行“训导”，学员在受训期间免费供给膳宿，受训结束后，又大都接受秘密津贴，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在青少年中进行活动的特务，要他们在各自原来学校中宣传“东亚联盟”，在组建伪青年团时起核心作用^⑦。接着，汪精卫集团又举办了一所“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汪精卫自兼校长，林柏生任教育长，专门训练伪青年团骨干，时间定为六个月。学员一律仿效德国法西斯青年挺进队装束，身穿青黄色露胸服装，头戴橄榄形歪帽，实行军事编制，每天都进行晨操和军训，受训的课程主要是“东亚联盟”理论，汪精卫也经常到校“训话”。在这个学校中，林柏生在学员中大搞对汪精卫的偶像崇拜，每日晨操都高呼“汪主席万岁！”“东亚联盟万岁！”“新国民运动万岁！”等口号，甚至让学员一听到“汪精卫”三字就立刻“肃立”，并由此而逐步把这种做法推向整个沦陷区^⑧。

一九四三年，随着汪伪政权正式对英美宣战，和日本政府实行强化汪伪政权的新政策，“东亚联盟”与“新国民运动”进入最活跃的年头。汪精卫在他的元旦广播词中说：“务使新国民运动的精神更加深刻化、普遍化”，并把努力的目标，集中于“协力大东亚战争”，声言要“在和平区域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保证日本“以其全部力量，使用于大东亚战争的前线。”^⑨在这一阶段，汪精卫把进行“东亚联盟”与“新国民”精神集训的重点由青少年转向汪伪政权的各级官员。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一九四三年夏天举办的“南京公务人员集训营”和“上海公

务人员集训营”，前者“训练”伪中央政府及南京特别市政府科级以上人员，后者“训练”上海特别市政府荐任以上官员，各二百余人，方法完全与“中央青年干部学校”一样^③。汪精卫集团企图用这种办法，最大限度地挖掘各级汉奸官员的反共卖国潜力，更加卖力地强化他们的法西斯统治。

汪精卫集团在推行“东亚联盟运动”时，还一再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思想，把这个运动与汪伪国民党在沦陷区内的法西斯“党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他们说：“国民党为领导中国政治之唯一中心势力，汪主席为继承国父遗志，完成国民革命之唯一领导者”^④。“大亚洲主义”和“东亚联盟”思想则为他们唯一指导思想。汪伪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形式上都是由汪伪国民党中央全会决定的。汪伪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展“新国民运动”，作为“东亚联盟运动”的补充和具体化，而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则专门讨论向英美宣战后，如何加强“精神总动员”，要求“一方面阐明强化中心势力，服从领袖之绝对必要，加深国民对党及领袖认识与崇敬，一方面督促国民党员重振革命党人之本来精神面目，革除蒋介石祸党窃国时代党官走衙门之恶习，深入民众，做领导下层工作，做推动之工作，由党的强化做到国之强化。”^⑤一般说来，“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各地分、支会和“新国民运动促进会”各地分会的主要头目均由汪伪国民党各级地方党部主任兼任，这样就使得这些运动都带上了法西斯主义“党化”色彩。汪精卫病死后，继承伪国民党主席的陈公博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干脆下令将“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移转于中央党部，“使党与新运合为一体”，“在国民党统一指挥统一办理之下，作更进一步之推广”，“以期获得更超高度之发展”^⑥。然而，这种“超高度发展”的期望很快变成了肥皂泡，两个月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汪伪政权连同“东亚联盟运动”一起

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东亚联盟运动”是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一种思想运动，如果从它的萌芽期算起，这个运动前后经历了十余年之久，而汪伪政权酝酿、建立直到垮台的六年，则是它十分活跃的时期。“东亚联盟”本来是“舶来品”，但经过汪精卫等人的精心加工制作，已和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揉合在一起，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奸理论，这种理论曾严重地污染了中国的思想界。尽管历史早已判处“东亚联盟运动”的死刑，但弄清这种思想运动产生的背景、发展的始末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罪恶作用，无疑地将会有助于推进对汪伪政权史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注释：

- ①④⑦⑨⑭ 巩固：《东亚联盟运动的理论基础》，《东亚联盟》（北京）第5卷第2期。
- ② 参见〔美〕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3—64页。
- ③ 石原莞尔：《东亚联盟运动小史》，《东亚联盟》（北京）第5卷第2期。
- ⑤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第401页。
- ⑥ 角田顺：《解题》，载〔日〕《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第418—426页。
- ⑧ 《兴亚建国运动的发生与经过》，《兴建月刊》第1卷第6号。
- ⑩ 《中国共和党恢复》，《兴建月刊》第2卷第4号。
- ⑪ 《共和党告同志书》，《中华日报》1940年12月23日。
- ⑫ 《组织大亚细亚主义中国协会之说明书》，《兴建月刊》第2卷第5号。
- ⑬ 《大民会更新宣言》，《兴建月刊》第2卷第2号。
- ⑮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40年11月13日），〔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第464—466页。
- ⑯⑰ 郭秀峰：《关于汪伪东亚联盟总会的情况》（未刊）。
- ⑱⑲ 汪精卫：《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汪伪宣传部编，1942年版，第62页。
- ⑳ 《中华日报》1940年12月17日。
- ㉑⑳ 《贺电与谢电》，《大亚洲主义》第1卷第2期。
- ㉒ 汪精卫：《东亚联盟的理想》，《政治月刊》第1卷第3期。
- ㉓ 周化人：《和平理论之发展及其实现》，《大亚洲主义》第3卷第2期。

- ② 汪精卫：《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中华日报》1939年7月10日。
- ③ 孙中山：《会见日本记者的谈话》（1924年11月22日），《申报》，1924年11月24日。
- ④⑦ 孙中山：《与门司新闻记者的谈话》（1924年12月1日），《孙中山选集》1981年10月版，第985—988页。
- ⑤ 孙中山：《对神户各团体欢迎会演讲》，《孙中山选集》第971—984页。
- ⑥ 周化人：《大亚洲主义与中日永久和平》，《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二辑，汪伪宣传部编1941年3月。
- ⑧⑪ 汪精卫：《对于东亚联盟纲领的一点意见》，《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63—65页。
- ⑨⑫⑬⑭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第50号宣传要点：《关于东亚联盟运动》，藏上海档案馆。
- ⑯ 周化人：《肃清西洋思想的余毒》，《大亚洲主义月刊》第4卷第4期。
- ⑰⑱ 汪精卫：《大东亚解放战·勸中国民众》，《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
- ⑲⑳ 汪精卫：《扫除英美的流毒》，《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59—360页。
- ㉑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第82号宣传要点：《关于南京条约百年纪念》，藏上海档案馆。
- ㉒⑳㉓㉔ 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宣传部第92号宣传要点：《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藏上海档案馆。
- ㉕⑳ 林柏生：《关于东亚联盟运动》，《政治月刊》第1卷第2期。
- ㉖⑳ 东亚联盟中国协会设立要纲》，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㉗⑳ 《新国民运动第一期青年组织训练大纲》（1942年7月4日），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㉘⑳ 汪精卫：《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上训词》，《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00页。
- ㉙⑳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纲要》，《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37—340页。
- ㉚⑳ 汪精卫：《新国民运动与精神总动员》，《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53页。
- ㉛⑳ 《誓词》，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㉜㉝ 戴英夫：《新国民运动之展开》，《中日缔约与大东亚战争》，汪伪宣传部编，1942年12月版，第38页。
- ㉞⑳ 汪精卫：《国府还都二周年接见中外记者答问》，《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第378页。
- ㉟⑳ 《中华日报》1942年7月5日。
- ㊱⑳ 《中华日报》1942年7月10日。
- ㊲⑳ 参见《中国青年模范团暂行总章》，《中国童子军总章》，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㊳⑳ 《中华日报》1942年7月11日。
- ㊴㊵ 戴英夫：《汪伪新国民运动内幕》（未刊）。
- ㊶⑳ 《中华日报》1943年1月2日。
- ㊷⑳ 《中华日报》1945年6月8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述论

孙 彩 霞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夕，共产党人恽代英、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联合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等，高举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旗帜，通过了坚持国共合作，限制蒋介石权力，承认工农运动是国民革命的伟大力量等决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斗争的一个胜利，有“国民党左倾的最高表现”之称。

(一)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排斥共产党人的中山舰事件后，紧接着又于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部的活动。蒋介石通过这次会议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要职，而中央决策机构政治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也是他的傀儡。蒋介石实际上包揽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①。到了北伐前夕，蒋介石又乘机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把北伐军的各军以及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工厂等机构统归他一人指挥和调度，无限地扩大总司令的权限。特别是当北伐军进入长沙，占领汉口，攻下武昌，直取九江，把直系军阀吴佩孚、赵恒惕、萧耀南等打得落花流水，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后，以蒋介石、张静江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分子更加猖狂地打击、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张静江公然违反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任用西山会议派分子叶楚傖为中央秘书长；并且唆使钱大钧用武力解散广州市党部，圈定陈炯明的死党吴倚沧、国家主义派分子曾显浩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员。而江西省党部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也在蒋介石的圈定下，把共产党人、革命左派方志敏、李松风、罗石冰等排除在外，把一贯坚持反动的右派分子段锡朋捧为江西省党部首领。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十一月，北伐军攻克南昌，蒋介石便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他背弃自己的原议，又挑起了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本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仍设广州，暂不北迁，但会议闭幕不到一星期，蒋介石即主张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经临时政府会议决议通过。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由广州启程，十二月十二日，到达武汉的第一批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权力，蒋介石也从江西打电报表示赞成和致贺。一九二七年一月，广州第二批出发人员到达南昌，被蒋介石扣留。蒋介石企图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设立于南昌，并发出通告，于三月一日在南昌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蒋介石之所以出尔反尔，是因为他看到了武汉已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如果迁都武汉，就难于控制党和政府，其反革命阴谋就难以得逞。这是蒋介石独裁野心的大暴露。在他看来，他“总司令就是中央党部”，“总司令就是国民政府”，

“军事应该由他独裁，政治也应该由他独裁，党务也应该由他独裁”，因此，“他到武汉，政府应该在武汉，他到南昌，政府应

该在南昌”^①。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极大愤慨和反击。一九二六年十月，由共产党人吴玉章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议决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议案。一九二七年二月，特成立了一个由吴玉章、徐谦、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在其发表的宣传要点中强调“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统一党的指导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的保障”，用“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②。在这次迁都问题上，行动委员会表示“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照既定策略来鄂”^③，否决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别有用心的提议。与此同时，武汉的广大工农群众也纷纷起来，“打倒昏庸老朽”、“打倒新军阀”的标语，贴满武汉三镇。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为迁都问题到武汉察看形势，国民政府召开三十万人的欢迎大会，会上，群众严词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④蒋介石无词以对，狼狈不堪。

国民政府、中央党部迁往武汉后，蒋介石又“无限延期”召开中央执委全体会议。经临时联席会议决定，于三月七日举行。至七日，蒋介石又要把会期移到十二日，他才能来开会。到会多数委员对于蒋介石故意拖延开会日期的无理要求，不予理会，认为会议“人数既足，即可开会，不可以大会会期迁就个人，以损党之威权”^⑤。结果，七日作为预备会，八日开提案审查委员

①《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②《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③吴玉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情况》。

④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⑤《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会，九日开全体审查委员会，十日，正式于汉口南洋大楼三楼大厅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如上所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在深入反对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的斗争下召开的，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中所说：“此次会议，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而且是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不但为本党之存亡所系，亦全国之治乱攸关”^①。

（二）

全会于三月十日正式开幕，除蒋介石、张静江、李烈钧三人拒绝到会外，其它三十三名委员均出席了会议。他们是詹大悲、经亨颐、谭延闿、恽代英、谢晋、丁惟汾、孙科、周启刚、朱霁青、徐谦、夏曦、宋庆龄、于树德、毛泽东、陈其瑗、王法勤、吴玉章、丁超五、林伯渠、董必武、宋子文、陈友仁、顾孟余、邓懋修、何香凝、李宗仁、陈公博、彭泽民、江浩、邓演达、许甦魂、王乐平、柏文蔚。其中共产党员八人，其它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及当时的左倾人士，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可以说，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会议。

全会第二日，即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1）中央常务委员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中正、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2）中央政治委员，除常务委员九人兼政治委员外，另有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伯渠六人；并推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谭平山、

^{①②}《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宋子文七人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3) 军事委员会则由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李宗仁、程潜、蒋介石、李济琛、汪精卫、冯玉祥、张发奎、何应钦、孙科、邓演达、宋子文、徐谦、顾孟余十六人组成；推举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介石、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4) 国民政府委员有汪精卫、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徐谦、冯玉祥、程潜、谭延闿、陈友仁、李宗仁、谭平山、钮永建、朱培德、唐生智、李济琛、宋庆龄、顾孟余、蒋介石、柏文蔚、王法勤、吴玉章、何应钦、孔庚、彭泽民、经亨颐、黄绍竑、杨树庄、陈调元二十八人；以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五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5) 中央各部部长：组织部长汪精卫，宣传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长陈其瑗（陈不就，改选王法勤担任），劳工部长苏兆征，农政部长谭平山，实业部长孔祥熙，卫生部长刘瑞恒。

全会发表了《对全国人民宣言》、《对全国农民宣言》和《对全体党员训令》，并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对于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统一财政决议案》、《统一外交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内蒙古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对于外蒙古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关于特别党部决议案》、《关于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关于党员服兵役法征集委员会决议案》、《关于取消违反选举之各省市党部另行改选决议案》、《对于萧佛成发表反动言论及在暹罗之反动行为决议案》、《湖南省民会议大纲》、《湖南省民会议组织法》。会议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予以极大的支持，批准了《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

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

全会于三月十七日闭幕。

(三)

这次全会的重要成果，是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坚持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大大地提高了党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第一，全会坚持和维护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分子，自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来，打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压制工农运动，严重地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以全会通过的《对全体党员训令》指出，必须遵守孙中山决定的革命策略，“诚意的与世界革命战线上先进之苏俄亲密联合，容纳国内最急进的共产党分子以与之亲密合作”；在《对全国人民宣言》中指出：“国民党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意义，即“国民革命必须成功。我们的国家必须独立。我们的人民必须自由。帝国主义的宰制、封建军阀的压迫剥削必须打倒。”它和共产党关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废止封建主义的压迫”^①的最低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同时，全会谴责那些违背孙中山的主义和策略的人，“实在就是帮助帝国主义与反革命。”^②

第二，特别重视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当时长江流域，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全会对此已引起足够的重视，推定邓演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57页。

^②《对全国人民宣言》，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达、徐谦、恽代英、毛泽东等为对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审查员，并设立了农民部和劳工部。在《对全国农民宣言》中指出：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目前农民运动形势的发展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所依附的基础——地主阶级，建立“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和农民革命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方法，一方面从反动的地主手里把他们的旧武装拿过来放在农民政权管理之下，建设农民自己的新武装；另一方面，由政府设法补助一些枪支弹药。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说明了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制订的改良农民状况，如“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二十二条决议，由于乡村地主的打击没有能够实现，而政府和党部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给以积极的援助。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农民群众的觉醒，本党与国民政府必须竭力促其实现。“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毫无疑义，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要推进革命前进，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全会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方针是基本一致的。

第三，限制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高了国民党党权。全会深刻地认识到蒋介石搞个人军事独裁，企图分裂国民党的严重性及危害性。《对全体党员训令》说：“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之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指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不但使党内之昏庸老朽分子盘踞于内，官僚市侩及一切投机分子乘机而入，因此纵成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谬误，妨害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之权威，形成党内投机腐化之倾向。”故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对蒋介石军事权力进行限制，“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

均须集中于党”^①，提高国民党的党权权威。

《统一革命势力案》明确规定，须立时召开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讨论一般的合作办法”。《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委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它的一切决议、措施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才能生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重新规定了总司令的职权，只有在战争状况下，才能在作战地及警备地有宣布戒严令及指挥前方军民财政各机关之权；军官的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决议，提交中执会通过，再交总司令执行。《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中执委常务委员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对党政军行使最终决议权。通过这一系列的议案，实际上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军委主席和组织部长职务，对他个人军事独裁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会议通过的议案和决定，有利于大革命的发展，是应当肯定的。

（四）

但是应该指出，全会对于蒋介石的斗争并不彻底，仅仅局限在控制的范围内，同时对于那些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右派分子认识不清，以致上当受骗。这是全会的历史错误。

首先，全会对蒋介石的斗争只是企图限制他的独裁专制而已。蒋介石在南昌设立总司令部，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的大本营。当时，亲美派、亲日派以及有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研究系的政客，如王正廷、黄郛、张群之流，纷纷出入于总司令部，与蒋介石洽商投降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阴谋。英美帝国

^①《对全体党员训令》，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训令及决议案》。

主义的走狗虞洽卿，奉其主子的命令到南昌和蒋介石谈判，以六千万元的借款为钓饵，换得蒋介石反共灭共条件。蒋介石也派戴季陶、吴铁城赴日，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保证“中国人永不反日”。蒋介石自己在全会开预备会时即三月七日，公开放出投降帝国主义的信号，说什么：“不仅日本，无论那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末，我们对他们……未始不可联合”^①。在其加紧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同时，也开始了和奉系军阀的联系“协商”。蒋介石派代表在北方和奉系军阀密谈，奉系军阀再三表示：“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的妥协非不可能之事”^②。蒋介石这些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活动，全会没有公开的揭露，给以应得的惩罚。更重要的是，全会没有撤销其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还让他继续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委主席团的职务。这说明全会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这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就有所表现：那时多数中央委员对于蒋介石企图操纵党部、操纵政府、操纵一切的确是“怒不可遏”，提出了“统一党的领导案”，但由于张静江的阻止，那次会议否定了此案。致使蒋介石的个人野心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一切限制蒋介石军事权力的计划、决议和措施成了一纸空文，他仍然握有继续反革命的主要资本。所以全会宣告完成任务胜利闭幕不到一个月，蒋介石便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其次，对挂着“左派”招牌的右派分子的真面目认识不清。本来，右派的队伍是很复杂的，有些人，如蒋介石的新右派面目已经暴露，有些人的政治面目是随着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而变化，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不易识别。而汪精卫，正是这后一种人物。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便成了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之

^① 《在南昌总部之演讲》，见1927年9月出版《蒋胡最近言论集》。

^② 《向导》，第188期第2013页。

一，并且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蒋介石在制造“三·二〇”事件，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逼走了汪精卫。所以，当蒋介石的右派面目暴露后，汪精卫便成了“最适当的党务和政治首领”，国民党海内外党部“请汪复职”的函电“如雪片飞来，不下千万通”，武汉三镇也张贴了“欢迎汪主席复职，恢复国民党党权”的大幅标语。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处于幼年时期，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只看见汪在历史上的功绩，只看到汪蒋之间的矛盾，而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他们的一致性。所以全会推举汪精卫（尚在国外）担任组织部长、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重要职务，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一个祸根。

历史上的华工出国

彭 家 礼

一 华工出国的历史意义

华工是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在国外靠体力劳动谋生受人剥削而不剥削他人的中国劳动人民都属于华工的范围。有自愿出洋的自由华工，而更多的是被强迫拐卖的契约华工。前者包括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手工匠人、小生产者，借地垦荒的小农、雇工、商业劳动者（如店员摊贩、货郎）以及自由职业者。后者（契约华工）实际上是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契约奴隶。华工出国始于唐宋，盛于明清。经历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各个时代的变迁。出国方式、分布地区和劳动制度都随之改变。这个问题，在近代世界史和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华工被掳掠出国，对一些西方殖民地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开创和推动了当地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充分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及其罪恶本质。

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即小生产者被剥夺生产资料的过程。但是，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原始积累和资本积聚，则主要来源于海外掠夺。它们用暴力强迫千百万奴隶，为它们开发殖民地的资源。奴隶们用血汗劳动创造的财富就是海外掠夺的源泉。如果没有海外掠夺，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将是难以想像

的。马克思指出：“它们到处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期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①。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

“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②。可见海外掠夺和殖民奴役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没有无数奴隶（包括华工在内）对殖民地财富和资源的开发，这种掠夺、积累和积聚也是不可能的。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殖民地奴隶制度已不能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废除奴隶制，以契约劳工代替奴隶劳动，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以羊易牛”的手法。华工本来一直是西方“猎捕”的对象，这时对华工需求更加扩大了。

契约华工是世界上劳动效率最高、工价最低廉、最为理想的劳动力。这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一致公认的。华工不仅来源取之不尽，尤其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无力加以保护，西方侵略者可以任意掠贩，横施暴行。迫使华工在几年契约期内，耗尽全部精力，甚至断送生命，从而使殖民地的开发，得到迅速扩大和加倍的经济效益。正因为如此，西方侵略者才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不择手段地争夺和掠贩契约华工。

契约华工在西方殖民地的开发中所起的作用，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的对比中，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东南亚的殖民地的发展速度有很大差距。除其它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对华工的政策。荷属东印度疆域辽阔，土地和人口资源都大大超过英属马来亚，并且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可是荷印的经济增长却远远落后于英属马来亚，后者只用了几十年时间，便遥遥领先，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0页。

② 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声明》。《人民日报》1968年8月8日。

矿和橡胶的产量都曾达到世界第一位。原因何在？原来荷兰殖民主义者初来时，也曾极力诱致和掳掠华工，在经济开发上取得很大效益。后来，看到中国人人多势众，竞争能力很强，害怕难以控制，因此决定采取限制、排斥、驱赶和屠杀的政策，以致华工裹足。与此相反，英国殖民当局，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占领槟榔屿（1786年）开始，就采用充分诱致、利用华工的政策。如授地招垦、贷款补助，对中国人开发马来亚实行所谓“不干涉”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华工，不断涌入马来半岛。把原始森林所复盖的处女地开发为大大小小的种植园，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提供丰富的热带经济作物。同时还把埋藏在深山峡谷的锡砂一铲一锄，一挑一担地挖运出来，供应世界工业发展的需要。作为马来亚吞吐港的新加坡很快就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现在这个城市国家的人口，华人血统占76%以上。可以说，他们全是当年华工的后代。早在1819年，新加坡开港时，只是一个偶有海盗和渔民栖息的荒凉渔村。经过无数华工（当然也有马来人和印度人，但华工人数最多）积年累月的辛勤开发，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便把这个殖民地建成大英帝国控制远东和东南亚海上交通贸易的经济枢纽和战略基地。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凝结着华工的血汗。英属马来联邦总督瑞天咸说过，如果没有华工就不可能有海峡殖民地和马来半岛的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曾任马来亚殖民官、著名的东南亚历史学者泼赛尔（Victor Purcell）写道：“如果没有中国人（按：即华工），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贡献（按：指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巨大的发展。”^①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十九世纪下半期华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① 泼赛尔：《马来亚》（Victor Purcell, Malaya），伦敦，1916年，128页。

1848年1月24日美国通过同墨西哥签订的休战条约，从墨西哥夺得西部的领土，当时只是广阔无垠的大片荒原，面积占美国全部领土的一半。同一年，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发现金矿，引起淘金狂潮，从这时起，到旧金山去的华工与年俱增。到1882年美国下令严禁华工入境为止，三十多年当中，至少去了三十多万华工。他们在西部的矿山、铁路、工厂、农场、森林、果园、渔场、港埠、公用设施等开发工作中，承担了最艰巨、最危险、最繁重的劳动，为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促进和加速的作用。1876年，美国第四十四届国会参众两院联合组织调查华人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一些政府官员和投资开发西部的资本家到会作证，一致肯定了华工在西部开拓中的丰功伟绩，这是华工出国的历史意义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海外华工对当时中国，特别是侨乡华南地区的各种革新活动起了很大作用。长期以来，作为“海外孤儿”的华工，受尽殖民统治者的奴役侮辱和迫害，得不到祖国的支持和保护，他们热切盼望中国能很快地富强起来。同时由于身在国外，亲身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影响，得风气之先。他们在海外节衣缩食，对祖国和家乡捐款兴学投资，创办路矿和新式工业，并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革命运动。孙中山、廖仲恺、陈嘉庚都是华工的后代。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都得到广大华侨、华工的全力支援和广泛参加，华侨华工炽烈的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闪耀着光辉的异彩。二十世纪初去欧洲的华工，首先接受并向国内传播了马列主义。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中，成千上万的沙俄华工，纷纷组织赤卫队和华工营，投入红军的战斗行列。总之，华工，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驱，在近代历史进程中，不论是在国内外的经济开发还是革命斗争中，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个问题，近年来已引起我国史学界的注意。笔者认为华工出国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

和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分野，即欧洲由落后转为先进，中国由先进转为落后的过程，华工出国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中国封建主义从停滞到崩溃这种一消一长的过程中的产物。

综观华工出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和四种类型。

第一个时期，从唐、宋到明代中叶（嘉靖年间），即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以前，统称早期。历史证实我国唐代已有丝织工匠远适大秦（东罗马）、后唐同光二年已有成批华侨首次在爪哇岛定居开垦，海外华人至今仍自称唐人是有历史根据的。但是此时期出国人数很少。

第二个时期指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个时期长达三百多年，主要地区为菲律宾，荷印各岛和马来亚，大致十七世纪为奴隶华工与债奴华工，十八世纪为自由华工，十九世纪为契约华工——猪仔。

第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个时期是华工出国最盛最多的时期。华工出国由东南亚扩及全世界，出现各种不同类型。主要有四种：

一、南洋的“猪仔”；二、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殖民岛屿的契约苦力；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赎单工”；四、自由华工。自由华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愿自费出国，不受契约约束；二是在海外契约期满，恢复自由，继续劳动的华工。这四种类型，后面将逐一加以论列，一、二、三种类型本质上都是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契约华工。但是由于地区不同，出国方式和劳动制度也各有特点，分成类型加以论述，头绪比较清楚，一般往往把“猪仔”和“苦力”混为一谈，混淆了两者的差别，有必要加以澄清。

二 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和对华工的掳掠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市民阶级的兴起使欧洲长期停滞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转机。造船、航海和武器弹药制造方面的改进，使海上私掠活动（Privateering）范围，不断扩大。海上私掠活动，对当时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来说，是名正言顺的国营贸易。这是它们的海盗传统。

这种杀人越货的海外扩张导致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主要是东印度群岛）征服和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化为资本”，这是欧洲“原始积累的主要的要素”^①。

这种“牧歌式”的过程，按时间顺序，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主义者带到了东方。它们到处进行野蛮的征服、疯狂的掠夺和无情的奴役。

葡萄牙

继1498年，葡人伽玛（Vasta de Gama）的远征队越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古里（Calicut）之后，阿方索·阿乌克克（Alf-anso Albuquerque）于1511年夺取了马六甲，构筑要塞，作为沟通和控制东西洋海上贸易（主要是香料贸易）的据点。1519年，西冒（Simao Andrada）的舰队窜到广州，在沿海一带横行无忌。在珠江口拦截中国商船，进行掠贩人口的“贸易”^②。早在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就有这样的记载：“两广奸民，私通番货，勾结外夷，与进贡者混以图利。招诱亡命，掠买子女，民受其害”^③。西冒的舰队久踞伶仃洋，“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④。被掳掠的中国人，一部份送到香料群岛当奴隶，一部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9—822页。

② 张天泽：《中葡贸易研究》66页。

③ 《明武宗实录》，169卷。

贩往葡属印度果阿、东非乃至欧洲出售，充当家庭奴仆^①。

1557年葡萄牙窃据澳门。这是它在中国长期掠贩人口的基地。中国闭关禁海，华南破产农民，很多是从澳门运往西方殖民地的。

西班牙

西班牙于1564年派黎牙斯比 (Miguel Lopez de Legaspi) 率远征队第三次入侵菲律宾。次年宣布菲律宾为其殖民地。1571年占领马尼拉。在西班牙入侵以前，中国人同菲律宾的交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菲岛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西班牙初来时，对华人表示友好亲善，并极力诱致前来垦辟开发。当时正值〔明〕隆庆三年（1569年），开弛海禁。闽南粤东劳动人民到菲岛谋生的日益增多。中国的商船和工匠在菲极受欢迎。1572年，到达菲南部各岛和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共八艘；1574年，到达马尼拉的有六艘。到1587年增加到三十艘，十六世纪末达到四十艘^②。开始是贸易往来，有去有回，后来在菲定居的人逐渐增多。1588年已达一万人。1590年，在马尼拉、顿多两地定居的，就有六、七千人。到十七世纪初，共增加到三万人^③。据说，当时福建“泉（州）、漳（州）民贩吕宋者或折阅破产及犯压冬禁，不得归。留寓夷土，筑庐舍、操佣管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④。这些人都是为菲岛的开发和经济生活服务的闽粤劳

① 《明史·佛郎机传》。

② 博瑟，《明末清初欧洲文献中的海外华侨》（C. R. Boxer, Notes on the Chinese abroad in the Last Ming and Early Manchu Period, compiled from European Sources, 1500—1750），《Tien-hsa Monthly》，1937，447—468页。

③ 本尼特兹：《菲律宾史》，73页；引1572—75年菲总督报告；采德：《菲岛政治文化史》，马尼拉，1950年，207页。

④ 陈烈甫：《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和华裔》，台北，1979年，214页。

⑤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福建漳州志·洋税考》。

动人民。

1582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看到中国人愈来愈多，为了隔离华人，特在马尼拉市郊辟一华人区，称为巴里安（Parian，菲语叫“润内”，意思是丝绸市场，因为当时中国同菲律宾的贸易以丝绸为主）。在华人区定居的，除少数丝商外，绝大多数是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劳工。包括铁匠、木匠、瓦匠、石匠、雕刻匠、织绸匠、银匠、锁匠、鞋匠，以及搬运工和码头装卸工，可以说应有尽有。不仅工价低廉，而且劳动质量优良，所以深得当地人和外来人的欢迎。早期马尼拉宏伟的官署、教堂，富丽堂皇的宅第等建筑，都出于中国工匠之手^①。英国历史学者福尔曼（John Foreman）说，在菲岛的华人，几乎全是苦力的后裔，非苦力出身的华人，大约只有千分之二^②。1609年菲岛代理总督莫尔加曾说，“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中国工匠，为微薄的工资而辛勤地劳动，这个殖民地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是千真万确的”^③。

1585—1590年菲总督曾两次遣人来闽粤各地招募华工。这时西班牙殖民者正在美洛居（即摩鹿加香料群岛）同葡萄牙人争夺香料。新招来的华工由菲督率领到香料岛战地送死，沿途对待华工极为苛虐。1593年曾发生以船户潘和五为首的抗暴斗争事件。二百五十名华工在海途群起反抗，杀死菲督，夺船返航^④。

1603年，菲岛华人已达三万，而西班牙人还不满五百。中国

① 布莱尔和罗伯逊合著：《菲律宾群岛》（Emma H. Blair and James A. Robertson, 《Philippine Islands》），〔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1903—1909年版，第12卷（1601—04年），191—192页。

② 福尔曼：《菲律宾群岛》（John Foreman, 《Philippine Islands》），上海，1900年，119页。

③ 阿利普，《菲中关系千年史》（E. M. Alips, *Ten Centurys of Philippine—Chinese Relations*）马尼拉，1959年，12页。

④ 张燮，《东西洋考》，5卷，59页；郑民：《菲律宾》，商务，1924年，34页。

人在菲岛的生产、贸易等经济生活方面居于优势。西班牙殖民者，早已心怀嫉恨。潘和五事件后，曾借词驱逐华人一万二千人^①。接着在1603年，一举屠杀了二万五千名华人，只有三百人幸免^②。结果是生产停顿，百业萧条，贸易中断，马尼拉成为一座死城，连吃饭、穿鞋都成了问题。第二年，西班牙遣使到福建上书道歉，要求华人继续前往“贾贩佣值”。当年适逢漳州大水，“被淹者万余户”，不得不“过番”谋食。当时菲岛“佛郎机之夷（按指西班牙人），见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③。后来又发生多次屠杀华人事件。出海谋生的华工多转往爪哇岛的噶刺巴（即今雅加达）。

荷兰

1595年4月3日，霍特曼率荷舰四艘士兵二百五十人，来到爪哇岛北岸的万丹，1598年范尼克又率舰八艘，驶往摩鹿加群岛装上香料，过万丹又加装胡椒，运到欧洲销售，获得巨利^④。1599年，伦敦胡椒价格由每磅3先令涨至8先令^⑤。英、法殖民者也接踵而来。1600年伦敦商人集资筹设东印度公司。1602年，英海军头目兰开斯特曾两次率舰队到苏门答腊岛南部的亚齐、爪哇岛的万丹以及摩鹿加等地搞海上私掠活动，并在万丹等地设立商栈，收购胡椒和香料^⑥。法国于1601年到万丹，1604年在那里设立了东印度公司。其后，荷兰人为同它的西方对手展开激烈争夺，也于1602年设立东印度公司。经国会特许，这个公司有权发动战争，签条约、占土地、筑城堡，成为荷兰侵略东方的大本营。

① 当时菲岛华人共二万四千人，遣返了半数。见泼赛尔，《东南亚华人》（*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牛津，1980年版，513页。

② 张燮前引书。

③ 顾炎武，前引书，引崇祯三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请开洋禁疏》。

④ 刘继宣、束世徵，《中华民族南洋拓殖史》，115页。

⑤ 弗尼瓦尔，《荷属东印度》（*J.S. Furnival, Netherland India*），纽约，1944年，22页。

⑥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116页。

荷兰殖民主义者，以它的优势暴力，征服了印尼各岛的土邦，排挤了葡、西、英、法等对手，同时极力打击华商，取得垄断贸易的地位。

如前所述，我国闽粤沿海劳动人民早在荷兰殖民主义者东来以前，已经在印尼一些地区定居谋生，垦殖开发，贾贩佣值。十六世纪初，万丹已有中国居民二千人。他们带来先进的栽培技术，把胡椒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多，使万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胡椒贸易中心^①。万丹的华人商贩还从巨港、邦加、勿里洞和文郎、马辰等地贩来华人种植的胡椒，卖给欧洲人和其它外籍商人，换得银元，选购其它商品贩往中国，或从事万丹与马打兰、望加锡之间的三角贸易^②。因此，在十六世纪前后，中国商船在东南亚的航运上实居于主导地位。这时苏门答腊所产胡椒占世界总产量的80%。其中巨港的胡椒园全部是闽南人种植的；邦加和勿里洞岛上椒园，则由广东惠阳人和河源人种植^③。荷兰人要收买胡椒必须通过中国商贩。他们总想压低收购价格，但未能得逞。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昆极力设法诱致万丹及其它地区的华人迁往巴城。意在转移胡椒贸易中心，置于他的势力控制之下。他提出对华人免征通行税和别项税收，以及其它“优待”办法，希望借华工之力，兴建港市，开辟富源，繁荣经济。一些中国人，在荷兰殖民当局的利诱和强迫下迁往巴城。但是万丹国王深知荷兰人的阴谋，下令不准华人离境，并以死刑相威胁。于

① 费穆伦，《巴城华人和红溪事件》(J. T. Vermuelen) The Chinese in Batavia and the Trouble of 1740)，新加坡《南洋学报》第一辑，第9卷，1953年。

② 从万丹把绸布、陶磁、杂货贩往马打兰国的商港扎巴拉(Japasa)，换购大米，贩往望加锡。在这里换购香料运回万丹。这就是东爪哇的三角贸易，主要由中国商贩经营。

③ 丘守愚，《荷属东印度与华侨经济史》，重庆，1947年，385页。

是，荷兰人一面封锁万丹港，一面在海上大举劫掠中国商船，押往巴城。按荷公司定价“收购”全部货物。随船华人都被强行留住巴城^①。

由于荷兰、英国殖民者和万丹土王之间长期混战，在整个十七世纪，巴城几乎没有爪哇人^②。重建巴城的苦役，主要由掳掠来的中国人和土著奴隶承担。由于长年战争的破坏，爪哇岛上森林资源已经耗竭，巴城的建筑和其它岛屿的开发，都感到木材奇缺，须要从安汶、巴章等岛砍伐运济，需要很多有经验的伐木工、木匠、石匠和烧砖窑工。另外，由于各香料岛上的土著居民已被灭绝，产品无人收获，迫切需要移入外来劳工。因此，1617年8月12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给昆总督的第17号指令，要他设法给安汶和班达等岛，移入外来劳工，“特别是要移入华工及其家属”^③。1618年10月24日和1619年4月4日及6月2日，昆曾先后给安汶荷籍副县长和驻日本平户和太泥的荷兰商馆馆长写信，要他们给安汶、巴城、巴章等地运去所需要的华工^④。一面仍继续在海上劫掠中国商船。计1619年劫夺中国两千名乘客，强留巴城为奴。1622年又劫夺17艘^⑤。

1623年，总督昆引退了。他在给继任人卡彭迪尔的信中，明确指示：

巴城、摩鹿加、安汶和班达岛都需要有很多人去定居开发，……而中国人劳动之优良，世无其匹。……目前必须乘此风

① 泼赛尔，前引《东南亚华人》，392页。

② 弗列克，《“努山塔拉”，印度尼西亚史》(Benard H. Vlekke, "Nusantara", A History of Indonesia)，第91页。

③ 凡德，《荷印法令汇编》，海牙，1855年，第一集，50页。

④ 柯连布兰德，《燕彼得森昆在东印度的施政文件》，1919—23年，海牙，第472、538和559页；均转见《南洋资料译丛》，1963年，第1期，101页。

〔日〕岩生成一，《论安汶岛初期的华人街》一文。

⑤ 郁树根编，《南洋年鉴·华侨》；〔荷〕冯特科伊(Bontekoe)《难忘的东印度航海记》。

帆（按指季风）加派战舰，开往中国，尽可能多地掳掠中国人男妇幼童，运至上述各地繁殖人口。其赎金可定为每人60里亚尔，但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妇女回国，或把她们转到非我公司的辖区，要让她们留下，就地生殖。^①

就在这一年里，荷舰在福建沿海和澎湖一带就掳去了一千多人，在押送爪哇途中，虐死过半^②。1657—58年又在柔佛和北大年港劫掠中国商船4艘^③。康熙年间，福建永春梁人黄豪亭所乘帆船在海上被劫，同船一百多人，全部沦为奴隶，送往深川，垦辟种植^④。乾隆甲辰年（1784）粤人李志谈，乘船赴暹罗，同船者均被掳往渣华（爪哇），勿得归者^⑤。到乾隆末年，这种海上掳掠仍极猖獗。“妇女壮丁悉被掳去，勿得归赎。所是人丁，皆可转贩。”^⑥

从以上见于中外史籍的点滴事例可以看出，十七—十八世纪，在东南亚和中国海域，劫夺中国商船，掳掠人，贩卖奴隶的罪恶活动，时间延续很久，范围越来越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原始积累一章中曾说到：“最突出的莫过于荷兰人在西里伯岛上为爪哇岛补充奴隶而实行的、东方盗人制度”^⑦。上述情形正是这种“盗人制度”的扩大化。

① 《荷兰国家档案汇编，东印度，1622—24年》（Calendar of state Paper, East Indies），100—01页。转贝密亨利，《华侨》（H. F. McNair, The Chinese Abroad），1955年，上海版，52页。

② 《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260页，陈造福文。

③ W. 坎贝尔《荷人统治下的台湾》（W. Camb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Rule）。

④ 《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115页；福建省晋江专区华侨史调查报告。

⑤ 杨仲溪，《柳溪随笔》第五卷，二十二页。

⑥ 刘征明，《南洋华侨问题》，54—5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0页。

三 荷印各岛的华工

荷印各岛的华工

十七—十八世纪巴城的华工——奴隶、小贩和债奴。

通过迫迁、劫夺，掳掠和贩运，巴城华人有所增加，大多数是奴隶。1619年巴城华人共有一百几十户人家，约三、四百人^①。苏鸣岗任首任华人甲必丹。除掳来奴隶外，还有来巴城谋生的小贩。例如，1625年2月24日，一只由福建泉州开到巴城的商船，共载来480人。除舵工，水手共80人外，400名乘客中，商人只有40人。其余360人全是带货小贩。到达目的地，立即肩挑磁器、杂货，上岸沿街叫卖^②。到1695年，巴城殖民政府的布告中还说，“新到的华人通常都沿街叫卖陶磁杂货。每人每月向包税人交纳交易税二元。他们七、八个人睡在一个房间。有时就在屋子里卖货，但不开店。但包税人硬要他们再领一张执照，再交税二元。”^③当时这种肩挑负贩、沿街叫卖的小贩占到巴城谋生人数的90%，长期一贯如此。他们大都怀有一技之长，在生意折本时，就转为“杂作”工匠，或出卖体力为生。在荷印谋生的华人中，这种小贩是有代表性的。

明朝覆亡以后，到爪哇避难谋生的闽粤劳动人民“猛增至5万以上”^④。另有人说，由原来的几千人，增加到10万人^⑤，关于十七世纪头三十年巴城华人人数问题，中国文献和西方记述相差悬殊。据中国文献1720年和1730年，巴城华人都在十万人以

① 费缪仑，前引书，6页；李长傅，前引书，166页。

② 《巴城日志》，1624—29年，130页。

③ 费缪仑，前引书，24页。

④ 福田省三，《华侨经济论》，东京，1939年，第18页。

⑤ 丘守愚，前引书，367页。

上^①。据西方记述，1700年巴城华人仅一万人，市内六千，市郊四千^②。泼赛尔甚至说，“在1725年以前，巴城华人从未达到一万人”。可是“到了1733年，仅巴城地区，华人已增至八万”^③。相隔仅八年，人数猛增八倍，而未作可信的解释，笔者认为，中国文献作者到过巴城，有的曾在巴城定居多年，所举数字，虽不能说精确，但毕竟是比较了解华人社会情况，而西方学者多怀有偏见，且情况隔膜，往往以讹传讹。仍以中国人的数据比较可靠。

这个时期巴城有不少奴隶。虽然没有确数，但据荷兰人自己承认：“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巴城的居民一半以上，是由奴隶组成的”^④。1733年巴城的八万多华人，住在市内的约一万四千人，属于多少有些资产的商人。住在郊外的大约六、七万人，多数是奴隶。荷兰人禁止华人小贩在街边设摊，或沿街叫卖，迫使他们充当种植奴隶。

从十七世纪下半期到十八世纪上半期，是巴城蔗糖兴旺发达时期。早在十二、三世纪，爪哇噶刺巴就是华人制糖中心。产销量年达四、五千担。1602年，这里开设好几家华人糖厂和甘蜜厂^⑤。爪哇糖运销欧洲，利润很大。东印度公司为了鼓励中国人多产糖，1619年把土地租给中国人包种，免除了高昂的土地税，1627年明令废除了土邦的封建领主制，并发放制糖贷款。1637年，公司在巴城郊区建立了“蔗廓”（即蔗园和制糖厂联合组

① 参阅陈伦炯1730年付印的“海国闻见”：噶刺巴条；王大海，《海岛逸志》，1791年版；杨炳南《海录》，噶刺巴条以及李长傅、温雄飞、丘守愚等，前引书。

② 霍尔，《东南亚史》（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伦敦，1958，272页。

③ 泼赛尔，前引书，397、404页。

④ 沃特海姆《转变中的印尼社会》（W. F. Wertheim, 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海牙、万隆1951年，239页。

⑤ 陈达，前引书，56页。

织)，由中国人承包。第一个华人承包商是华人甲必丹客观^①，殖民政府给他免税十年的优待。所产蔗糖先是全部交给公司按万丹市价收购，不久改为按公司定价交售。开始因劳动力短缺，只有二、三百名华工。1652—53年增至二千人。产糖一万二千担。1648年巴城华人潘明岩开凿磨盘河，以水力推磨榨糖，大大促进了生产^②。

从顺治十二年（1655）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近三十年间，中国严禁商民下海。巴城华工来源受阻。荷当局一面禁止华工回国，一面从巴厘、望加锡输入奴隶，实行强迫种植。华工当然也沦为种植奴隶^③。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回归大陆，康熙皇帝“诏开海禁”以后，巴城蔗廓华工不断增加，1710年，蔗廓增至一百三十家，共有华工二万五千人。另外还有十二家酿酒厂，也是全用华工^④。

从1864年起，涌入巴城的华工，绝大多数是福建、广东的破产农民。出国时，因无钱付船费而把自己质押给船户。每人船资伙食费，共约二十元，到达目的地，由雇主或同族亲友垫款归还船户。这笔垫款就在华工资项下加利扣还，到还清为止。在偿债期间，同雇主有人身依附关系，其地位类似当时国内的“雇工人”。荷兰殖民当局称他们为“新唐”或“新客农奴”，实际是债奴。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奴隶制度是在抵债劳动（Peonage）形式下隐蔽着的”^⑤。荷兰当局称他们是“新客”或“新客农奴”，以区别于“蔗廓”的种植奴隶。雇用这种押身抵债的“新

① 泼赛尔，《东南亚华人》，369页。

② 陈造福，前引文，27页。

③ 韩振华，《荷兰东印度公司时期巴城蔗糖业的中国人雇工》，1981年华侨历史学会讨论会论文（打印稿）。

④ 福田省三，《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华侨》，译文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2期。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8页，注（40）。

客”，比购买种植奴隶还要便宜。因此前者逐渐代替了后者。开始时“新客”有的是投靠族亲，有的是出于戚友援引。后来由于需要大增，船户贩运“新客”比装运货物更为有利，于是便出现拐贩“新客”谋利之事，曾引起闽粤当局的注意。雍正五年（1727），闽浙总督和福建、广东巡抚联名奏报说，“以前商船出海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手客商，总计不过七、八十人，其实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许货物，竟将游手之人（按指破产、失业的劳动人民）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到彼处，即行留住。”^①这是最早的“新客”贩卖活动。“新客”一词，早在1684年已在巴城出现。到1720年代即开始出现船户拐贩“新客”。尽管“新客”不断贩入巴城，巴城的劳动力供应仍经常紧张、短缺。因为“新客”不堪折磨，死亡过早过多；常随本地种植奴隶逃亡，致使荷兰当局不得不逐渐放宽，乃至取消限制华人入境的法令。一位在巴城当了七年教书匠的程日忻回国后，写了一本《噶刺巴纪略》。书中写道：“每至一山，丛林密莽，死骸相枕籍，不可一朝居”。可见当年荷印华工生活之困苦。当年闽南流传的民谣说这些“过番客”是“六死三留一人还”。

邦加、勿里洞的采锡华工

邦加、勿里洞的锡矿原归苏门答腊巨港苏丹管辖。很早就有华工在此采锡。1710年荷兰殖民者才注意到邦加锡矿。1710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向巨港苏丹收购锡锭运往欧洲试销^②。巨港苏丹早就发现华工采锡技术效能比土著的原始方法优越，曾派人到华南各省招募华工。1755年以后，每年锡的输出超过二万担（1250吨）^③。

① 雍正朝《硃批谕旨》，第四十六册，26—27页。

② 泼赛尔，前引《东南亚华人》，426页。

③ 弗尼瓦尔，前引书，202页。

十九世纪初，英法战争时期，荷兰一度曾与法国合并。1812年，英军占领了苏门答腊。总督莱佛士强迫巨港苏丹把邦加和勿里洞岛的锡矿权让予英王，由英国政府派代表驻扎邦加首府文岛（Mintok）^① 监督开采。莱佛士曾通过英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买办，从广州、黄埔和澳门私下偷募华工。1813年12月13日和1842年2月8日两次从澳门运出一千七百多名华工，送往文岛^②。由采锡华人承包开采。1816年，英国将该岛退还荷兰。于是邦加锡矿便成了荷印政府的产业。

勿里洞锡矿的矿藏，一直被岛上居民巧妙地隐秘不报。过去从未认真进行开采。1850年荷兰当局进行了广泛的探索，雇用华工开采。1853年曾派人到广州、黄埔和香港，一次招去华工253名^③。鸦片战争以前，荷兰人主要向海峡殖民地转贩华工。1864年后，荷兰人先后从海峡殖民地、汕头、厦门、香港等地募去约60万华工。

婆罗洲的华工

荷、英殖民主义者东来时，主要目的是争夺香料。荷兰人集中力量经营爪哇，对于婆罗洲（今加里·曼丹），无力顾及。在十九世纪以前，一直未能在婆罗洲立足。华工到婆罗洲各地定居开发历史悠久，对当地的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起过很大作用。现将几个主要地区华工劳动生息的若干事例，分述如下：

马辰 马辰是婆罗洲东南沿海的伊斯兰王国。早在十六世纪已有大批中国劳动人民到这里定居谋生^④。向当地苏丹纳税交租，领地垦殖。他们把种植胡椒的先进技术，传到马辰。除自种

① 马士，前引书，第3卷，第203—204页。

② 卡德，《荷印华人的经济地位》（J. W. Cater,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Netheland East Indies），芝加哥，1936年，译文见《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3期，7页。

③ 江醒东，《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华侨的迫害》，《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8页。

自销外，还收购当地居民种的胡椒，主要运销中国。

1603年，荷兰殖民者初来马辰，就强迫压低胡椒价格，遭到当地居民反对。1607年被迫退出马辰。1609年，英国乘虚而入，到马辰大肆劫掠。国王迁往内地以避其锋。英国人不敢深入，只得撤走商站^①。1635年荷人再次谋求垄断马辰贸易与国王发生冲突。1638年荷军六十四人被击毙，未能得逞^②。1667年，荷兰占领望加锡后，马辰沦为荷印贸易的中心。但是1669年东印度公司马辰代理处的荷籍人员，全部被杀，只得再次撤出马辰。1707年，英国在马辰港建造仓库和炮垒，并派军舰在内河游弋，耀武扬威。当地居民与华人联合，共三千人进行反击。一夜之间，焚毁了仓库和炮垒，迫使英国放弃攻占马辰的企图^③。中国人在马辰主要是种植和收购胡椒，同当地居民平等互利并共同抗击殖民主义者侵扰，所以深受欢迎。直到1888年，马辰才被纳入荷兰殖民统治的范围。

文莱 1521年，葡萄牙人首先来到文莱，订约通商，购买胡椒。同年意大利人皮哥菲塔到文莱访问。据他说，当时文莱市内的中国居民共有三万人。

十八世纪初到文莱谋生的中国人照例向当地拉甲纳税交租，在海口河边开辟土地，种植胡椒、经营菜园。并循河流到内地清除森林，砍伐木材，建造坚固的中国大帆船，满载货物（主要是胡椒），运往中国销售。连船只也一起卖掉，另坐别船，返回原地，再重新开始。

1774—1775年，一位到过婆罗洲的英国航海者在报告中说，他在文莱看到一间中国船坞，建造一艘580吨的帆船，只用两个

① 见《东南亚研究资料》1969年，第1期。

② 朱杰勤，《十九世纪加里曼丹华侨及其反抗荷英殖民者的斗争》，《东南亚研究资料》1967年，第3期。

③ 田汝康，前引文，117—118页。

多月时间，4,250元的成本。这样低廉的造价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①。非常具体地说明当时文莱华人技师和工匠造船技能之高超。

文莱有很多胡椒园，全是中国人种的。这里种胡椒的方法与苏岛不同。不把结籽的藤蔓绕在树上，而是在地里竖上一根短的直竿，使藤蔓受到充分的阳光滋养，并拉掉藤上的叶子，使胡椒籽得到更多的日照。每株可产胡椒籽七十至七十五粒，比苏岛胡椒结得多^②。

中国人在文莱港不论船上、岸上都设有出售中国货品小店铺。他们把红木、丁香、桂皮、龟甲、上等樟脑、燕窝等运往中国。当时从厦门开到文莱的中国商船，每年约五至六艘，还有从上海、宁波、澳门来的各二艘，广州开来的一艘，总共每年达十二、三艘。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文莱统治者沦为荷兰殖民政府的傀儡，对华人商船进行海盗劫掠，对华人横征暴敛，备极苛虐，致使贸易完全陷于停顿。中国商船和客商都裹足不前，到新加坡殖民地开始建港时（1819年），文莱只剩下五百名华人。椒园均已荒废^③。

西婆罗洲三发、坤甸和喃吧哇邦的华人“公司”

1740年，巴城荷兰当局发动骇人听闻的红溪事件，屠杀华人一万多人，并严格限制华工入境。在这以后，华工多转往荷兰人鞭长莫及的“外岛”（指荷印爪哇以外的岛屿），如苏门答腊、婆罗洲和廖内群岛以及马来亚、泰国等地，但以去西婆罗洲三发、坤甸地区的人数最多。因为十八世纪上半期，这一带发现了金矿。当地苏丹看到华工采金技术和效率比土人土法先进，为增加收益，曾向文莱和华南招募华工，在喃吧哇的东万律（Mandor，

① 泼赛尔，前引书，同页。

② 弗列斯特，前引书，同页。

③ 陈达，前引书，同页。

后改隶坤甸)发现有中国采金者的墓碑,上面刻着1745年的年号^①。1812年三发金矿区共有矿场三十多处,每矿有华工三百人,全邦共有华工三万人^②。在三发河以南15英里处,另有一条河,其上游40英里处有一名为沙拉科(Sataco)的地方,有两万名华工在那里采金^③。

后来,到这一带谋生的华工,一般是在“客头”带领下,组成合作开发的“公司”(带有村社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基本上是自产自销的经济共同体。他们向当地苏丹或酋长交纳人头税和地租,取得土地和开发权利。除采金外,还从事农垦、捕鱼、放牧、种茶、种菜、伐木、造屋、造船、筑路等。一切胼手胝足,从头开始。这样的“公司”共有十八家,比较著名的有东万律的兰芳公司,蒙托拉度的大港公司,三条沟公司以及和顺公司总厅。兰芳公司成立于1777年,为首的是广东梅县客家人罗芳伯(按:伯是对会首的尊称,实名罗芳,一般均误称其名为罗芳伯)。初来时仅率同族一百人。在“公司”极盛时期,成员多达三十万人。(包括当地土著居民)。“公司”除领导生产外,还仿照天地会模式,组成“兰芳大总制”,实际是自治、自卫的民主实体。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西婆罗洲“公司”华工已达十五万人,其中采金者九万人,多数是客家族。“公司”华工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互助合作,打成一片,曾多次联合抗击荷兰殖民军的侵犯。

1824年,兰芳公司负责人刘某,受荷兰殖民当局收买,“公司”成为傀儡组织,所产黄金全部由荷印当局定价收购。1854年大港等公司,先后被荷兰殖民军消灭。兰芳公司延至1885年终被撤销、解散。但是这种由华工合伙合作开发的“公司”组织有大有小,是东南亚各地华工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只是一般规模比较

^① 叶湘云,《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见田汝康,前引文附录。

^{②③} 泼赛尔,前引《东南亚华人》,420页。

小，时聚时散。

四 鸦片战争前后的契约华工

马来半岛的贸易原来基本上受荷兰人的控制。178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长莱特（Fnancis Light）夺取槟榔屿后，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开始。1819年莱佛士占领新加坡，1824年英国以苏门答腊的萌古莲同荷兰的马六甲相交换。1826年这三个英国殖民地联合组成海峡殖民地，首府设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很快就发展为英国从海上控制远东贸易以及逐步向马来半岛进行殖民扩张的大本营。

槟榔屿（简称檳城）和新加坡原为海盗出没的荒岛。英国为了迅速取得开发效益决定采取充分利用廉价华工的政策，以授地招垦、贷款补助为诱饵，极力诱致和招来华工。建港开始，大批华工源源涌来，土地很快就被开发，种上经济林木和作物。所有市镇建筑，港埠设施，几乎全由华工兴建起来。海峡殖民地的迅速繁荣引来更多的华工。从檳城、新加坡和马六甲三个据点向半岛内陆推进。首先是柔佛、吡叻和雪兰莪等土邦。在柔佛邦定居开发的华工有几千家。他们自建村镇，开渠、筑路，境内二十九条河流两岸几乎全是华工开发的种植园。接着后来的华工便分别向半岛西部各邦，分头探采锡矿，开辟种植园。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充分利用华工为开发打下基础，对华工的开发活动，宣布采取“不干涉”政策。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采锡华工已在万人以上。到马来亚的华工不断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是“猪仔”。

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迫开五口通商，武装走私鸦片，掠卖契约苦力，如入无人之境。其它西方侵略者接踵而来，在沿海口岸竞相争夺廉价华工。此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被掳往海外的契约华工，已由东南亚扩及世界各地。华工出国可分为前述四种类型。其中自由华

工主要指自愿自费，出国谋生，不受或摆脱了契约的束缚，这种华工流动性很大。有的转为小本经营的商贩和小生产者，有的打短工。在海外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重压下，他们的处境比契约华工好不了多少。契约华工的第一类型是：

南洋的“猪仔”华工

“猪仔”是指人为畜的贬词，指的是押身抵债到南洋谋生的华工。马来亚的“猪仔”也称“新客”。1827年刊行的《粤游小志》讲道：“东省有诱愚民而贩卖出洋者，谓‘卖猪仔’”。可能是最早提到“猪仔”的中国文献。据说十八世纪中期到南洋各地谋生的债奴华工，年均约一万到一万二千人。到1805年，债奴华工人数已占东印度群岛人口总数的一半^①。1800年，檳城已开始出现购买债奴华工的公开行情。立约劳动一年的华工售价为三十元^②。1823年，新加坡总督莱佛士曾制定管理“猪仔”贩卖的法令，虽然没有实行，但是可以说明当时的“卖猪仔”已发展到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控制的程度。

以新加坡和檳城为中心的“猪仔”贩卖制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1870年以前，英国标榜的是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阶段，新加坡和檳城的“猪仔”贩子（即“客头”），受雇主委托，租下船只，开往厦门、汕头和澳门，转到自己的家乡内地，诱骗和拐架同村、同族的破产农民。运到目的地后，由“客头”上岸找雇主义定售价，然后带领“猪仔”上岸，钱“货”两清。这时“猪仔”贩子主要是居中赚取佣金。“猪仔”从被拐开始，即丧失自由，完全处于禁闭和暴力胁迫之下。

① 贾克森，前引书，8—9页。

②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工制》，《历史研究》，1963年，1期，162页。

第二阶段始于1876年以后。由于“猪仔”的需要量愈来愈大，供不应求，价格随之腾涨，拐贩“猪仔”的利润极为丰厚。这时贩卖“猪仔”的成本，每名约40元，售价为100—120元^①。不久便发展为有组织的经营。檳城、新加坡开设的“猪仔”馆，同厦门、汕头、澳门、香港和海南岛的海口的“猪仔”馆，结成联号或分号。这些馆实际都是绑架、拐骗、关押华工的牢房。它们之间联系密切，能贿赂官府，上下其手。并雇有专门打手，备有各种刑具，以酷刑强迫被拐华工当官承认自愿立约，卖身偿债。其迫害华工的种种暴行，难以尽述。

新加坡和檳城的“猪仔”馆，表面上是当地华人黑社会头目出面经营，实际受英国殖民当局的策划、支持、包庇和操纵。开设“猪仔”馆，要经殖民地当局批准注册，发给执照。规定“猪仔”馆应悬挂方形招牌，以区别于普通客栈。“猪仔”馆对华工有“格杀勿论”之权，华工“在客馆死毙，不论善终屈死，均勿庸洋医相验，便可葬埋”^②。当时，厦门、汕头、广州的中国地方当局，曾累次下令禁止拐贩“猪仔”，英国驻华使节便立即向中国政府施以压力，不让禁阻^③。

另一方面，从1865年开始，荷兰殖民主义者，对荷印各地，也加强了资本输出，扩大开发，所需“猪仔”华工，即向海峡殖民地提价转贩，更引起供应紧张。1876年英国殖民当局决定对“猪仔”贩卖，进行行政干预，特设《华民政务司》（The Chinese Protectorate），专管华工事。名曰“保护”，实为直接控

① 雷德，《北苏门答腊的早期中国移民》（Anthony Reid, Early Chinese Migration into North Sumatra），见《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史研究论文集》（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伦敦，1970年，313页；江醒东，前引文，36页。

② 清外务部档：光绪卅一年八月初二日驻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致外务部申呈。

③ 1886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公报（Strait Settlement Government Gazette, 1886），133页。

制。新章规定：入境“新客”，一律要经政务司官员审查，当官签立契约^①。目的在于，制止荷兰人抬价转贩，以确保半岛的供应。荷兰殖民者延至1888年才开始在汕头自行设立招募华工的机构，名为元兴公司，以好时洋行（Holland China Handile Co.）的名义；进行拐贩，另由德商Laus and Hayloop洋行派船，包揽承运。厦门方面则委托德商Paseday and Co. 洋行，专收潮州“猪仔”^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马来亚的殖民经济立即衰退，出现了劳动力过剩，很多华工失业。殖民政府害怕引起社会骚乱，曾分批遣送华工回国。英属马来联邦政府于1914年宣布废除“猪仔”制度，从1916年起实行，后来又延至1918年。但是，当时马来半岛橡胶种植正在兴起，由于橡胶是战备必需物资，销市紧俏，利润惊人，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增无已。这时马来亚的胶园和荷印苏东烟园，采取老客带新客的办法，利用回乡探亲的华工，招引本乡农民，随他出洋趁工。船资旅费由招工单位支付，但华工必须做满三百个劳动日，才能领取工资，这三百天仍是偿债劳动。“猪仔”制虽已明令废除，但名亡实存，只是方式有些改变罢了。过去“猪仔”为了偿还他的“身价”，要付出一年至三年的无偿劳动，每月只有五分钱作零用。但“客头”常借钱给“猪仔”，到年终结帐时，由于欠帐未清，只得续约，再当“新客”。有的续约五次以上，有的甚至终身不得脱身。还清了积欠，仍继续劳动的华工，称为“老客”，可按一般工资标准到年终结付。但同样要受东家的虐待与盘剥。

关于英属马来亚（包括海峡殖民地）入境华工人数，在1876年成立华民政务司以前，没有系统统计可查。根据一些中外专著

^① 布莱司，前引文，7—8页。

^② 雷德，前引书，313—4页；丘守愚，前引书，90页；泼赛尔，前引《东南亚华人》，434页。

提出的零星数字，估计这七十六年华人入境人数累计约一百八十八万人，平均每年约有二万三千多人。从1877年到1914年，根据海峡殖民地政府劳工委员会历年年度报告的统计，这三十七年入境华人累计约六百一十四万人。估计其中“猪仔”至少占百分之八十，约合四百九十万人。平均每年约去十三万人以上。从1915到1940年这二十五年，华人入境人数累计为五百二十八万五千余人。估计“猪仔”占百分之七十，约合三百七十万人。平均每年约去十五万人。从1800年到1940年这一百四十年，英属马来亚（包括海峡殖民地）入境华工累计在一千万人以上。从三个阶段年均入境人数可以看到入境华工人数增长的趋势。总的情况是去的人多、留在海外死在海外的人多，回国的是极少数。也有回国后再去的。

“猪仔”主要来自汕头（潮州、嘉应州各属），厦门（泉、漳、福州各属）和广、惠、琼州各属。分布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邦加、勿里洞以及婆罗洲的沙巴、沙劳越和西部各地的矿山、橡胶种植园。由于热带的病疫、过度的劳累、无情的折磨、虐待和迫害，“猪仔”的死亡率很高。因此需要不断补充。华工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不断补充“新客”维持的。

鸦片战争以后，拉丁美洲、美国、加拿大及其它地区的契约华工制，都是从“卖猪仔”制度演变而来。一般往往把各地区不同类型的契约华工统称为“猪仔”，实际上各大地区掠贩华工的方式各有不同特点。例如，掳掠手段、出洋口岸和掠贩时期（长短）、人数及结束原因均不相同。分成几个类型叙述，头绪比较清楚。下面是第二个类型：

拉丁美洲的苦力掳掠

苦力这个词来源于印度南部泰米语（Tamil）原文为Koli，原译为咕哩。后因与汉语苦力音义相通，一般都指靠体力负重谋生的人，所以改译苦力。十九世纪初，英国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

度，改用契约劳工。西印度群岛首先从印度招募契约工，称为苦力贸易。后来又从中国掠贩契约华工，仍沿称苦力贸易。因此，这里苦力一词与一般含义有别，它专指契约华工。

早在十九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多次通过其驻广州商馆的买办分别为囚禁过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为西印度特里尼达岛种植园以及当时被英国占领的邦加岛锡矿以及毛里求斯岛偷募华工，包括工匠、农业技工和普通劳工。每次由英国商船偷运二、三百人，一共运出三、四千人。开始原从黄埔上船。当时中国海禁很严，常被中国当局查获究办。后来便改在澳门出口。当时它在中国口岸还不能为所欲为。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西方侵略者直接窜到我国沿海口岸肆意掠贩我国劳动人民，运往海外各地，充当开发殖民地的契约奴隶。几乎所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投入了这一惨绝人寰的“贩卖人类血肉”的贸易。

1、明目张胆的暴力掳掠

1845—6年，一个法国投机商首先租船窜到厦门，先后两次掠贩380名契约苦力运往布尔邦岛。同年英国投机商，苦力贩子德滴（James Tait）窜到厦门开设德记洋行（Messrs Tait Co.，亦称德记卖人行），专门包揽拐贩苦力业务。此人身兼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三国驻厦门领事。手下雇有几百名拐贩和打手，用发给人头钱的办法，收买拐架来的苦力。把他们锁禁巴拉坑，即收容苦力的囤舍和囤船。用暴力刑逼苦力签订到外国劳动八年的卖身契约。在苦力胸前打上S. C. P.等字样的烙印。S.代表运往夏威夷，C.和P.代表古巴和秘鲁。候船到达即押运上船。拐架苦力的手段，不外诱酒、诓骗、下蒙汗药、打闷棍等。一旦落入魔掌，便完全失去自由，比过去在非洲“猎捕”黑人奴隶更加残忍、野蛮。西方殖民主义者，看到华工在东南亚劳动的情况，证实了华工是劳动效率最高、价格最便宜的理想劳动力，所

以不远万里争相掠贩。这种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运到目的地，立即抢购一空。因此苦力贸易（包括运输与贩卖）暴利惊人，运到古巴哈瓦那，可获利八倍。侵略者之间竞争激烈，抬高收购价格，以致拐匪不择手段，肆意横行。白天公然在大街上绑架行人，闹得人人自危。在厦门、上海、广州、汕头、福建等地曾先后发生这类事件，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怒反抗。1852年11月，厦门英商和记洋行（Messrs Syme Muir and Co.）老板塞姆，竟然率领店夥歹徒闯进官衙，把该洋行因抢人被捕的拐贩夺回。说洋行雇的人也有治外法权，中国官府无权干涉。此事激起群众公愤，有一千五百人聚集在该洋行门前要求交出拐犯。泊在厦门的英舰竟派陆战队上岸，向群众开枪，打死十二人，重伤十六人。事态扩大，厦门十八乡全体罢市，抗议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最后，这帮英国苦力贩子，不得不离开厦门转往汕头和澳门。这些暴行是在驻香港的英国侵略者头目包令和德庇时支持和包庇下干出来的^①。

在1860年以前，汕头还没有辟为通商口岸。英国船只就经常非法窜到汕头、南澳和妈屿岛，贩来鸦片，抢走苦力。从1852到1858年，六年中便掠去了四万人，其中有八千人被迫害致死，弃尸河滩^②。

澳门自1557年被葡人窃据，一直是掠贩人口的罪恶渊藪。从1856到1873年，这里运出了大量的契约苦力和“猪仔”。其中运

① 坎贝尔，前引书，101—102页；费正清，《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John King Fairbanks,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哈佛大学，1953年，第一卷，218—9页；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海，1910—18年，第一卷，218页。

② 卫三畏，《中国商业指南》（Samuel Wella William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Hong Kong, 1863），236页。

往古巴和秘鲁的苦力共约二十多万人^①。1893年，葡萄牙、西班牙和秘鲁设在这里的招工馆就有三百多家。靠掠夺苦力为生的人约达三、四万人^②。这里虐待和迫害苦力的暴行是举世闻名的。

2. 海上“浮动地狱”

从中国开往中南美洲的苦力船，需在热带航行三个月至半年，两次越过赤道。在漫长的海途中，苦力一直被锁禁在拥挤不堪的底舱，备受饥渴、窒息、疫病的折磨。而且，动辄遭受鞭打、抛海和任意枪杀。以去古巴的苦力船为例，海途平均死亡率为36.84%，个别有高达70%的^③。在阴森惨厉的恐怖笼罩下的苦力船，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浮动地狱”。陷于绝境而又手无寸铁的苦力，曾多次掀起英勇壮烈、可歌可泣的抗暴斗争，夺船返航，登岸四散。面对船上的暴力镇压，苦力常采取破釜沉舟，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办法，放火烧船。这种大无畏的反抗精神，使强盗们为之丧胆^④。

3. 虐待与反抗

被掠往古巴和秘鲁的契约苦力，所受凌虐，最为残酷。清政府曾先后派陈兰彬和容闳分赴古巴、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况。陈兰彬的报告《古巴华工事务各节》附有一千六百名苦力的控诉、禀词和口供。报告书详细转述了古巴苦力所受的极端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文件发表以后，举世为之震动。现略举几点：1. 苦力每天劳动十六小时，常无故受监工的皮鞭抽打；2. 为防苦力私逃，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一册，38条；W、斯图亚特，《秘鲁华奴》（W、stewart, 《The Chinese Bondage in Peru》），北科罗来纳，1951年，30页。

② 《总署清档》，同治十二年招工档附件：澳门—美国给香港—美国人的信。

③ 《中国评论》（China Review），1865年9月，第11卷，18页，（意大利苦力船《玛尔》号（Deardel Mare），由澳门开往塔溪地的纪录。

④ 彭家礼，《十九世纪西方侵略者对中国劳工的掠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编：《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一集，1979年，北京，260 262 268页。

晚间将苦力的手或脚铐锁在床前的木桩上；3.如触犯工头，除鞭打外，还要戴脚镣劳动；4.终年以生蕉、玉米充饥，吃不饱；5.每月工资四元，只有古巴一般工资的十五分之一。6.契约期满，雇主不给“满身纸”（即满期证明），强迫续约，否则将苦力送官罚做无钱街工；7.做满一年街工后，改做“绑身工”（即由官方将苦力出租，坐得其工资的十分之九，苦力本人只得一成）；8.契约期内，苦力的平均寿命只有五年，苦力死亡率为百分之七十五；9.苦力死后，将其遗骸化为骨粉，作蔗田肥料；10.幸存的苦力，多数是“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绽”的残废人，流落古巴各地，沿街乞食，“生还者百不得一”^①。

到秘鲁的苦力，以在钦察岛上挖鸟粪者为最惨。那里终年无雨，气候酷热。苦力每天的劳动定额是挖出四至五吨鸟粪，由于多患肿脚病，只得跪着劳动，还要挨皮鞭的抽打。有的因劳累过度，当场死亡；有的身陷鸟粪软坑被活埋而死；有的不堪苦役和酷刑，集体从绝壁投海自杀。1860年送去的四千名苦力华工，几乎全部死光，只剩下一百人^②。另外，在秘鲁的山场、糖寮、棉田等种植园和矿山、铁路上劳动的苦力共约十二万人以上，所受虐待与迫害，同古巴相似。秘鲁华工，因不堪凌虐，先后于1869年和1871年两次通过美国驻秘鲁使馆提来申诉，要求转达清政府提出交涉，加以营救。清政府（李鸿章）迟至1874年秘鲁政府派使者到北京谈判订约时，才派驻美副使容闳于九月间到秘鲁调查华工状况。容闳的报告附有二十四幅华工受虐待的照片^③。

这样的非人虐待，理所当然地要激起华工的反抗，从集体自杀逃亡，到聚众起事，乃至参加当地战争，表现了中国人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古巴华工在遭受管工无理鞭打时忍无可忍把管工

① 前引《古巴事务各节》，第一册，第39条。

② 清外务部档，附件：同治十一年，北京同文馆译：《伦敦威斯敏斯特评论》文章：《华工出洋论》。

③ 斯图瓦特，前引书，200—3、208页。

推下鼎沸的糖锅，以及杀死园主、甘愿偿命的义举，屡见不鲜^①。从1870到1876年，秘鲁曾发生多次华工起事，聚众达一千二百人，形成武装暴动事件^②。从1866年到1898年，古巴人民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进行了三十二年的独立战争。有很多华工自始至终同自由战士并肩战斗。哈瓦那广场上矗立着的华工纪念碑，上面刻着“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叛徒”的颂词^③。

西方侵略者不远万里，窜到中国，不择手段地掠贩苦力，不仅因为这种贸易本身有八至十倍的暴利，而且劳动效率远比掠贩黑奴为高。这一点，早在1852年，美国驻华特使马沙利就已有预感。他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建议禁止美国船只装载苦力运往拉美。他明确指示：拉丁美洲的种植园大量引进廉价优质的契约华工，对于还在使用奴隶的美国（特别是南部）种植园将产生很大的压力，在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④。这是美国一贯标榜反对苦力贸易的原因所在。

对契约苦力的野蛮奴役和疯狂虐待，马克思曾加以谴责。1857年3月，他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中写道：“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海去充当连牛马都不如的奴隶以及在古巴被卖为奴隶的受骗的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从未听到过”^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契约苦力制是“隐蔽的苦力奴隶制”，是“接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的^⑥。遗憾的是，有人在论述契约华工时，不仅否认苦力接替奴隶劳工之说，而且说“这是

①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四节。

② 清外务部档，附件：同治十一年，北京同文馆译：《伦敦威斯敏斯特评论》文章：《华工出洋论》122—123页。

③ 《人民日报》，1960年2月7日第四版。

④ 《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The American Diplomatic Public Papers），1971年，第3号文件：1852年3月8日美驻华特使汉弗莱·马沙利致美国国务卿义华业的信。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三辑，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78页。

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说法”，未免唐突经典作家了。

4. 关于苦力贸易的终结

从1845到1874年，野蛮的苦力掳掠猖獗了三十年。据估计，被掠往拉丁美洲的契约苦力不下五十万人^①，包括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墨西哥、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圭亚那、特里尼达、牙买加和智利等，绝大多数苦力是从澳门出国的。

1869年，美国内战结束以后，从1870年代起，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得热带经济作物蔗糖、棉花和烟叶等世界市场价格下降。古巴和秘鲁这类作物的种植园被迫减产，已不需要继续招募华工。与此同时，古巴各族奴隶奋起参加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大批华工也参加了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政府于1871年宣布古巴停止输入华工^②。这个时期秘鲁也陷于同智利的长期战争，种植园瘫痪。1874年，秘鲁同清政府签订招工条约，但一直没有招募华工，秘鲁的最后一只苦力船是1874年7月2日到达卡亚俄的^③。

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掳掠契约苦力，因利害冲突而分为两个体系。一是英国殖民体系（包括美国），一是英国以外的殖民体系。分别以香港和澳门为各自掠贩华工的输出港。两者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前者实力雄厚、占有优势。后者则以哄抬收购价格，进行激烈争夺。英美方面极力谴责澳门从事奴隶贸易，葡方则反唇相讥，各不相让。由于到澳门装运苦力的船只，必须在香港改建夹层、舱，备办淡水、食物和船用物资，最后，英国断然下令禁止澳门的苦力船驶入香港。澳门当局被迫于1874年初宣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集）第一卷，第64页。

② 帕斯特兰纳，《1847—1930年为古巴解放而斗争的中国人》（Juan Jimenez Pastvana, Los Chinoisen la luchas Porlaliberacion, 1847—1930），哈瓦那，1963年页80、60页。

③ 《秘鲁新闻报》劳工副刊《劳动日》，1975年5月11日刊登：《秘鲁：中国人的地狱——华工编年资料，1849—1908年》。

停闭苦力贸易^①。从此以后掠贩廉价的契约移民，几乎全为英国人垄断了^②。

这里附带说一下，苦力贸易与南洋的“猪仔”贩卖方式不同。白人苦力贩子，主要是利用拐匪用暴力绑架，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抗，所以不得不集中到香港和澳门出国。“猪仔”贩子“客头”是跑到自己的家乡，利用所谓“地缘”、“血缘”封建宗法关系，勾引和欺骗贫苦乡民。前者要在上船出国前强迫签约，时间长达八年；后者到目的地才签约，时间为一至二年，并能贿赂官府，诡称皆是自愿自费，取得官府纵容。去拉丁美洲航程约需半年，去新加坡不到一个月，那里同乡亲友多，有返回家乡的希望。拉丁美洲远隔重洋，永无生还之日。因此去南洋的“猪仔”确有自愿卖身的。而去拉丁美洲的契约苦力则纯出暴力掳掠。故在苦力贸易终止后，“猪仔”贩卖仍继续进行。此外，大洋洲的一些殖民岛屿掠去的苦力，人数虽然不多，残酷奴役和野蛮虐待华工的暴行，均出如一律。

美国的“赎单移民”

“赎单”是粤语，指赎欠船票。“赎单工”绝大多数是从香港按赎欠船票办法，出国谋生的契约华工。

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发现金矿，引起了淘金狂潮。1849年已有不少中国苦力被拐贩到旧金山出卖。当时旧金山有人登报转卖苦力。连同房屋、货物一起转让^③。1849年，上海英商祥盛洋行（Messrs Johnson Co.）拐得二百名契约苦力，运往旧金山。每人船资、伙食、杂费由该洋行垫付。契约规

①②《澳门史》（Historic Macao），香港，1902年，469—10页。

③ 莱恩，《1848—49年在上、下加州的游记》（William Redmond Ryan, Personal Venture in Upper and lower California 1848—49），第三卷，266—267页。

定到美做工，在工资项下分期扣还^①。从1850—51年起，香港开始有拐贩华工去旧金山的组织。为了监督华工履行契约和收回垫款，在旧金山设有代理人。后来由于去美华工人数增加，不久重心移至旧金山。以唐人街广东各属同乡会（即会馆）为联系业务、控制华工的机构，其业务范围，包括承包工程，出租和代募华工。美国资本家需要华工，一般只找会馆接洽，立约承包，而不同华工直接打交道^②。华工到达旧金山时，首先到会馆报到。随即在会馆头人率领和监督下，前往工地编队劳动。华工的工资比白人工资少一半，全部交给会馆头人，除按月扣还欠债本息外，还从生活消费、鸦片、酒赌等方面克扣勒索华工^③。所有到美国西部从事开发的华工，都采用这种包工办法。随着美国西部开发事业的扩大，会馆对华工的控制更趋严密。

去美国的“赔单工”几乎全是从香港出国的，绝大多数是广东人。

香港从来都是拐贩华工的中心。那里“为中国法令所不能及，缉捕所不能到”，因此，“拐骗之徒，寄迹其间，贩人渔利，恣其所为。”^④拐子以暴力强迫华工“见官诡称自愿自费赴美”取得香港美国领事的签证，冒充“自由移民”，或“自由旅客”的身份，运往美国。事实上“赔单工”到美国后，在会馆严

① 《英国议会文件》，关于1852—53年中国出洋移民的通信，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Emigration from China, 1852—53, No. (1686) LXV 111. 第8号文件，附件3：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的报告；坎贝尔，前引书，19页；《地平线》双月刊，1982年2月，第2期，附有祥盛洋行招募苦力的契约图片。

② 参阅《华工出国史料》第三辑，239—250页。

③ 贡特·巴什，《苦力，1850—70年美国华人史》（Gunt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50—70）坎布里奇，1964年，57、58、67页；左基扬（音），《1850—80年，美国入境华人》（Kit Young Zo, Chinese Emigration into The U. S., 1850—80）纽约，1978年，50页。

④ 《总署档》，同治八年八月十五日两广总督瑞麟咨总署。

密控制下，强迫从事偿债劳动。受迫害，无权控诉，不能到法庭作证。人身无保障，更无自由可言。所谓“自由移民”，纯属欺人之谈，无非想以债权债务关系掩盖强制奴役关系。美国学著贡特·巴什承认赎单工是变相奴隶。但认为“他们是受本国同胞的剥削”。旧金山六大会馆主要是控制华工，包工谋利。但事实是美国资本家利用会馆，贩来大量华工，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资本家付给华工的工资还不及给白种工人工资的半数。华工创造的财富，兴建的工程都留在美国。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人，最大的剥削者是美国资本家。会馆华商只是以承包商或包工头的身份，为美国资本家效劳，从中分润些油水。说华工只是受“本国同胞的剥削”，显然是为美国资本家开脱。

去美华工几乎全部由美国船只承运。从香港到旧金山，航运成本每人不到五元，而大舱船票每张收五十元以上^①。装运华工使美国航运业得到十倍的暴利。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陷于萧条的美国航运业得到意外的繁荣。

华工从踏上美国土地之日起，就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排斥和凌虐。他们对华工勤劳耐劳，工资低，劳动质量高，很反感。认为华工竞争力太强，降低了白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投机政客从中煽动，西部排华之风时起时伏。华工孤悬海外，毫无保障。唯有遇事退让，避免冲突。白人气焰更加嚣张。由于西部的开发迅速扩展，华工增多，排华活动更趋激烈。

1868年，美国因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工程险阻，劳工短缺，工程陷于停顿。此时正值昏庸的清政府，委派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外交特使，代表中国出访欧美各国。蒲安臣未得中国政府同意，便同美国国务卿西华签订了招工条约，名为“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从中国招去数以万计的筑路华工。参

① 田贝，《中国和中国人民》（Charles Denby, China and Her People），波士斯，1909年，第五卷，110页。

加这条铁路工程的华工共四万多人，牺牲了一万多人。可是在这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建成通车，举行庆祝大会时，却不让一名华工参加。并且事先就把全部华工解雇，不留一人^①。这条铁路对于推动美国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七十年代美国东部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袭击，东部的工业品和失业工人，通过太平洋铁路，大量涌到西部，使加州工业瘫痪，劳工过剩。加上种族歧视和职业竞争，迫害华工的宣传鼓动和野蛮暴行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屠杀、焚掠、驱赶、殴辱华工的惨案达二百多起^②。这是美国当局转移美国工人斗争方向的伎俩。到1882年美国单方面废约，并严禁华工入境。所谓“赎单移民”至此结束。据估计，从1849到1882年，到美国的“赎单工”共约三十万人。他们对美国西部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美国人民至今还表示怀念。

所谓“合法”化招工

英国侵略者借“亚罗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于1858年1月占领了广州。1859年，广州拐贩苦力的暴行更加猖狂了。愤怒的群众自发地惩治拐匪。英国当时正在广州为英属西印度圭亚那招募华工，因拐贩哄抬收购苦力价格而遇到困难。英占领军当局为了控制局势，利用这个机会，由行政委员巴夏礼出面干预，向广州巡抚柏贵施加压力，迫他出示准许民人自愿出洋承工，意在变非法拐贩为“合法”招募，以减少中间层层中饱，降低收购成本，进一步实现国际共管招工的阴谋。英、法在广州（太平门）各自设立了招工馆（公所），英国为圭亚那招募了三百名苦力，平均每人只花了一百十七元的费用。一次便盈利八万

① [美]塞克斯顿，(Apexander Saxton)，《高山上的广东劳动大军》(The Army of Canton in the High Sierra)，《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66年5月号，142—151页。

② 《总署清档》，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外交始末记稿本），使美陈兰彬等奏寓美华人多被虐待请派设领事片。

五千元。英国侵略头目罗素、卜鲁斯、阿礼国、巴夏礼等人无不为之兴高采烈^①。这是所谓“合法”化招工的前奏。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迫签城下之盟。《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允许民人自愿到通商口岸，下英（法）船只，到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工作。”从此，所谓外国在华“合法”招工，就由广州一口扩至各通商口岸，海禁已不废自废。可是，如前所述，自愿到远隔重洋的拉丁美洲热带种植园和矿山为白人卖命的人，毕竟寥寥无几。结果所谓“合法”招工仍然是用“人头钱”向拐子收购。从1860年到清末，英、法、西（西班牙）、美、秘、荷、德等国都曾同清政府签订招工条约和章程，取得“合法”掳掠的权利。西班牙签约后，曾贿通福州将军和关道衙门，在厦门设馆，为古巴招工。仍是绑架掳掠，禁闭刑逼，受害者跳海、呼救。各国驻厦门领事曾联名向清政府抗议，何以独许西班牙如此招工。总理衙门派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到厦门调查。他在报告中也说，福建地方当局不应贪图每人三元的招工费而牺牲人命。总署为此通报各口关道注意^②。

二十世纪初英国曾为南非金矿招去约七万名华工。这次招工正值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之后，清廷对英国招工，求之不得。在谈判过程中，对英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无不一一俯首承诺。英方答应每招一名华工交纳招工费三元，华工到达南非后，每人每年向中国驻南非总领事交纳注册费三元。清政府为了这项收入，不惜出卖华工到远隔重洋的南非当奴隶。

在签约以前，1903年，英国已在香港、梧州为南非招工。由于在华南招工，与海峡殖民地的“猪仔”贩卖利益冲突，决定改在华北招募。当时日俄交战，以我东北为战场，每年大批“闯关东”的华北难民，为战争所阻，为南非在北方招工提供了很大便

① 彭家礼前引文，282—285页。

② 《总署清档》，同治八年七月初五日，总署咨上海道文。

利。

美国第31届总统胡佛当时在天津开平矿务局当工程师，汉名胡华。听说英国为南非招工，特地跑到伦敦组织了一个“中国工程矿务公司”，自任董事。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同南非当局签订代理招工合同，取得包揽在华招工的专利权。所谓招工，仍不外借手洋行、买办、拐匪、人贩等层层立约，负责按期如数交人。胡佛因此大发横财。

上述“招工”人贵，由天津海关道保工局（专收招工费的机构）发给执照，让他们随带武器，深入内地，肆行掳掠。招工开始不久，北京五城“接连发生丢失人口案件，率多藉口招工”。烟台瑞记洋行所雇印度籍招工人员，携带手枪，窜到山东濮县、肥城等地掳掠民伕，强拉民船，行凶杀人。所谓“合法化”招工，实际是以条约、章程为护符的野蛮掳掠和清朝买办官僚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无耻出卖^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1916年起，英、法、美、俄等国曾同北洋军阀政府签订条约，从华北等地共招募二十三万契约华工，送往欧洲战地做工。1916年2月起，法国先后从天津、山东、浦口等地招去十五万人，主要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战地和后勤工厂劳动。英国于1917—1919年从山东威海卫和胶济铁路沿线招去五万多人，运往巴尔干半岛和西部战场。1918年华工在米索不达米亚沙漠地带为英军挖战壕和修筑其他军事工程。在德军反攻中，华工伤亡惨重，共有一万多名华工死于德军炮火之下。这些为外国人当炮灰使的华工，显然不能说是出于自愿的，而只能是受骗和被迫去的。这个时期，沙俄从华北和东北招去的华工最多。俄国在天津设有专门招募华工的“义成”和“泰茂”两家公司。从1916年起，先后招去二十多万人，大约欧俄和西伯利亚各

^① 参阅彭家礼，《清末英国为南非金矿招募华工始末》，《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占一半。他们在西部战场挖战壕、装卸军火物资，还担任斯摩棱斯克铁路终点、黑海的建港工程，以及西伯利亚森林的开发，乌拉尔铁矿和顿巴斯煤矿的开采。这些工程都是最粗重，最危险的劳动。俄国人招工时，以待遇优厚诱骗华工。实际不仅不给工资，还挨冻受饿。有一次，受骗华工群起反抗工头的鞭打，打死前来镇压华工的俄兵，俄方立即派兵增援，把三百名起事华工全部枪杀。在西线俄军战场牺牲的华工约七千人。这些都是根据条约“合法”招募的契约华工。

十月革命后，大批旅俄华工参加了红军。1918年苏红军第三军二十九师后备团、乌拉尔中国团、莫斯科的中国营，全体成员都是华工。在莫斯科、彼得堡（即列宁格勒）等城市，华工组织赤卫队，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

在法国的十多万华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不少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传播了火种。

历史上的华工出国，时间长达数百年，地区遍及世界各地。出国人数至少在千万以上。华工对海外各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加速和促进的作用，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他们在海外受尽了折磨、歧视、排斥、侮辱、迫害和屠杀，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奴役，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广大华工对祖国始终怀着无限忠诚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华工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华工出国的历史是当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现实意义的好教材，也是研究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十九世纪华工与华人 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贡献

张 铠

从1845到1874这三十年间，大约有30万契约华工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卖到拉丁美洲，在那里被迫从事牛马不如的奴隶劳动。他们惨遭剥削与奴役的历史，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充满血和泪的一页。对此中国人民应当永远铭记在心。

拉丁美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奴隶创造的。其中就包含着广大华工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西方新老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却极力抹杀这一事实，尤有甚者，他们甚至不惜篡改历史把殖民主义者对华工的罪恶掠卖说成是“黄祸”的蔓延，把那些用自己的血汗为拉丁美洲的开发做出贡献的华工和华人诬蔑为侨居地的“民族灾难”。而且直至今日，仍有人在召唤“黄祸”论的幽灵，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此中国人民不应沉默。

（一）契约华工对拉丁美洲经济开发

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英属圭亚那于1853年开始大量招来华工。在华工入境前，由于奴隶制的废除，“‘西方世界的筋力’再也得不到了，许多已经开始兴旺的种植园只好废弃。”^①英属圭亚那到处呈现出荒凉衰败的景象。然而契约华工的到来和不畏艰难的辛勤劳动，使这里又重新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所以英国土地与移民委员会在1854

^① 詹姆士·罗德韦：《英、荷、法属圭亚那》，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99页。

年5月的一封信中也承认：“中国人在东方各地已经公认为是造成繁荣的因素。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以他们的不懈劳动促成那个地方的繁荣富足。在西印度^①，从每一方面传来的报导，都证明中国移民对于西印度的主要支柱，种植园事业的良好作用。如果没有来自东方各地的移民，那里的种植园早已无法维持了。”^②

到1870年左右，“庄园的地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出口总值同奴隶解放前相比增加了一倍”^③，使英属圭亚那“已经达到优于大多数热带殖民地的地位，”^④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梅腊的糖产量和其他地区相比所以能青云直上，其关键之一在于应用了“真空平锅”的技术，而使用“真空平锅”精炼蔗糖的工艺，“一般都归功于中国工人的精湛技术。”^⑤

华工对英属圭亚那的开发，使英国在那里得以立足。英国握有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地，就会控制住亚马逊河流域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此外还可以垄断南美同向风群岛之间的一切贸易。这种形势对竭力想插足这一地区的美国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因而美国对英国的招工活动开始采取阻挠措施并禁止美国船只为英属圭亚那运送华工。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华工“将创造出一种难以与之抗衡的竞争力量。”^⑥

在秘鲁，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国际市场对蔗糖和棉花有大量的需求，因而为秘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废除黑奴制以后，秘鲁农业由于缺乏劳动力，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在这种危急时刻，大约有十万名华工被掠卖到秘鲁，其中近九万人被投

① 西印度：历史上曾专指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征服的美洲地区，本文的各段引文中，一般指英属圭亚那一带地区。

②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二辑，第83页。

③ 詹姆士·罗德韦：前引书，第119页。

④ 同上，第129页。

⑤ 陈翰笙：前引书，第四辑，第408页。

⑥ 同上，第三辑，第5页。

入到种植园中从事甘蔗和棉花的生产，这无异于给一个垂死的病人输了氧。事实也是如此，秘鲁的沿海农业区是华工最集中的地方，1874年6月11日，即苦力贸易即将终止前的三个星期，又有3,982名苦力被运进秘鲁，其中3,100人被迫在上述沿海地区从事农业劳动^①。

这一地区的很多种植园里都曾雇佣过上百名苦力，有的种植园里雇佣的苦力人数高达1500名^②！在秘鲁的某些沿海地带，华工甚至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比如在帕蒂维尔卡谷地，华工占总人口的66.3%^③。当时一位在秘鲁沿海做科学考察的法国人夏尔·维奈尔看到靠近太平洋的一些谷地中有如此之多的华工在劳动，使他感觉那里“好象是亚洲的田野。”^④1871年8月15日《卡亚俄利马新闻》一报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些土地现在为中国人耕种着。”^⑤秘鲁华工史专家瓦特·斯图尔特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指出：“尽管当时在这些种植园里很可能还有一些中国人以外的工人，但绝大部分工人是苦力，这似乎是无容置疑的。”^⑥由于华工辛勤的劳动，使秘鲁农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甘蔗生产为例，殖民时期结束时（1826年），秘鲁甘蔗产量仅56,700金塔尔。由于有了苦力的劳动，遂使秘鲁甘蔗生产进入了极盛时期，1875年产量已达2,000,000金塔尔，增长三十五倍以上，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瞠目^⑦。再从糖产量来看，1870年为2,510吨；到1880年

① 斯图尔特：《秘鲁华工史（1849—1874）》（W. Sterwart, Chinese Bondage in Peru,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olie in Peru, 1849—1874）北卡罗莱纳1951年版第89—90页。

②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107页。

③ 罗德里格斯：《秘鲁的苦力华工》（H. Rodrigues, Los Trabajadores Chinos culies on el peru）利马1977年版，第16页。

④ 同上，第16页。

⑤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84页。

⑥ 同上。

⑦ 蒙塔格内和阿尔瓦：《秘鲁中国移民社会经济概略（1848—1874）》（E. F. Montagne, G. G. Alva, Apuntes Socio Economicos dela Inmigracion China encl peru, 1848—1874）利马1977年版，第61页。

增加到80,000吨^①。产量直线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华工使“真空平锅”的技术在生产实践中发挥了作用，“蔗园糖业煮糖管机重要之工亦华人也。”^②美国内战的爆发使秘鲁的棉花在国际市场上大受欢迎，售价扶摇直上。秘鲁棉花种植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自1865年至1873年秘鲁向英国出口的棉花从8,937英担增至99,492英担^③。在1877年以前，秘鲁出口的棉花14%来自皮乌拉；38%来自利马专区；42%来自皮斯科——伊卡^④。这些地区恰恰是华工最集中的地方。华工对秘鲁棉花种植业的贡献不言而喻。此外，华工还是秘鲁种植水稻的先驱者。张荫桓在其《三洲日记》中对此亦有记叙：“秘民……遂亦种稻，赖华工为之，岁仅一获，米却不恶。”^⑤华工开创的水稻种植业在秘鲁得到不断的发展，直至今日秘鲁水稻的单产量仍居拉丁美洲首位^⑥。基于上述史实，秘鲁学者自己也承认，华工对秘鲁的农业“起到了一种挽救的作用”^⑦。

秘鲁华工不但是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而且也是鸟粪开采业的支柱。为了进一步评价华工在这方面对秘鲁社会所起的支撑作用，让我们首先看一下1840至1880年间鸟粪开采业对秘鲁国计民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秘鲁沿海的岛屿上有着丰富的鸟粪储藏。在上述历史时期欧洲对鸟粪肥有着大量的需求，因而刺激了秘鲁鸟粪的生产。1840至1880年秘鲁共生产了1,200万吨鸟粪，价值750,000,000比索^⑧。

① 博尼利亚：《鸟粪与秘鲁资产阶级》（H. Bonilla, Guano y Burguesia en el Peru）利马1974年版，第154页。

② 《晚清海外笔记选》，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③ 博尼利亚：前引书，第153—154页。

④ 博尼利亚：前引书，第154页。

⑤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40页。

⑥ 多利宁和多罗什克维奇：《秘鲁》，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11页。

⑦ 罗德里格斯：前引书，第25页。

⑧ 博尼利亚：前引书，第146页。

这笔庞大的收入对秘鲁的政治、经济各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政治领域，秘鲁独立以来，各派政治力量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搏斗，使秘鲁各种社会矛盾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军队和官僚机构，才勉强维持住国家的统一。在上述历史时期，鸟粪收入的60%用于政府的行政开支，其中24.5%用于军队开销，29%用于加强官僚机构^①。没有鸟粪的收入，秘鲁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因而也就没有了秘鲁社会的相对安定和秩序。

在经济领域，自1845年，秘鲁进出口的平衡状态已被打破，从1859年起，进口总值平均为出口总值的四倍^②。秘鲁只有从鸟粪的出售中换回预付款才能弥补这种对外贸易中的亏空。秘鲁历届政府用来平衡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就是用鸟粪换取国外贷款。1868年当彼罗拉任财政部长时，秘鲁财政状况已濒临崩溃的边缘，财政预算赤字达17,000,000索尔，外债达45,000,000索尔^③。秘鲁只能与法国德勒弗公司签订一项合同，提供200万吨鸟粪，由该公司立即付给秘鲁政府2,400,000索尔的预付款，并在一年内每月再预支700,000索尔，同时负责偿还秘鲁的外债^④。就这样秘鲁政府靠出卖鸟粪资源苟延残喘，避免了财政上的总崩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鸟粪的收入构成了秘鲁经济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秘鲁民族的命运，因而在秘鲁历史上把1840至1880年盛产鸟粪的这一时期称作“鸟粪年代”。而这一历史时期秘鲁鸟粪的开采主要是由华工承担的。《秘鲁华工史》一书指出：“在整个进口移民的时期，这种产业的大部分劳动都是由中

① 博尼利亚：前引书，第146页。

② B.派克：《秘鲁近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册，第232页。

③ 博尼利亚：前引书，第142页。

④ 博尼利亚：前引书，第82—83页。

国人承担的。”^①最早获得贩运华工特许权的多明戈·埃里亚斯于1853年将600多名华工运到钦察岛从事鸟粪的挖掘；到六十年代中期达1000多人^②。这里自然环境险恶，华工劳动条件极为艰难，正如郭嵩焘日记所载：“濒海无雨，鸟粪屯积数百年，取之不尽。中国人充工必鲁（秘鲁），以搬鸟粪为最苦。以岁久干结，锄锹所及，飞尘四扬，其气恶臭，又地气亢热，所以为苦。”^③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华工每人每天被迫挖掘4—5吨鸟粪^④。广东香山人张贵对华工在鸟粪岛上的悲惨遭遇做了血泪的控诉：“在鸟粪山名真渣（钦察）岛做工，有定限，每天装满两大车，如不完，即将两手两脚指用绳扎，吊打，每日不准多饮水，若在饮水处停一两秒钟时，即要鞭打，每天寅正常有两三人自缢的。又有许多在鸟粪岛高处投海死。又有挖鸟粪自埋死。大凡投海自缢俱系约定一百余人同时尽命。”^⑤钦察岛最初引进华工达4000人以上，但十年过后，残存者不过百人，其悲惨程度可想而知^⑥。秘鲁历史上的“鸟粪年代”实际上是建立在华工的累累白骨之上，支撑了秘鲁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

此外，秘鲁金融业的发展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都与对华工的剥削紧密相关。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秘鲁很多种植园主、商人和船主鸟粪承包商等开始进入金融业，使秘鲁“有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并开始了资本主义化的突进过程。”^⑦秘鲁在1862—1869年间先后成立了“禾意银行”（1862年）“秘鲁银行”（1863年）、“伦敦、墨西哥和南美洲银行”（1863）、“信贷银行”

①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96页。

② 罗德里格斯：前引书，第4页。

③ 陈翰笙：前引书，第四辑，第634页。

④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96页。

⑤ 容因：《询访客居秘鲁各官民人等目睹华工各情形及面讯华工供词》

⑥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266页。

⑦ 罗德里格斯：前引书，第1页。

(1866年)和“利马银行”(1869年)等五家银行。象乌加特、坎达莫和卡内瓦罗等双手沾满华工鲜血的苦力贩子都成了这些银行的董事^①。这一事实说明秘鲁这些金融界巨头与苦力贸易和契约华工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种植园里，在鸟粪场上，华工的劳苦与牺牲对秘鲁民族资本的积聚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客观上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1864年12月8日美国人恩里克·梅格斯与秘鲁签订了一项承修从利马到奥罗亚这段铁路的合同。梅格斯有鉴于华工在修筑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过程中所做出的业绩，决定在他承包的这项铁路工程中也大量使用华工。1870年梅格斯从秘鲁政府那里得到进口8,000名华工的特许权，而且在几个月内他就完成了这批华工的输入。在这段铁路线上华工人数最多达6,000人，占劳工总数50%^②。可以说没有华工，就没有奥罗亚铁路。在筑路工程中华工披荆斩棘的辛勤劳动与牺牲得到秘鲁人民的尊敬。秘鲁著名的经济学家艾米利奥·罗梅罗赞誉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出色的筑路工人。”^③梅格斯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是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工人。他们坚韧不拔”^④。而且我们尤其不应脱离当时秘鲁特定的时代背景来狭隘地评价华工在修筑奥罗亚铁路过程中的贡献：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对鸟粪储藏连续几十年的狂挖滥采，使这一天然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产量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多年来一直靠鸟粪收入支撑的秘鲁经济遇到了新的挑战。1879—1884年间秘鲁和智利为争夺阿塔卡玛沙漠的矿藏而展开了太平洋战争。结果秘鲁惨败，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就在“鸟粪年代”的光圈逐渐黯淡，以及秘鲁为医治战争创伤而进行国家重建

① 博尼利亚：前引书，第46页。

② 罗德里格斯：前引书，第15页。

③ 蒙塔格内和阿尔瓦：前引书，第67页。

④ 罗德里格斯：前引书，第15页。

的艰难时期，在秘鲁中部山区的奥罗亚一带发现了种类繁多，蕴藏量颇丰的矿藏，其中尤以银的储存量最大。1886至1895年间该地的白银产量达33,000,000美元^①。这笔巨大的收入给秘鲁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所以秘鲁人民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作“白银年代”。奥罗亚矿区的开发和白银的外运完全仰仗主要由华工承建的奥罗亚—卡亚俄铁路。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华工用自己的牺牲为秘鲁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白银年代”的到来揭开了序幕。

契约华工对古巴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功绩昭著的，在甘蔗的种植中尤为如此。甘蔗的种植和蔗糖的出口在古巴的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蔗糖产量来看，1847年为208,599吨，至古巴独立战争前的1868年，糖产量已经高达749,000吨^②。而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华工大量被掠卖到古巴的阶段，八万名华工在种植园里的劳动与古巴蔗糖生产量的剧增紧密相关，正如陈兰彬所指出的“该国入款以古巴糖税为大宗，而糖寮出息，又以华佣多寡为盈拙关键，故该国上下无不注重招工”^③。其次，在水稻的生产中，华工不但是劳动者，而且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进了古巴，从而改进了水稻的生产面貌。

到十九世纪末，巴拿马运河的开凿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国际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国际概况》一文中曾指出修建这一运河的重要意义^④。在巴拿马铁路修建过程中，曾有两万华工在施工线上从事艰难的劳动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帕那马（巴拿马）之地介于南北米里坚（南北美洲）之间……闻昔修铁路时，因其地水土恶劣，天气炎燠，西班牙国用所贩‘猪仔’粤人两万余执其役，乃听其穴居野处，餐生饮冷，逼以苦工，而疾困死者

① B. 派克：前引书，上册，第314页。

② 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1492—1969）》，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80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二一卷，第一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48页。

殆尽，狠哉！”^① 据国外资料记载，1855年在海拔3,020英尺的一高地上，为了修建47.5英里长的一段铁路，华工竟埋骨400余人。华工的死亡率是各国工人中最高的^②。在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过程中，同样有许多华人劳动在死亡线上。光绪十三年（1887年）被诱骗华人六千至巴拿马开河，“已往者五百六十一人，瘴歿逾半”^③。所以华工都把去巴拿马视为畏途，我们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语：巴拿马铁路的竣工和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成功，内中包含着数万华工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

（二）华人在促进侨居地经济发展以及在加强中国人民与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拉丁美洲各地的华工在解除契约以后，很多人成为独立的劳动者，在侨居地一般称他们为“华人”或“自由华人”。他们勤奋的劳动态度和简朴的生活作风给侨居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秘鲁，“在口头的传说中（至今）还忆及着在利马寒冷、云雾浓重的早晨，零售热水的华人；口头传说没有忘记拣拾抛在街头上的烟蒂的华人，他们把这些烟蒂送到并非地下的车间里去，重新做成香烟；传说没有忘记那些赶着骡车在利马贫民区挨家逐户掏粪的华人，他们把这些粪肥施到田地里去；传说也没有忘记，在一个时期，凡是谈到仆役，那就等于说中国人。”^④ 在秘鲁，华工解除契约后一般都流入城市，在那里充当厨师、洗衣匠、面包师等；同时，“新生的手工业也吸收了东方的劳工。”^⑤ 在古巴，解除契约的华人与秘鲁华人的情况基本相似，他们也多半流入到城市

①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16页。

② 杜瓦尔：《大山可以移开》（M. P. Duval, And the Mountains will Move），第29—30页。

③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34—235页。

④ 罗德里格斯：前引书，第18页。

⑤ 同上。

和村镇上去，“在烟草厂和卷烟厂里作工，也有的成了木匠、泥瓦匠、机械工、铁匠、码头上的小车载运工和运糖船上的装卸工”，还有的成了矿工和筑路工①。以1899年为例，从下列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巴华人职业的分布情况。②

职 业	人数	职 业	人数	职 业	人数
艺 人	26	制 糖 师	1	技 师	4
经 纪 人	16	家 仆	2754	水 手	7
建筑工人	7	饭店及旅馆老板	17	机 械 师	19
泥 瓦 匠	127	养马场主	1	医 生	1
房屋修缮工	8	铁路雇员	4	听 差	8
画 匠	4	店 员	2	乐 师	1
二道商贩	301	政府雇员	3	白 铁 工	23
理 发 师	61	牧 牛 人	2	面 包 师	37
陶 工	6	雕 刻 师	1	渔 夫	28
马 倌	6	农 场 主	42	画 匠	23
制 盒 工	2	铁 匠	3	银 匠	5
烧制火药工	1	小 店 主	5	巡警和更夫	4
西服裁缝	1	工程师(民用建筑部门)	3	首 饰 匠	8
石 匠	4	工 程 师	17	成 衣	25
鞣 革 工	7	园丁和花匠	71	士 兵	1
烧 炭 工	287	短 工	8033	乐 器 师	1
看 门 人	2	砌 砖 工	14	铜 匠	23
磨 夫	23	洗 衣 工	196	糖场蒸馏车间工人	3
木 匠	104	挤 奶 工	1	小 贩	471
马 车 夫	2	伐 木 工	16	鞋 匠	28
商 人	1923	学 者	2	工 头	5

从上述表格所列举的数字来看，华人从事的社会职业达63种之多，有的务农，有的经商，有的充当佣工，有的受雇于厂矿，

① 帕斯特拉纳：《古巴解放斗争中的中国人（1847—1930）》（J. Pastvana, Los Chinos en Las Luchas por La Liberacion Cubana, 1847—1930）哈瓦那1963年版，第45页。

② 科比特：《古巴华人传奇（1847—1947）》（D. C. Corbitt, A 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uba, 1847—1947）威尔莫1971年版，第92—94页。

有的从事手工艺劳动，涉足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个别华人达到小康地步外，绝大多数华人仍属于所谓下等人之列。他们之中能够自立于社会的，多是从事手工艺劳动和零售商业的那部分华人。他们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填补侨居地经济生活中的缺门，借此勉以糊口。绝大多数华人以充当“短工”为多。所谓“短工”，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上随时准备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固定工作的人。他们的生活自然是艰难和动荡的，得不到任何保障。

无论在秘鲁、古巴或是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华工一旦解除了契约义务，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靠勤俭节约，积聚了一点点资本，于是开起了杂货铺或饭铺，或者成为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在秘鲁，华人最初多半开办一些小饭铺或酒馆，顾客主要是在当地谋生的华人。后来，中国厨师高超的烹调技艺逐渐在秘鲁社会上赢得了盛名，光临中国饭铺的顾客日益增多。在秘鲁各社会阶层当中都有中国饭食的偏爱者，其中尤以劳动人民为众。中国饭馆的各种小吃经济实惠，深受他们的欢迎。直至今日，秘鲁华人开办的饭馆仍被秘鲁人称做“契发”，这实际上是广东话“食饭”的转音，此外象萝卜、豆芽、绿豆、生薑、白菜、芋头等中国蔬菜以及豆腐、云吞（馄饨）、蝦饺、叉烧饱、旦卷、萝卜糕、煎堆、绿豆沙、寄生旦茶、鱼生粥、凉粉、凉糕、马拉糕和五加皮酒等中国食品，由于华人的引进和推广现已成为秘鲁人民日常饭食中的一部分^①。在古巴，还在华工受契约束缚的年代，他们已经在种植园里充当厨师了。当他们解除契约后，往往也以烹饪为业。1858年华人路易斯·佩雷斯^②（曾玲，Chnng Leng）在哈瓦那桑哈大街开办了一家小饭铺；阿夫拉姆·斯库尔（蓝西叶，Lan Si Ye）随即在这条大街上摆了一个卖油炸小吃以及兼卖水果的

① 何名忠编：《秘鲁华侨手册》，利马1967年版，第12页。

② 华工被掠卖到美洲后，雇主常常给华人起西班牙名字。故有些华人有西班牙姓名。

小摊子。这里日后发展成为哈瓦那的“唐人街”^①。除饭馆外，华人还经营杂货铺和小商店。在一些小镇上，华人的杂货铺甚至兼营铁器、皮革制品和衣服、首饰等物品，其小而全的特点，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多方便。当年美国驻秘鲁大使吉布斯曾指出：“华商卖出的商品较其他民族商贩卖出的东西，价廉而物美。”^②一家秘鲁报纸在评述华人开办的永安昌商号（Wing on Chong）时说：“它以其商品丰富、名贵、花色品种繁多以及售价低廉和对顾客态度的殷勤而负盛誉。”^③另一位当代的评论家指出：华人对于有效地改变秘鲁很多陈旧的技艺和降低很多种消费品的价格做出了贡献^④。而这也正是中国人开办的小商店能够在侨居国立足并不断得到发展的根本原因。比如在古巴，到1866年，即第一家华人店铺开创八年后，华人商店已经遍及皮纳尔·德尔里奥斯，纳纳哈伊和吉内斯等地。到1870年，在古巴西部四省的各城镇中，几乎处处都有华人开办的商店^⑤。古巴城镇所需的蔬菜，从种植到销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都是由华人承担的。特别是华人小商贩给侨居地的人民带来极大的便利，“他们身着兰色粗布的上衣和肥大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没有后跟儿的拖鞋，头上戴着宽大的草帽，肩上横着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圆筐，内中零星杂货一概俱全。他们走街串巷，试图打动那些善于盘算的家庭主妇的心，劝说她们从他那儿买点什么东西。他们不是靠甜美的叫卖声来吸引顾客，而是手中拿着五六个小磁碟，悠然自得地让这些磁碟依次从这只手落到另一只手里，发出不断的清脆的响声，把那些心不在焉的主妇们很快吸引到窗口来。”^⑥在英属圭亚那，华人一度被污蔑为“狡猾的流氓和小偷，”经过生活的实践，人们终

① 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46页。

②③④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228页，第226页，第228页。

⑤ 科比特：前引书，第90页。

⑥ 科比特：前引书，第90页。

于认识到“这个污名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形成相当重要的商业阶级。中国人在经营乡村小店方面，显得更为成功，但所得利润只能维持最低生活，不能有其他奢望。”^①这些经商的华人以其诚恳的态度、周到的服务、低廉的售价，奔波城乡之间不辞辛苦的毅力以及兢兢业业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在侨居国的人民中赢得了信誉和声望。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侨居地城乡间的物质交流，活跃了市场，也便利了顾客，成为侨居国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不能不说是华人对侨居地的贡献。

还有些华工在国内就是熟知医术的大夫，像咸丰二年（1852年）被卖往哈瓦那的陈鼎贤，在中国时就是“向作医生的”^②。被掠往海外后，他们又逐渐熟悉和了解了侨居国的各种草药的性能，丰富了自己原有的药物知识并为自己的同胞治病，在解除契约后，他们又往往重新悬壶问世。在秘鲁，“华医之术颇行于彼。”^③华人在秘鲁行医之初，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他们的医术不但被人怀疑甚至遭到污蔑和诋毁。因而也引起秘鲁人当中力主正义的人士的不平和愤慨。当地报纸曾发表文章为中国的医术辩护，证明用中草药治好了秘鲁大夫所未能治愈的病人^④。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医在秘鲁人中间逐渐赢得了声誉、尊重和信任。在1873年10月21日的《商报》上，有报导说：“在中国医生中，医道最高明的那位，仅凭看病和出售开给患者的药剂，其收入已不下80,000索尔。”^⑤华人炮制的各类草药，“无论过去或是现在，一直被当作各种家庭常备的药物使用着。”^⑥在掠卖到古巴的华工当中，也有些是医术高明的中医大夫，他们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医

① 詹姆斯·罗德书：前引书，第194页。

② 陈兰彬：《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四册，第三页（下）。

③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47页。

④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127页。

⑤ 蒙塔格内和阿尔瓦：前引书，第67页。

⑥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127页。

术立即在古巴社会中引起震动。其中一位著名的中医还著书立说，其专著曾流行一时。1847年10月22日哈瓦那的《玛丽娜日报》为推销这一著作，还专门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中国医术》或《天朝医学概论》，内中对令人惊异之医疗方法有详尽记载。该书系由新近莅临哈瓦那之华人现身说法笔录而成。”^①哈瓦那其他各报也纷纷转载这一广告，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慕名前往就诊的古巴人络绎不绝。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哈瓦那旅游的一个英国“士绅”曾以卑鄙和不屑的口吻，对这位中国大夫的医术表示了怀疑并对哈瓦那人中间出现的“中国热”流露出讥讽之意。他写道：“我发现哈瓦那人和约翰^②中一样易于受骗；一位中国植物学家来到这里并自告奋勇愿一试其医术——人人都发疯般地找他确诊，没有任何一条街道象他诊所所在的那条街道那样人群蜂拥蚁动……只两个月，他就寄回中国8,000镑。”^③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无损于中华传统医学的光辉，也无法阻挡中华医术在古巴的传播。著名中医钱博比（Chan Bam-bia）在马坦萨斯一带遐迩驰名，人们对他的高超医术交口相赞。在古巴民间形成了一句谚语，当人们谈到一种不治之症时，就说：“连中国医生也治不好了。”^④1870年6月，由于他享有的盛誉，被从马坦萨斯省请到哈瓦那来行医。当时，中国医生的医德则更为侨居国人民所称道。他们好善乐施、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都传为佳话。象上面提到过的那位钱博比医生，他从不利用自己的医术和盛名渔利。相反地他对古巴的贫困者充满着同情和关怀，他经常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药钱，就给我；如果你们没有钱，就不要给。我这药是给穷人治病的。”^⑤由于他经常免费为古巴劳苦者治

① 科比特：前引书，第130页。

② 指英国人。

③ 科比特：前引书，第87页。

④ 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80页。

⑤ 同上。

病，因而他本人则一贫如洗，当他临终时，那些满怀感激之情的古巴人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①。有些中医，当古巴独立战争（1868——1898年）爆发后，他们舍弃了自己的诊所和丰厚的收入以及宁静的生活，而投身到火热的战斗中去。象利沃里奥·王森（Wang Seng），他本是蔓萨尼略附近居民点的中医。当战火在奥连特省点燃的时候，他毅然参加了起义军，并成为莫德斯托·迪亚斯将军的副官。他曾参加过多次战役，屡立战功，荣升为上尉。他的事迹在古巴起义军中已经有口皆碑了^②。

在拉丁美洲各地幸存下来并在当地扎了根的华工或华商就是拉丁美洲华侨的前身。他们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增殖了资本，店铺规模日大，逐渐发展成华侨资产阶级。不少华人“从挣得饭食、衣着和每月四个比索的工资起家，逐渐积累到两万、三万甚至四万元的资本。”^③1877年1月8日《商报》所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事实是中国人胜过了秘鲁人，成为他们饭食的供应者，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击败了他们，而他们却不知如何去和中国人竞争，这些都要归功于中国人所富有的商业才能，他们吃苦耐劳，善于谋算并深知我们的民族。那些可怜的被剥夺了几年权利的人们，已成为拥有自己资产的人，拥有自己公司的人。在公共财富中，他们也许代表着百万资本。”^④象曼努埃尔·德拉克鲁斯原是被掠卖到秘鲁的华工，他“作为移民阶层的第一批被输入者之一来到了我们国家。他为我们田地耕耘施肥，遭到我们极大的蔑视。他终于履行完了被迫签订的契约中所规定的年限；他开始从事自由劳动，积攒下了一笔钱”，终于成为一个有资产，有社会地位的人^⑤。另外象华工开办的“永发号”（Wing Fats）、“邝记”（Kwong），

① 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80页。

② 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71页。

③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128页。

④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228页。

⑤ 同上，第129页。

“邓记”(Tung)和“郑记”(Tags)等,都是遐迩驰名的商号,然而在秘鲁最有名望的商号当属“永安昌”,被誉为“华商之冠”,在巴拿马、智利都城,皆有分号委托商伙经营,“而受成于香港总核之人,层叠约束,条理精密,数万里外不能欺饰,故能持久。”^①在古巴,象帕斯托尔·毛里(苏汶,Thu Meng)在比那尔——德里奥经商并得以致富;何塞·马尔菲亚·玉(Wong)在圣胡立安·德基内斯不但立了足,而且成为那一带的名人。再如在瓜纳哈伊定居下来的何塞·阿尔曼(徐满,Shiu Man),“在当地居民中是个非常受爱戴的人物,他对自己的同胞异常慈善,而对古巴人也是很慷慨的。”^②一些华人商号专事进口祖国的商品,1870至1874年间开设在哈瓦那的几家华人进口公司资本已在50,000至70,000比索之间。1877年,第一家华人银行开业。1879年创办的王安公司每年营业额高达300万比索^③。1879年在马坦萨斯省三名华人合资买下“格拉蒂都特”制糖厂,1880年产糖35,000袋,四年后达60,000袋^④,在英属圭亚那,象何受(Ho A-Shoo)周陆湖(Chau LuK-Wd)以及何显(Ho Hin)等,都是在解除契约后通过艰苦的创业,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成为侨居地颇有资产的名人^⑤。

在华人的聚居区逐渐形成了“唐人街”(亦称“华埠”)如哈瓦那的桑哈太街首先出现华人的店铺,其后在拉伊奥斯、库契略、德拉贡内斯、卡姆帕纳里奥、萨鲁特和曼里盖等几条大街上也布满了华人商店和摊棚,并逐渐发展成为哈瓦那的“唐人街”^⑥。此

①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39页。

② 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47页。

③ 科比特:前引书,第90页。

④ 科比特:前引书,第91页。

⑤ 克莱门特:《英属圭亚那的华人》(C. Clement, 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伦敦1915年版,第334、337、345页。

⑥ 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89页。

外，象秘鲁利马市的加庞大街，“到处开设着华人的杂货铺，成衣、鞋匠、卖面包的、卖肉的和和其他商贩都云集于此。沿着这些街道漫步，看着这些商贩、店铺和招牌，一个人很快会感到如同置身于一座中国城市之中。”^①其后，当秘鲁开发昌恰马约地区时，圣拉蒙镇主要是借助华人之力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华人聚居区之一^②。在英属圭亚那，华人胡大金（Wu Tai-Kam）在解除契约后于1865年联络了120名华人在德梅腊河支流的一块沼泽地上，建立了一个华人聚居区，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外的“希望城”。到1874年这里定居华人已达800人。据到这里观光的人说，希望城“到处洋溢着欢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像。”^③嗣后，华人又在德梅腊河畔建立了另外一个聚居区，以务农为主，“土地种得井井有条。”^④在当地热带气候条件下，“中国人的村社都采用印第安人的棚屋，周围夹上栅栏，通风而舒适。”^⑤这一华人居民区存在时间较短。后来大多数华人首先是经营小的企业，当受到教育后，“他们便从事专门职业、商业，”个别华人也有进入政界的^⑥。在墨西哥，远在十六世纪墨西哥城已有了“唐人街”，另外，“墨之棉司加利（今阿卡普尔科）市肇初系华侨所辟，近已渐臻繁庶。”^⑦到十九世纪末，墨西哥开始开发下加利福尼亚地区，华工胼手胝足，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华人便在此立足，到1919年墨西哥加利市的华人已达9,000人（当地居民仅700），因而该城被称之为“小广州”^⑧。在巴拿马，也有了华人的聚居区，“我华民商务之在巴（拿马）国者，以巴京为最大，次则个啞埠（科

①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226—227页。

② 罗德里格斯：前引书，第11页。

③ 克莱门特：前引书，第298页。

④ 詹姆士·罗德韦：前引书，第177页。

⑤ 同上，第178页。

⑥ 史密斯：前引书，第85页。

⑦ 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索引》，卷九，页一。

⑧ 欧阳民主编：《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省华侨沿革史略》，香港1971年版，第42页。

隆),由巴京至个哪埠开河一带,火车路所经约共华里一百四十余里,华民店铺约三百家,零散处各埠者亦不下百十家,约共有三千余人。”^①华人“投资颇巨,几握其全国商务权之半。”^②分布在拉丁美洲各地的“唐人街”成为发展中的华侨社会的活动中心和华侨的家园。为了实现国人互助,华人往往自发地组织起来;如在古巴,1867年华人建立起第一个结社组织“结义堂”,1868年初又建立了“恒义堂”;是年,“客家人”建立了“义盛堂”。在秘鲁,华人于1885年建立了中华通惠总局。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加利市,华人于1919年建立了中华会馆。这些华人团体主要是为了实现国人互助这一宗旨,“相助相扶,则在会馆”。如秘鲁“通惠总局”(亦称“通惠公所”)其会名,“取通商惠工谊也”^③。为了资助“华人寓秘老疾瞽目无依者”,该总局在卡亚俄港开办了养济院,不但给那些不幸的华人提供了栖止之所,还帮助大约300名难胞返回祖国。此外,各处发现华人受虐之事,一总局也出面代呈稟词,以维护华人的权益^④。古巴、秘鲁等处的华人团体还集资购地置义冢,使流落异域的同胞有个善终之地。为了使华人精神上有所寄托,华人团体常出面组织修建关帝庙,在秘鲁“是以侨居之多,工截之巨,辄葺关庙无虑百十。”^⑤这些团体还兴办学校,使华人子孙不忘故国的文字。1887年古巴“学堂规模渐立,学生共二十八人,教习甚认真。由于该学堂一切井然有序,故“西人啧啧称善。”^⑥华人虽远在他乡,但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每当祖国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华人团体都要发起募捐,给灾区以

① 引自清廷《外务部档案》,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驻巴拿马总领事欧阳庚奏折。

② 引自清廷《外务部档案》,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至宣统元年十一月驻美使臣伍廷芳等奏折。

③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46页。

④ 同上,第240页。

⑤ 同上,第247页。

⑥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32页。

资助。这些华人团体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核心。

拉丁美洲各地的“唐人街”并不单纯是华人在异域的家园，而且也是侨居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唐人街”促进了侨居地的繁荣和昌盛。

在拉丁美洲各地侨居的华人和侨居地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些华人和当地妇女结了婚，他们“勤俭持家，疼爱儿女”，被认为是“可意的丈夫”^①。由于这种结合，在拉丁美洲形成了中国人与白种人、中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的混血后代。华人在侨居国的社会地位很低微，因而他们的混血后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重视。他们默默无闻地奋斗着，然而正象秘鲁学者指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嫁接种’开始获得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声望。今天，在我们大学和专业工作圈子里毫无疑问他们具有了这种声望。混血的华人在学习的勤奋、对事豁达以及善于沉思冥想——这是使本地人大惑不解的——等方面都是突出的。此外，还因为他们有一种精细的分析能力，使他们能脱颖而出。”^②在拉丁美洲各侨居地，华人与当地人民多能和睦相处。广大华人一直把侨居地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来看待。他们热心于当地的公益事业，在侨居地人民处于某种困难的时候，华人总是与当地人民休戚与共，同渡难关。

在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广大华工积极地参加了起义军，为古巴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参加过古巴独立战争的龚萨洛将军深为华工战士无畏的英雄形象所感动，他曾写作《中国人与古巴独立》一书，对华工战士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作者充满感情地写道：“在战争中，中国奴隶、白人奴隶和黑人奴隶，都以他们的鲜血，来争取古巴的自由平等。假如将来我们能够为中国人树碑的时候，让我们镌上下面两句话

①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225页。

②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231页。

来颂扬他们的恩义吧：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①现在刻有这两句铭言的华工纪功碑高高耸立在哈瓦那的广场上，它永远象征着中古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它也雄辩地证明广大华人是拉丁美洲人民值得信赖的兄弟和战友。就是那些在古巴独立战争中荣立过战功的中国战士也从未向侨居国政府索取过荣誉和报酬。象骁勇善战的路易斯·利马，在独立战争中已升任上尉，在一次战斗中他“率领着英雄的连队冒着炮火进行了值得敬佩的冲击”，这位昔日威名远震的英雄，在古巴独立后，却隐居在卡马圭省，靠耕田度日。他被当地的古巴人称作“再生的辛西纳托”^②。另一位著名的华工战士法昆多上尉，战后在雅瓜哈伊开了一个小吃店，“正正经经地经营着他的买卖。”^③他们的这种谦虚的美德赢得了古巴人民的尊敬。在墨西哥，当地人“称华人曰‘拔山拏’。”^④“拔山拏”(Paisano)在西班牙语中为“同乡”之意，这种称呼表明了墨西哥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广大华人成为加强中国人民与拉丁美洲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和桥梁。

(三) 驳“黄祸”论

在拉丁美洲各侨居地，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华人沦为乞丐。有的殖民者借此攻击华人，说他们履行完契约后，“象游民一样到处流浪。他们安于懒惰，干尽各种坏事，犯下了一些相当严重的罪行。”^⑤在秘鲁，甚至有些人怀着种族主义的偏见侮蔑侨居那里的华人为秘鲁的“民族灾难”^⑥。但华人靠乞讨度日并不是由于华人

① 引自1960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四版。

② 辛西纳托，公元五世纪的罗马统治者，以生活简朴著称，曾亲耕田亩。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97页。

③ 同上。

④ 谢希傅：《墨西哥述略》，第4—5页。

⑤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126页。

⑥ 同上，第229页。

生性懒惰，而是由于苦力奴役制度对他们的蹂躏和摧残，使他们丧失了劳动力这才造成古巴各埠中，“蓄目残疾华人乞食者甚众”^①的惨状；在秘鲁才出现“琐尾流离，存亡参半，甚至非瘫即盲”^②的悲惨情景。大批华人行乞不是华人堕落的表现，而是契约华工制残酷性的大暴露，是有力的控诉与谴责。就是侨居地的人民也对华人的悲惨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同时对那些靠剥削华工致富的种植园主们加以指责和抨击。在秘鲁的《商报》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写道：“那些不幸的中国人在繁重的劳动中，变得缺肢断臂，双目失明。今天当我们沿着聚集着这些中国人的街道漫步，当我们看到他们肮脏、因饥饿而变得苍白和充满隐隐的绝望神色的面孔，当我们看到他们那颤抖着向我们伸过来的双手，于是在我们的心中，不禁油然而生起一种内疚之感，”接着著者指出造成这些华人乞食者的罪魁祸首是剥削与奴役华工的种植园主，因而他提出，那些靠剥削华工致富的种植园主应对这些华人负道义上的责任，并应从他们的财富中拿出部分资金为华人乞丐建立一收养所^③。这充分表明普通秘鲁人对待这一问题的严正立场。

有些殖民者还散布这样一种谬论，说华人把吸食鸦片和赌博等恶习带进了侨居国。如果说有部分华人沾染了吸食鸦片的恶习，那也是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倾销鸦片造成的毒害和后果。在澳门等地的“猪仔馆”中，拐子手开设了专卖鸦片的店铺，于是鸦片又成为拐子手从被骗华工手中掠走所谓“垫钱”的一种手段。在华工被掠往海外的途中，殖民者在苦力船上专门开辟了“烟室”，怂恿华工在那里吸食鸦片，以便继续从华工手中掠夺仅剩的一点点“垫钱”，同时通过鼓励华工吸食鸦片以达到麻痹华工反抗

①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23页。

② 同上，第246页。

③ 蒙塔格内和阿尔瓦：前引书，第71—72页。

意识的目的。华工到达拉丁美洲以后，是雇主阶级买来鸦片再卖给华工，从中大肆进行盘剥^①。是谁使吸食鸦片的恶习得到泛滥，这本是不言自明的。从华工方面来看，由于他们沦落异域，痛感为人牛马之苦，又看不到求生之路，因而有些华工借助鸦片来麻醉自己，以忘却人生的忧患，甚至有些华工吞食鸦片自杀……。所以说从历史上来看，不是华工给侨居地带来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而是剥削阶级用鸦片来残害华工！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统治阶级借助贩毒致富并严重摧残被剥削阶级大众身心健康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古柯叶原产秘鲁，内含咖啡因，可作兴奋剂。但长期服用会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并使服用者逐渐丧失劳动力。在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殖民者妄图用古柯叶的刺激作用来提高印第安人的劳动效率并从贩卖古柯叶中赢利，所以在印第安人当中大肆推销古柯叶。印第安人矿工由于食不果腹，只有购买古柯叶咀嚼，凭借一时的兴奋作用以忘掉饥饿并完成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劳动任务。长期食用古柯叶使印第安人的智力和体力都受到严重的摧残！西班牙殖民者明明是造成印第安人种族蜕化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却散布印第安人本性低劣的谎言。事实上，殖民主义者对华工和华人的诽谤不过是他们侮蔑印第安人的可耻的故伎的重演。

至于说到赌博，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南方各省和在澳门，借助赌博设下圈套逼使我国劳动人民出洋正是人贩子的惯用手法。被骗华工潘明曾口述：“咸丰三年因赌输欠猪仔头的钱，就带我到汕头上船……”^②。有的华工揭露说：“有猪仔头借钱与我赌。我不能还，他就带我到汕头上船。”^③

华工被掠卖到拉丁美洲以后，被迫从事奴隶劳动，身心受到

①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100页。

② 陈兰彬：《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四册，第8页（下）。

③ 同上，第四册，第13页（下）。

严重的摧残。的确有些华工在百无聊赖之中曾借赌博寻求刺激，以忘却苦海中的忧患。这是苦力奴隶制度造成的可悲后果。而不是华工的堕落。事实上，拉丁美洲赌博之风兴起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而且西班牙国王就是赌博的倡导者：在西属美洲殖民地销售纸牌的专利权一直握在西班牙王室的手中，1578年菲利普二世将这种专利权转卖给埃尔南多·德卡塞雷斯后，西班牙王室仍从每付纸牌的销售中坐享一雷亚尔税金之利^①。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在掠夺和奴役印第安人的过程中聚积了大量财富，因而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于是赌博之风也越演越烈，“人人都耽于赌博，掷骰子、打牌、赛马与斗鸡……不一而足。”^②无情的史实是直至此时此刻，契约华工根本尚未踏上美洲的土地，指责华工把赌博的恶习带进拉丁美洲完全是一种恶意的诽谤。赌博是生成于剥削阶级机体内部的恶性肿瘤，把这种不治之症的起因嫁祸于华人纯粹是别有用心的诬陷。

广大华工在拉丁美洲被奴役的岁月中，历尽了艰辛和苦难，但他们内心深处仍充满对幸福和自由的渴望，中华民族坚定乐观的精神在华工身上也充分体现出来。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华工总是从事一些有益的文艺活动。华工中有些人被掠卖到美洲之前，本来就是演员或民间艺人，他们的表演曾带给沦落异域的同胞以极大的欣慰和欢乐。英属圭亚那招工专员怀特曾在致圭亚那总督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人的特殊性格，使他们在习惯于当地新环境之前相当难管。就一切表面现象看，他们是不动感情的，冷酷、顽强象岩石一样。可是即使这样，他们却非常爱好音乐、戏剧以及各种娱乐。我曾在他们演唱的时候，看见他们成百地、

① 布莱尔与罗伯逊：《菲律宾群岛（1493—1898）》（E. H. Blair,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克利夫兰1903—1909年版，第24卷，第192页。

② 迈耶和谢尔曼：《墨西哥历史教程》（M. C. Meyer, W. L. Sherman,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纽约1979年版，第241页。

如果不是成千地一齐纵情大笑，……”^① 中国人对艺术的酷爱使他们在结束契约后，有的人开始组织起剧团，在自己的同胞中演出中国的传统剧目。1878年谭乾初随同陈兰彬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等三国，后著《古巴杂记》一书，内中曾提及：“夏湾拿（哈瓦那）有华剧二班，虽不甚可观（优伶多由本处学艺），然忠孝廉节喜怒哀乐亦足激发天良，各华人仍不忘中国面目也。”^② 大概最初是出于剧团演出的实际需要，以及华人欣赏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渴求，一些华人开始创办起剧院和剧团。在古巴有好几家华人剧院和杂剧团。在秘鲁，到1878年，也有好几家由华人开办的剧院，而且上座率很高。据美国驻秘鲁大使吉布斯的记述：

“利马第二剧院已为华人公司承租四年，夜夜客满”^③。华人经营剧院或组织剧团演出向侨居国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为活跃侨居国的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在拉丁美洲侨居国的行为举止完全证明了中国人是具有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尚道德品质的。秘鲁大多数人也都认为：“一旦获得了自由，苦力是勤奋的，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苦力或许比秘鲁当地的劳动者更整洁，从长远来看，似乎华工对秘鲁工人起到了好的影响。他们常是一种需要竞争者好好与之较量的人。”^④ 《古巴解放斗争中的中国人（1847—1930）》一书的作者也充分肯定了古巴华人的品德，他写道：

“尽管奴隶制造成了这种悲惨的现实，中国人还是在劳动中不断地证明了他们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聪明智慧以及争取自由生活的坚定决心。”^⑤ 而且他们优良的品德得到社会上普遍的赞扬。在古巴的华人，其犯罪率与其他社会阶层和人种集团来比较都是低

① 陈翰笙：前引书，第4辑，第347页。

② 《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24页。

③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226页。

④ 斯图尔特：前引书，第231页。

⑤ 帕斯特拉纳：前引书，第46页。

的。以光绪六年（1880年）为例，夏湾拿（哈瓦那）所犯谋杀命案数十起，白人居六，黑人居四，华人则无一犯者。”^① 华工不仅用自己的血和汗为拉丁美洲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他们高尚的品德对侨居地也起到了良好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叶，拉丁美洲各国的阶级斗争形势非常复杂，社会上充满着动荡和不安。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又不时给拉丁美洲造成巨大的冲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劳动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并不断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拉丁美洲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极力强化他们的国家机器，随时准备镇压被统治阶级可能掀起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企图转移劳动人民的视线，诱使他们把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变成对所谓“夺了他们饭碗的”黄种人的仇恨。拉丁美洲以及当时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所发生的“排华”事件就是上述政治图谋的体现。“黄祸”论在十九世纪末所以能喧嚣一时，正是服务于上述政治目的的。当时一些种族主义者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编造了一个谎言，把当时处于各帝国主义瓜分威胁之下的古老中国描绘为意欲征服整个世界的潜在的危险。美国海军上将阿·玛汉就曾写道：“当我们想到四万万中国人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一个现代装备，而这样庞大的人群却被圈在对于他们是过于狭小的一片土地上，这是很难以宁静的心情来展望将来的。”^② 有的“学者”不惜笔墨描绘在黄种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西方文明遭到毁灭的可怕情景。为了使这种神话变得可信，“黄祸”论的鼓吹者们不顾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肆掠卖我国人口的罪恶历史事实，把被掠卖到世界各地的华工污蔑为“希腊人的礼物”，即钻进敌人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从而为世界性的排华运动找到了借口。英国殖民者更把“中国移民”和黑人并列称之为在拉丁美洲甚至在这个世界上进行漫无止境的扩张的危险因素，认为中国移民在

^① 《晚清海外端记选》，第228页。

^②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2页。

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有可能凌驾西班牙血统的人、印第安人和这两种人混血种族之上，地球将为一条“接连不断的带子”，一条黑黄色的腰带缠绕起来，而且这一中国人和黑人的繁殖地区将永无休止地扩张^①。翻开拉丁美洲的历史，人们会清楚地看到，不是黑人和中国人跨越大洋到拉丁美洲去进行扩张和从事殖民活动，恰恰相反，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填满他们漫无止境的欲壑，才通过罪恶的“奴隶贸易”和“苦力贸易”，把成千累万的黑色皮肤和黄色皮肤的奴隶掠夺到美洲来。由于有了这些奴隶，才使拉丁美洲的资源得到了开发，并使其经济逐步繁荣发展起来。那些获得了自由的黑人了解除了契约义务的华人都曾对拉丁美洲的进步做出过伟大的贡献，因而他们完全有权在这块他们耕耘出来的土地上立足，并享受用自己汗水浇灌出来的果实。在拉丁美洲散播“黄祸”论和“中国人和黑人的繁殖地区将永无休止地扩张”这种种谬论其实质是为了发动一场剥夺华人与黑人正当权益的新的种族主义运动做准备。同时也包藏着这样一种祸心，即把拉丁美洲被压迫的白种人劳苦大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引向反对有色人种的歧路上去。这种卑鄙的企图是统治阶级“分而治之”这一传统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马克思对此曾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罗马的*diviole et impera*〔分而治之〕是大不列颠大约一百五十年来用以保有它的印度帝国的重要准则。总合起来构成那个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统一体的不同种族、部落、种姓、教派和国家彼此之间互相仇视——这种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基础”^②。

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阶级斗争的范围日渐扩大，尖锐程度不断加剧，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越演越烈，为了避免在一场激烈的冲突中各资本主义列强会同归于尽，所以统治者把

① 哥尔维策尔：前引书，第54—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51页。

“分而治之”的政策从一国或一个地区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妄图以“黄祸”论来缓和它们的内部矛盾，而把中国作为一个方便的靶子，任他们攻击和吞噬。在当前的国际斗争中，仍有人在召唤“黄祸”论的幽灵，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而且我们认为，阐述契约华工制发生、发展的历史，回顾华工、华人对侨居地的历史贡献，这本身就是对新“黄祸”论者最好的回答。

结束语

中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光辉四射的古代文明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传播并对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促进作用。在近代，中国虽然遭到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与压迫并曾一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但中国人民并没有沉沦，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并没有泯灭。就连那些被掠往海外的华工和华人也仍然保持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民族精神并对侨居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做出过伟大的贡献。我们觉得我们史学界的同志们应当对海外华人在世界范围内所建树的丰功伟绩进行较全面的估价和总结并能为之立传。这些感人肺腑的篇章不但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对于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也将会有所助益。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 一起“倒清拥李”的密谋事件

夏良才

在距今九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有几个怀有扩张主义野心的美国人曾策划过一场密谋，企图趁日本攻打北京之机，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这件事迄今在国内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的论著中似乎还没有人提及，知道的人大概不多。六十年代末，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玛丽兰·杨写过一本书《帝国的修辞学：1895—1901年美国的中国政策》^①，作者从这一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威尔逊的个人档案中，首先发现了这方面的材料，并在该书中作了披露。前几年，美国辛辛那提州的学者迈克尔·戴万因在他的《科士达评传》一书中^②，对这一问题又有进一步的叙述。现在我们想根据上述两书提供的材料，就这一事件作点介绍和评述。

这一事件涉及到的主要人物是三个美国人：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 Pethick），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 H. Wils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时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的顾问科士达（J. W. Foster）。时间是在1894年9月中，当时，清政府在海防、平壤、黄海两次关键性战役中遭到沉重打击后，军事上已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而日军在驱

① Marilyn B.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American China Policy, 1895—1901*,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8年。

② Michael J. Devine, *John W. Foste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the Imperial Era, 1873—1917*, 俄亥俄大学出版社, 1981年。

逐清军出朝鲜和控制黄海制海权以后，气焰更加嚣张，决意扩大战火，准备分两路大军入侵我国辽东半岛；日本国内舆论竟狂妄叫嚣要让“旭日军旗”“进入北京城”^①。这时，毕德格正在美国筹措对华铁路开发事务，他向他的好友威尔逊提供了中国局势的情况，认为遭到日本打击的清朝政府已无法生存下去，他断言：要使中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李鸿章是最合适的统治者^②，初步提出了“倒清拥李”的设想。毕德格担心机密外泄对李鸿章不利，要求威尔逊不向任何人透露，包括他们的至友科士达。为了保密，毕德格写信不用真名，落款是“月中人”，并嘱咐对方“阅后烧毁”。这表明，这是一件重要密谋，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他们所以气味相投，是有共同的目的和思想基础的。

毕德格和威尔逊都参加过美国的南北战争。威尔逊在1860年毕业于著名的西点军校，内战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和企业家，在他的家乡德拉瓦州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一定的势力和实力。1885—1886年他到中国做过铁路考察，在颐和园架设一条供慈禧娱乐用的火车轨道，怀有攫取中国铁路让予权的野心。毕德格在1874年来中国，开始是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由于熟悉汉语和法、德等国语言，以后成了李鸿章的秘书、翻译和顾问，又是李鸿章儿子李经方的英文老师。毕德格在1886年结识威尔逊，从此两人成为至友，并经营起非法勾当来：威尔逊为毕德格在国外推销中国的古玩字画等美术品，而毕德格则为威尔逊提供国内铁路修造的内部情报。他们都是美国的经济扩张主义者。威尔逊认为，美国在远东的投资应不受任何限制。此人后来是美西战争和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美军将领，死于1925年。毕德格在李鸿章身边二十来年，关系不同一般。毕德格曾为他的主人译读过“数百本”英、法、德文原著，灌输不少“西方

① 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90页，商务版。

② M. J. Devine, J. W. Foster, 第76页。

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对李鸿章的思想有影响，并深得他的信任^①。毕德格和威尔逊的共同目标，是为美国资本开拓中国市场。

威尔逊很赞赏毕德格的设想，但他认为要干成这样的事业，需要有几个一定身份的人合作，他首先提出的人就是科士达。他对毕德格说，科士达是个有经验的外交家，能保守秘密，他建议毕德格去访问科士达，争取他的赞助。

科士达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人，当过律师、报纸编辑，以及驻墨西哥、俄国、西班牙等国的公使或大使，1892年6月至1893年2月任哈礼逊总统的第二任国务卿。科士达在美国历史上享有“专家外交第一人”的声誉，他奉行的外交策略，都是围绕着消除美国孤立主义形象为出发点的，极力主张通过贸易、传教等手段，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美国的影响。科士达对中国一直很感兴趣，早在任俄使期间，就与清朝驻俄公使曾纪泽有过交往，他与清政府驻华盛顿使馆的官员也有联系，如与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关系很好，甚至对张推崇备至。1893年他辞去国务卿职务后，曾充当中国驻美使馆的法律顾问。这年下半年，科士达偕其夫人作环球旅行，到过广州、上海、天津、北京，参观和考察过开平煤矿，对该矿铁路建设有兴趣。他会见了不少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其中包括李鸿章，并极力称道这位“大学士”，说他是中国“第一位最进步和开明的政治家”^②。在甲午战争期间，他对战事特别关心，并利用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法律顾问身份，以及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 Denby）和毕德格等人，获得不少有关中国的情报。

威尔逊希望得到科士达的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他孚有声望，与中国政界有联系；另一方面他们都主张美国对外扩张，极力在寻

① J. W. Foster, *The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第296页。

② J. W. Foster, *Diplomatic Memoirs*, 第2卷第96页。

找机会开拓中国市场。

毕德格与科士达作一番长谈以后给威尔逊写信说：科士达亲口对他说，“最好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①。9月28日，科士达又给田贝写了一封信，含蓄地透露了毕德格、威尔逊的密谋计划。他认为，如果日本战胜中国而导致清廷覆没的话，也许会产生一些有益的后果。他暗示田贝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密切注视战争形势的发展，为“帮助”中国而抓住一切机会。但他在这封信中不仅仅关心李鸿章称帝，而且还商量如何给清政府提供美国贷款的问题。因为他已经从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得知清政府需要一笔美国借款，为此他已会见了一个纽约的银行家集团^②。这说明科士达与毕德格、威尔逊的设想还不太一样，他对李鸿章称帝只表达一种愿望，着眼点却是想抓住清政府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的困境，夺得对华借款权。

在这前后，威尔逊和毕德格已为他们的设想进行了具体的部署。9月23日，威尔逊给在日本驻华盛顿使馆中充当顾问的史蒂文斯（D. W. Stevens）写了一封信，他说：统治中国的满族集团已失去他们祖先征服汉帝国的那种能力，除非日本迅速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否则英、俄就将瓜分中国，使日本丧失胜利果实。他在信中自问自答地说：如果清廷覆亡，谁来继承皇位？哪个国家来决定这个混乱国家的命运？只有让李鸿章或他儿子李经方当皇帝和日本来控制这一新局面。这样，使中国甩掉“没有希望的满人”统治，日本就有权力成为中国的“救世主”^③。威尔逊显然想依靠日本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信中极力鼓吹日本控制中国的好处。

一个星期以后史蒂文斯回信给威尔逊，说已把他的信送交日

① M. J. Devine, 前引书, 第76页。

② M. B. young, *The Rhetoric of Empire*, 第29, 240—241页。

③ M. B. young, 前引书, 第28—29页。

本驻美特命全权公使栗野慎一郎看了，还准备抄送一份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史蒂文斯是否给伊藤和陆奥抄送了威尔逊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判断，即栗野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想必是要递报给本国政府的，这就是说，正在同中国鏖战的日本最高当局，很可能已知道美国有那么一伙人希望日本向北京推进、推翻清朝统治而由李鸿章掌权的阴谋计划。

毕德格对诸事顺利感到满意。9月28日，他给威尔逊写信时乐观地说：“将军，你的伟大计划——改朝换代，让你的朋友李（鸿章）当君主——随着每天从中国传来最新消息而越来越成为可行的了。”^①同一天，威尔逊在给田贝的信中说得更露骨，他对这位驻华公使说：“我要你在时机来临时充当华瑞克*这一角色。”^②他们似乎已确信，随着日军兵分两路大举向中国进攻，清廷的覆亡已指日可待，李鸿章将成为统治者。

怀着这一信念的毕德格在10月中旬离美返回中国，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天津。在此途中，他是否路过日本停留（这很有可能），还干了些什么事，无人知晓。在这一段时间内，由山县有朋率领的日本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续攻下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市），并继续分头窜扰，至11月中已占领凤凰城、岫岩，逼近海城。另一路由大山岩率领的日本第二军从10月24日起陆续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11月6日占领旅顺门户金州，21日攻占北洋第一要塞旅顺。在侵略军的追击下，清军望风披靡，溃不成军。在毕德格、威尔逊看来，这样的局面对他们计划的实现非常有利，他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日本向北京进军这一基础上。

① M. J. Devine 前引书，第76页。

• 华瑞克（Warwick Richard Neville 1428—71）英国伯爵，是英国历史上“玫瑰战争”中的主要人物，因拥戴英王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而出名，获得一个绰号King-maker—拥立国王者。

② M. B. young, 前引书，第29页。

但是日军下一步没有攻打北京。11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对侵华战争的部署发生了战略分歧：山县有朋主张从辽东西出山海关，在直隶与清军决战，一举攻下北京；而首相伊藤却提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决策。他认为日军如攻下北京，立即会在列强中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导致干涉行动；而且即使日本迫使清廷投降，中国广大军民仍会继续进行反抗，日军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暴民四起”的困境^①。经过日皇亲裁，日军大本营于12月14日下令日本联合舰队载第二军一部份兵力开始向威海进扰。毕德格、威尔逊期望依靠日本方面的配合，显然已经落空。

日本打不打北京，虽然与毕德格、威尔逊的计划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下面那封信却很耐人回味。据史蒂文斯在1895年5月给威尔逊的信中曾这样说：当初，如果日本要攻打北京，那是完全能做到的。它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在清廷覆亡以后，列强之间会出现一场权力之争，日本在这场争夺中将有相当可观的利益会被欧洲强国抢走，所以日本人感到，更明智的办法是，不把现有的成果去为威尔逊主张的计划进行冒险赌博^②。这从侧面说明，日本人对威尔逊计划还是有所反应。

使他们感到沮丧的另一重要情况是，在旅顺失陷以后，清廷下令褫夺了李鸿章的黄马褂，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当毕德格在12月初回到天津时，发现他的主人正在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迷惘和担忧。尽管如此，毕德格还是想尽办法鼓励这位垂头丧气的主人，但唯独没有向他透露他们的密谋^③。事情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自身已难保，即使他有意自立为王，又能使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呢？毕德格和威尔逊除了依靠日本的力量外，他们本身是无能为力的。

①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29页。

② M. B. young, 前引书，第29页。

③ M. J. Devine, 前引书，第78页。

“倒清拥李”的设想虽然落空了，但毕德格等人想占领中国市场的欲望并没有消失。1895年1月，毕德格给威尔逊写信又提出新的设想：第一，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第二，让清帝国分成“两个势力范围”，南部地区让英国控制，北部地区置于美国的影响之下，这样在英、俄之间就形成一个缓冲地带。然后，在美、英军事顾问的帮助下，中国“建立起一支超越日本的优秀海军”^①。毕德格对威尔逊说，我们计划的“第一幕已经过去，现在是为第二幕了。”^②

他们企图用什么办法来完成这“第二幕”，没有见到下文。其实，凭他们几个人就想把中国的北部地区“置于美国的影响之下”，在当时显然是种幻想。但这里也反映出他们的野心，说明他们的眼光已转移到“战后中国”的格局上来，他们比其它列强更早提出“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

在这“第二幕”中，科士达正好被清政府聘为赴日使节张荫桓、邵友濂的顾问，张、邵乞和失败，他又成为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的顾问。科士达在动身来中国之前，美国一些铁路公司、造船公司的代表和银行家纷纷将他包围，表示愿意提供贷款，要他用密码告诉他们有关中国赔款数目、建造海军等情报^③。科士达本人也作了投资准备，有人说他与原驻华使馆参赞何天爵(C. Holombe)为清政府筹措了四亿两银子^④。科士达的目标很清楚，他就是要充当扩大美资输出和美货销售市场的掮客。

以上是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我们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毕德格、威尔逊和科士达的设想，很可能是代表美国国内一部分要求向外扩张、正在迅速膨胀起来的铁路、船舶和银行垄断资本的

① M. J. Devine, 前引书, 第79页。

②同①

③ J. W. Foster, 前引书, 第2卷, 第107—108页。

④ J. M. Dorwart, *The Pigtail War: American involvemen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第83页。

政治利益。类似毕德格等人的设想，在1894年末的美国报纸上经常出现，如《纽约论坛报》曾预言，日本将进攻北京，然后中国分裂成三部分，其中一部由李鸿章统治^①。这些人都抱有占领中国市场的欲望，总认为冥顽不灵的清廷是妨碍他们扩大对华贸易和铁路投资的最大障碍。他们希望日本打败中国，促使清廷垮台，为他们策动李鸿章上台创造条件，然后这位“开明”、“进步”的政治家就向日、美资本家敞开中国的大门。在他们看来，如果日本能控制住中国，那么这些具体帮助中国改朝换代的美国人就更能有效地控制住李鸿章，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打开中国市场的欲望。这就是毕德格、威尔逊等人企图趁中日甲午战争之机混水摸鱼，制造这样一起未遂政治阴谋的主要目的。

^① 见M. B. Young, 前引书, 第27页。

谈清末北洋六镇的编练

任恒俊

关于北洋六镇的编练及沿革，众说不一。本文略作考察，就教于大家。

一九〇〇年冬、一九〇一年，驻蹕西安的清朝逃亡政府，多次颁发谕旨，实行“新政”，其中心是“筹饷练兵”。刚刚爬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高椅的袁世凯，以其“应变”“长才”，接过“新政”旗帜，大刀阔斧地在直隶推行“新政”，反应之迅速有力，居各省之冠。袁世凯“新政”举措，名目较多，主要脉络则十分明显，就是编练新式陆军，扩充军事实力。

一九〇二年一月，袁世凯接任直督视事不久，奏准从直隶赈捐项下拨款一百万两作为募练新军费用，派王英楷、王士珍赴直隶正定、大名、广平、赵州等地精选壮丁六千人，在保定进行训练。同时奏准《募练新军章程》^①，六月二十一日，奏准设立常备军左右两镇^②。次年七月奏报编齐常备军左镇^③。此为北洋新军中，也是全国各省新军中最早成军的一个镇。袁世凯自诩“实开常备军风气之先”^④。一九〇三年初，袁世凯把保阳练军马队及亲军马队裁并整编成马队一标四营。一九〇四年初又将元字淮军、亲军马队各营裁改编成步队一协六营，又在直隶各地和河

①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13，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折。未刊本，藏天津图书馆。

② 同上，卷15，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折。

③ 同上，卷24，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五日折。

④ 《军务训练档》，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袁世凯奏第二镇编练已满三年请简员校阅折。

南、山东、安徽等省招募新兵，编成步兵一协、炮队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于三月成军，称北洋常备军右镇^①。四月十五日，奏改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为北洋常备军第一、第二镇^②。与此同时，又在河南、安徽、山东等省招募新军编成北洋常备军第三镇，四月二十一日奏报成军^③。一九〇五年二月，经练兵处奏准将驻扎北京南苑和轮流宿卫宫禁的武卫右军及自强军，第三镇各标第二营编为北洋常备军第四镇，于三月初编成^④。五月，以驻扎山东的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加上从第四镇抽拨的步炮六营，还从山东各地招募新兵编成第五镇^⑤。前此，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清廷命袁世凯训练京旗常备军三千人^⑥。一九〇四年添营成协，一九〇五年五月添协成镇。此时，练兵处奏准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并统一番号。北洋常备军遂改称陆军，并变更番号。京旗常备军称陆军第一镇、北洋常备军第一镇改称陆军第二镇、第二镇改称陆军第四镇，第三镇改为陆军第三镇、第四镇改称陆军第六镇，第五镇编成恰在统一番号之时，直接编为陆军第五镇。至此，北洋六镇新军编练完成。第一至第六镇的首任统制官分别为凤山、王英楷、段祺瑞、吴凤岭、吴长纯、王士珍等。六镇分驻仰山洼、迁安、保定、马厂、济南、北京等地。

关于北洋六镇的编练及其沿革，专门著作不多，但为很多论著涉及。众说纷纭，比较紊乱。

关于第一镇成军时间，张联棻、张国淦均称系光绪二十九年

① 《陆军部档》，《第四镇镇志》。

② 《兵部档》，光绪三十年二月三十日户部致兵部咨。

③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27，光绪三十年三月初六日折。

④ 《陆军部档》，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陆军第六镇统制官段祺瑞折。沈祖亮，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4，页3。

⑤ 《陆军部档》，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陆军第五镇统制张永成关于《第五镇编练情形》呈文：《清德宗实录》，卷544，页14—15。

⑥ 《清德宗实录》，卷507，页6—7。

(1903年)六月^①，比实际成镇时间提前了两年。该军筹建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诏令挑选旗兵，交北洋大臣训练^②。十一月从挑选的万余人中先以三千人交袁世凯在保定训练，其余分批添派^③。至一九〇四年二月，（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首批三千人编成步队四营，过山炮队一营、马队一营、工兵两队。袁世凯、铁良联衔奏准按北洋常备军营制拟再添营成协^④。此时较上述所说成镇时间脱了六个月，尚不足一协之数，何论成镇？陶菊隐先生说一九〇三年六月四日，清政府将“京旗常备军”交袁世凯训练。而“京旗常备军”最初挑选旗兵“拼凑为四营”^⑤显然与史实不符。一九〇四年十月，清廷还从直隶驻防旗兵中“按旗挑选”，送常备军“补额编伍”，进行训练^⑥。一九〇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袁世凯、铁良会奏说：“现在北洋各镇，均已次第照陆军新章编练，则京旗亦自应遵照改编。……拟请添练一协，扩充成镇”。此时，该军须添步队两标共六营，炮、马、辎重各一营，才符合一镇的编制^⑦。尽管如此，奉旨点验各镇的兵部尚书长庚、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与练兵处仍按成镇对待，编京旗常备军为第一镇，步队为全国新军第一、第二协，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标^⑧。这枝“京师禁旅”，番号居各镇之先，先有建制，后补兵额。至一九〇六年元月九日，袁世凯奏报

① 张联棻：《北洋军的建立》，《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以下引用均为此文。）

② 《清德宗实录》，卷505，页11。

③ 《清德宗实录》卷507，页6—7。

④ 《军机处录副档》，袁世凯、铁良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折；《清德宗实录》，卷525，页8。

⑤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3月2版，第28页。

⑥ 《谕折汇存》，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二日。

⑦ 《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袁世凯、铁良折。

⑧ 《陆军部档》，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练兵处议复兵部尚书长庚、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奏。

时还说,“将次成镇”^①。

第一镇首任统制,文公直、张国淦、张联棻等均记为铁良^②。这把袁世凯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奏准添派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与翼长相混^③。翼长为旧军官名,当时曾交叉使用。但练兵处奏定新军营制后各镇均使用统制官。至统一六镇番号时,更没有使用翼长为一镇统帅之名。考陆军部左侍郎寿勋等宣统二年奏称:

“第一镇系于光绪三十一年由京旗常备军扩充成镇,嗣经编为第一镇,该镇初设统制官缺,臣凤山适承其乏”^④。此前,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铁良已署任兵部尚书^⑤,八月二十六日入军机^⑥,次日又充政务大臣^⑦,没有兼任第一镇统制。

第三镇的组成。陶菊隐先生说是由“巡警营北段”扩编而成的。而“巡警营北段”是一九〇二年袁世凯接收天津前“在北洋各镇中抽调精锐三千人”编成的,新版改为“从新军各营中抽选精兵三千人”组成的^⑧。旧版所云不能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接收天津在一九〇二年八月十五日^⑨。此时王瑛楷、王士珍从直隶各地招募的新兵正在保定训练,北洋常备军连一镇也没有编成,无从抽调。按新版从“各营”抽选亦与情理不通。新兵共六千人,抽选其半,训练几月,难云其精。按档案记载,该镇编组时,曾将自强军四营拨编为九、十、十一、十二标的第二营^⑩。另外则“系光

① 《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袁世凯、铁良折。

②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3页。

③ 《军机处朱批奏折档》,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袁世凯折。

④ 《军机处录副档》,宣统二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勋等折。

⑤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5318页。

⑥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5386页;《清德宗实录》,卷547,页14。

⑦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5387页;《清德宗实录》,卷547,页14。

⑧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59年版,第15页,1983年3月2版25、27页。

⑨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28,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袁世凯折。

⑩ 《陆军部档》1074号。

绪三十年间当局外中立之时，仓卒成军，无暇招募土著，因于直隶而外，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选募”^①。

关于第四镇、第六镇，张联棻、张国淦混淆起来了。按其所述，第四镇是“留京各营，改编为第四镇，分驻南苑一带”。第六镇是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南洋自强军组成。驻京师宿卫宫门，分扎南苑和海淀一带。实际上这两镇是一回事。这里混淆了北洋常备军第四镇和由该镇改编的陆军第六镇。把一个镇前后不同番号敷衍成两个镇。庚辛之际，回銮前后，武卫右军先后几次奉调入都宿卫宫禁，分扎南苑等处^②。所谓留京各营，即为该军。先编为北洋常备军第四镇^③，统一番号时，改称陆军第六镇。这样，张联棻、张国淦所述六镇，只有五个镇。缺少的是北洋常备军右镇，先改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统一番号时又改称陆军第四镇的一个镇。美国学者鲍威尔博士同样忽略了统一番号前后各镇序列的变化，误将第四镇说成武卫右军改编的^④。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先生则说第四镇系北洋淮军及奉天练军所改编^⑤。袁世凯改编留直淮军，是其扩军野心的另一部分，乃在北洋六镇编成之后。至于奉天练军成为北洋军阀势力更是一九〇七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以后的事了。波多先生抑或另有所据，则待明教。

袁世凯在直隶练兵，设有督办机构。陶菊隐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新、旧两版中都说，袁任直督之初，即“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设参谋、训练、兵备三处，以

①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20，页9670—9671；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军事·年政篇》，页67。

②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谕折汇存》，光绪二十九年八月袁世凯折；《德宗实录》，卷490，页17；《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60，页9561。

③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4，页3。

④ （美）拉尔夫·代·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183页。

⑤ （日）波多野善大：《中国近代军阀研究》，第109页。

段祺瑞、冯国璋、刘永成分任总办^①。按多种记载，袁世凯任直督后设立的督办新军机构名曰“军政司”^②，而不是“督练公所”。“督练公所”是练兵处成立后，奏定新军营制饷章等章制中所规定的各省督练新军的机构^③。袁世凯依新章规定，于1904年改直隶“军政司”为“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言敦源、段芝贵、何宗莲分任总办^④。

袁世凯从一九〇二年初编练常备军，到一九〇五年六月练成北洋六镇，只用了三年半时间。至一九〇五年底，除湖北张之洞编成新军一镇又一个混成协外，其他各省均无所成。北洋六镇能够迅速成军，究其原因：

首先，乘时待势，借机扩充。经过八国联军之役，荣禄编组的武卫军伤亡、溃散、资遣、裁撤，中、前、后三军建制取消，左、右两军虽留存下来，左军亦大为削弱。联军撤走后，畿辅防务极端空虚。清廷除饬调武卫左、右两军屯扎外，更重视畿辅练兵填补这一地区的防务空白。同时，帝国主义以暂时的妥协勾结逼签的《辛丑和约》并未能缓和他们之间侵华中的矛盾和争斗，终于酿成日俄战争的爆发。这是一场争夺中国东北、又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侵略战争。日俄战争蹂躏清室的“龙飞圣地”，也威胁京畿的安全。在日俄战争酝酿和进行过程中，清廷不得不下令扼守边防，加紧练兵。负责奉、直防务和外交的袁世凯则趁清室危殆局面，大叫兵力单薄，不敷分布，要求添练陆军，扩充实力。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九日奏称：“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

①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957年版第一册第12页，1983年3月2版，上册第24页。

② 沈祖宪、吴闿生：《客庵弟子记》卷3，页6；《养寿园奏议》，卷16，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袁世凯折；

③ 《练兵处档》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三日练兵处、兵部会奏折。

④ 沈祖宪、吴闿生：《客庵弟子记》，卷3，页20。

封守，计非十万人不克周密”，“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而直隶部队“应战之兵，不过三万”，可以出防的不过两万。特请增募三万，先募一万，并酌购军火^①。被列强争斗吓得神经十分脆弱的清政府都悉如所请。二月八日，日俄战争正式打响。当日，懿旨命袁世凯迅速调集各营，严防沿海及关外一带。二月十二日，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后，袁世凯以“直隶密尔战疆，防务盖棘，而地阔兵单，顾此失彼”为借口，奏请“赶紧增兵，以为固圉之计”^②。至七月二十九日奏报，已“将左镇改为第一镇，右镇原有马队四营，添足为第二镇，又添募一镇为第三镇”^③。

应该指出，清室这期间赶练新军，也是为了镇压狂飙骤起的革命运动。清政府的反动腐朽，投降卖国行径，激起人民的强烈愤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先后成立，革命思想迅速传播，以资产阶级领导的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为主导，全国各族人民反洋教、抗捐、抗租抗税、少数民族反抗、会党起义等斗争汇集成巨大的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怒涛滚滚的反抗潮流，刺激着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不断加快练兵步伐。清王朝江河日下，加紧练兵，袁世凯借机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北洋六镇，除原有的武卫右军、武卫右军先锋队和自强军三支部队改编成两镇外，实际添加了四个镇，一九〇四年日俄大战方酣，练成北洋常备军一、二、三镇，京旗常备军也已成协，奠定了一镇的基础。

其次，清室倚信，竭力扶植。这一时期，清室再四申谕：“现在时事艰难，练兵为当务之急”^④；“现在时势积弱，非练

①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26，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折。

②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27，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折。

③ 《兵部档》，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七日袁世凯折。

④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5133页。

兵无以立国。亟应整军经武，切实举行”^①。对练兵给予高度重视，通令各省裁减绿营防勇，筹建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作为督办全国编练新军事的专门机构，全面推行西洋军事规范和章制，千方百计筹措练兵经费。

清政府汲汲于新军的编练，而寄厚望于袁世凯。袁世凯自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庚子以后，又升任直督兼北洋大臣，编练新式陆军当然非袁莫属了。小站练兵时，朝廷就将新建陆军当作“试点”。那时的上谕说：“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②。现在则把这个“样板”的经验推而广之。一九〇二年，诏令北方各省迅速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待练成后发回各省，管带新兵^③。清廷对袁世凯宠命优渥，大力扶植。1. 委以重任，授以实权。袁世凯任直督头二年间，兼任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津镇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电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本兼八职，皆由特简。恩遇之隆，事权之重，直可与曾国藩、李鸿章相埒；2. 优给饷需，经费充足。此时清室库空如洗。担负巨额的庚子赔款，已万分困窘。为了搜刮北洋练兵费用，朝廷强行摊派，不准稍有短欠，严旨催缴。一九〇二年，各省协拨三百八十万两。一九〇三年练兵处成立后，奏请懿旨照准向各省摊派次年经费达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两^④。一九〇五年，各省认解之数亦达九百一十余万两。这些经费，绝大部分用于北洋各镇。袁世凯继任直督后，在接收淮军钱银所截旷银八百余万两^⑤的同时，还接收李鸿章直督任上办实官捐纳银一千三百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5142页。

② 《清德宗实录》，卷390，页11。

③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4964页。

④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48—52页。《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9册。

⑤ 凤岗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44页；刘厚生：《张謇传记》，第58页。

另八万两^①。如此巨额款项，被筹款弄得焦头烂额的户部追索不放，经过反复议驳，仅从袁世凯口中挖出一百万两^②。3. 宦海风波中给以庇护。袁世凯军政权力迅速扩充，言官时有弹章，亲贵中亦渐有烦言。一九〇三年，御史王乃征参劾袁世凯“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揽，群情骇异，谓疑于帝制自为，依信如斯，可谓古无今有。”^③袁世凯立即疏请开去会办练兵大臣兼差，朝廷温旨勉慰：“该督于兵事夙所讲求，特加委任，惟当任劳任怨，挽回积习，认真整顿”。“所请开去练兵差使之处，著毋庸议”^④。朝廷依信如常，袁仍放手扩军。袁世凯说：“总之，政府不能主持，无论何事皆不能办也”。

再次，袁世凯机诈诡谲，巧施权术。袁世凯深谙仕途权诈，在戊戌变法、庚子风云中博取了慈禧太后的欢心。同时，施展“运动亲贵，掌握朝政”的权术，对先后兼领军机的荣禄、奕劻都深相结纳，引为奥援，以为自固之计。袁世凯编练新军，并不以新章制改编原有三支部队开始，而是从招募新兵入手，使北洋六镇得以神速成军。如果先改编原有三军，再募编新兵，在当时筹饷艰窘，亲贵疑忌、官场倾轧、君主专制政局变化无常的情势下，则有随时中辍刹车，扩军谋划搁浅的可能。所以当一九〇四年徐世昌提到改编原部队问题时，袁答称：“分镇一议，似可缓奏。”^⑤一九〇四年末，袁世凯控制的练兵处曾奏请除按新章改

①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13，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折。

②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卷13，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折。

③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9，第9659页。

④ 《光绪朝东华录》，（五），总5142页。

⑤ 《袁世凯致徐世昌函》，1904年5月6日，《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二期，第39页。

编原有三军外，拟再添募陆军一镇，照奏定章程编伍训练^①。但当第五镇于翌年六月改编完成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广西会党起义在滇、桂、粤、湘四省军队镇压下接近尾声，京畿地区拥有新军六镇，清室对添练新军的要求大不如前之急迫了。上述奏请虽获旨准，添募一镇的计划终于化为泡影，可能组编为北洋第七镇的一军因此流产，而以改编原有三军为两镇而收场。此外，袁世凯从小站练兵起，着意罗致新式军事人才，建立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培养储备了相当数量的军官，适应了迅速扩编军队的需求。如北洋武备学堂前后入学二百多人，有一百三十多人被袁所网罗。小站时期建有随营学堂四所，至鲁抚任未曾中辍，督直以后，又举办了行营将弁学堂、陆军师范学堂等一批各类军事学校。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九年，留日士官生六百二十人中，北洋所派约占四分之一^②。

①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此折载为“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丙寅”。误。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六镇已经编成，并统一番号，不会在事过半年多之后的十二月，练兵处才奏请改编原有的武卫右军、武卫右军先锋队、自强军等三军的，显系错讹。考同书三十一年“二月丙辰”载：“户部奏，据练兵处咨称，上年十二月间具奏增练兵队折内声明，除武卫右军、自强军并编一镇，不敷款项，由北洋另筹外，合计新编一镇，改编山东一镇，应需餉项，请户部按月拨发银二十五万两。……”（总第5136页），可证此折时间被错后一年，应为“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再考《陆军部档》，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第六镇统制段祺瑞奏报该镇编练沿革称，光绪三十一年正月，经练兵处奏准，将武卫右军、自强军及第三镇各标第二营并编成镇。《清德宗实录》卷544、页14—15载：“署山东巡抚杨士骧奏，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前经练兵处奏准，抽调六七成编为陆军第五镇，业发拨出十二营归并编练。原有关防，应即缴销，其拨存之马步八营，拟即改为山东抚标先锋队左右翼防军，营制餉章，均仍照旧办理。下部知之。”时间为“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己巳”。亦可佐证。朱寿朋编此书时，《德宗实录》尚未成书，系另外广泛搜辑材料编成，有很多机密文书无从收录。记载上与实录时有出入。此折时间或为手民误植，或系刊刻不慎，有以致之。

② （日）东亚同文会：《最近支那官绅录》。

从冯桂芬到郑观应

——洋务思想家试析

在中国近代史的行程上深嵌着洋务运动的足印，但它如此杂沓纷乱，以至人们今天仍热烈地探讨、仔细地辨别着它的行进方向。的确，认清这三十年的里程，对理解整个中国近代历程是极为重要的。

社会思想应是社会物质运动的反映。因此，对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洋务思想（即通常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认识洋务运动。

一

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问题。

雷
颐

兴办洋务的直接原因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首当其冲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对外交涉的官僚，较现实地感觉到了世界的变化，不得不承认西方“船坚炮利”的优越，并希冀藉此维持、加强摇摇欲坠的腐朽的封建统治。所以，他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作为其思想纲领。

无独有偶，日本明治维新时提出的口号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这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与其说这是偶然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新事物刚刚出现时，人们往往习惯于用旧的方式来理解它，希望把它容纳在旧框架之内。这样，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定，以维持、加强旧的统治为目的的洋务派就更不可能认识到船坚炮利，机器制造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了。他们相信这些新东西仍能纳入旧的封建框架中

去。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说是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

难道对外妥协投降不是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吗？

不是。因为洋务运动是个极其复杂的运动，参加洋务活动的人员非常庞杂，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态度、措施是各不相同的。左宗棠、刘铭传、张树声等人的爱国思想就较突出，其洋务企业的对外抵制性就较明显。即便是一贯主张委屈求和的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也未尝不希望“从此中国轮船畅行，……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①。所以，尽管洋务派中不乏对外妥协投降者，但对外妥协投降却不是必然与洋务派联在一起的。

同样，对待发展工商的态度也不是洋务运动的本质特征。刘铭传就认为“外洋以商为国，自强实在经商”，主张“举凡丝茶纺织垦矿制造诸大端”招集殷商，允许“商自经理，官为保护”，政府“妥议保商防损章程，银钱出入商自主持”^②！郭嵩焘也上奏道：“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③。陶模、胡燏棻也都上疏要求“开民厂”，“劝立公司”，“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卮，勿搜括税厘以病民而自病”^④。能据此说他们不是洋务派么？

可见，在对待外国侵略、发展工商的态度上，洋务派是因人而异的。而时代和阶级却规定了他们的本质特征必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以，不论他们内部如何派系林立，个人气质有多大差异，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如何迥异，但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却是共同的。

如果说洋务运动发轫时“中体西用”的口号主要是针对顽固派的话，那么在戊戌时期它则阻碍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它是一柄双刃剑，遭到两方面的反对。顽固派与维新派分别从不同的方向

反对这个纲领。而坚持这个纲领的，就是洋务派。所以，它可作为衡量是否洋务派的标准。

现在，我们可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从冯桂芬到郑观应这些被称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了。

二

机器制造，声光电化等科学技术是威临中国的第一道近代文化之光。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能立即明白它的全部含意，但一些开明而敏锐的人们仍尽其所能地理解它。

主持上海“中外会防局”，勾结串通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冯桂芬，对西方船坚炮利的感受自然更深。所以，他较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⑤作为富强之道。他同时痛切感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但“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⑥。只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旧制度作部分修整，中国就能报仇雪耻，“复本有之强”成为第一大国。

尽管洋务运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但还是遭到顽固派“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的严厉呵责。对此，薛福成回答说：“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⑦他辩解道：

“自有天地以来，所以纪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而道之所寓者器也。”“道之中未尝无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⑧由于中国人重于道，西方人精于器，所以“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⑨中国的三纲五常、政教礼义是西方远远不及的，故“为今之计，莫若勤修政教，而辅之以自强之术，其要在夺彼所长，益吾之短，并审彼所短，用吾之长。”^⑩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抽象的

“道”寓于具体的“器”，无论“器”怎样变化无穷，“道”则永恒不变。

王韬亦如此写道：“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儒道也，亦人道也。”^⑩“人类不变，其道不变。”^⑪所以“欲变者器也，而非道也。”^⑫他认为“器”是“道”的物质载体，故“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⑬他以为各种“器”所负载的根本之“道”是同一的、不变的，而“道”正是通过“器”的变化而使自身以不变应万变。

郑观应也向人们说：“中，体也，本也，所谓不易者，圣之经也。”^⑭“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⑮学习西方是“礼失求诸野”，是“由博返约”。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是“博”，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一语足以包性命之原”的“约”^⑯。他甚至主张要象牧师布道那样宣讲传统之道，要设立公所，“按期宣讲，听讲者授以餐”，“所讲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务求有当于人心。”^⑰这样，百姓就能“改恶从善”，“永无犯上作乱之萌，万邦亦一道同风，咸知学圣尊王之义。”^⑱“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⑲由于这是郑观应的主导思想，所以《盛世危言》出版后受到许多洋务官僚的高度评赞。

陈炽的思想也是“始以自强，终以圣道”^⑳。他看到“商埠海疆，人情浮动”，焦虑地要求“急建书院，广储经籍，延聘师儒，以正人心，以维风俗”^㉑。他在为《盛世危言》作的序中写道：“既生孔子以正人心，达天道矣”，“他日我孔子之教，将大行于西”。“我恶西人，我思古道，礼失求野，择善而从，以渐复我虞、夏、商、周之盛轨。”^㉒

马建忠、陈虬也认为孔孟之道是“本体”，科学技术不出“六艺之外”，根诸“中学”。总之，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面

对突如其来的陌生事物，这些理论家们力图用传统的哲学来理解这种变化，以陈旧的道器观念来解释新的事物，为古老文明在新挑战面前的生存、调整、发展寻找科学的根据。时代未能给他们提供新的思想武器，他们还认识不到，机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凝聚。机器所负载的，不但不是中国传统之道，恰恰相反，它是颠覆传统之道的物质力量，它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些理论家们依然以为，在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有着亘古不变的“道”。他们认为，道固然寓于器，但却从根本上决定器。器的功能只是负载、体现道。中国羸弱的原因是由于器的功能受到破坏，因此，只需向西方学其“器艺”，以更好地负载、体现中国的根本之“道”。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必然成为他们思想的基础。

在这种道器观的基础之上，他们根据中国传统的有机循环历史观豁达地认为列强的侵入正是“六合将混为一”，“书同文，车同轨”，人类大同的“天假之机”。

中国古代哲学的特征之一是不重视精致的经验分析与缜密的逻辑推理，而强调从整体上直观把握自然与人事。虽然带有某种神秘的气息，但又有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与人类历史的运动规律是统一的。儒家认为“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无往不复，天地际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道家也认为“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轮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道无终始”，“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人们从“月有阴晴圆缺”联想到“人有悲欢离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成为“话说天下大事”的定律……。在新思想传入之前，洋务思想家也不可能偏离这种“天人感应”的历史循环论。

冯桂芬认为：“今诸夷互市，聚于中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也”^②。郑观应预言：“五方俱入中

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 “由强致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观而无难矣。”^⑤ 陈炽写道：“西人之通中国也，天为之也，天与中国以复古之机，维新之治，大一统之端倪也。”^⑥ 薛福成也认为“世界日开，其机自外国动之，其局当自中土结之，……其效即不在今日，亦当见诸千百年后也。”^⑦ 王韬也这样说道：“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屈必伸，否极必泰”，“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故谓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⑧ “既合地球之南朔东西而归于一天，亦必化天下诸教之异同而归于一源。”^⑨ “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⑩。他充满信心地写道：“惟智者能以人事度天心，而即以远人益中国，庶几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太和翔洽，瑞应骈臻，中外一体，遐迩禔福。”^⑪

后来的维新派代表康有为也理想着“车同轨，书同文”的大同世界。但康有为却是偏离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论，汲取了西方进化论学说，用进化史观来论证他的“大同”社会的。二者的历史观是大不相同的。

也正是中国哲学中朴素的辩证因素使他们虽为这种深创巨痛而愤怒、忧虑，但并不绝望。他们能以充满深厚历史感的达观来看待这种巨变，认为这是中国复兴的开始，世界大同的必然进程。这不仅比那种对古老文明衰颓的感伤和叹息要高明，也比那种单纯的道义激愤和谴责要深刻。

但在他们的著述中，探讨得更多，也更引人注目的是具体的经济、政治措施。

冯桂芬强调的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未明确提出发展工商的主张，其经济思想仍囿于传统的重农桑的旧说中。而以后的洋务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他们提出要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工商业，要求政府“保护商本”，要与外国“商

战”，以“夺回利权”。由于对他们这些思想已有较充分的研究，无需笔者在此多著笔墨了。恕赘言一句：前面已提到，一些洋务派官僚也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思想。

在政治方面，他们逐渐认识到封建专制政体的不足，激烈大胆地提出要仿效西方“设议院”。

王韬写道：“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②。因而称赞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郑观应、陈炽、陈虬等人也有较多论述。郑观应大声呼吁：“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③陈炽曾设想把议院制与乡官制结合起来，“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④陈虬也认为“泰西富强之道，在有议院以通上下之情，而他皆所末”^⑤。

但王韬又说：“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⑥郑观应、陈炽、陈虬等都异口同声地说：“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⑦“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鞬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⑧。设议院“但陈利害，不取文理”^⑨。他们所说的议院只是“通上下”的机关，而不是权力机构。他们仍是从中国传统的“通上下”“民贵君轻”这个角度来理解考虑的。如同他们没有认识到机器将破坏封建制度一样，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议会制与封建制是不相容的。相反，他们认为议会制是“三代遗风”，作为一种补充，会使封建制度更加完善。所以，王韬同时又认为“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是“本”，要“行宗法，而佐以屯田”，“厚宗植族”以“敦本”^⑩，就不足怪了。

但在当时，提出设议院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这是洋务官僚们所未言或不敢言的，郭嵩焘曾多次赞扬西方“政教修明，具有本末”^⑪，“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⑫。刘铭传也写道：“西国官

商一体，在下无不达之情，中国官商久睽，在下多难言之隐。”^④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西方“政教”的歆羡之情，但并未明确提出设议院。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他们的思想有时迸出激烈的火花，言洋务大员所未言，写洋务大员所未写——思想、言辞往往比实践、行动要急进，但其思想核心，本质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当说，他们是洋务思想家。从他们的社会经历来看，产生这种思想并不足怪。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容闳、郑观应等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曾出入曾、李门下，为洋务运动立下汗马功劳。王韬曾因上书太平天国事躲避香港，但他与洋务官僚丁日昌交往甚深，为洋务运动出谋划策。正是这种社会经历使他们有产生洋务思想的可能。

三

为什么他们长期被认为是与洋务派不同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呢？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曾对洋务运动有所批评，一些指责甚至十分尖锐。但应该看到，他们所批评指责的并不是这个运动本身，而是这个运动的不足。

王韬与郑观应是对洋务运动批评较多的二人。王韬曾说洋务运动“仅袭其皮毛，而即嚣然自以为足，又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臻臻于自强。”^⑤郑观应也曾激烈批评洋务运动中的仅重船坚炮利。但通观他们的著述，更多的指责还是针对顽固派的，而对洋务运动不乏夸赞之辞。王韬说：“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⑥。称赞洋务运动是中国的一线“转机”，认为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渐知以商力溶其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⑦。“中国富强之机或基于此”^⑧。并希望能“剔弊兴利”，再进一步。

当一些洋务企业因亏损而被人攻击、要求停办时，郑观应则立即为之辩护：“计自闽、沪设厂仿造轮船以后，……日新月异，著有成功。无如制造愈多，经费愈绌，议者不察，动谓轮船可废，工厂可停。……先难后获，凡事皆然。今中国费千万之帑金，积十年之功业忽然中辍，长敌人之气，灭志士之心，失策莫甚于此。”^⑧他甚至为洋务派主办的海军辩白道：“不知有海军之时，尚不足以御外侮，若并此而无之，则重门洞开，内皆酣睡，有不启盗贼之心者乎？”“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自仿行西法以来，机械日精，虽训练未必认真，而已非从前可比”^⑨。总之，他们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运动，所以，“剔弊兴利”可说是他们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之所以认为他们是“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另一个原因更主要，也更引人深思。

怎么能把这批明显具有进步性的思想家同那些大多是镇压农民运动刽子手的洋务官僚相提并论呢？

但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以至无法简单地用道德非道德、正义非正义、善良与邪恶，好与坏来理解衡量历史事件、人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是国际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的那个“世界”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彻底摧毁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任务。但历史仿佛在开玩笑，使这光荣的任务有着不光荣的开端，把这伟大的使命交给不伟大的执行者。当然，如果中国历史能象西方那样从社会内部先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然后由资产阶级奋起领导法国式的大革命，再进行工业革命，该是多么理想，多么壮观！但十分遗憾，这只能是思想的现实，而不是历史的现实。我们应怎样看待这无情的历史事实呢？

恩格斯告诉我们，在历史研究中要着重探究历史人物动机背

后的动因。镇压农民起义只是洋务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而深藏在动机之下的，还有着未被时人意识到的动因，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必然要把大机器生产引入中国。这也说明为什么农民运动被镇压之后，洋务运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由军工而民用，由官办而官督商办，越办越大，又延续了三十年。看来，洋务派只是充当了大机器的媒介而已。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洋务运动的肇始者在把“心腹之患”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时，无意中却将一个更剧烈，“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的革命家”——“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⑤引进中国，这与他们维持封建统治的初衷正好相反。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使人回味无穷。正是：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⑥

恩格斯曾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⑦。为什么我们还要按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动机“是否镇压农民运动”来判断洋务运动、洋务派呢？让我们听从恩格斯的教诲，彻底摆脱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浓重影响吧！

当然，农民英雄的业绩不能不使我们激动不已，刽子手的罪行不能不激起我们极大的义愤，我们无法、也不应摈弃这强烈的爱和恨。马克思对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分析述评，为在历史研究中把鲜明的感情与冷静的理智结合起来作出了典范。请听，他这样说：“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

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④好，我们在以无比的义愤谴责洋务派的种种罪行，怀着真挚的感情讴歌农民运动的光辉时，也应象马克思那样豁朗、达观地说：那末，洋务派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引进新的生产力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四

从1861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付梓到1893年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刊行，是这一思想产生、发展、成熟的三十年，也是洋务运动从开创、发展，到破产的三十年。这样，逻辑与历史一致，思想进程与社会进程吻合。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便是产生洋务思想的社会物质原因。

在这三十年中，前所未有的大机器生产横空出世，魔术般地出现在中国社会。大机器生产在先，资产阶级产生在后，这是与西方不同的。这是个平庸的过渡时代，很少奋勇牺牲的英雄，也缺乏慷慨激昂的猛士，而是一些渺小的人物在不自觉地充当着历史的工具。

过渡的时代产生过渡的思想。承上启下，便是洋务思想的作用与意义。新旧矛盾，在这一思想体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冯桂芬到郑观应，洋务思想不断发展，已达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边缘，但终未能跨越这道藩篱——这最后的关键一步，是维新派跨出的。

人们的认识水平是受条件限制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产生这种社会思想。所以，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提供了正确的救国之道，拟定了可行的救时方案，而在于他们反映出时代的变化，为后来的变革提供了思想材料。

洋务运动的破产顿使洋务思想黯然失色。在新的历史阶段，

他们已无力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康梁的资产阶级维新理论顿时成为时代精神。但维新派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而超越他们的。

注释：

- ①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第六册，6页。
- ②④ 刘铭传：《复陈津通铁路利害折》，《刘壮肃公奏议》，卷三。
- ③ 《郭嵩焘奏稿》，第341页。
- ④ 陶模：《培养人材疏》，胡燏棻：《变法自强疏》，《戊戌变法》，第二册。
- ⑤⑥②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戊戌变法》，第一册。
- ⑦⑨ 薛福成：《变法》，《筹洋刍议》。
- ⑧②⑦ 薛福成：《代李伯相答彭孝廉书》，《庸庵文编》，卷二。
- ⑩ 薛福成：《赠陈主事序》，《庸庵文编》，卷二。
- ⑪⑬ 《郑观应集》，上册，第167页。
- ⑫②④ 王韬：《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以下简称《外编》）。
- ⑭③ 王韬：《原道》，《外编》。
- ⑮⑥⑦ 同⑪，第234，242，243页。
- ⑯⑨⑩ 同⑪，第490，491，276页。
- ⑰ 宋育仁：《庸书序》。
- ⑱ 陈炽：《学校》，《庸书》。
- ⑲⑤⑥ 同⑪，第232，243，230页。
- ⑳ 王韬：《六合将混为一》，《外编》。
- ㉑ 王韬：《天命不可妄干》，《外编》。
- ㉒ 王韬：《重民中》，《外编》。
- ㉓ 郑观应：《议院》，《盛世危言》，卷一。
- ㉔③ 陈炽：《议院》，《庸书》。
- ㉕ 陈虬：《上东抚张宫保书》，《治平通议》。
- ㉖ 王韬：《重民下》，《外编》。
- ㉗ 同⑪，第312页。
- ㉘ 陈虬：《开议院》，《治平通议》。
- ㉙ 王韬：《洋务下》，《敦本》，《外编》。
- ㉚ 郭嵩焘：《使西纪程》。
- ㉛ 郭嵩焘：《伦敦至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第十一卷。
- ㉜⑥ 王韬：《治中》，《外编》。
- ㉝ 王韬：《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
- ㉞⑨ 同⑪，第91，762页。
- 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
- ㊱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

海外民国史资料一瞥

——访美札记

李宗一

(一)

根据中美学术交流协定，应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之邀，我于1984年2月8日赴美进行学术访问，4月7日返回北京。在短短的两个里，除在亚利桑那大学逗留了两周，参加该校麦金农(S. Mackinnon)教授安排的研究生的教学活动外，还先后走访了在图森(Tucson)的另一所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伯克莱加州大学、密苏里大学、伊立诺大学、哈佛大学、布兰黛大学、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美京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等十三个单位。有幸会见了各单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教授和朋友，如维克曼(F. Wakemen)、沙勒(M. Schaller)、范力沛(Van Slyke)、陈张富美(Fu-mi C. Chen)、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许华茨(B. Schwartz)、沙洵泽、韦慕庭(C. Martin Wilbur)、唐德刚等。承他们热情帮助，我得以了解了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现状和趋势，并查阅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档案资料，同时又应邀在上述大学历史系或东亚研究中心进行讲演或参加座谈会，介绍了我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的现状。

在访问期间，我参加了两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一次是应谢文森教授之邀，前往圣·路易斯参加中西部各大学联合召开的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于3月3日在密苏里大学举行。我宣读的论文是《试论杨度》。还有《史沫特莱在武汉》和《蒋介石新生活

运动与德国》两篇论文，是由麦金农教授和华盛顿大学的柯尔比（W、C、Kirby）教授分别宣读的，谢文森教授对三篇论文作了精彩的评论。之后，与会三十多位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据说，这种学术讨论会一年举办一次，与会者主要是中西部各州二十几所大学的研究中国的教授。

另一次是参加1984年亚洲学会年会。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始建于1941年，起初只为《远东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的出版者，目前已发展为世界上对亚洲研究的团体中最大的一个。从1970年起，组成四个区域委员会，即中国、中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分别处理各地域的学术研究和会务。其编印的出版品，主要有《亚洲研究季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和《亚洲研究书目》（Bibliography of Asian Studies）两种。年会每年春天举行，近年来对中国的研究颇引人瞩目。1982年年会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共聚一堂，讨论辛亥革命，去年又有“中国统一之展望”的讨论会，这两次会议都有数百人参加，盛况空前。今年是第三十六届年会，于3月23至25日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会上，对中国问题的讨论由于缺少往年那类轰动大会的敏感议题，未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规模不大，成绩一般。

需要一提的是，中国近年来对民国史的研究引起不少美国学者的兴趣。就在亚洲学会年会开幕的当天上午，由《民国》（Republican China）杂志社编辑部发起，对我访美为表示欢迎之意，于希尔顿饭店开了一个早餐会，会议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中亚研究会的赞助和财政支持。与会四十多位学者，不少是多次访问过中国的老朋友。大家就中美两国关于民国史研究和学术交流诸问题，热烈地交换了意见。

(二)

我此次访美的另一个目的，是了解和搜集有关中国历史的私人档案资料。近几年，在从事民国史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美国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时而征引一些私人档案。这些史料是美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珍藏，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从而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次访美之机，总算如愿以偿了。令人遗憾的是，到美国以后方才晓得，有些私人档案虽已整理完毕，陈列架上，但因某种政治原因，还没有开放给学者研究；因此，一般人只能从目录上或询问保管人员略知内容一二。对已开放的档案，由于我的时间太少，只能抽查一小部份，一览而过，未及细读。所以此行只可说找到了一些档案史料的线索和下落，谈不上搜集。现将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略作介绍如下：

一、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档案馆，藏有二十巨册关于史沫特莱的史料。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 1892—1950)，是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她在外国度过半生，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抵达中国，从此积极支援中国革命，被誉为“中国人民之友”。她青年时代由美国科罗拉多州来到亚利桑那州的坦佩 (Tempe)，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即现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前身。目前在这里执教的麦金农教授夫妇，是研究史沫特莱的专家。这些资料就是他们在合作撰写《史沫特莱传》的过程中，耗费了多年心血，从中国、英国、印度、苏联及美国各地搜集和整理起来的，包括书信、文稿、剪报、笔记、照片等，其中不少涉及史沫特莱在中国十三年的生活。尤为难得的是，史沫特莱在各抗日根据地拍摄的大量照片和来往书信，反映了她与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交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情况，实属珍贵历史文献。

二、1919年成立的胡佛研究所，不仅以藏书丰富著称，其档

案馆依靠雄厚的财力，也广泛搜集了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档案资料。据《胡佛研究所档案指南》(Guide to the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和1983年《胡佛研究所报告》(Hoover Institution Report)所载，已多达四千四百七十五目。其中绝大部份是关于美国历史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占第二位，再次是西欧，直接间接涉及中国历史的不过两百个目。尽管数量不多，但不乏第一手资料，对于民国史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应忽视的。

首先，关于中国人的私人档案，就所见而言，主要的有九个目。这些人大都是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

①宋子文(1894—1971)档，共五十八盒。在该馆所藏中国人的档案中是数量最大的一宗。其中十八盒为中文：信札一盒（内有与蒋梦麟、冯玉祥等人往来书信），电报三盒，中国银行资料一盒，另外十三盒为“机密”资料（1940—1948）。四十盒为英文资料：包括信札十盒，电报九盒，文件及会议笔记等十盒，谈话记录 and 手稿一盒，地图和照片一盒，“机密”资料四盒（1934—1948）。这些资料都是宋子文的后人捐赠的。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吏，四大家族之一，其档案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可惜，限制阅览范围，一般学者不得使用。

②黄郛（1880—1936）档七盒，内有1927年南京事件和1933年塘沽协定的交涉文件、书信及电报等。不开放。

③胡世泽（1894—1972）档七盒半。胡字子泽，浙江吴兴人，1932至1942年为驻瑞士公使兼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1942至1945年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档案是他在世时捐赠的。

④张嘉璈（1889—1979）档十二盒半。张字公权，江苏宝山人，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路理事长、中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

托局理事长等要职。五十年代先后旅居澳大利亚和美国，六十年代在胡佛研究所工作，著有《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中共经济潜力之研究》等。这些档案是他生前于1974年、1978年两次捐赠的。该馆目录上标明“尚未整理，不开放”。但据了解，档案内容主要是张在东北时的日记、报告及文件等，大部份资料已编入台北出版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姚崧龄编著）一书。

⑤张嘉森（1887—1969）档一盒。张字君勳，与张嘉璈为同胞兄弟，中国民主社会党的党魁。其档案仅有两封信，是他在1947年分别致魏德迈（A. C. Wedemeyer）和马歇尔（G. C. Marshall）的，内容关于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前途，因涉“机要”，不开放。

⑥颜惠庆（1877—1950）档一盒，内仅英文自传打印稿一份。颜字骏人，上海人，民国外交官。自传是他于1946年在上海撰写的，共十七章，止于1942年。此稿已经姚崧龄译为中文，题名《颜惠庆自传》，由台北传记文学社1971年出版。

⑦金问泗档二盒，是其夫人1968年捐赠的。金字纯儒，浙江嘉兴人，历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交涉员、驻荷兰公使、挪威公使等职。档案内容涉及中国与荷兰、挪威、丹麦、波兰和捷克诸国的关系。

⑧毛炳文（1891—1972）档一卷宗。毛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卷内仅自传稿一份，内容关系中国抗日战争和内战（1945—1949）。

⑨张歆海（1900—1972）档十九盒。张为浙江海盐人，历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司长，驻葡萄牙公使、波兰公使等职。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资料，如1950年张国焘与美国作家诺斯（R. C. North）的谈话记录，陈独秀为1932年被捕事向江苏高等法院提交的申诉书英文译本，等等。

其次，欧美人的档案，直接或间接与民国史尤其是中美关系

史有关的目上百个，其中史料价值比较大的是在华活动的外交官、顾问、军人、记者、传教士及商人等。例如：

①包瑞德 (David D. Barrett, 1892—1977), 美军上校，抗日战争时期来华，任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档案二盒，内有他在延安时书信、笔记本、报告底稿、文件及照片。

②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1883—1946), 美军将领，抗日战争时期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档案六十一盒，其中一至十七盒是他在中国战区工作时的报告、笔记本、书信、地图以及作战计划。

③陈纳德 (Claire Lee Chennault, 1890—1958) 档十四盒，主要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组织“飞虎队”的资料，包括备忘录、命令、报告、地图、书信。全部资料都是其夫人陈香梅于1967年捐赠的。

④梅乐斯 (Milton E. Miles, 1900—1961), 美海军少校，抗日战争时期来华，任中美合作所副所长，支持蒋介石实行特务统治。其档案九盒又四卷宗，内有信札、报告、谈话记录、命令、笔记本、照片。

⑤魏德迈 (Alhert C. Wedemeyer), 美军将领，抗日战争时期来华，接替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司令官。档案五十一盒，1983年新入藏，未经整理，不开放。

⑥阿瑟·恩·杨格 (Arthur N. Young, 1890—) 美国财政专家、国务院官员。1929年参加国民党政府所聘甘末尔财政设计委员会来华，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档案共一百一十六盒，为1929至1946年他在华期间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财政统计数字、机密文件、笔记本以及剪报等。六十年代末，他撰写的《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一书，除使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档案，就是依靠这批史料。

⑦内尔森·罗 (David Nelson Rowe, 1905—), 1941至

1942年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助理。其档案共一百三十六盒，其中仅一部分涉及中国。

⑧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6), 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其档案一盒，内有1946至1949年日记，内容涉及中美关系和中国内战。

⑨鲁格尔·佩克 (Wilys Ruggles Peck, 1882—1952), 美国外交官，驻中国领事。其档案三盒，内有日记、回忆录、剪报、照片。

⑩科尔文·休斯顿 (Jay Colvin Huston), 美国外交官，驻中国领事。其档案十四盒。

⑪彼得·拉斯冯 (N. Peter Rathvon) 档一盒。为1923至1945年拉斯冯与端纳 (W. H. Donald) 之间的来往信件，其中一部份已编入《端纳在中国》(Donald of China) 一书。端纳为澳大利亚著名记者，长期住在中国，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的顾问，其信札多涉及中国内部政情。

⑫罗伯特·诺顿 (Robert Norton, 1896—1974), 美国新闻记者，《今日中国》(China Today) 主编。档案三盒半，内容关于1935至1948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日本侵入中国和国联的态度等。

⑬高尔德 (R. C. Gould, 1898—), 美国远东新闻记者，1923年来华，担任英文《北京日报》副编辑兼合众社驻北京通讯员。1931至1941年任上海《大美晚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报停刊，1945年复刊，仍任总编辑，1949年停刊返美。档案六盒，是他在华期间的信札，论著、剪报、照片等，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外交和抗日战争。

⑭璧约翰 (J. F. Brennan, 1883—1953), 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中国海关职员布廉安 (E. V. Brennan) 之子。档案一盒，是他致英国外交部的紧急报告，内容关于1926年他代表英国与当时中国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解决中国抵制英货和港九铁路

诸向题。

⑮包引登 (C. L. Boynton), 美国传教士, 1906 年来华, 历任上海中华基督教续行委员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 编辑《1936年中华基督教运动指南》一书。档案十盒, 内有他传教的日记、信札、报告、著作、照片。

此外, 值得重视的还有关于辛亥革命的私人档案两宗: ①、荷马李 (Lee Homer, 1896—1962) 档十六盒又五个卷宗。荷马李是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这些资料是他的往来书信、电报、地图、论著、剪报、照片等, 时间为1900至1920年, 内容关系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及清末民初政局。全部资料都是由鲍尔斯 (J. B. Powers) 搜集和捐赠的。②、布斯 (C. B. Boothe, 1851—1913) 档一盒, 布斯是美国商人, 与荷马李、孙中山等有交往。档案是他的回忆录和1908至1911年的来往书信, 内容多为筹划中国革命事宜。

其他如西湾子天主教堂神父勒兰德 (F. Logrand), 杭州传教士马托克斯 (E. L. Mattox)、协和医院的蒲爱德 (Ida pruit), 传教士马修斯 (H. S. Matthews) 等人都有私人档案藏在该馆, 是研究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哥伦比亚大学的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藏有不少稀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这些资料是在推行口述历史工作中搜集起来的, 主持此项工作的是该校前东亚研究所所长韦慕庭教授和已故何廉教授。韦慕庭教授本来是研究汉代的奴隶制度, 二次世界大战后改攻中国近代史。他对孙中山和北伐战争史的研究, 都有贡献。从五十年代末以来, 他们所征集到的口述历史资料和私人档案大约有三十多宗, 在海外短短的几年间, 能够集中起这些珍贵资料, 提供学者使用, 确是难能可贵的。现将资料分为两类略作介绍:

第一类是口述历史, 即回忆录或自传, 有本人撰写的, 有录

音之后经他人整理成文的。

①蒋廷黻自传，二百五十页。从童年至1940年，此后的历史由于他1964年去世未能写下来。

②胡适自传，二百八十六页。此稿由唐德刚教授译注，于1981年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题名《胡适口述自传》。

③李汉魂自传，二百三十页。李是国民党军队将领，其自传分三部份，第一、二部份可借阅，第三部份因关系内战时期（1945—1949）的许多人物，暂不开放。

④李璜回忆录，大约一千页。他是中国青年党的党魁。其中文稿题名《学钝室回忆录》，已在台北出版。

⑤李书华（1890—1979）回忆录，二百三十四页。李书华，字润章，河北昌黎人，历任中法大学代理校长、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次长等职，其回忆录内容涉及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

⑥顾维钧回忆录，英文打字稿一万一千余页，在哥大口述历史资料中是最长的一部。这份口述历史是他晚年旅居纽约期间完成的，中译本名《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卷已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⑦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唐德刚教授整理出版。

⑧陈光甫（1881—1976）自传，一百六十七页。陈光甫原名德辉，字光甫，以字行。江苏镇江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经理。著有《陈光甫使美日记》、《陈光甫言论集》等。

⑨陈立夫自传，仅八十五页是公开的，内容为童年受教育及1926年以前的政治活动。

⑩孔祥熙（1881—1967）回忆录，一百四十七页。内容关系国民党政府财政政策，西安事变及一些中外政治人物，并附录官方文件。

⑪沈亦云回忆录，四百八十九页。沈为黄郛的夫人，其回忆录是从中文稿翻译的。中文稿经过修改后，于1968年由台北传记

文学社出版，题名《亦云回忆》。

⑫陈启天自传，二百三十八页。陈为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1958年写完中文自传稿，1967年捐赠。

⑬王正廷（1882—1961）自传，二百五十八页。王为民国期间外交界重要人物。

⑭吴国桢自传，三百九十一页。吴国桢，历任国民党政府重庆市长、上海市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到台湾后，任台湾省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要职。后与蒋介石政见不合，于1953年离台赴美，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政府的特务统治政策，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蒋介石下令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查办，造成轰动一时的“吴国桢案”。此后即脱离政界，以授课教书为职志，1984年6月6日病逝于乔治亚州萨凡那寓所。

⑮刘瑞恒自传（未完稿）。刘是哈佛大学留学生，曾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⑯张嘉璈自传，一百九十九页。1960年完稿，记其1913至1935年的经历。

⑰张发奎回忆录，约一千页，张是国民党军队将领。他的回忆录较详细地叙述了1920至1950年中国军事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党、各军事集团和政府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⑱陈公博自传稿，二百六十页。

第二类是私人档案，与胡佛研究所度藏的档案性质相近，史料价值较大。

①张发奎资料，均为缩微胶片。这些资料是从张发奎保存在香港的大量文件和信札中挑选拍摄的。内有北伐战争和抗战时期第四战区的史料，战后海南岛的政治、经济及建设计划的文件，陈纳德等美军将领给他的信札。

②陈光甫档，包括日记（1942至1950年）及1936至1942年间

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官吏参加国际谈判的文件等。

③蒋廷黻往来书信，时间为1947至1964年。

④胡适日记（1921至1934年），均为缩微胶片。

⑤熊式辉档，包括日记（1930至1974年），自传手稿，与蒋介石等人往来信札（1930至1940年），以及有关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军交涉的大量文件和照片。

⑥李宗仁日记（1926至1946年）。

⑦李璜撰写的文章和书籍手稿及附件。

⑧梁启超信札一件（1919年）

⑨顾维钧档，包括日记（1936至1956年）、信札、文件、备忘录、讲演底稿、照片、印刷品等共一百九十六盒。其中1930年以前一盒，1932至1933年李顿调查团四盒，国际联盟六盒，驻法国大使三十四盒，驻英大使二十一盒，驻联合国代表三十盒，驻美国大使一百盒。在哥大所存的私人档案资料中，这是数量最多的一宗。

⑩黄郛资料，均为缩微胶片。其中有黄郛与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杨永泰等往来书信千余件。内容涉及北京政变（1924年），南京事件（1927年），济南惨案（1928年）及塘沽停战谈判（1933年）。

⑪孔祥熙资料，均为缩微胶片。内有他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和院长期间的来往电报、文件、报告、财政计划、会议记录等。其中有关西安事变的电报六百余件，涉及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何应钦等重要人物。

⑫李书华往来书信，其中有李石曾二百件，吴稚晖六十件，蔡元培、胡适等人数件。

（三）

美国各单位保存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私人档案资料，当然不

止上述这些。据了解，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杜鲁门图书馆、耶鲁大学等单位，也藏有这类资料，数量亦颇可观。如耶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有容闳、唐绍仪和二百五十名传教士的资料，所以本文所介绍的，并不是这方面资料的全貌。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仅就私人档案而言，美国所藏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档案数量最庞大的，当然要推政府档案。例如，仅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摄制的关于1910至1929年中国内部情况的史料胶片 (Records of the Dep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就有二百二十七卷之多，中美关系史的档案资料更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

搜集和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中国近代史，不仅要大力发掘和整理国内的历史资料，也要不断开拓视野，广泛搜集海外史料。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列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都取得了支配地位。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国外势力紧相关连，而且无不有文字记载。另外，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民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或其后人，不少侨居在海外。他们手中也有许多珍贵的资料，所有这些资料，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应努力搜求，不仅美国的要搜集，其他国家的也要搜集。过去，前人已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一些学术机关和近代史学者也注意于此，并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研究工作的需要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今后，如果我们能有计划有选择地把海外的史料收集起来，经过一番去伪存真的整理，使它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服务，必将大大地丰富中国近代史的内容。

《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评介

于世明

建国以来，史学界十分重视辛亥革命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初步统计，已出版的辛亥革命资料近一百种，但其中译成汉文的有关外文资料却寥寥可数。由胡滨翻译、中华书局出版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以下简称《选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增添一部较有价值的资料书。

《英国蓝皮书》是英国政府提交议会两院的外交文件，我国现在只有几个大图书馆藏有此书。过去曾有过部分译文，散见于《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史学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之九”，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以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等书中，篇幅不多，有些还有错误。这次胡滨翻译了《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的全部资料共四册，计五十余万字，分上下两册。该书除原件

系由中文译成英文者（如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及袁世凯政府给英国政府的照会、文告等）一概不予回译外，对其余的资料未作任何删节，全部移译。因此，它基本上保存了《蓝皮书》原来的面貌。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及事件，译者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对资料中原有的错误，也酌情予以注明。书后附有《大事索引》和《译名对照表》，便于读者查阅本书的资料和人名。

从内容上看，《选译》收录了辛亥革命时期英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官员及海陆军将领与英国政府之间的往来函电，起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止于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

正式大总统，内容相当丰富。它包括辛亥革命的爆发、各省响应、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北停战及议和、临时政府北迁、民国初年的国内政治形势及各派势力的消长、“二次革命”的爆发及其失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等等。这些资料不仅仅说明了当时英国政府对华所采取的政策，而且还可以作为有关中文资料的印证或补充。这里，就《选译》中的几项主要内容加以评介。

(一)

《选译》中的大量材料说明，英帝国主义是绞杀辛亥革命的最凶恶的刽子手。

早在武昌起义前十天，即1911年9月30日，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葛福根据武昌美国教会提供的情报，曾电告驻北京公使朱尔典说，“清军即将发生兵变”。10月3日，葛福又向英国驻上海的高级海军军官申述“今后若干时间内宜对汉口提供海军援助的理由”，他的请求得到了英国舰队司令温思乐的赞同（《选译》页34。以下仅注明页码）。英帝国主义对武昌起义的爆发是有所准备的。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10月11日），湖广总督瑞澂逃至“楚豫”号巡洋舰，要求英国军舰帮助清军阻止起义军渡江，朱尔典通知温思乐“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温思乐“欣然同意了这个请求”（页1、34—35）。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清朝统治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朱尔典于10月16日报告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一般的舆论认为，目前的乱事将被镇压下去，但满清王朝所面临的前景是暗淡的”

（页37）。英帝国主义已经看出清王朝即将上崩瓦解，考虑更换它在华的统治工具了，袁世凯重新出山，立即博得了英帝国主义的喝彩。11月中旬，袁世凯北上组阁。格雷电告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最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

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页58）。这段话清楚地反映了英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反动政策。

袁世凯到达北京后，与朱尔典来往密切。他们之间不仅直接会晤密谈，有时还通过袁世凯的“亲密朋友”、“私人秘书”等往返传递消息及密谋策划。《选译》中有相当多的内容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当时南北之间的停战与议和，就是在朱尔典的操纵下进行的。

11月26日，朱尔典与袁世凯第一次商谈南北停战问题，朱向袁表示，“战事的继续进行，将使汉口的英国人士遭受危险并感到惶惶不安。”袁当即保证：“如果能够根据双方都很满意的条款达成一项休战协定，他将乐于下令停战”。袁并委托朱通过葛福向武昌革命方面转达他的意思（页73）。此后，南北双方的停战谈判，便由葛福居间传达，而葛福则是直接向朱尔典请示汇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袁世凯提出的停战条件中，竟包含“英国总领事（葛福）应作为证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条款，并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页103）。12月3日，南北双方签订了停战三天的协定，葛福就此事电告朱尔典说：该协定的内容“几乎同袁世凯所要求的完全一致”（页105）。

接着，南北双方开始议和谈判。袁世凯同朱尔典磋商后，起草了“议和大纲”，其中包括将停战协定延长十五天，以及任命唐绍仪为代表同黎元洪都督讨论局势等条款在内。朱尔典授权葛福将上述条款通知武昌方面，并嘱咐他“尽力斡旋，保证这些条款被接受”（页133）。9日，南北双方签订了展期十五天的停战协定，朱尔典报告格雷说，“看来武昌的黎元洪都督实际上采纳了袁世凯所建议的条款”（页208）。

袁世凯的和谈代表唐绍仪于12月9日离北京南下，11日抵达汉口。南方的和谈代表伍廷方致函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法磊斯，申述“在目前情况下以上海为会议地点是可取的”，并要求法磊斯请朱尔典出面，促使袁世凯指示唐绍仪赴沪谈判。袁世凯“一直愿意选择汉口”作为议和地点，但朱尔典认为，在上海谈判更利于英国对南北双方代表施加影响，所以同意伍廷方提出的意见，袁世凯终于被迫让步。朱尔典电复法磊斯说：“已对唐绍仪发出指示，要他前往上海会谈”（页160、208）。

唐绍仪与伍廷方之间的议和谈判，于12月18日在上海开始举行。在谈判开始的前夕，朱尔典电告法磊斯“尽可能同唐绍仪保持密切接触”，并向他指出，“我们急于希望同其他国家合作促成一项迅速解决的办法；他应尽最大努力协助双方达成协议”

（页209）。在北京，朱尔典同袁世凯的接触也较前一阶段更为频繁。袁世凯在和谈中采取的翻云覆雨的种种狡诈手法，朱尔典一一与闻，并且帮同策划，他实际上几乎成为袁的最高顾问和决策人。《选译》中所收录的有关这方面的函电，都是第一手资料，是英帝国主义干涉辛亥革命的铁证。

英帝国主义一方面积极支持袁世凯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则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迫使他们向袁世凯屈服。

首先，英帝国主义极力制止南方起义各省动用关税，从财政方面对革命势力进行扼杀。

各地革命党人起义后，根据同盟会事前拟订的《对外宣言》，分别通知各国驻该地领事，声明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承认清政府以前同各国缔订的条约。英帝国主义不满足于这项保证，力图把海关岁入控制在列强手中。有关此事的纠纷，最先在长沙发生。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占领了长沙。不久，他们便通知各地海关税务司：他们可以继续留任，但必须服从军政府的命令。朱尔典获悉后，立即电告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说：“应诱

劝（湖南）起义军政府同意将海关岁入暂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您应当为此目的尽最大努力，与税务司会同办理”。他们指示翟比南威胁湖南军政府说：海关岁入“应归各国持有债票的人所有，如果起义军挪用该款，结果或许将与各国发生严重纠纷”

（页6）。几乎与此同时，汉口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湖北军政府任命了一名革命党人担任海关监督，汉口税务司立即提出“抗议”，湖北军政府终于撤销了原来的任命。朱尔典报告格雷说：长沙、汉口两地税务司在与起义军首领们的谈判中，“似乎很机智灵活，然而，至少在汉口，他们提出的抗议，无疑获得了当时泊驻在长江的各国强大海军力量的援助。甚至泊于长沙的德国小炮舰也起了心理上的作用，那些没有在中国内地居住过的人是很难评价此事的”（页154）。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威胁下，长沙、汉口两地军政府被迫同意把征收的关税以海关总税务司的名义存入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用来支付清政府的外债（包括借款和赔款在内）。后来，各省其他口岸的海关岁入也都遵循上述先例办理。南方革命势力被剥夺了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十分拮据的困境。

其次，英帝国主义纠合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起，一开始就不承认南方各省起义后所建立的军政府，拒绝按照国际惯例同意军政府所应享有的各种合法权益。

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10月13日），朱尔典便电告葛福说：

“除了因英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而绝对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外，您不应与起义军统领保持任何联系”（页3）。后来，朱尔典又对英国驻中国其他各地领事发出了许多类似的电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始终未获得各帝国主义的承认。对南方革命势力采取不承认政策，是英帝国主义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的重要手法之一。

当时，各国（主要是英国）轮船继续在长江中行驶，为清政

府运送军火、粮食、煤炭等，支援汉口一带的清军。湖北军政府于10月下旬曾将违禁物品清单送交各国驻汉口领事，申明“这些物品如经查获，将同运载物品的船只一起予以没收”。各国领事将此事提交北京外交使团。朱尔典作为外交使团首席公使，发表意见说：“起义军都督没有任何权力对运载这些物品的船只加以没收；条约没有禁止的所有货物，都可以由外国船只自由运往汉口”（页86）。后来，湖北军政府查获运载违禁物品的英国船只多起，每次都遭到英国方面的蛮横干涉，总是以赔礼道歉、发还违禁物品了事。

再次，英帝国主义增派海陆军来华，对中国人民直接进行武力威胁。

武昌起义一爆发，朱尔典便非常担心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排外的性质”。10月31日，他感到北京和天津的形势不稳，主张为了“保卫”北京至沿海之间的铁路畅通而使用英国军队。他的主张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后来，他联合法、日、美等国公使指示各该国部队对京榆铁路实行军事占领。同时，为了防止革命势力向京津地区扩展，外交使团于11月23日议定，将北京使馆卫队的兵力增加到1901年所保持的人数。于是，各国纷纷调兵遣将，至12月19日为止，各国驻直隶的官兵总数达七千零二十一人，其中英军二千八百四十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部队的人数。驻北京的各国使馆卫队达二千零九十八人，其中英军为三百二十一人。各国驻直隶军队大都集中在天津，英国驻华使馆武官韦乐沛对这些部队作了这样的评价：“无可怀疑的是，他们驻在天津起了稳定形势的作用，并且直到目前为止，很可能防止了天津发生内战”（页211）。

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在增兵华北的同时，调遣了军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游弋，并派兵在汉口、上海等地登陆保护租界。11月初，英国舰队司令温思乐窜至上海，视察

了租界“防务”，发觉英军的力量仍较薄弱，不足以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件，建议英国政府与日、德、法等国磋商，各派遣一千五百名步兵赴沪，以保证上海的安全。于是，列强在汉口、上海等地租界集中大批武装部队，造成了武装干涉的紧张气氛。

英帝国主义还一手策划沪宁、津浦等铁路的所谓“中立化”。11月初上海光复后，英国总领事法磊斯竟一度派“义勇队”占领沪宁路车站。朱尔典电告法磊斯说：“该路已经抵押给英国的债券持有者，所以我认为，您有理由采取您能够采取的一切办法，坚持该路作为一个纯粹的商业机构，按照中立的铁路进行经营管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利用该路运送军队或军火”（页41）。尽管英帝国主义标榜它对双方的态度是“不偏不倚的”，但当时的所谓“沪宁铁路中立化”，有利于清朝方面，阻碍了起义军对南京的进攻。12月初，南京、浦口相继光复。朱尔典于12日又指示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说：关于津浦铁路问题，“您应当尽可能按照我们力图在沪宁铁路推行的原则办事，目的是要把该铁路作为一个商务企业来经营，不受任何一方的干涉”（页196）。津浦铁路的“中立化”，限制了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二）

英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之一，它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几乎都设立了领事馆。辛亥革命时期，各领事馆就当地情况写给英国驻京公使馆和英国政府的报告，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辛亥革命在各省的发展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资料。下面以四川、湖南、南京三个省区的情况作为例证。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前奏，但四川却是起义较晚的一个省份。清朝顽固势力、立宪派、革命党人等三种力量在四川都很活跃，关系错综复杂。四川从保路到光复的经过，历来就是辛

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英国驻成都领事馆官员泰克曼曾做了这样的概述：到1911年底为止，成都的政治形势经历了三个显著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到11月27日为止，是赵尔丰总督^①统治下清朝制度的延续时期；第二阶段，自11月27日至12月8日，是首届共和政府的统治时期；第三阶段，自12月10日至31日，是革命党与保路同志会联合建立的军政府的时期。赵尔丰曾经千方百计地防止革命在四川爆发，但是，武昌起义和其他各省光复的消息不断传来，四川人民情绪激昂，赵尔丰看到大势已去，把政权和平过渡给立宪党人，由蒲殿俊、朱庆澜两人担任四川第一届共和政府的正、副都督，主张武装起义的革命派人士被排斥在政权之外。蒲殿俊等未能稳定四川局势，首届共和政府于12月8日垮台，经过两天的混乱之后，由保路同志会与革命党联合组成了一个新的军政府，尹昌衡、罗纶出任正、副都督（页371—372）。关于四川保路运动、光复经过、成渝两地军政府的合并、四川与滇、黔两省军队的矛盾和斗争等，《选译》中都有较丰富的材料，对读者是很有吸引力的。

湖南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省份，但是，湖南省内部的斗争复杂，光复后的第十天，即10月31日，湖南立宪派勾结旧官僚、政客、劣绅等发动政变，杀死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等，由谭延闿继任都督。这是我国史学界流行的关于湖南光复情况的说明，有大量中文资料作为论据。《选译》中所发表的材料与上述说法不完全相同。据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报道，长沙民党内部有两个派系，主要是由于副都督陈作新“怀有阴谋诡计”，两派之间存在的分歧“随时有爆发公开战斗的危险”。10月26日夜間，危机达到了严重关头，士兵预料即将发生战斗，纷纷武装起来，做好临战准备。在最后时刻，由于陈作新获得一万两赏金的

① 赵尔丰是署理四川总督，《英国蓝皮书》中所收报告对其官职的称呼有误，此处沿用原文提法。

酬报而应允辞去职务，所以避免了危机的爆发。事实上，陈作新最后没有履行他辞职的诺言。焦达峰的举动“似乎始终是温和的”，他曾发布一项告示说，临时政府既已建立起来，他打算辞职，应采取步骤推举一位继任者。10月31日，两位都督被军队击毙，谭延闿被举为都督。翟比南的报道中还透露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他写道：长沙光复之初，“革命军所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关闭各城门，向所有的主要士绅和其他富户征收捐税，不管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那些被特别指明勒捐的人，是过去曾为满清王朝明显效劳者的家庭，如曾国藩、左宗棠和其他人的后代。据说曾国藩的后代已被迫捐五十万两”（页120）。

需要说明一下：上述报道的作者翟比南是著名汉学家翟理思的儿子，出生于中国，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的报道是根据亲身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的。尽管该报道可能不完全属实，而且在有关中文资料中一时还找不到类似的记载互相印证，但它毕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情况提供了一些线索。

南京是革命军经过激烈战斗后攻克的一座重要城市，对当时的整个形势影响很大，它扭转了革命军因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所处的不利地位，打击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嗅觉灵敏的朱尔典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2月1日革命军占领南京前夕便向格雷报告说：“这里对南京的命运感到最强烈的兴趣，因为它很可能是政治形势中决定性的因素之一”（页168）。革命军是怎样攻克南京的？攻克南京前后革命军内部的情况如何？关于这些问题，《选译》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据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报道，革命军对南京的进攻是11月8日开始的，当时驻守南京的清军达一万多人，其中旗兵约有二千人，由江宁将军铁良率领，其余的各种军队由提督张勋统率。两江总督张人骏曾接到清廷的谕旨，命令他向革命军投降，但铁良

坚决反对，并以破坏南京城相威胁。张勋最初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并就自南京城撤退一事索银八十万两，而张人骏只答应付给他四十万两，张勋认为这笔款额太少，于是决定站在铁良一边，他掌握了防守南京的指挥权，在南京城内实行恐怖统治。革命军在徐绍桢统制的指挥下开始进攻，但革命军内部矛盾重重，

“徐绍桢统制和林述庆都督^①彼此互相嫉妒，他们之间的对立严重地妨碍了军事行动”（页190）。革命军对南京的进攻持续了二十多天，徐绍桢一开始“似乎把他获得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旧军^②内部的不和及城内子弹的缺乏，而非建立在对南京城进行轰击的结果之上”（页152）。因此，革命军的进攻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12月2日才占领南京全城。伟晋颂认为，革命军对南京的占领，是通过同张勋的谈判完成的，因为张勋的主力部队并没有被歼灭，如果不是他接受革命军提出的投降条件，革命军一时便很难占领南京城。他写道：“就我所能搜集到的情报来说，（南京）投降一事是由一个姓左的人安排的，他是革命军的使者，但又与张勋提督有私交，他已在城内住了一些时候，试图商谈一项解决办法。他在几名传教士的陪同下，于昨日（12月1日）早晨见到了城外的革命军指挥官林述庆都督，并从他那里获得了清军投降时的十分圆满的条件”（页193）。于是，张勋于1日晚间或2日早晨离开南京，渡江前往浦口，他的大批部队也在下关上游约十二英里处渡过了长江。伟晋颂指出：防守南京的主崩瓦解如此突然和出乎意外，所以人们很难不怀疑张勋是被“收买”的；还应当注意的是，当时革命军既已占有南京城外各炮台，又有炮舰封锁南京至浦口之间的江面，但他们没有认真企图阻止张勋及其部队渡过长江，1日早晨进攻浦口而且几乎已包围浦口的部队，当天下午便统统撤了回来。

① 林述庆为镇江分府都督。

② 指张勋所率清军。

伟晋颂是南京光复的目击者，他的上述报道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与中文资料的有关记载颇有出入。究竟孰是孰非，是很值得我们加以考订的。

伟晋颂还报道，林述庆都督最先进入南京城，立即占用了前总督衙门，自称南京都督，并将此事通知领事团；徐绍桢名义上是林的上级，入城后不得不满足于占用前谘议局的房屋。程德全于12月6日抵达南京，在把林述庆逐出总督衙门的企图失败之后，便和徐绍桢联合，向林述庆进行挑战。据说林述庆被派遣率军北伐，但在付给他二十万两饷银之前，他拒绝离开南京。后来，他带走了大批饷银，不知去向。南京光复后首领们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在其他一些省份也不断发生。

除了上述三个地区的情况之外，《选译》中还有其他许多记载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如各省光复过程中新军是一支重要力量，英国驻华公使馆代理武官欧特白于1911年11月11日写道：“整个革命运动中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也许是：已化费很多金钱而且寄予很大信任的陆军，现已证明是部份倾覆清政府的工具”（页92）。英国领事们还报道了云南、贵州、陕西等省哥老会和江西洪江会的活动。此外，英国驻芜湖领事报道：“前清朝驻伦敦公使李经方（李鸿章的儿子）侯爵的财产被芜湖临时当局所占有，他们正在征收租金及占用那些祖传的财产，直到原物主被说服向革命派支付大量捐款为止”（页466）。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来说，这些资料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

关于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选译》中所收录的函电报道了许多重要情况，其中有些内容是相当生动的。

1912年5月，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中文秘书写了一篇《1912年第一季度北京报纸述评》，说明该季度内北京舆论的重要变化

和发展动向。他写道：这年初，北京各报中有一股强大的满族人的势力。例如：《帝京新闻》公开主张清王朝应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晨报》则鼓吹成立一个不一定把皇族亲王排斥在外的责任内阁。《爱国日报》、《帝国日报》等报纸都发表了反对汉人、反对民国的言论。中文报纸中最有影响的《北清日报》^①表示反对改朝换代，认为爱新觉罗虽然不是一个伟大的统治家族，但也并不低于明朝朱家的统治。《光华日报》极力颂扬庆亲王奕劻，攻击袁世凯。只有1911年创刊的《国风报》是宣传推翻满族统治并剥夺清朝皇帝尊号的唯一报纸，由于它采取了坚决支持共和的观点，所以不久便与警方发生冲突，暂时不得不缓和它的调子。

1月中旬，北京发生了图谋暗杀袁世凯的事件，气氛十分紧张，各报的腔调为之一变，都热衷于鼓吹共和，认为清帝退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警告满族统治者当心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的下场。除了《国风报》经常反对袁世凯而且对暗杀他的秘密计划遭到失败一事公开表示遗憾之外，其他报纸似乎都暂时倒向了袁世凯一边，称赞他是“国家的救星”（页566）。

到了2月中旬，清帝退位已成为既成事实，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南方革命党人要求袁世凯赴南京就职，并派代表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2月29日，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在北京发动兵变，要挟南方代表团。此后，北京各报的态度又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致对袁世凯进行批评和谴责，甚至那些被认为是代表官方的报纸也避免对袁世凯说恭维话。有好几个报刊发表连环漫画，把袁世凯画成一只猴子（袁、猿谐音），故意奚落和蔑视他。袁世凯被描述成为一个野心勃勃、寡廉鲜耻、残酷无情而又缺乏统治能力的人物。与此同时，各报都热烈赞扬孙中山，称颂他大公无私地辞去临时大总统

^① 音译。

的职务，把他说成是“革命的英雄，始终如一的人物”（页567）。

上述《选译》所提及的那些报纸，我们目前很难一一找到，不可能加以核实。尽管它的报道不一定完全确切，但它对我们了解当时北京舆论所经历的变化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着手组织国会，企图通过国会使自己成为合法的正式大总统。关于1912年下半年进行的国会议员的选举，《选译》中有较详细的记载，称之为“戏剧性”的事件。据英国驻各地领事报道，在湖南，广大选民对选举的态度是冷淡的，他们随意卖掉自己的选票，每张选票的价格一般是五元，随着投票选举日期的逼近，选票价格也就上涨，选举的那一天，在许多地区的投票站周围，互相竞争的各派候选人之间发生殴打，投票箱和选票常被捣毁，投票站也遭到破坏。在江西，选举中出现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冒名顶替和其他不法行为，当地报纸报道了许多关于同一个人投入几十张选票的事例。在广西，经常有人申诉发放选票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但人们没有兴趣对这些指控进行公开的调查。在山东，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是很少的，因为人们大都对新制度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总之，各个省区的选举情况大同小异，反映了广大群众对袁世凯政权是不信任和不支持的。

1913年7月初，孙中山等革命派发动了“二次革命”。英国驻华外国官员们早就觉察到了南北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1月间，袁世凯下令扣留江西省当局购买的七千支步枪和大约三百万发子弹，这批军火当时已卸在九江。江西都督李烈钧不甘示弱，从南昌调部队前往九江，九江要塞司令戈克安坚决执行袁的命令。李烈钧任命师长欧阳武接替戈克安的职务，并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措施，迫使戈克安辞职。到3月下旬，双方部队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英国外交官员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在安徽、江西、广东、福建等省之间，而且可能还有湖南省，组成了一个积

极的联盟，以对抗袁世凯的权力，内战已迫在眉睫”（页665）。后来，由王芝祥出面调解，经过一些谈判后，说服了戈克安辞职并离开了九江。这一次较量以江西省当局的获胜而告终。袁世凯在未获得列强提供的“善后大借款”之前，暂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13年4月8日，国会两院在北京开幕，表面上一切都保持“平静”。英国官员们窥出：“有一股发生磨擦的暗流，人们担心可能发生动乱”。他们估计：“袁世凯很可能当选为民国总统，但人们在制订宪法的时候，肯定会企图把他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那时候，他可能必须在接受一个供装饰用的职位和主张在政府中享有部份实权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页661）。袁世凯当然不会甘心当一个“供装饰用”的总统，企图最大限度地把权力集中在他手中。后来，袁世凯在列强支持下消灭了南方革命势力，“统一”了中国。英国官员们在分析袁世凯取胜的原因时，直言不讳地承认列强提供的巨大借款起了重要作用。

《选译》中所收录的函电都是出自英国官方人士之手，他们站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辛亥革命做了许多歪曲的评论，特别是对中国人民大肆污蔑和诽谤，把光复后建立的“军政府”说成是“君政府”，是“暴民统治”，叫嚷“中国人民的教育程度不足以适应政体中如此激烈的一项变革”，只能接受专制主义的统治。他们还对中国人民的公敌袁世凯竭力加以美化，吹嘘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只有通过他才能在中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我们撇开这些陈词滥调，是可以从《选译》中获得很多重要资料的。

两则反映宜章暴动日期的资料

冯资荣

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湖南宜章举行的“年关暴动”，是何日发生的，历来说法不一。有说是一月十二日爆发的，有说是一月二十二日爆发的。也有笼统地说是一月中旬或一月下旬爆发的。笔者最近查到两份旧档案资料，对于确定宜章暴动的日期很有参考价值。

第一份资料登在旧粤海关的《各项事件传闻录》（《Canton, Events and Current Rumours》）上，这是一种英文打字稿。该稿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记载：“据来自北江韶关的军事报导称，湘粤边境的坪石宜章两镇，已经陷落在四千赤色农匪手中”。“共产党部队的领袖名叫朱德，他是云南将领范石生下属的前任军官。据闻，政府现已命令许克祥率部前往坪石进攻‘红军’。”《各项事件传闻录》是将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的情报逐日记录，综合整理供粤海关外籍税务司签阅的。这一份记录明确地显示出宜章暴动的日期是在一月二十二日之前。

第二份资料是广东省政府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致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的军字第二〇一号电文：“现据宜章各法团驻坪石临时办事处马日电称，共逆杨子勳（应为杨子达——笔者）等勾结朱德胡少海等千余，于文日抄入宜城，焚烧杀掠，县长遇害，枪毙士绅数十，……团防保安队均被冲散，匪势愈张，覆巢堪虞。……函请贵部迅飭部队进剿，以靖地方。”^①这是目前看到的明确记载有宜章暴动确切日期的历史资料，它采用以诗韵代日期，“文日”即十二日。宜章暴动的具体日期当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

^① 《广东省政府周报》军事卷第22、23期合刊第42页。

赣西南特委的成立和演变

周 明

赣西南特委是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陂头会议”上决定成立的，在这以前不叫“赣西南特委”，而分别为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其成立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江西省委遵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的指示，开始组织各地秋收暴动。为了便于集中力量，加强各地武装暴动的领导，决定将全省划分为赣东、赣西、赣南、赣北四个特区，并成立四个特委。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赣西南暴动以万安为中心，并组织赣西特委于万安”，成立了赣西特委，宛希俨为特委书记，领导了万安暴动。

一九二八年三月，万安暴动失败后，特委机关迁入吉安城内（对外名称叫“赣西红旗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赣西特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后，特委机关又从吉安城内迁往陂头，刘士奇代理书记。当时赣西特委包括吉安、吉水、太和、万安、永丰、安福、分宜、新余、峡江等县。

与此同时，赣南特委也在赣州成立，汪群为特委书记。赣南特委包括兴国、赣县、于都、寻邬、会昌、信丰、大余、瑞金等县。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特委书记。同年十月十四日，边界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第二届特委委员十九人，谭震林为特委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湘

赣边特委包括永新、莲花、宁冈、遂川、茶陵、酃县等县。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中共江西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目前军事状况》中提出：“现因目前（革命形势）的发展，赣西和赣南有联合组织赣西南特委之必要”。后因种种原因而未着手合并。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湘赣边特委“经过敌人三次‘会剿’后，党和群众损失非常大，几次派人找上级，终以路上发生问题（邓乾元同志去而不返，刘真同志被难）仍找不到关系。边界党当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西特亦遭破坏，曾道懿反水，城市组织完全倒台。南路同时被破坏，廖桂棠同志被难，……适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到来，向特委发起在遂川召集五军军委、边、西两特委联系会议”。（赣西南特委向省委报告《一九二九年八月以后的赣西南》一九三〇年六月）遂川会议决定合并赣西、湘赣边特委为赣西特委，集中红二三四五团编成红六军，确定攻打吉安。

一九三〇年二月六日至九日，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在吉安陂头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四军前委扩大为指导四、五、六军和湘、鄂、赣、闽、粤行动的前委，毛泽东为书记。“为了赣西南的统一指导，决定赣西、赣南二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指定刘士奇、曾山、刘和健、李文林、王怀、刘大千、郭贞、彭桂峰、肖道德、刘品山等十五人为委员，刘士奇、曾山、王怀、李文林、刘和健（一说丛允中）等五人为常委，刘士奇为特委书记。特委下设三个行委：一为北路行委，管辖吉安以北及袁州、安福、峡江、分宜、新余、吉水北部等县区；一为南路行委，设于都，管辖赣县、于都、宁都、上犹、崇义、大余、南康、信丰、安远等县；一为西路行委，设吉安西部，管辖吉安西区及永新、莲花、宁冈、遂川各县区。吉安南部之太和、万安、及吉安东部之永丰、乐安等县区由特委直接指挥。（《张怀万

巡视赣西南的报告》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赣西南特委由前委指挥。

由于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为新特委，为了指挥上和行动上的需要，因此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改名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为主席。三月间，红四军离开赣西南前往广东南雄，曾山随四军行动，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肖道德代理。

同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吉安富田召开，选举肖道德、肖芳全、邱达三、李文林、刘士奇、胡炳田、胡品、胡益寿、王怀、龙超清、陈婉如、丛允中、郭贞、曾如柏（曾山）、谭思聪、刘天干、郭承禄等十七人为特委委员，曾炳春、金万邱、钟蛟球、贺怡、赵世嘉、谢汉昌、古柏、段起凤、李白芳、周冕、彭桂峰等十一人为候补委员，并由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推选肖道德、刘士奇、李文林、王怀、丛允中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正式成立赣西南特委。（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一号，一九三〇年四月九日）常委分工：刘士奇为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王怀为组织部长，李文林为军委书记，肖道德为工运书记，丛允中为南路行委书记，候补委员李白芳为秘书长。（李文林：《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特委下设东、西、南、北四路行委。

一九三〇年五月“四打吉安”以后，为了指挥方便，赣西南特委机关从赣河东迁往河西，将原属特委直接指挥的县区划为中路行委。不久，又将南路行委分为东河、西河两个行委，从此赣西南特委下面设有六个行委，它们是：东河行委：包括兴国、于都、瑞金、会昌、安远、寻邬、赣县（赣河以东部）等红色区域，以于都为中心，罗寿南（后叛变）为行委书记。

西河行委：包括上犹、崇义、南康、大余、赣县（赣河以西部）信丰、南雄等红色区域，以南康、信丰为中心，黎日晖为行委书记。

东路行委：包括永丰、宁都、乐安、南丰等红色区域，以永丰、宁都为中心，金万邦为行委书记。

中路行委：包括吉安之儒林、富田、东固、纯化、水东、吉水之水南、白沙、中鹄，以及万安、太和等红色区域，毛泽潭为行委书记。

西路行委：包括永新、莲花、宁冈、遂川、茶陵、酃县和吉安之西区等红色区域，以永新为中心，周高潮为行委书记。

北路行委：包括吉安之儒行、坊廓、延福、吉水之金滩、同水、仁寿、同登、阜田以及分宜、宜春、峡江、安福等红色区域，郭承禄为行委书记。

在各行委所属的地区，均设立了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作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派出机关。

一九三〇年八月五日，赣西南特委召开第二次特委全体会议（简称“二全会议”）贯彻全国苏区代表会议精神，接受了立三路线，撤销了刘士奇的特委书记职务（一说开除了党籍），改组了特委常委会，以曾山、王怀、郭承禄、肖道德、李文林等五人为常委，郭贞、陈婉如二人为常委候补委员，李文林为特委书记。

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安以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城内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江西省行委”），选出委员十三人，常委为李文林、曾山、陈正人、王怀、段良弼等五人，李文林为书记，王怀为组织部长，陈正人为宣传部长，段良弼为团委书记，曾山为省苏维埃主席。

特委下设：赣东、赣西、赣南、赣东北、赣西北五个行委。（毛泽东给中央信，一九三〇年十月十四日）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富田事变”发生后，江西出现了河东、河西两个省行委。一个是以曾山、陈正人为首的河东区行

委：一个是以段良弼、金万邦等为首的河西省行委。两个省行委都向下级党部发文件，指示。为了避免混乱，总前委决定撤销省行委，成立赣西南特区委（相当于省委），陈毅为书记。

特区委下设：东、西、南、北四路分委，东路、南路在赣江之东；西路、北路在赣江之西。当时因为交通时常被敌人阻隔，特区委与各路分委不能发生关系，特区委能够指挥的只有直属几个县委，和省政府的工作而已。

自从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为了统一指挥，集中力量，集中人材，又将赣西南特区委取消，在河东成立赣东、赣南、永吉太三个特委，直属于苏区中央局指挥。在河西成立湘赣省委，指挥河西及湘东南的工作。（欧阳钦：《关于中央苏维埃区域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至此，赣西南特委组织即不复存在了。原来由赣西南特委管辖的地区，以后分别由重新恢复的江西省委和新成立的湘赣省委、粤赣省委领导。

“九·一八”事变时的沈阳东大营

孟繁宗 高景生 谢 文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与沈阳北大营的关系，早为人所共知。但是，对沈阳东大营的问题历来很少涉及。北大营号称沈阳第一大营，东大营则为沈阳的第二大营。不弄清东大营的情况，势必影响真实反映“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的全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作探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其面临的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实现其长期梦寐以求的霸占我国东北的侵略计划，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蒋介石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在四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三千万骨肉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时，日本关东军在沈阳东北部的柳条湖，自己炸了一段铁路，然后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即制造了所谓的“柳条湖事件”。之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命令其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和第五大队，由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指挥，袭击当时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驻地北大营，第二天早五时三十分完全占领该地。如果把日军在沈阳的侵略活动分为几个环节来看，这是完成了它的第一个环节。而日军驻扎沈阳的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由联队长平田幸弘大佐指挥，进攻沈阳城，并于十九日六时三十分占领该城，这是第二个环节的完成^①。

日军在占领了北大营及沈阳城之后，并未完事大吉，他们立

即纠集重兵，以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森连中将为指挥官（因森连在公主岭布署日军向长春方向的侵略行动而未能及时赶到战场，遂由第二大队长代替指挥），把攻击矛头指向东大营及其附近地区。这是日军有计划发起的进攻，是它的侵略活动的第三个环节②。

事实证明，日军非常重视对东大营地区的进攻，不但作为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配备了相当强的兵力。日军的出发点和原因是：

第一，东大营战略地位重要。东大营是东北讲武堂的所在地，里边集中了东北军的精华。在其东，有山咀（东陵）兵营。南有兵工厂、航空处飞机厂等备有武器弹药的军事设施。东大营及其附近已构成一个重要的军事地区，要人有人，要物有物，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第二，“九·一八”事变的枪声一响，东北军独立第七旅由北大营撤出后向东大营方向运动，日军非常害怕他们与东大营地区军事力量结合，对日军占领沈阳构成威胁。

第三，东大营背靠天柱山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占领并保住沈阳，不能不把东大营夺到手里。

但是根据需求和可能，日军把攻击东大营还是放在了第三个环节上。“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日军在沈阳能战斗的部队只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及驻守的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日本的其它部队均分散在旅大、辽阳、鞍山、海城、铁岭等地。协助侵占北大营的守备队第五大队是十九日四时四十分才乘车从铁岭到达，投入攻击时，第二大队已占领了北大营的大部分。至于第二师团其它一些部队以及多门二郎本人也都是十九日四时四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才乘火车到达沈阳的。而此时沈阳城也已大部分被第二十九联队占领了③。大约到了十九日晨，日军集结在沈的兵力已比较充足。所以，日军在侵占了北大营和沈阳城之后，为

了继续“击退东大营附近之中国军队，以稳住奉天附近局势”^④，调转矛头，组织了对东大营地区的进犯。

这里所说的东大营，位于沈阳城东、天柱山脚下东山咀子，距沈阳城约十公里。营区坐北朝南，地势平坦，东与东陵区金家屯相接，西和高管台毗连，南有沈抚公路，北临沈吉铁路，面积约为二百万平方米^⑤。沈阳东大营规模之大，历史之悠久，虽视北大营为稍逊，但无愧于沈阳第二大兵营，它与北大营及西大营并称为沈阳的“三大营”。

沈阳东大营初为张作霖时代所建筑的一座兵营。一九二八年九月东北讲武堂由小东边门外校址迁到这里^⑥。当时，东北讲武堂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完善的。在东北地区则是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培养军官最多的军事教育阵地。它与当时的云南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为国家正式中等军官学校，后来则成为培养高级、中级和初级三种军事干部的综合军事学校。“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学校学习的有讲武堂第十一期学员，全部是现职军官，共七百余名^⑦；步兵教导队学兵六百五十名^⑧，还有“高等军学研究班”、“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工兵研究班”等。东北讲武堂的学员、学兵共约一千五百人^⑨。在校教职员工七百多人^⑩。总计，当时整个东大营共有二千五百人左右。“其中配备武器的，只有步兵教导队，包括步兵三个连，重机枪一个连，步兵炮一个连，通信兵一个排，计六百五十人”^⑪。他们是入伍不久的学生兵。当时东大营是军官多，学生多，没有战斗部队，武器装备也很少。

十九日七时五十分，日军多门二郎中将对进攻东大营进行了部署，并命令十时三十分前做好进攻准备。对东大营的攻击，他们动用的实力是独立守备队三个大队，第二师团的两个联队及一个炮兵联队，一个工兵中队的兵力，取南北夹攻的态势。其战斗队形具体配置如下：

担任攻击任务的日军第二师团及独立守备队以沈海铁路为战斗分界线，独立守备队由北向南、第二师团由南向北攻击，铁道线路归第二师团负责。

担任由北向南进攻的独立守备队之第二、第五、第六（缺一、四中队）三个大队在东大营西北方向展开，分两线配置。第五大队、第六大队（缺一、四中队）为第一线，第六大队（缺一、四中队）在右，第五大队在左；第二大队为预备队。

担任由南向北进攻的第二师团之第十六联队（缺第十中队及第二大队一部分）和第二十九联队（缺第二大队）配置在东大营西南的八家子至十里坎一线，由十五旅团司令部和旅团长天野少将指挥。其预备队由第十六联队十中队、二十九联队七中队及第二工兵中队编成，配置在兵工厂附近。同时命令第十六联队第二大队（缺五、七中队）担任对山咀子（东陵）兵营之攻击。由第二十九联队第二大队（缺第七中队）担任对沈阳方向的警戒。野炮兵第二联队（缺第二大队及第二中队）炮兵阵地配置在沈阳南站附近（太原街二号，即今沈阳铁路局院内）支援对东大营的攻击。第二师团司令部也配置在沈阳南站附近^②。

显然，日军对东大营的进攻部署之严密，兵力之众多，指挥官之高级，都可以看出日军对此举的重视。

面对日军步步进逼，一场血腥的攻击迫在眉睫，驻有中国军队的东大营情况如何呢？由于日军的突然袭击，北大营、沈阳城相继被占，东大营的对外联络也完全被切断，所以此时已处于群龙无首、势孤力单的状态。特别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更是束缚了爱国官兵的手脚，瓦解部队的斗志。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讲武堂即接到上级“指示”说：“如果日军向我们进攻时，不要抵抗，要什么给什么；如果日军向我们挑衅，我们可以躲出营房，日军见到我们驻地无人，他们自然就走了，等他们走了，我们再回来；如果日军侵占我们的国土，我们就报告国联，

国联自然会出来主持公道，迫使日军撤兵。”^①讲武堂领导在接到这样的“指示”后，害怕在日军进攻时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抵抗，所以“枪支不发子弹”^②。这叫自行解除武装，既解除“精神”武装，又解除“物质”武装。十八日夜，当日寇进攻北大营、沈阳城的枪声响起，还以为是日军演习；后来感到事情不妙，也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直至北大营火光烛天，方知北大营已经陷落，一场严重的事变发生了。这时东大营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愤恨殊甚”，纷纷要“与日人决一死战”。但由于东大营已失去指挥，加上缺乏战斗部队，缺少武器，特别是上级明令不准抵抗的压迫，于是堂堂的东北讲武堂竟是一枪没放地“整军退出”了东大营！具体撤出的过程是这样的：十九日晨，讲武堂骑兵队长张庆第带领骑兵去北大营方向侦察回来，没有弄清情况就报告说：日军已向东大营进攻！上午八时左右，东院步兵队首先整队从北门撤出，而后各单位相继撤出^③。当东大营的爱国官兵被迫撤出时，“军官流涕，士兵痛哭，悲号之声，闻于遐迩”^④。东北讲武堂人员从东大营撤出后，和从北大营撤出的第七旅会合在一起向山城镇方向转移，然后，开进了山海关。

在十九日十一时四十分至十二时三十分，包围东大营的日军，在东大营周围进行了一番抢劫后，当他们“探悉”东北讲武堂人员已“全营退出，乃敢侵入营内，大肆搜索，所有一切军械、子弹、款项，以及一切紧要物品，悉被搜掠净尽。”东部的山咀子（东陵）兵营也几乎同时告失。

东大营的被占领，不仅标志着整个沈阳完全沦陷，而且进一步失去了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抵抗的战斗阵地。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东大营之后，则更加放心大胆地扩大他们的侵略活动了。

注释：

① 参见易显石等著《“九·一八”事变史》，第140～141页。

田琪之译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1981年6月

印刷)，第5页。

②③④：见注①之《概要》一书第5~7和第7页。

⑤ 东大营营房资料（现存东大营有关单位）。

⑥ 金亚东著《东北讲武堂第八期概况》，辽宁省文史研究馆等编的《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80页。《东北年鉴》第278页。

⑦ 李传玺著《东北讲武堂》，见《辽宁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4~75页。

⑧⑨⑩：见注⑥之《文史资料》（1982年号）第54页。

⑪ 《东北年鉴》第282页。

⑫ 日本政府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日文本）第19~20页。

⑬⑭：郑殿起著《我对“九·一八”的片断回忆》，转引自《“九·一八”事变史》第165页。

⑮ 辽宁省政府参事室郑殿起口述。

⑯ 虎口余生著《日军侵据东北记》第28页。

一九八三年国外出版 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

西文部分

论 文

一、总论、通史

Chan, Ming K. & Strand, David, Militarism and militar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rends in History 1981 Vol.2 No.2 p.53-69

中国近代史上的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化 陈明鍊 斯特兰德

Zurcher, E., China na 1911: Hoofddlijnen van de ontwikkeling (China since 1911, main line of development). Spiegel Hist.(Netherlands) 1981 Vol. 16 No.6 p.322-329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 泽克

Myers, Ramon H., Society and economy in modern China; som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Bulletin Institution Modern History, Academy Sinica 1982 No.11 p.197-224

近代中国的社会与经济:若干历史问题的阐释 迈尔斯

Potter, Sulamith Heins, The position of peasants in modern China's social order. Modern China 1983 Vol.9 No.4 p.465-499

近代中国社会制度中农民的地位 波特

Lyon, Judson M., Protonationalism in China, 1874-1890;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ers. Asian Profile (Hong Kong)1980 Vol.8 No.4 p.301-310

中国原始的民族主义, 1874—1890; 制度改革者 莱昂

Cole, James H., Social discrim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To-min of Shao-hsing. Journal Economics Social History Orinet 1982 No.25 p.100-111

传统中国的社会歧视: 绍兴堕民 科尔

Averill, Stephen C., The shed peop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Yangzi highlands. Modern China 1983 Vol.9 No.1 p.84-126

棚民和长江流域丘陵地的开发 艾夫里尔

二、政治

Kwong, Luke S.K., Imperial authority in cris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up D'etat of 1861.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Vol.17 Part 2 p.221-238

危机中的皇室权威：辛酉政变释义 卞（音）

Eberstein, Bernd et al, Kang Youwei's "Eingabe der prüfungskandidaten"
—ein document der reformbewegung. 1 teil (Kang Youwei's Candidates'
memorial, a document of the reform movement. Part 1) Oriens Extremus
(West Germany) 1980 Vol.27 No. 1 p.33-54

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一项改良运动的文件 埃伯施蒂因

Felber, Roland, Charakter und bedeutun der Xinhai-Revolution 1911 in China.
Zeitschriften Geschichtswiss 1983 No.31 p.233-242

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费尔伯

Hsueh, Chun-tu, New aspect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
tory 1983 Vol.16 No.3/4 p.5-35

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些新问题 薛君度

Huang Yiping, The rol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in promoting national capital-
ist indust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3 Vol.16 No.3/4 p.138-158

辛亥革命对促进民族资本工业所起的作用 黄逸平

Mumford, Richard L., Crane Brinton's patter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81 Vol.42 No.4 p.707-722

克兰·布林顿的模式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芒福德

Rosenbaum, Arthur, The railway controversy of 1911, the bureaucratic pers-
pective. Bulletin Institution Modern History, Academy Sinica 1982 No. 1
p.315-46

1911年路权争论：官僚政治透视 罗森鲍姆

Maimone, Daniela, L'applicazione delle leggi penali in Cina prima della rivolu-
zione del 1911(The application of the penal laws in China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Mondo Cinese (Italy) 1981 Vol.9 No. 3 p.45-61

辛亥革命前中国刑法的应用 梅莫纳

Huo, Warren,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founding date of the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Issue and Studies(Taipei)1982 No.18 p.15-33

中国共产党成立日期的再探讨 郭化伦（音）

Marks, Robert B., Class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in a
south China county. Bulletin ana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1983 Vol. 15.
No. 1 p.36-49

东南某县农村中的阶级关系与革命的起源 马克斯

Radtke, K.W., De oorlog tegen Japan en de burgeroorlog(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the class war.) Spiegel Hist. (Netherlands) 1981 Vol.16 No. 6
p. 341-349

抗日战争与阶级斗争 雷德克

Gilpin, Donald G. & Etter, Charles., Staying on, Japanese soldiers in China,
1945-1949.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No. 42 p.497-518

1945—1949年继续停留中国的日本士兵 吉林、埃特

Yin Ching-yao, The bitter struggle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CP. Asian
Survey 1981 Vol.21 No.6 p. 622-631

国共两党的苦斗 殷京尧（音）

Zurnderfer, Harriet T., Het vooroorlogs politiek bestel, Het nationalistisch regime en zijn tegenstanders (The prewar political system,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its opponents). Spiegel Hist. (Netherlands) 1981 Vol.16 No.6 p.330-335

战前的政治体系：国民党政权及其反对者 曾德费尔

Leung, Edwin Pak-wah, The Quasi-war in East Asia, Japan's expedition to Taiwan and the Ryukyu controversy.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Vol. 17 Part 2 p.257-281

东亚的准战争：日本出征台湾和琉球争端 梁伯华（音）

Hsiao, Frank S. T. & Sullivan, Lawrence R.,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1931.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 42 No. 2 p. 269-289

台湾共产党政治史1928—1931 肖（音）、沙利文

Lucas, Christopher J.,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1982 No. 14 p.211-26

台湾民族发展的政略与教育问题 卢卡斯

Otness, Harold M., Taiwan in pre-world war II guidebooks. Asian Cultural Quarterly 1982 No. 10 p.70-79

二次战前台湾指南 奥特内斯

Baker, Hugh D.R.,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 95 p.469-479

城市生活：“香港人”的出现 裴达礼

Dicks, Anthony, Treaty grant usage or sufferance?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427-455

是条约让与惯例，还是出于宽容？香港地位的某些法律方面 迪克斯

Hook, Brian,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491-511

香港政府，传统范围内的改变 胡克

Howe, Christopher, Growth, public policy and Hong Kong's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 512-533

香港的发展，公共政策和对华经济关系 豪

Lau, Siu-kai, The government, 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s, and grass-roots politics in Hong Kong. Asian Survey 1981 Vol.21 No.8 p.865-884

香港的政府、居间组织和基层的政治策略 刘兆佳

Miners, N.J.,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pium monopoly, 1914-41. Journal of Imperial Commonwealth History 1983 No.11 p.275-299

香港政府的鸦片专卖，1914—1941 迈因纳

Ng Lun, Ngai-ha, The role of Hong kong educated Chinese in the shaping of moder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Vol.17 No.1 p.137-163

在香港受过教育的华人对近代中国形成所起的作用 吴伦霓霞

Pye, Lucian W.,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456-468

香港的国际地位 派伊

- Watson, James L., Rural society,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480-490
农业社会：香港的新界 沃森
- Shaffer, Lynda Norene,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mments on two articles, *Modern China* 1983 Vol.9 No.4 p. 455-464
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两篇文章的评论 谢弗
- Hershatter, Gail, Flying hammers, walking chisels, the workers of Santiaoshi. *Modern China* 1983 Vol.9 No.4 p.387-419
抡锤运凿：三条石的工人们 赫沙特
- Yip, Ka-che, Student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Canadian Review of Studies Nationalism* 1982 No.9 p.247-261
民国时期学生的民族主义，1912—1949 叶嘉彻（音）
- Beahan, Charlotte L., In the public eye, wome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istorical Reflections* 1981 Vol.8 No.3 p.215-238
公众心目中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妇女 比翰
- Drucker, Alison 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women on 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 1840-1911. *Historical Reflections* 1981 Vol.8 No.3 p.179-199
西方妇女对反缠足运动的影响，1840—1911年 德鲁克
- Honig, Emily, The contract labor system and women workers, preliberation cotton mills of Shanghai. *Modern China* 1983 Vol.9 No.4 p.421-454
合同工制度和女工，解放前上海的棉纺厂 霍尼格
- Rong Tiesheng,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3 Vol.16 No.3/4 p.159-200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妇女运动 荣铁生
- Stranahan, Patricia, Labor heroines of Yan'an. *Modern China* 1983 Vol.9 No. p.228-252
延安的妇女劳动英雄 斯特拉纳汉
- Pauw, Alan Donald, Chinese democratic parties as a mass organization. *Asian Affairs* 1981 Vol.8 No.6 p.372-390
作为群众团体的中国民主党派 鲍（音）
- Armentrout-Ma, Eve., Urban Chinese at the Sinitic Frontier,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United States' Chinatowns, 1849-1898.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Vol.17 No.1 p.107-35
城市华人聚居区的中国人，1849—1898年美国唐人街的社会组织 阿门特劳特——马
- Hune, Shirley, Politics of Chinese exclusion, legislative executive conflict, 1876-82. *Amerasia* 1982 No.9 p.5-28
排华政论：立法行政的冲突，1876—82 胡恩
- Woon, Yuen-fong, The voluntary sojourner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myth or reality?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56 No.4 p.673-90
华侨中的自愿寄居者：神话，还是事实？ 吴越芳（音）
- Wunder, John R., The Chinese and the court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Justice denie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 52 No.2 p.191-211
华人和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法庭：公正被否定了吗？ 旺德

三、经济

- Hernandez, Roberto, *El comercio extriorde China hasta 1948* (China's foreign trade until 1948). *Estudios de Asia y Africa Mexico* 1919 Vol. 14 No.1 p.1-44
1948年前中国对外贸易 赫南德兹
- So, Alvin Yiu-Cheong, *Foreign capitalism and Chinese rural industry, a re-examination of the destruction thesis*. *Asian Profile* (Hong Kong) 1981 Vol.9 No.6 p.477-489
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农村工业, 破坏论的再考察 苏优中 (音)
- Chao, Kang, *New date on land ownership patterns in Ming-Ch'ing China, a research not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1 Vol.40 No.4 p.719-734
中国明、清土地所有权形式新资料, 研究笔记 赵康
- Rowe, William T., *Hu Lin-i's reform of 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in Hupeh, 1855-1858*. *Ch'ing-shih Wen-t'i* 1983 Vol.4 No.10 p.33-86
胡林翼对湖北漕粮制度的改革, 1855—1858 罗
- Haviland, E.K., *Early steam navigation in China, The Yangtze River, 1861-1867*. *American Neptune* 1983 No.43 p.85-128
长江早期汽轮航运, 1861—1867 哈维兰
- Chiang, Tao-chang, *The salt trade in Ch'ing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Vol.17 Part 2 p.197-219
清代的盐政 蒋陶章 (音)
- Liu Yung-ch'eng, *The handicraft guilds in Soochow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1-2 Vol.15 No.1-2 p.113-168
清代苏州手工业行会 刘永成
- Will, Pierre-Etienne, *Le stockage public des grains en Chine a l'epoque des Q'ing (1644-1911)*. *Annales of Social Economic & Civilization* 1983 No.38 p.259-278
清代的义仓 1644—1911 威尔
- Lee-Whitman, Leanna., *The silk trade, Chinese silks and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interthur Protfolio* 1982 Vol.17 No.1 p.21-41
丝绸贸易: 中国丝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 李一惠特曼
- So, Alvin Yiu-Cheong, *Development inside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a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silk industry*. *Journal of Asian Culture* 1981 No.5 p.33-56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发展, 中日丝绸业研究 苏优中 (音)
- Li, Lillian M., *Silks by sea, trade,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Japan*. *Business Historical Review* 1982 No.56 p.192-217
海上丝路, 中日两国的贸易、工艺和企业 李莉莲 (音)
- Brown, Shannon R. & Wright, Tim,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al-mining industry, 1850-189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al History* 1981 Vol.18 No.1 p.60-83
中国采煤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经济与政治策略, 1850—1895 布朗、赖特
- Gregor, A. James & Chang, Maria Hsia, *Essays on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

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Occasional paper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1983 No.1 p.1-54

孙逸仙和台湾的经济发展 格雷戈尔、张夏玛丽(音)

Leung, C.K., Railway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aspir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Thought & Society 1981 Vol.6 No.17-18 p.178-192

民国时期的铁路发展与民族热望 梁志强

Davis, Clarence, Financing imperialism, British and American Bankers as vec-
tors of imperial expansion in China, 1880-1920. Business Historical Re-
view 1982 No.56 p.236-264

以金融支持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在华扩张媒介的英美银行家,1880—1920 戴维斯
Pugach, Noel H., Keeping an idea aliv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o-Ameri-
can Bank, 1910-1920. Business Historical Review 1982 No.56 p.265-293

旧意常新,中美银行的建立,1910—1920 帕格奇

Polachek, James M.,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 1928-193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805-829

江西苏维埃的精神经济,1928—1934 波拉切克

Anbert, Claude et al., Entraide spontanee, entraide provquee en Chine rurale,
l'intervention communiste (1943-44). Annales 1982 No.37 p.407-43

1943—1944年中国农村从自发的互助到号召互助,共产党的干与 奥贝尔

四、文化

Kondrek, Gregory Louis,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1921-1925. Asian Forum 1981 Vol.10 No.3 p.27-46

1921—1935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发展 康德里克

Arndt, Andreas, The synthe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 Ma
Tse-tung's theory of dialectic.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Netherlands)
1981 Vol.22 No.3 p.196-206

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中中西哲学的综合 阿恩特

Rubinstein, Murray A., Propagating the democratic gospel, Western mission-
ar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thought in China, 1830-1848. Bulletin
Institution Modern History, Academy Sinica, 1982 No.11 p.251-72

传播民主的福音:西方传教士与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830—1848年 鲁宾斯坦

Bradshaw, Sister Sue, Religious women in China, an understanding of indige-
nization.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1982 No.68 p.28-45

在华信教妇女,教会本地化的一种理解 布雷德肖

Bays, Daniel H., Popular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des et Historia 1983 No.15 p.24-38

十九世纪美国和中国民众的宗教运动 贝斯

Hayhoe, Ruth, Towards the forging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ethos, Zhendan and
Fudan, 1903-1919.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4 p.323-341

中国大学的民族精神经受锻炼,1903—1919年的震旦和复旦 海豪

Kelly, D.A., Nietzsche in China, influence and affinit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1983 No.27 p.143-172

尼采对中国的影响和吸引力 凯利

Fogel, Joshua A. ed. & tr., Naito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3 Vol.17 No.1 p.3-131

内藤湖南和中国历史上现代概念的发展 福格

Namiki Yorihisa, Japanese studies of post-opium war China, 1980. tr. by Joshua A. Fogel. *Ch'ing-shih Wen-t'i* 1983 Vol.4 No.9 p.47-76

1980年日本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研究 井木赖寿 (音)

Shimizu Minoru, Japanese studies of post-opium war China, 1981. translated by Joshua A. Fogel. *Ch'ing-shih Wen-t'i* 1983 Vol.4 No.10 p.111-139

1981年日本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研究 清水稔 (音)、福格译

Asai Motoi, Ming-Ch'ing studies in Japan, 1981. tr. by Joshua Fogel. *Ch'ing shih Wen-t'i* 1983 Vol.4 No.9 p.77-102

1981年日本对明清史的研究 浅井纪 (音) 福格译

五、外交

Chevrier, Yves., Le vent d'ouest. la revolution Chinoise et l'occident. *Cultures et Developpement*(Belgium) 1981 Vol.13 No.1-2 p.173-181

西风, 中国革命和西方 舍弗里埃

Waterfall, D.E., China, modernization and the west. *Queen's Quarterly* 1981 Vol.88 No.2 p. 279-288

中国现代化与西方 沃特福尔

Brown, David G.,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82 No. 1 p.25-56

中外合资经营: 当代发展与历史透视 布朗

Kehoe, Barbara B., William Patterson Jones, American consul to China, 1862-1868. *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1980 Vol.73 No.1 p.45-52

威廉·帕特森·琼斯, 1862—1868年美国驻华领事 基欧

Behrsing, Siegfried, Ein zeitgenössischer diplomat zur Binchunreise 1866 (A contemporaneous diplomat to the Binchun Mission in 1866). *Arch. Orientalni* (Czechoslovakia) 1981 Vol.49 No.3 p.245-254

1866年同斌椿使团同时代的一个外交官 贝尔辛

Capie, Susan A. James B., Angell, Minister to China, 1880-1881; his mission and the Chinese desire for equal treaty rights. *Bulletin Institute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82 No.11 p. 273-314

1880—1881年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的使命和中国对平等条约权利的愿望 卡皮

Malukhin, A., US diplomacy's manoeuvres in China late in the 1940s. *Far Eastern Affairs* 1983 No.4 p.87-98

1940年代末美国在华的外交策略 马洛兴

- DeBenedetti, Charles, The American peace movement and Asia, 1941—1961.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1 vol.50 No.2 p.192-214
- 美国的和平运动与亚洲1941—1961 德贝内德蒂
- Addy, Premen, Imperial prophet or scaremonger? Curzon's Tibetan policy reconsidered.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I p.54-67
- 帝国的预言家, 还是骇人听闻的谣言制造者, 关于寇松对西藏政策的再探讨 艾迪
- Lodwick, Kathleen L., The role of British officials in China in ending the opium trade from India, 1907-1915. Asian Profile (Hong Kong) 1979 Vol.7 No.5 p.431-441
- 英国在华官员对结束来自印度的鸦片贸易所起的作用1907—1915 洛德威克
- Fung, Edmund S.K., The Sino-British reproachment, 1927-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No.17 p.79-105
- 中英和解, 1927—1931 冯兆基
- Sahu, A.C., Genesis and growth of Indo-Chinese opium monopoly under East India Company.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1979 Vol.57 No.1 p.163-169
- 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印——中鸦片垄断的起源与发展 萨胡
- Vertzberger, Yaacov., India's border conflict with China, a perceptual analysi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82 No.17 p.607-32
- 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冲突 弗茨伯格

六、传记、回忆录

- Woodside, Alexander, Some Mid-Qing theorists of popular schools, their innovations, inhibi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Modern China 1983 Vol.9 No.1 p.3-36
- 清代中叶几位著名学派的理论家, 他们的革新、受压抑和对贫民的态度 伍德赛德
- Whitbeck, Judith, Kung Tzu-chen and the redirection of literati commitment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Ch'ing-shih Wen-t'i 1983 Vol.4 No.10 p.1-32
- 龚自珍和十九世纪初文人禁锢状态的改变 惠特贝克
- Pruden, George B., Jr., Issachar J. Roberts, a southern Missionary pioneer in China. Proceeding of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81 P.28-55
- 在中国传教的先驱者罗孝全 (小) 普鲁登
- Perry, Elizabeth J., Social banditry revisited, the case of Bai Lang, a Chinese brigand. Modern China 1983 No.3 p.355-382
- 白朗个案, 重访社会盗匪活动地 佩里
- Chan, F. Gilbert,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in transition, Sun Yat-sen and his comrades, 1905-1925. Asian Profile (Hong Kong) 1980 Vol. 8 No. 1 p.11-24
- 转变期的革命领导权: 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 1909—1925 陈福霖
- Hsueh, Chun-tu, An essay on Huang Hsing, with a commentar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983 Vol.16 No.3/4 p.36-77

论黄兴, 兼评辛亥革命 薛君度

Chan, F. Gilbert; Liao Chung-k'ai and the labor movement in Kwang-tung, 1924-1925.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1981 No.10 p.433-455

廖仲恺与广东工运, 1924—1925 陈福霖

Richter, Harald; Chen Wangdao, Ein abriß seines lebens und werkes. Oriens Extremus(West Germany) 1980 Vol.27 No.1 p.61-72

陈望道生平要略 里克特

Rylander, R. Lynn; Mao as a Clausewitzian strategist. Military Review 1981 Vol.61 No.8 p.13-21

毛泽东——克劳赛维茨式的战略家 赖兰德

Goldstein, Steven M.; Zhou Enlai and China's revolution. a selective view.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6 p.720-730

周恩来和中国革命 戈尔斯坦

Yuriev, M.; Lin Boqu, an outstanding Chinese revolutionary. Far Eastern Affairs 1983 No.2 p.130-138

林伯渠, 一个杰出的中国革命者 尤里耶夫

Roper, Myra; -The re-education of Pu Jie, from Emperor's China to People's China. Eastern Horizon (Hong Kong) 1981 Vol.20 No.4 p.32-38

溥杰的再教育: 从中华帝国到人民中国 罗泊

七、资料、工具书及其他

Coates, P.D.; Documents in Chinese from the Chinese Secretary's Office, British Legation, Peking, 1861-1939. Modern Asian Studies 1983 Vol. 17 Part 2 p.239-255

1861—1939年北京英国公使馆汉文正使保存的中文文件 科茨

Nornang, N.L. & Epstein, 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the Anglo-Tibetan war of 1888. The Journal of the Tibet Society 1982 Vol.2 p.77-104

关于1888年英、藏战争的往来函札 诺南、爱泼斯坦

八、书评

Fairbank, J.K. & Liu Kwang-ching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 Late Ch'ing. Part 2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0 754p.

Rev.by Rowe, William T.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3 p.167-168

剑桥中国史, 卷11, 晚清, 第二部分 费正清 刘广京合编 书评者 罗

Clarke, Prescott & Gregory, J.S. eds.;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2 454p.

Rev. by Weiss, Robert 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Vol.43 No.2 p.311-312

西方关于太平军的报道文件选编 克拉克 格雷戈里合编 书评者 韦斯

Kamachi, Noriko;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Harvard Univ. Press, 1981 384p.

Rev. by Bastid, Mariann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4 p.379-381

中国的改革,黄遵宪与日本范例 蒲地式子 书评者 巴斯蒂

Munemitsu, Mutsu, Kenkenroku: A diplomatic record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95.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erger, Gordon Mark. Tokyo, Univ. of Tokyo Press, 1982 311p.

Wilson, Dick: When tigers fight, 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London, Hutchinson, 1982 269p.

Rev. by Drew, W.J. Asian Affairs 1983 Vol. 14 Part 1 p.105-7

Rev. by Nish, Ia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561

蹇蹇录:中日甲午战争外交记录 陆奥宗光 伯杰译

两虎相斗, 1937—1945年中日战争史话 威尔逊 书评者 德鲁、尼什

Schoppa, R. Keith: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82 280p.

Rev. by Rankin, Mary Backu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3 p.733

Rev. by Fincher, John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1 p.125-7

Rev. by Rawski, Evelyn 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 940-1

Rev. by Rowe, William T.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3 Vol. 17 p.195-197

Rev. by Cotton, James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1 p.98-100

中国社会名流与政治变迁, 二十世纪的浙江省 斯各珀 书评者 兰金 傅因彻 罗斯基 罗 科顿

Fincher, John H.: Chinese democracy: 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in local, provincial and national politics, 1905-1914. N.Y., St. Martin's Pr., 1981 276p.

Rev. by Cohen, Paul 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2 p.386-7

Rev. by Bastid, Marianne Pacific Affairs, 1983-4 Vol. 56 No.4 p.726-7

中国的民主: 地方、省和国家政治中的自治运动1905—1914 傅因彻 书评者 孔宝荣 巴斯蒂

Spence, Jonathon D.: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London, Faber & Faber 1982 461p.

Rev. by Candlin, Enid Saunders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1 p.96-7

天安门, 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 1895—1980 斯彭斯 书评者 坎德林

Summerskill, Michae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Britain's Chinese work-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Summerskill, 1982 236p.

Rev. by L.H.L.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III p.338-9

中国在西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的华工 萨默斯基尔 书评者 L. H. L.

Lubot, Eugene: 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 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2 192p.

Rev. by Fairbank, John K.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 96 p.738-740

Rev. by Geisert, Bra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4 p.1045-46

Rev. by Grieder, Jerome B.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56 No.4 p. 723-9

不自由时代的自由主义, 中华民国新文化的自由主义者, 1919—1937 卢博特 书评者
费正清 盖塞特 格里德

Rigby, Richard W.: The May 30 movement. events and theme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0 271p.

Rev. by Coble, Parks M.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2 p.318-320

Rev. by Roux, Ala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562

五卅运动 里格比 书评者 科布尔 鲁

Bedeski, Robert E.: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 of California, 1981 181p.

Rev. by Sheridan, James 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2 p.450-1

近代中国的建国工作: 战前时期的国民党 贝德斯基 书评者 谢里登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
llapse, 1937-45. Univ. Michigan Press, 1982 309p.

Rev. by Sheridan, James E.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1 p.127-9

1937—45年抗战中的国民党中国: 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崩溃 齐锡生

Brugger, Bill: China, lib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42-1962.

Barnes & Noble Books, 1981 288p.

Rev. by Berkeley Gerald W.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3 Vol.17 p.197-
198

中国, 解放和改造, 1942—1962 布鲁格 书评者 伯克利

Fung, Edmund S.K.: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us-
tralian National Univ. Pr., 1980 349p.

Rev. by: Funnell, Victor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1 p.93-4

中国革命中军事的重要性 冯兆基 书评者 芬内尔

Jencks, Harlan W.: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322p.

Rev. by Whitson William W.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2 p.322-324

Rev. by Esposito, Bru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3
p.621-2

从旧式步枪到导弹, 1945—1981年间中国军队里的政治挂帅派和职业军人派 詹克斯
书评者 惠特森 埃斯波西托

Chan, Anthony B.: Arming the Chinese: the Western armaments trade in
Warlord China, 1920-1928.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2 180p.

Rev. by Sheridan, Jam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Vol. 43 No.2
p.306-308

Rev. by Kennedy, Thomas L.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3 p.524-525

武装中国人, 西方在军阀中国的军火贸易 陈(音) 书评者 谢里登 肯尼迪

Eberhard, Wolfram: China's minorities: yesterday and today. California, Wa-

dsworth, 1982 176p.

Rev. by Dreyer, June Teufe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Vol. 43
No.2 p.314

中国少数民族今昔 埃伯哈德 书评者 德雷尔

Jones, Susan Mann, Tsou, Tang ed.: Select papers from the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NO.3, No.4;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 Univ. of Chicago. 1979 286p.
Rev. by Falkenheim, Victor C.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 42
No.4 p.927-32

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 1850年迄今中国地方一级政治领导和社会变迁, 第
三卷 琼斯编 第四卷 邹谠编 书评者 福尔肯海姆

Chang, Luke T.: China's boundary treaties and frontier disputes. London,
Rome, New York, Oceana Pub., 1982 443p.

Rev. by Maxwell, Neville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6 p.743

中国边界条约及边境争端 张(音) 书评者 马克斯威尔

Samuels, Marwyn S.: Contest for the China Sea. London, Methuen & Co., 198
203p.

Rev. by Draycott, Kathleen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1 p.101-2

Rev. by Duncanson, Dennis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4 p.368-369

中国南海地区的争议 塞缪尔斯 书评者 德雷科特 邓肯森

Chand, Attar: Tibet, past and present, a select bibliography with chronology
of historical events 1660-1981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Privat.
Ltd., 1982. 257p.

Rev. by Szerb, Janos The Journal of the Tibet Society 1982 Vol.2 p.114115

西藏的过去和现在选目, 附1660—1981大事记 钱德 书评者 塞布

Michael, Franz: Rule by incarnation: Tibetan Buddhism and its role in soci-
ety and sta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277p.

932-33

Rev. by Houston, G.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932-33

Rev. by Skorupski, Tadeusz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1 p.144-6

Rev. Wylie, Turrell V.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
2 p.453-454

活佛统治, 西藏的佛教及其对社会和国家所起的作用 梅谷 书评者 豪斯顿 斯科
鲁普斯基 怀利

Knapp, Ronald G.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
graphy of Taiwan. Honolulu, The Univ. Pr. of Hawaii, 1980 287p.

Rev. by Hanson, Jayde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3 Vol.17 p.200-201

中国的海岛边疆: 台湾历史地理研究 纳普 书评者 汉森

Ong, Ioh tek (Wang Yude): Taiwan, a history of anguish and struggle. Tokyo,
Taiwan Qingniar She, 1979 258p.

- Rev. by Chen Fu-mei Chang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4 p.370-372
 台湾的苦难及其斗争史 王玉德 (音) 书评者 陈张富美
- Ride, Edwin: BAAG, British Army Aid Group,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Hong Kong, Oxford Univ. Pr., 1981 347p.
- Rev. by Epstein, Israel & Elsi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935-36
- Rev. by Sedgwick, P.C.M. *China Quarterly* 1983 No. 94 p.376-377
- 英军服务团:1942—1945年香港的抵抗 里德 书评者 爱泼斯坦 塞奇威克
- Irick, Robert L.: 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 1847-1878.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 452p.
- Rev. by Fay, Peter War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3 p.732-3
- 清政府对苦力贸易的政策1847—1878 艾里克 书评者 费伊
- Mak Lau Fo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 1981 178p.*
- Rev. by Kaiser, Gregory J.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56 No.4 p.784-5
- 秘密会社社会学,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上的华人秘密会社研究 马 (音) 书评者 凯译
- Omohundro, John T.: Chinese merchant, families: in Iloilo, commerce and kin in a central Philippine City. Metro Manila, Atenco de Menila Univ. Press. 1981 206p.
- Rev. by Dannhaeuser, Norbert *China Quarterly* 1983 No. 93 p.170-171
- 在怡朗的华裔家族, 菲律宾中部城市华裔的商业和亲属关系 奥穆亨德罗 书评者丹内索
- Chin, John M.: *The Sarawak Chines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 Press, 1981 158p.
- Rev. by King, Victor T.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983 Vol.46 Part 1 p.183-4
- 沙撈越的华人 金约翰 (音) 书评者 金·维克多 (音)
- Knoll, Tricia: *Becoming Americans: Asian sojourners,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Portland, Oregon, Coast to Coast Books, 1982 356p.
- Rev. by Thompson, Richard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6 p.746-747
- 成为美国人: 在美国西部的亚洲暂居者、移民和难民 诺尔 书评者 汤普森
- Richardson, Peter: *Chinese mine labour in the Transvaal*. London, Macmillan, Humanities Press, 1982 287p.
- Rev. by Kubicek, Rober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4 p.1041
- 中国矿工在 (南非) 德兰士瓦 理查森 书评者 库比塞克
- Wu, David Y.H.: *The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 1880-198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 Pr., 1982 176p.

Rev. by Leo Syrtadina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3 p.601-602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人,1880—1980 吴燕和 书评者 利奥

Rozman, Gilbert 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settlements in Ch'ing China. Studies in aggregate data from North Chin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 154p.

Rev. by Schoppa, Keit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938-40

清代人口与市场,华北地区综合资料研究 罗兹曼 书评者 斯各珀

Ch'en, Jerome: State economic policies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1840-1895. New York, Garland, 1980 216p.

Rev. by Chan, Wellington, K.K.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3 p.731-2

清政府的国家经济政策,1840—1895 陈志让 书评者 陈锦江

Li, Lillian Ming-tse: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97, Harvard Univ. 1981 288p.

Rev. by Ash, R.F.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983 Vol.46 Part 1 p.180-181

中国丝织品贸易,近代世界的传统工业,1842—1937 李莉莲 书评者 阿什

Godley, Michael R.: The Mandarin-capitalists from Nanyang: overseas Chinese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893-1911.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1 222p.

Rev. by Chan, Wellington K.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 42 No.4 p.920-922

Rev. by Hou, Chi-mi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4 p.1043-44

Rev. by Bergere, M.C.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3 p.163-165

南洋官僚资本家,1893—1911年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华侨经营的企业 戈德利 书评者 陈锦江 侯纪明 白吉尔

Wiens, Thomas B.: The microeconomic of peasant economy: China, 1920-40. New York, Garland Pub., 1982 512p.

Rev. by Brandt, Loren L.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3 p.161-162

中国农民的微观经济学,1920—1940 威恩斯 书评者 布兰特

Howe, Christopher ed.: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 1981 444p.

Rev. by Lieberthal, Kenneth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2 p.38-90

上海,一个亚洲大都市的革命与发展 豪 书评者 利伯瑟

Gregor, A. James with others: Ideology and development, Sun Yat-sen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aiwa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2 107p.

Rev. by Lin, Ching-yuan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 56 No.2 p.330-332

意识形态和发展, 孙中山和台湾经济史 格雷戈尔 书评者 林清园

Gernet, Jacques: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 by J.R. Foster.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 772p.

Rev. by Bodde, Derk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3 p.519-521

中国文化史 谢和耐

书评者 卜德

Bodde, Derk: Essay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Edited & introduced by Blanc, Charles Le & Borei, Dorot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1 454p.

Rev. by Grafflin, Denni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 2 p.377-8

中国文化论文集 卜德 书评者 格拉弗林

Miyazaki, Ichisada: China's examination hell: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of Imperial China. tr. by Conrad Schirokauer. Yale Univ. Press, 1981 144p.

Rev. by Dennerline Jer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3 Vol.17 p.192-3

中国地狱式考试: 中华帝国文官考试 官崎市定 希洛考尔译自日文 书评者 登纳林

Belde, Klaus: Saomang: Kommunistische alphabetisierung-sarbeitsarbeit im landlichen China vom Jiangxi-Sowjet bis zum ende des grossen sprungs nach vorn (1933-1960). Bochum, Brockmeyer, 1982 385p.

Rev. by Staiger, Brunhild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557

扫盲, 从江西苏维埃地区到大跃进年代中国农村的文化普及工作 贝尔德 书评者 施泰格

Kao, George ed.: The translation of things past: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Hong Kong, Chinese Univ. Pr., 1982 200p.

Rev. by Grunsfeld, A. To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 42 No.3 p.622-3

对过去事情的解释: 中国历史和编史学 高乔治(音) 书评者 格伦斯菲尔德

Gernet, Jacques: 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eaction. Paris, Gallmard, 1982 342p.

Rev. by Fay, Peter War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919-920

中国和基督教: 作用和反作用 谢和耐 书评者 费伊

Buck, Peter: American science and modern China, 1876-1936.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0 283p.

Rev. by Brown, Shannon R.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3 p.523-524

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 1876—1936 巴克 书评者 布朗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1884-1899. Vol.1-2 The Univ. Presses of Florida, 1982 984p.

Rev. by Whiting, Allen 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83 Vol.17.p.201-203

Rev. by Ikle, Frank 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5 p.1306-7

尔许我虞: 1884—1899年在朝鲜和满洲的国际对抗 伦森

书评者 惠廷 伊克莱

Thomson, James C., Jr. & others: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1 323p.

Rev. by Cohen, Warren I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1 p. 116-7

Rev. by Alstyne, Richard W. Va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52 No.2 p.240-241

感情用事的帝国主义者, 美国人在东亚的经历 (小)汤姆森 书评者 科恩 阿尔斯泰因

Hunt, Michael H.: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83 416p.

Rev. by O'Connor, Raymond G.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 56 No.4 p.727-8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 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 亨特 书评者 奥康纳

Chern, Kenneth S.: Dilemma in China: America's policy debate, 1945. Hamden, Archon Books, 1980 277p.

Rev. by George, Brian 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52 No.1 p.137-8

在华进退两难, 1945年美国对华政策争论 彻恩 书评者 乔治

Lowrence, James J.: Organized business and the myth of the China market. 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1898-1937.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81 112p.

Rev. by Wei William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52 No.2 p.237-238

有组织的商业和中国市场的神话 美国亚洲协会史, 1898—1937 劳伦斯 书评者 魏威廉 (音)

Stueck, William Whitney,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326p.

Rev. by Tucker, Nancy Bernkopf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 52 No.1 p.138-9

走向对抗的道路, 1947—1950年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 (小)斯塔克 书评者 塔克

Chudodetev, Yu. V. ed.: Soviet volunteers in China, 1925-1945.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0 320p.

Rev. by Levine, Steven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 3 p.644-6

苏联志愿军在中国, 1925—1945 丘多杰耶夫 书评者 莱文

Rees, David: Soviet border problems,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1982 30p.

Rev. by Conolly, Violet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II p.222-223

苏联、中国和日本的边界问题 里斯 书评者 康诺利

Yu, Wen-tang: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von 1860-1880. Bochum,

- Studien Verlag Brockmeyer, 1981 327p.
- Rev. by Kirby, William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4 p.382-383
- 1860—1880年中德关系 于文唐 (音) 书评者 柯尔比
-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f Oxford Univ. 1982 445p.
- Rev. by Weinberg, Gerhard L.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88 No.2 p.421
- Rev. by Nish, Ian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4 p.381-2
- 德国和远东危机1931—1938 福克斯 书评者 温伯格 尼什
- Newell, William H. ed.: *Japan in Asia, 1942-1945.*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23p.
- Rev. by McCoy, Alfred W.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Vol.43 No.2 p.370-371
- 在亚洲的日本,1942—1945 纽厄尔 书评者 麦科伊
- Gupta, Calcutta: *Spotlight on Sino-Indian frontiers.* Calcutta, 1982.
- Rev. by Das, Naranarayan *China Report* 1983 Vol.19 No.6 p.46-47
- 举世瞩目的中印边界问题 古普塔 书评者 达斯
- Mehra, Parshotam ed.: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 Vol.2 1914-54. Delhi, Oxford Univ. Press, 1982 192p.
- Rev. by Yapp, M.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 of London*, 1983 Vol.46 Part 3 p.573
- 东北边界, 印度、西藏和中国边界争端文献研究, 卷二, 1941—1954 梅赫拉编 书评者 亚普
- Kindermann, Gottfried-Karl ed.: *Sun Yat-sen, founder and symbol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Nation-Building.* Munich, Gunter Olzog Verlag GmbH., 1982 Ost-West-Synthesen Vol.1 332p.
- Rev. by Wilbur, C. Martin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 96 p.737-738
- 孙逸仙: 中国革命建国的创始人和象征 金德曼 书评者 韦慕庭
- Hu Chi-hsi: *L'Armee rouge et L'Ascension de Mao. essai d'interpretation sur la montee au pouvoir de Mao Zedong au sein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Paris, E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2 272p.
- Rev. by Lary, Diana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3 p.529-531
- 红军与毛泽东地位的晋升 胡继熙 书评者 拉瑞
- Shaffer, Lynda: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N.Y., & London, M.E.Sharpe, 1982 251p.
- Rev. by Bianco, Lucien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56 No.4 p.729-31
- 毛泽东和工人, 1920年至1923年湖南工人运动 谢弗 书评者 毕仰高
- Goldstein, Steven M.: *Zhou En-lai and China's revolution: a selective view: 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6 p.721-730

周恩来和中国革命, 评周恩来选集第一卷 戈德斯坦

Furuya, Keiji: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abridged and tr. by Chang Chun-ming. New York, St. John's Univ. 1981 978p.

Rev. by Rhoads, Edwar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916-917

蒋介石生平 张纯明根据古屋奎二主编的《蒋介石秘录》节略 书评者 罗兹

Chu, Pao-chin: V.K. Wellington Koo: 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 1912-1966.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1p.

Rev. by Lautz, Terrill 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3 p.614-615

✓ 顾维钧, 中国的外交官和民族主义外交个案研究, 1912—1966 朱葆璿 书评者 劳茨

Arkush, R. David: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98, 1981 386p.

Rev. by Lubot, Eugen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898-899

费孝通和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阿库什 书评者 卢博特

Huters, Theodore: Qian Zhongshu, Boston, Twayne Pub., 1982 187p.

Rev. by Duke, Michael 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922-923

钱锺书 哈特斯 书评者 达克

Cooley, James C., Jr.: T.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1882. Leiden, E.J.Brill, 1981 160p.

Rev. by Gerson, Jack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3 Vol. 88 No.4 p.1043

威妥玛在中国, 环球外交的先驱, 1842—1882 (小) 库利 书评者 格尔森

Braun, Otto: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1932-1939.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Moore, Jean London, C.Hurst & Co., 1982 278p.

Rev. by Foot, Rosemary Asian Affairs 1983 Vol.14 Part 1 p.97 8

Rev. by Harrison, James P.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 56 No.3 p.525 527

奥托·布劳恩 (李德),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 穆尔译自德文 书评者 富特 哈里森

Ewen, Jean: China nurse, 1932-1939.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1981 162p.

Shephard, A.E. & Levesque, Andree eds.: Norman Bethune, his time and legacy. Ottawa, Canadi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1982 235p.

Rev. by Bertram, James Pacific Affairs 1983 Vol.56 No.1 p.129 131

中国的护理人, 1932—1939, 尤恩

诺尔曼·白求恩生平和传统 谢皮德等二人 书评者 贝特兰

Snow, Lois Wheeler: Edgar Snow's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iled from the writing of Edgar Snow. London, Orbis, 1981 284p.

- Rev. by Lattimore, Owen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3 p.162-163
 斯诺的中国, 斯诺对中国革命的私人记载 惠勒·斯诺 书评者 拉铁摩尔
 Fairbank, John King: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480p.
 Rev. by Gordon, Leonard H.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Vol.42 No.4 p.912-4
 与中国的不懈之缘: 五十年回忆录 费正清 书评者 戈登
 Hollander, Paul: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N.Y., Oxford Univ. Pr., 1981 524p.
 Rev. by Barrett, David P.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56 No.4 p.793-5
 政治上的朝圣: 西方知识分子赴苏联、中国和古巴游记1928—1978 霍兰德 书评者 巴雷特
 Hook, Brian e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China*.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 492p.
 Rev. by Buck, David D.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56 No.4 p.724-5
 剑桥中国百科全书 胡克 书评者 巴克
 Mackerras, Colin: *Modern China, a chronology from 1842 to the presen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han, Rober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2 703p.
 Rev. by Mitchell, Peter M. *Pacific Affairs* 1983-84 Vol.56 No.4 p.725-6
 Rev. Wright, Elizabeth *The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5 p.566-567
 近代中国年表, 1842年至今 麦克勒斯 书评者 米切尔 赖特
 Teng, Ssu-yu: *Protest and crime in China, a bibliography of secret associations, popular uprisings, peasant rebellions*. New York, Garland Pub., 1981 455p.
 Rev. by Curwen, C.A. *China Quarterly* 1983 No.93 p.166
 中国的抗议与犯罪: 关于秘密会社、民众暴动和农民起义书目 邓嗣禹·书评者 柯温

著 作

一、总论、通史

- Buchanan, Keith & others: *China*. N.Y., Crown, 1981 519p.
 中国 布坎南等
 Fossati, G.: *Chine, trad. de l'Italien*. Paris, Nathan, 1993 192p.
 中国 福赛特
 Kapur, Harish: *The Awakening Giant: China's ascension in world politics*. Winchester Mass.: Sijthoff & Noordhoff, 1981 314p.
 觉悟的巨人, 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卡帕
 Boerschmann, Ernst.: *Old China in historic photographs*. Weng, Wan-go, introd. N.Y. Dover, 1982 287p.

历史镜头里的旧中国 博希曼

Muller, David G., Jr.: *China as a maritime power*. Westview Press, 1983 300p.

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中国 马勒

Hsu, Immanuel 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3rd ed. N.Y., Oxford Univ. Pr., 1983 1024p.

近代中国的兴起(第三版) 徐中约

Fairbank, John K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剑桥中国史,卷十二、中华民国,1912—1949 费正清主编

二、政治

Bohr, Paul Richard: *The Politics of eschatology: Hung Hsiu-Ch'uan and the rise of the Taipings, 1837-1853*. Ph.D. 1978 Univ. of California, Davis 420p.

终世论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1837—1853 博尔

Perry, Elizabeth J., ed.: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Nien rebellion*. White Plains, N. Y., Sharpe, 1982 139p.

中国人对捻军起义的观点 佩里编

Leung, Pak-wah Edwin: *China's Quasi-war with Japan: the dispute over the Ryukyu(Liu-Ch'iu) Islands, 1871-1881*. Ph.D. 1978 Univ.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349p.

中日准战争状态,1871—1881年关于琉球群岛的争端 梁伯华(音)

Chere, Lewis Milton: *The diplomacy of the Sino-French war (1883-1885), finding a way out of an unwanted, undeclared war*, Ph. D. 1978 Washington State Univ. 240p.

中法战争的外交,1883—1885 彻里

Leitner, Ralph Augustine, Jr.: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French blockade of Formosa(1884-1885)*. St. John's Univ 239p.

1884—1885年法国人封锁台湾的国际原因 莱特纳

Lensen, George Alexander: *Balance of intrigue,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Korea and Manchuria 1884-1899. I-II*. Th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82 984p.

尔诈我虞,1884—1899年在朝鲜和满洲的国际抗衡 伦森

Spendelow, Howard R., III: *Conflict of authority in south Manchuria: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ussian leasehold, 1898-1900*. Ph.D. 1982 Harvard Univ. 522p.

南满权力的冲突,1898—1900年俄国早期租借地 斯彭德格

Chung, Sue Fawn: *The much maligned Empress Dowager: a revisionist stud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z'u-Hsi in the period 1898 to 1900*. Ph.D. 1975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304p.

备受诋毁的皇太后,对1898—1900年间慈禧太后的再研究 鍾叔范(音)

Ma, Yeh Shiang: *Southeast China during the Boxer movement: A study of Tung-Nan Hu-Pao*. Ph.D. 1976 The American Univ. 339p.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互保的研究 马业祥(音)

- Liao, Sheng-hsiung: The quest for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pioneering phase. Ph.D. 1978 The Florida State Univ. 265p.
- 清末对立宪政体的寻求: 草创时期 廖圣雄 (音)
- Prozniak, Roxann: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rural China: Tax resistance and county-village politics on the Eve of the 1911 revolution. California (Davis), 1981 Ph.D. 378p.
- 中国村社和抗议: 辛亥革命前夜的抗租和乡村政治 普拉兹尼亚克
- Seki, Masaaki: Militarist power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case of Chang Tso-lin. Univ. of Washington, 1982 355p. DAI
- 民初军阀的权力: 张作霖个案 塞基
- Pillsbury, Michael Paul: Environment and power: warlord strategic behavior in Szechwan, Manchuria and the Yang-tze delta. Ph.D. 1980 Columbia Univ. 346p.
- 环境和势力: 四川、东三省和长江三角洲军阀的战略举动 皮尔斯伯里
- Canning, Craig Noel: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hantung during world war I. Ph.D. 1975 Stanford Univ. 303p.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占领山东 坎宁
- Summerskill, Michae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Britain's Chinese work 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M. Summerskill, 1982 230p.
- 中国在西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华人劳动力 萨默斯基尔
- Friesen, Oris Dewayne: Republic to monarchy: the impact of the twenty-one demands crisis on the Yuan Shih-k'ai. Ph.D. 1982 Arizona State Univ. 313p.
- 从共和到专制, 二十一条要求危机对袁世凯的影响 弗里森
- Schwarz, Vera: From renaissance to revolution: an internal his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Ph.D. 1978 Stanford Univ. 328p.
- 从文艺复兴到革命, 五四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诞生的关系史 施瓦茨
- Williamsen, Thomas Marvin: Political training and work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prior to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h.D. 1975 Duke Univ. 279p.
- 北伐前黄埔军校的政治训练和政治工作 威廉森
- Coates, Austin: Whampoa, Ships on the shor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Ltd., Hong kong, 1980 266p.
- 黄埔, 岸边的船 科茨
- Andrews, Carol Corder: The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wards the peasant movement, 1921-1927: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t on social revolution. Ph.D. 1978 Columbia Univ. 481p.
- 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 民族主义对社会革命的影响 安德鲁斯
- Marks, Robert Brian: Peasant society and peasant uprisings in South China: social change in Haifeng county, 1630-1930. Ph.D. 1978 The Univ. of Wisconsin-Madison 635p.
- 华南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起义, 海丰县社会变迁史, 1630—1930 马克斯

- Luk, Michael Yan-Lung: Ideological bolsheviz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28. Univ. of Toronto (Canada) 1982 DAI
- 中国共产党思想体系的布尔什维克化1921—1928 陆延龙 (音)
- Ristaino, Marcia Reynde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7-1928, organizations, strategies and tactics for making revolution. Ph.D. 1977 Georgetown Univ. 262p.
-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7—1928, 革命的战略和战术 里斯泰伊诺
- Averill, Stephen Car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Kiangsi province. Cornell, 1982 Ph.D. 434p.
- 山区革命, 共产主义运动在江西的兴起 艾夫里尔
- Chi, Pingfeng: The Chinese red army and the Kiangsi Soviet. Ph.D. 1977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 246p.
- 中国红军和江西苏维埃 齐斌芬 (音)
- Wei, William: The KMT in Kiangsi: the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bases, 1930-1934. Ph.D. 1978 The Univ. of Michigan 306p.
- 国民党在江西清剿共产党根据地, 1930—1934 韦威廉 (音)
- Butler, W.E. ed.: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1931-1934. New York, Translational Pub., 1983 212p.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制度 巴特勒编
- Carr, W.H.: The twilight of Comintern, 1930-1935.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461p.
- 共产国际的衰微时期, 1930—1935 卡尔
- Liden, David Leroy: Party factionalism and revolutionary vision: cadre training and Mao Tse-tung's effort to consolidate his contr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36-1944. Ph.D. 1978 The Univ. of Michigan 272p.
- 党内派性和革命预见: 干部培养和毛泽东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1936—1944 莱登
- Miller, Joseph Thoma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Trotskyism: the role of a permanent opposition in Communism. Ph.D. 1979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334p.
-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 不断反对共产主义的作用 米勒
- Cochran, Sherman, Hsieh, Andrew C.K. & Cochran, Janis tr. & ed.: One day in China: May 21 1936.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83 290p.
- 中国的一天, 1936年5月21日 科克伦等编译
- Fang, Chin-yen: The Sian Incident: a prelude to the coming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China. Ph.D. 1977 The American Univ. 178p.
- 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的序幕 方清延 (音)
- Yaung, Emily: The impact of the Yalta Agreement on China's domestic politics, 1945-1946. Ph.D. 1979 Kent State Univ. 248p.
- 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内政的冲击 相 (音)
- Gottschang, Thomas Richard: 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 1891-1942. Univ. of Michigan 1982 287 p. DAI

- 从华北向满洲移民：1891—1942年经济史 戈特肖昂
 Lee, Chong-sik: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Manchuria, Chinese Communism and Soviet interest, 1922-1945.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满洲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利益1922—1945 李仲西（音）
 Weland, James Edwin: The Japanese army in Manchuria: covert operations and the roots of Kwantung army insubordination. Ph.D. 1977 The Univ. of Arizona 302p.
- 日本军队在满洲偷偷摸摸的军事演习和关东军桀骜不驯的起源 韦兰
 Egler, David George: Japanese mass organizations in Manchuria, 1928-1945: the ideology of Racial Harmony. Ph.D. 1977 The Univ. of Arizona 354p.
- 日本在满洲的群众组织，1928—1945 埃勒
 Chauncey, Helen Roberta: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radition and radical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China. Stanford, 1982 Ph.D. 330p.
- 教育和社会动员，华中的传统和剧变 昌西
 Geisert, Bradley Kent: Power and society: the Kuomintang and local elites in Kiangsu province, China, 1924-1937. Ph.D. 1979 Univ. of Virginia 360p.
- 权力和社会，1924—1937年国民党和江苏省地方精英 盖泽特
 Chen, Yung-fa Howard: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Volumes I & II) Ph.D. 1980 Stanford Univ. 956p.
- 革命的形成过程，1937—1945年华东、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卷1—2 陈荣发
 Paulson, David Mark: War and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the Shandong base area, 1937-1945. Ph.D. 1982 Stanford Univ. 433p.
- 华北的战争和革命，1937—1945山东根据地 保尔森
 Dorris, Carl Eugene: People's war in north China: resistance in the Shansi-Chahar-Hopeh border region, 1938-1945. Ph.D. 1975 Univ. of Kansas 373p.
- 华北的人民战争，1938—1945年晋察冀边区的抵抗运动 多里斯
 Reynolds, Douglas Robertson: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f wartime China, 1938-1945. Ph.D. 1975 Columbia Univ. 505p.
- 中国工合运动和战时中国政治的极化，1938—1945 雷诺兹
 Woon, Yuen-fong: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outh China, 1911-1949, the case of the Kuan Lineage of K'ai-p'ing county. 1983. The Univ.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华南社会组织，1911—1949，开平县关姓族系个案 吴越芳（音）
 Mehraban, Zahra Shirazi: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colonial Taiwan. Univ of Missouri, Columbia 1980 DAI 206p.
- 台湾殖民地人口增长与经济变迁 梅拉班
 Batkins, Donald Leonard: The changing role of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wo Chinese regions: Hai-nan and T'ai-wan,

- 1895-1975. Ph.D. 1919 Michigan State Univ. 186p.
- 海南岛、台湾两个地区经济发展中政治状况变化莫测的作用, 1895—1975 巴特金斯
Shepherd, John Robert: Plains aborigines and Chinese settlers on the Tiawan
frontier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nford Univ. 1981
525p. DAI
- 十七、八世纪台湾边地的平原本地人与汉族定居者 谢拔德
Chou, Nailene Josephine: Frontier Studies and changing frontier administra-
tion in late Ch'ing China: the case of Sinkiang, 1759-1911. Ph.D. 1976
Univ. of Washington 443p.
- 晚清边疆研究与边政的演变, 1759—1911年新疆个案 周约瑟芬 (音)
Yang, Jane Parish: The evolution of the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from 1920 to 1937. Wisconsin (Madison), 1981 Ph.D. 275p.
- 1920—1937年台湾的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杨潜 (音)
Hsieh, Jih-Chang Chester: Structure and history of a Chinese Community in
Taiwan. Ph.D. 1978 Washington Univ. 336p.
- 台湾岛上汉族团体的组织和历史 谢日昌
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
Press, 1982 205p.
- 香港的社会和政治 刘兆佳
Crisswell, Colin & Watson, Mike: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208p.
- 香港皇家警务处, 1841—1945 克里斯威尔、沃森
Moore, Robert Lloyd: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ization in Hong Kong: patterns
of culture change in an urban setting. Ph.D. 1981 Univ.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73p.
- 香港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一个城市背景文化变迁的样式 穆尔
Sit, Victor Fung-shuen; Wong Siu-lun and Kiang, Tsin-sing: Small scale in-
dustry in a laissez-faire economy, a Hong Kong case study. Hampshire
Gower Publishing Co., 1980 442p.
- 放任主义经济下的小型工业, 香港个案研究 薛、黄、姜 (音) 等
Ikels, Charlotte Frances: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n aging
in Hong Kong. Ph.D. 1978 Univ. of Hawaii 290p.
- 都市化和现代化对香港老化的影响 艾克尔斯
Ehrlich, William David: Hong Kong: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language
diversity. Ph.D. 1982 Columbia Univ. 301p.
- 香港: 经济组织和语言多样化 埃利希
Hayes, J.: Rural Hong Kong. Oxford Univ. Press, 1983 250p.
- 农业的香港 海斯
Guldin, Gregory Elliott: "Overseas" at home: the Fujianese of Hong Kong.
Ph.D. 1977 The Univ. of Wisconsin-Madison. 355p.
- 华侨在老家: 香港的福建人 古丁
• 劳 工 •
Thomas, S.B.: Labor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Univ.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3.

劳工和中国革命 托马斯

Ko, Yiu-chung: The labor movement in north China, 1900-1937. Univ.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1981 225. DAI

华北工人运动, 1900—1937 郭育中 (音)

Hershatter, Gail Brook: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ianjin, 1900-1949(China). Ph.D. 1982 Stanford Univ. 497p.

天津工人阶级的形成, 1900—1949 赫沙特

Honig, Emily: Women cotton mill workers in Shanghai, 1919-1949. Stanford. 1982 Ph.D. 339p.

1919—1949年上海的纺织女工 霍尼格

Hammond, Edward Roy, III.: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1939. Ph.D. 1978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300p.

1927—1937年上海有组织的劳工 哈蒙德

• 妇 女 •

Beahan, Charlotte L.: The women's movement and nationalism in late Ch'ing China, Ph.D. 1976 Columbia Univ. 403p.

晚清的妇女运动与民族主义 比汉

Johnsen-Rod, Candace Mauree: The catalyst effect of the Y.W. C.A. 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1901-1927. M.A. 1981 Florida Atlantic Univ 115p.

基督教女青年会对中国妇女运动所起的促进作用, 1901—1927, 约翰逊——罗德

Frenier, Mariam Darce: Wome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52: changes in Party policy and mobilization techniques. Ph.D. 1978 The Univ. of Iowa 297p.

妇女和中国共产党, 1921—1952, 党的政策与动员方法的变化 弗伦尼尔

Jackal, Patricia Stranahan: Development of policy for Yenan women, 1937-1947. Ph.D. 1979 Univ. of Pennsylvania 268p.

延安妇女政策的发展 1937—1947 杰卡尔

• 华工 • 华侨 •

Irick, Robert L.: Ch'ing policy toward the coolie trade, 1847-1878.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2. 452p.

清政府的华工政策, 1847—1878 艾里克

Arensmeyer, Elliott Campbell: British merchant enterprise and the Chinese coolie labour trade, 1850-1874, Ph.D. 1979 Univ. of Hawaii 318p.

英国商人企业和华工贸易, 1850—1874 阿伦斯梅耶

Chen, Helen Bokwan: Chinese 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immigration policies. Brandeis, 1980 Ph.D. 270p.

中国向美国的移民, 对移民政策演变的分析 陈博文 (音)

Chen, David Yeesui: Needs and service utilization patterns of older Chinese Americans residing in New York city's Chinatown. Columbia (Teachers college), 1981 Ph.D. 193p.

纽约唐人街老一代美籍华人的需要和利用服务的方式 陈以瑞 (音)

Bristol-Kagan, Leigh.: Chinese migration to California, 1851-1882: selected industries of work, the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the legislative exclusion of a temporary labor force. Harvard, 1982 Ph.D. i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417p.

1851—1882年间中国向加利福尼亚的移民 布里斯托尔—卡根

Tsai, Shih-shan Henry: 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8-1911. The Univ. of Arkansas Press, 1983 176p.

中国和旅美华侨, 1868—1911 蔡石山

Lee, Raymond: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of Los Angeles, 1870-1900, a case of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California (Irvine). 1982 Ph.D. 380p.

洛杉矶美籍华人团体, 反抗、组织和加入的个案 1870—1900, 陆雷蒙 (音)

Harris, Heather: The Chinese Canadians. Ontario, Scarborough, 1982

加拿大的华裔 哈里斯

Wickberg, Edgar: 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Ontario, McClelland & Stewart, 1982.

从中国到加拿大: 加拿大华人社团史 威克伯格

Wang Gunwu: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Katon Shpping Centre, 1981 292p.

社团和国家: 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 王广武

Mak Lau Fong: The sociology of secret societies, a stud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Singapore, Katong Shpping Centre, 1981 178p.

秘密社会的社会学: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华人秘密社会研究 马洛风 (音)

Siaw, Laurence K.L.: Chinese society in rural Malaysia: a loc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of Titi, Jelebu. UK, 1983 Univ. of Oxford Press. 240p.

马来西亚乡村中的华人社会 肖 (音)

Coppel, Charles A.: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UK, Oxford Univ. Press, 1983 200p.

危难中的印尼华人 科佩尔

Ting, Yuen-hung Chen: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study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and its components, 1939-1949. Ph.D. 1978 New York Univ. 256p.

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 中国民主同盟及其组成, 1939—1949 丁陈月红 (音)

Shaheen, Anthony Joseph: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and Chinese politics, 1939-1947. Ph.D. 1977 The Univ. of Michigan 482p.

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政治, 1939—1947 沙欣

三、经济

Feuerwerker Albert ed.: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Song to 1900.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 of Michigan, 1982 182p.

从宋代到190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 费维恺编

Lee, Raymond L.: China's foreign trade relations and industrialization, 1940-

- 1965: a policy study. Ph.D. 1982 New York Univ. 270p.
- 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和工业化政策研究, 1940—1965, 李雷蒙 (音)
- Huenemann, Ralph William: 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s in China, 1876-1937. Ph.D. 1982 Harvard Univ. 540p.
- 龙和铁马: 中国的铁路经济情况, 1876—1937 许内曼
- Leary, William M., Jr.: The dragon's wings, the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viation in China. The Georgia Press, 1983 294p.
- 龙翅,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 利里
- Chiang, Tao-chang: The salt industry of China, 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1644-1911. Ph.D. 1975 Univ. of Hawaii 349p.
- 中国的制盐工业历史地理学研究, 1644—1911, 蒋道章 (音)
- Chang, Ying-hwa: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inese cities, 1920's and 1930's an ecological approach. Ph.D. 1982 Princeton Univ. 605p.
- 1920和1930年代中国城市的内部结构 张荫华 (音)
- Stross, Randall Elliott: A hard row to ho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agriculture in western Jiangsu, 1911-1937. Ph.D. 1982 Stanford Univ. 305p.
- 难扫的门前雪: 江苏西部农业政治经济学, 1911—1937 斯特罗斯
- Eng, Robert Yeok-yin: 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anton and Shanghai silk industry, 1861-1932. Ph.D. 1978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315p.
- 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 1861—1932年广州、上海的丝织业 吴岳应 (音)
- So, Alvin Yiu-cheong: Gentry and the capitalist world-system: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uth China silk district. Ph.D. 1982 Univ.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53p.
- 绅士资本家社会秩序: 华南丝绸产区政治经济学研究 苏优中 (音)
- Shih, Chin: Peasant economy and rural society in the Lake Tai area, 1368-1840.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1 282p. DAI
- 太湖地区的农业经济与乡村社会, 1368—1840 石进 (音)
- King, Frank H.H. ed.: 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The Athlone Press, London, 1983 791p.
- 东方的银行: 汇丰银行史论文集 金 (音) 编
- Keswick, Maggie ed.: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Octopus Books Ltd. London, 1982 272p.
- 紫荊和翠玉: 怡和洋行150周年纪念 凯瑟克编
- Chan, Anthony B.: Arming the Chinese, the western armaments trade in warlord China, 1920-1928. Vancouver, Univ.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2 180p.
- 武装中国人, 1920—1928年西方对中国军阀的军火贸易 陈 (音)

四、文化

- Gernet, Jacques: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ster, J.R. [transl. New

-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2 777p.
- 中国文化史 谢和耐 福斯特译
Smith, Richard J.: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2.
Westview Press, 1983 300p.
- 中国的文化遗产, 清代: 1644—1912 史密斯
Sullivan, Lawrence Robert, Jr.: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 doctrine, 1915-1934. Ph.D.
1976 The Univ. of Michigan 352p.
- 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中国共产主义学说的发展, 1915—1934 (小) 沙利文
Lee, Byung Joo: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Kiangsu province, 1917-1937; educators turn to rural reform. Ph.D. 1978 Univ. of Hawaii 556p.
- 1917—1937年江苏省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者求助于乡村改革 李炳若 (音)
Lo, Leslie Nai-kwai: Development of nonformal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1936-1982: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on educational change. Ph.D. 1982 Columbia Univ. Teachers College 470p.
- 中国农村非正规教育的发展, 1936—1982, 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教育变迁影响的研究
罗迺贵 (音)
Leung, John Kong-Cheong: The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tudent-workers in France, 1913-1925. Ph.D. 1982 Brown Univ. 619p.
- 中国人的勤工俭学运动, 1913—1925年中国留法工读学生的社会、政治经验 梁恭昌 (音)
Rubinstein, Murray Aaron: Zion's corner: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27-1839. Ph.D. 1976 New York Univ. 497p.
- 天国一隅: 在华美国新教传教士活动的起源, 1827—1839 鲁宾斯坦
Najarian, Nishan J.: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to the religious stranger concept: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845-1900. Ph.D. 1982 Drew Univ. 548p.
-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 1845—1900 纳贾里安
Wiest, Jean-paul: Catholic activities in Kwangtung province and Chinese responses, 1848-1885. Ph.D. 1977 Univ. of Washington 345p.
- 天主教在广东省的活动和中国人的反应, 1848—1885 威斯特
Ling, Samuel D.: The other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Chinese "Christian renaissance", 1919-1937. Ph.D. 1981 Temple Univ. 222p.
- 另一次五四运动, 中国基督教的复兴, 1919—1937 林 (音)
Lam, Wing Hung: The emergence of a protestant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the Chinese church during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1920's. Ph.D. 1978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353p.
- 19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时期中国教堂里新教护教论的出现 林文宏 (音)
Minden, Karen Paula: Missionaries, Medicine and modernization: Canadian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Sichuan, 1925-1952. York Univ. (Canada) 1981
DAI

- 传教士、医学与现代化：加拿大医务传教士在四川，1925—1952 明登
 Unsworth, Virginia F.: American Catholic missions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3. Ph.D. 1977 New York Univ. 217p.
- 美国天主教使团和共产党中国，1945—1953 昂斯沃思
 Hsueh, Chun-tu ed.: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1911. New York, M.E. Sharpe, 1983 240p.
- 中国人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薛君度编

五、外交

· 中 美 ·

- Cohen, Warren I. ed.: 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 Columbia Univ. Press, 1983 344p.
- 美国东亚关系中的新领域论文集 科恩
- Biggs, Jeffrey Robert: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diplomacy with China: the Cushing mission of 1844 and the treaty of Wanghsia. Ph.D. 1975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 448p.
- ✓ 美国对华外交的起源：1844年顾盛使团与望厦条约 比格斯
 Pruden, George Blackburn, Jr.: Issachar Jacob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h.D. 1977 The American Univ. 339p.
- 罗孝全和太平天国期间美国在华外交（小）普罗登
 Chadbourn, Charles Cumston, III: Sailors and diplomats: U.S. naval operations in China, 1865-1877. Ph.D. 1976 Univ. of Washington 261p.
- 海员和外交官，美国海军在中国的演习，1865—1877 查德伯恩第三
 Patton, John R.: Minister to the mandarins: Charles Denby and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s China policy. M.A. 1977 Florida Atlantic Univ. 132p.
- 驻华公使田贝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出现 佩顿
 Siu, Victoria M. Cha-tsu: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82-1885: The mission of John Russell Young. (Volumes 1 & 2) Ph.D. 1975 Georgetown Univ. 669p.
- 杨约翰使华时的中美关系，1882—1885 苏且祖（音）
 Moore, A. Gregory: The dilemma of stereotype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China, 1901-1909. Ph.D. 1978 Kent State Univ. 298p.
- 一成不变的老困境：罗斯福与中国，1901—1909 穆尔
 Matsuda, Takeshi: Woodrow Wilson's dollar diplomacy in the Far East: the new Chinese consortium, 1917-1921. Ph.D. 1979 The Univ. of Wisconsin-Madison 466p.
- 威尔逊在远东的金元外交，1917—1921年新的中国银行团 松田武志（音）
 George, Brian Thomas: The open door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merican policy and China, 1917-1982. Ph.D. 1977 The Univ. of New Mexico 425p.
- 门户开放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美国的政策和中国，1917—1928 乔治
 Deangelis, Richard Clarke: Jacob Gould Schurman and American policy to-

- ward China, 1921-1925. Ph.D. 1975 St. John's Univ. 357p.
- 舒尔曼和美国对华政策1921—25 迪安吉利斯
- Cole, Bernard D.: Gunboats and marines: 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China 1925-28. Univ. of Delaware Press, 1983 229p.
- 炮舰和海军陆战队: 美国海军在中国, 1925—1928 科尔
- Nolan, William Francis: America'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litary defense of Shanghai, 1931-1941. Ph.D. 1978 Saint Louis Univ. 278p.
- 1931—1941年美国参与上海的军事防御 诺兰
- Kublin, Michael Baru: The role of China in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fall of 1944. Ph.D. 1981 New York Univ. 318p.
- 从珍珠港到1944年秋季中国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作用 库布林
- Grieve, William George: Belated Endeavor: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Ammissa) 1941-1942. Ph.D. 1979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35p.
- 为时已晚的努力, 1941—1942年的美军事使华团 格里夫
- Grasso, June Marie: Conflict and controversy: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8-1950. Tufts, 1981 Ph.D. 293p.
- 冲突和争论: 美国、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8—1950 格拉索
- Tucker, Nancy Bernkopf: Patterns in the dust,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Columbia Univ. Press, 1983 400p.
- 尘土飞扬中出现的模式, 1949—1950年中美关系和承认中国问题上的争论 塔克
- 中 苏 •
- Zagoria, Donald S.: Soviet polity in 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1983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360p.
- 苏维埃的东亚政策 扎戈里亚
- Glatfelter, Ralph Edward: Russia in China: the Russian reaction to the Boxer rebellion. Ph.D. 1975 Indiana Univ. 272p.
- 俄国人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应 格拉特费尔特
- Chi-Hsien Chu.: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Turkistan. M. A. 1980 North-east Missouri State Univ. 143p.
- 中苏在土耳其斯坦的冲突 朱起宪 (音)
- Jakimets, Gennady Nicholas: An interpretation of Czarist-Communist Economic-Political policy in Sinkiang, with emphasis on the years 1851-1955年. N.A. 1981 Univ. of Nevada, Reno 121p.
- 沙皇——共产党人新疆经济政治政策的阐释, 着重1851—1955年 贾克梅茨
- Hasiotis, Arthur Christos, Jr.: A study of Sovie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inkiang from 1928-1949. Ph.D. 1981 New York Univ. 265p.
- 1928—1949年苏联卷入新疆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研究 (小) 哈索蒂斯
- Franklin, Lawrence Anthony: The Chinese response to British and Russian encroachment in northwest China. Ph.D. 1978 St. John's Univ. 275p.
- 中国对英俄侵犯中国的西北的反应 富兰克林

Brown, Frances Cummings: Anglo-American co-operation in China, 1937-1941. Ph.D. 1975 Cornell Univ. 281p.

英美在华合作, 1937—1941 布朗

Boyle, Joseph Michael: British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Tientsin crisis, 1939-1941. Ph.D. 1979 Univ. of Minnesota 205p.

天津危急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 1939—1941 博伊尔

Maschke, Carl-Adolf.: Friedensfühler, die deutsche Vermittlung im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 1931-1941. München, 1981 (D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kultät) 807p.

和平试探者, 1931—1941年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 马施克

Martin, John Patrick: Politics of delay: Belgium's treaty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1926-29. Ph.D. 1980 St. John's Univ. 260p.

拖延时间的把戏, 1926—29年中比条约谈判 马丁

Jain, Rajendra Kumar: China-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 Vol. 1 and 2.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1981 1289p.

中国与南亚关系, 1947—1980年 贾恩

Greenhut II Frederic A.: The Tibetan frontiers question from Curzon to the Colombo conference: an unresolved factor in Indo-Sinic relations. Delhi, Bazar Sitaram, 1982

从寇松到科伦坡会议的西藏边界问题: 印—中关系中一项悬而未决的因素 格林赫特
Murty, T.S.: Paths of peace. — studies on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New Delhi, ABC Pub. Ltd., 1983 319p.

和平的道路——中印边境争端研究 默蒂

Lawson, Eugene Kistler: The origins of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Ph.D. 1982 Columbia Univ. 602p.

中越冲突的起源 劳森

六、传记、回忆录

Borei, Dorothy Villinger: Decline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statecraft essays of Kung Tzu-chen. Ph.D. 1977 Univ. of Pennsylvania 334p.

衰落与改良: 龚自珍治国言论研究 博雷

Hsieh, Andrew Cheng-Kuang: Tseng Kuo-fan, a nineteenth-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h.D. 1975 Yale Univ. 245p.

十九世纪儒将曾国藩 谢成广 (音)

Montgomery, Walter George: The "Remonstrance" of Feng Kucifen: a confucian search for change in 19th century China. Ph.D. 1979 Brown Univ. 310p.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 十九世纪中国寻求变革的儒家主张 蒙哥马利

Ocko, Jonathan Kevin: Ting Jih-ch'ang and restoration Kiangsu, 1864-1870: Rhetoric and reality. Ph.D. 1975 Yale Univ. 401p.

丁日昌和江苏的复兴 1864—1870 奥柯

Chao, Nang-yung: A study of Sun Yat-sen propaganda activities and techniq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period (1894-1911).

- M.A. 1981 North Texas State Univ. 93p.
- 1894—1911年革命期间孙中山在美国的宣传活动和研究方法 赵南云 (音)
- Huang, Margaret H.C.: Dr. Sun Yat-sen's efforts to modernize China (1894-1925). Ph.D. 1976 Georgetown Univ. 295p.
- 孙中山致力中国现代化, 1894—1925 黄 (音)
- Chan, Fook-lam Gilbert: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e career of Liao Chung-k'ai (1878-1925). Ph.D. 1975 Columbia Univ. 507p.
- 中国革命家廖仲恺的一生, 1878—1925 陈福霖
- Shao, Hsi-ping: Tuan Ch'i-jui, 1912-1918: a case study of the military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h.D. 1976 Univ. of Pennsylvania 316p.
- 段祺瑞, 1912—1918, 军事对中国政局发展影响个案研究 邵式平 (音)
- Wang, Richard Tze-yang: Wu Chih-hui: an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Ph.D. 1976 Univ. of Virginia 348p.
- 吴稚晖传 (政治思想方面) 王泽阳 (音)
- Odani, Akira: Wang Ching-wei and the fall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1905-1935. Ph.D. 1975 Brown Univ. 256p.
- 汪精卫和中华民国的衰落 小田内东 (音)
- Chu, William Tze-fu: Hu Han-min: a political profile (1879-1936). Ph.D. 1978 St. John's Univ. 188p.
- 胡汉民传 (政治侧面). 1879—1936 朱泽富 (音)
- Lai, Jeh-hang: A study of a faltering democrat: the life of Sun Fo, 1891-1949. Ph.D. 1976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350p.
- 左右摇摆的民主派, 孙科生平研究, 1891—1949 赖日行 (音)
- Kitts, Charles Roy: An inside view of the Kuomintang: Chen Li-fu, 1926-1949. Ph.D. 1978 St. John's Univ. 179p.
- 从陈立夫看国民党的内幕, 基茨
- Fountain, Kevin Frederick: The fatherless child: Chen Duxiu, 1879-1942. Brown, 1981 Ph.D. in history. 483p.
- 失怙孤儿: 陈独秀传, 1879—1942 方丹
- Lee, Feigon Nathan: Ch'en Tu-hsiu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h.D. 1977 The Univ. of Wisconsin-Madison 429p.
- 陈独秀和中国革命的创立 李飞公 (音)
- Shaffer, Lynda: Mao and the 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 1920-1923.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83 250p.
- 毛泽东和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 谢弗
- Levy, Richard Jay: The political-economic thought of Mao Tse-tung 1917-1965. Ph.D. 1976 The Univ. of Michigan 385p.
- 毛泽东的政治经济思想, 1917—1965 利维
- Mui, Lincoln Ying-tso: Chou En-lai: a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behavior. Ph.D. 1977 Univ. of Notre Dame 285p.
- 周恩来, 政治领导行为研究 梅荫卓 (音)
- Garavente, Anthony Joseph: He Long and the rural revolution in west-central

- China, 1927-1935. Ph.D. 1978 Univ.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38p.
- 贺龙和中国中西部农村革命, 1927—1935 加拉文特
- Brown, Zora Anderson: The Russification of Wang Ming a study of the Comintern career of Chen Shao-yu, 1925-1937. Ph. D. 1977 Mississippi State Univ. 295p.
- 王明的苏俄化: 1925—1937年陈绍禹从事共产国际活动研究 布朗
- Cadart, Claude & Cheng, Yingxiang: L'Envol du Communisme en Chine: memoires de Peng Shuzhi. Paris, Collection Temoins, 1983 490p.
-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彭述之回忆录 卡达特 郑英湘(音)
- Hunsberger, Merrill Ruth: Ma Pu-fang in Chinghai province, 1931-1949. Ph. D. 1978 Temple Univ. 221p.
- 马步芳在青海省, 1931—1949 亨斯伯杰
- Garver, Joseph George: Wen I-to: ideology and identity in the genesis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 Ph.D. 1980 Univ. of Pittsburgh 208p.
- 闻一多: 产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同一性 加弗
- Spar, Fredric J.: Liberal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China: Lo Lung-chi in Chinese politics, 1928-1959. Brown Univ. 1980 366p. DAI
-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内的自由政治反对派: 中国政治活动中的罗隆基, 1928—1959 斯帕
- Larson, John Lauritz.: John Murray Forbes and the Burlington Route: enterprise and culture in the railway age, 1813-1898. Brown, 1981 (Ph. D. in history). 408p
- 莫约翰、福勃士和伯林顿道路, 1813—1898年铁路时代的事业和文化 拉森
- Bennett, Adrian A.: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 The Univ. of Georgia Press, 1983 336p.
- 教会报人林乐知和他所创办的《万国公报》, 1860—1883 贝内特
- Nash, George H.: The life of Herbert Hoover: the engineer, 1874-1914. W. W. Norton & Co., 1983 768p.
- 工程师胡佛生平, 1874—1914 纳什
- Esthus, Raymond A.: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Clie Distribution Services, Oxford England, 1982
- 罗斯福与国际对抗 埃丝瑟斯
- Colleston, Janet Sue: J.V.A. Macmurray, American minister to China, 1925-1929: the failure of a mission. Ph.D. 1977 Indiana Univ. 269p.
- 1925—1929年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 科莱斯特
- King, Amelia Kay: James Keenan: United States consul to Hong Kong. M.A. 1978 North Texas State Univ. 142p.
- 美国驻香港领事吉南 金
- Kuo, Sampson Hsiang-chang: Drilling oil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wo American technicians' contribution to modernization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Volumes I & II) Ph.D. 1981 Georgetown Univ. 502p.
- 台湾的石油开采: 十九世纪末两位美国技术人员对现代化所作贡献的个案研究 郭湘

章(音)

Fisher, Michele Slavich: Service to China: the career of the American Engineer, O.J. Todd. Ph.D. 1977 Georgetown Univ. 318p.

美国托德工程师为中国服务的经历 费希尔

Cherepanov, A.I.: As military adviser in China. tr. by Sergei Sosinsky. Moscow, Progress Pub., distributed by Imported Pub., Chicago, 1982 332p.

作为军事顾问在中国 彻里帕诺夫 索辛斯基译

Leibo, Steven Andrew: A French adviser to imperial China: the dilemma of Prosper Giquel. Ph.D. 1982 Washington State Univ. 382p.

中华帝国的一个法国顾问: 日意格进退两难的处境 莱博

Harrer, Heinrich: Sept ans d'Aventures au Tibet. Le livre qui a le plus suscité de vocations, un classique de l'aventure vecue. France, Arth aud. 1983

西藏七年奇遇 哈勒

七、资料、工具书

Hobbs, Mary Kay: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t American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September 1981: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anced orientation in China and subsequent interaction with U.S. culture. Michigan State, 1982 (Ph. D. in administration and curriculum). 256p.

1981年9月在美国学院、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 霍布斯

Jacquet, F. comp.: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Asia and Oceania in the Netherlands. Munich, K.G.Saur, 1983

荷兰有关亚洲和大洋洲的史料 雅克特编

(韩荣芳、万燕)

俄文部分

论 文

一、总 论

Сенин Н.Г., Иде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об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их развитие в трудах В.И. Ленина.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1993. с.5-19.

卡尔·马克思关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思想及其在列宁著作中的发展 谢宁

Дедюсин Л., 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 11—1983. с.9—12.

伟大的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 杰柳辛

二、政 治

Никифоров В.Н., Труды советских ученых по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3—1983. с. 101—107.

苏联学者的中国近代史著作 尼基福罗夫

Делюсин Л., Китай.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М.,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 5—1983. с. 57—59.

中国的“五·四”运动 杰柳辛

Никифоров В. Н.,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торики о “Движении 4 мая” 1919 г. в Китае.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1983. с. 119—130.

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 尼基福罗夫

Акатова Т. Н., Роль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разработке политики КПК в рабочем движении.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1983. с. 137—150.

共产国际在制定中共工人运动政策中的作用 阿卡特娃

Владимиров О. Б.,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годовщина.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4—1983. с. 80—81.

有重要意义的纪念日（关于辽沈战役结束三十五周年）弗拉基米罗夫

三、思想、文化

Буров В. Г., Ли Да 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марксистских идей в Китае.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1983. с. 103—114.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布罗夫

Белоусов С. Р., Об одной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буржуазн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1983. с. 115—126.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 别洛乌索夫

Коваль М. 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инология СШ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4—1983. с. 104—116.

关于美中关系的当代美国中国学 科瓦利

Карыпкудов А. К., Сушанло М. Я.,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истории Киргизии и ее освещение в КНР. (Стать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в “Известиях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1983, № 3).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4—1983. с. 117—127.

吉尔吉斯史的某些方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 卡雷普库洛夫、苏山洛

Садвакасов Г. С., Шалекенов У. Х., Вопре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равде (Стать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в “Вестник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 4, 1983. Перепечатывается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сокращениями).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3—1983. с. 156—162.

违背历史的真实 萨德瓦卡索夫 沙列肯诺夫

四、中外关系

Ачкасов В. И., Юрьев М. Ф., Роль СССР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войн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разгром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Японии. 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9—1983. с. 41—56.

苏联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和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中的作用 阿奇卡索夫、尤里耶夫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Первые советники из СССР в Китае.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4—1983. с.82—88.

第一批苏联驻华顾问 米罗维茨卡娅

Малухин А. М., Маневры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Китае в конце 40-х годов.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3—1983. с. 90—100.

四十年代末美国的对华外交手腕 马鲁欣

五、传记

Юрьев М. Ф., Выдающийся деятель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Линь Боцюй.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1983. с. 131—136.

中国革命的杰出活动家林伯渠 尤里耶夫

Памяти товарища Ки Чжи.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1983. с. 207.

怀念纪芝同志

Сухов Л. Г., Л. М. Карахан—дипломат ленинской школы.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4—1983. с. 161—162.

加拉罕——列宁学派的外交家 苏霍夫

六、书评

Илюшечкин В. П.—В. С. Кузнецов, Амурсан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Известия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Вып. 2—1983. с. 146—147.

阿木尔撒那 库兹涅佐夫 书评者 伊柳舍奇金

Варлов С.—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Китай и Англия. М., "Наука", 1980. 351. с. 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12—1983. с. 142—145.

中国与英国 斯拉德科夫斯基 书评者 瓦尔洛夫

Илюшечкин В. П.—В. С. Кузнецов,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на рубеж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3. 126 с. 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 9—1983. с. 140—141.

清帝国在中央亚细亚边境(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十九世纪前半叶) 库兹涅佐夫 书评者 伊柳舍奇金

七、动态及其他

О создании Ассоциации советских китайедов.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1983. с. 205.

关于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的成立

XIV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молодых ученых ИДВ АН СССР.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2—1983. с. 206.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第十四次青年学者会议

Кобзев А. И., XIV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4—1983. с. 140—143.

第十四届“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学术会议 科布泽夫

Гольман М. И., 1-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монголоведов. М.,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3—1983. с. 145—151.

第四届国际蒙古学家代表大会 戈尔曼

Ясенев В. С., Славный город на Амуре (к 125-летию Хабаровска).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3—1983. с. 163—166.

黑龙江上的光荣城市〔纪念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一百二十五周年〕亚谢涅夫

Милюбанд С. Д., Список основных трудов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профессора Л. П. Делюсина (К 6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6—1983. с. 211—212.

历史学博士杰柳辛教授主要学术著作表(纪念六十寿辰) 米利班德编

Милюбанд С. Д., Список основных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Т. Н. Акатовой (К 6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 5—1983. с. 214.

历史学博士阿卡托娃主要学术著作表(纪念六十寿辰) 米利班德编

75-летие Е. Ф. Ковалева.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1983. с. 205.

科瓦列夫七十五寿辰

70-летие В. Я. Сидихменова.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1983. с. 207.

西季赫诺夫七十寿辰

70-летие Т. Р. Рахимова. 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1—1983. с. 606.

拉希莫夫七十寿辰

书 目

一、 政治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1917—1927. Гл. ред. 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Наука", 1983. 399 с.

中国现代史·1917—1927 斯拉德科夫斯基主编

Каргунова А. И., Политика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рабочем вопросе накануне революции 1925—1927 гг. М., "Наука", 1983. 190 с.

1925—1927年大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对劳工问题的政策 卡尔图诺娃

Акатова Т. Н.,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гоминьдановском Китае. 1927—1937 гг. М., "Наука", 1983. 272 с.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1927—1937年) 阿卡托娃

Златкин И. Я.,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1635—1758. Изд. 2-е доп. М., "Наука", 1983. 332 с.

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 第二版 兹拉特金

二、 军事

Юрьев М. Ф.,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КПК в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20—20-е годы. М., "Наука", 1983. 335 с.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的武装力量 二十——四十年代 尤里耶夫

三、思想、文化

- Стабурова Е. Ю., Анархизм в Китае (1900—1921 гг.). М., “Наука”, 1983. 184 с.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1900—1921年) 斯塔布罗娃
- Сухарчук Г. Д.,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згляд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лидеров Китая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М., “Наука”, 1983. 227 с.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领袖的社会经济观点 (比较分析) 苏哈尔丘克
-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тв. ред. Л. З. Эйслин. М., “Наука”, 1983. 208 с.
中国的传统文化 论文集 艾德林责任编辑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тв. ред. А. П. Базилянц. М., “Наука”, 1983. 196 с.
苏联东方学的形成 论文集 巴季扬茨责任编辑
- 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Г. М. Бонгард-Левин, Б. Г. Гафуров, С. Б. Кляшторный и др. М., “Наука”, 1983. 363 с.
中央亚细亚的历史和文化 邦加德—列文、加富罗夫、克利亚什托尔内等

四、中外关系

- Гуревич Б. Н.,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XV—XVI вв. Изд. 2-е, доп. М., “Наука”, 1983. 309 с.
十七世纪——十九世纪前半叶中央亚细亚的国际关系 第二版 古列维奇
- Беспрозванных Е. Л., Приамурье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середина XIX в. М., “Наука”, 1983. 207 с.
俄中关系中的阿穆尔地区 (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中叶) 别斯普罗兹万内赫
- Чернышева В., Чечулина Г., Сутурин, А., Хабановск, 1858—1983.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Хабаровск, Кн. изд-во, 1983. 335 с. ил.
哈巴罗夫斯克历史概述 (1858—1983) 切尔内绍娃 切丘林娜、苏图林
- Андреев Г.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 КВЖД в 1917—1922 гг.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3. 142 с.
1917—1922年中东铁路的革命运动 安德列耶夫
- Браславец К. М. История в названиях на карте Сахали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Южно-Сахалинск, Дальневост. кн. изд-во, 1983. 144 с.
萨哈林省地名中的历史 布拉斯拉维茨
- Кузнецов В. С.,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на рубеж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V—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3. 126 с.
清帝国在中央亚细亚边境 (十八世纪后半叶——十九世纪前半叶) 库兹涅佐夫
- Казахстан, Средня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в XV—начале XIX в. Под ред. Б. А. Тулсипбаева. Алма-Ата, “Наука”, 1983. 192 с.
十六——十九世纪初的哈萨克斯坦、中亚和中央亚细亚 图列普巴耶娃编辑
- Сергеев О. И., Казачество на рус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XV—XIX вв. М., “Наука”, 1983. 127 с.

十七——十九世纪俄国远东的哥萨克 谢尔盖耶夫

五、传记

Соколов В. В., На боевых постах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го фронта.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Л. М. Карахан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3. 193 с.

在外交战线的战斗岗位上 加拉罕生平事迹 索科洛夫

Стрелкова И., Валиханов.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83. 284 с. илл.

瓦利汗诺夫 斯特列尔科娃

六、索引

Кувшинникова Л. А.,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1917—1949. Указатель источник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русском, китайском и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м языках,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в 1917—1978 гг. М., 1982.

1917—1949年的中国工人运动 俄文、中文和西文史料、著作索引 库夫申尼科娃

(郭兴仁)

日 文 部 分

论 文

一、总 论

島田虔次他編 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1. 中国Ⅰ 2. 中国Ⅱ、朝鮮, 3. 中国Ⅲ 1983年11月 426—431页

〈亚洲史研究入门1. 中国(1) 2. 中国(2) 朝鮮 (3) 中国(3)〉

中山义弘 半植民地社会の支配と抵抗 「中国へのアプローチ」 201—232页 1983年10月

〈被统治与反抗的半殖民地社会〉

山田辰雄 橋樑の中国国民革命论 法学研究〈庆大〉56卷3期 477—518页 1983年3月 〈橋樑的中国国民革命论〉

菊池贵晴 杜重远の民族主义运动 福大史学36卷1—12页 1983年11月

〈杜重远的民族主义运动〉

二、政 治

佐佐木正哉 鸦片战争の研究研究—ポティンダーの着任から南京条約の締結まで

(一) 近代中国 14卷 1983年11月

〈鸦片战争研究—从璞鼎查(Pottinger, Sir Henry)上任到南京条约签订(一)〉

永野慎一郎 アロー号事件をめぐるイギリス议会论争 经济论集 35卷 51—89页 1983年3月

〈围绕亚罗号事件英国议会的争论〉

- 针谷美和子 太平天国占领地域の枪船集团—太湖周辺地域を中心にして 历史学研究 522卷 17—35页 1983年11月
 〈太湖周围地区, 太平天国占领地的枪船集团〉
- 针谷美和子 太平天国镇压後の枪船集团 一桥论丛 89卷1期 104—121页 1983年1月
 〈太平天国失败後の枪船集团〉
- 夏井春喜 太平天国时期苏州における土豪的支配について—长洲县の永昌徐局の場合 増洲论集 101—130页 1983年5月
 〈太平天国时期苏州的土豪统治〉
- 井木頼寿 1850年代, 河南联庄会の抗粮暴动(下) 中国近代史研究 3期 41—68页 1983年7月
 〈1859年河南联庄会的抗粮暴动(下)〉
- 目黒克彦 团练と乡勇との关系について—湘乡团练と湘勇の場合 研究报告〈爱知教大〉 32卷末 1—16页 1983年1月
 〈关于团练与乡勇的关系——湘乡团练与湘勇的情况〉
- 佐佐木正哉 酉阳教案补遗〈上〉〈下〉 近代中国 13卷 14卷 1983年6、11月
- 神戸輝夫 云南鑛山と回民起义 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 2卷末 1—12页 1982年3月
 〈云南鑛山与回民起义〉
- 洞富雄 日清开战は「朕の戦争に非ず」 历史と人物 1983年7月 48—55页
 〈日清战争“不是天皇的战争”〉
- 藤岡喜久男 张謇と日清战争 法学研究〈北海学園大〉 18卷2期 1—37页 1982年11月
 〈张謇与日清战争〉
- 藤岡喜久男 张謇と东南互保 「佐久間论集」 263—284页 1983年3月
 〈张謇与东南互保〉
- 深泽秀男 变法运动と中国女学堂 アルテスリベラレス 32卷 47—58页 1983年7月
 〈变法运动与中国女学堂〉
- 阿部贤一 邹容の“革命军”と西洋近代思想—“民约论”と进化论とを中心に 政治经济史学 200期 150—164页 1983年3月
 〈邹容的“革命军”与西方近代思想—从“民约论”到进化论〉
- 中村孝志 福州の台湾籍民—1909年における 南方文化 10期 160—172页 1983年10月
 〈福州的台湾籍人——1909年〉
- 新村容子 清末四川省における局土の历史的性格 东洋学报 64卷 3、4期 103—134页 1983年3月
 〈清末四川省议员的历史性格〉
- 中村 义 孙文と黄兴の初会见の仲介者は滔天ガ 辛亥革命研究 3期 32—37页 1983年3月
 〈孙中山与黄兴初次会见是宜崎滔天介绍吗?〉
- 郑正浩 犬养毅あて孙文・康有为ら书简について アジア文化 7期 53—68页 1982年10月
 〈关于犬养毅致孙中川、康有为等书信〉

- 楠瀬正明 辛亥革命の過程と性格 「中国へのアプロー千」 233—252頁 1983年10月
 〈辛亥革命の過程及性質〉
- 久保田文次 董野長知より中村弥六あて書簡—1911年11月 辛亥革命研究 3期 105—109頁 1983年3月
 〈董野長知致中村弥六书信—1911月〉
- 小島淑男 中国国民会について(二) 辛亥革命研究 3期21—31頁 1983年3月
 〈关于中国国民会(二)〉
- 内田頤一 湖北革命戦見聞日記(承前) 辛亥革命研究 3期69—93頁 1983年3月
 山根幸夫 廿一箇条交渉と日本人の対応 「佐久間論集」 307—329頁 1983年3月
 〈二十一条交渉と日本人の対策〉
- 味岡 徹 護国戦争後の地方自治回復—江苏省を中心に 人文研紀要〈中央大〉2巻143—174頁 1983年7月
 〈护国戦争后江苏省地方自治的恢复〉
- 曾田三郎 五、四運動と国共関係の展開「中国へのアプロー千」 253—287頁 1982年10月
 〈五、四運動与国共关系的发展〉
- 野澤豊 五四運動と省議会——民族運動内部構造の検討にむけて 人文研紀要〈中央大〉2巻35—87頁 1983年7月
 〈五四運動与省議会—对民族运动的内部结构探讨〉
- 野澤豊 五四運動史研究についての往復書簡—狭間直樹「五四運動研究序説—五四運動における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役割」をめぐる著者との対話 近きに在りて 3巻61—71頁 1983年3月
 〈五四運動史研究来往书信—围绕同“五四運動研究序説—五四運動时无产阶级的作用”著者狭間直樹対話〉
- 狭間直樹 野澤豊氏の批判に答える—五四運動における上海の罷工斗争の評価をめぐつて 近きに在りて 4期47—50頁 1983年9月
 〈答复野澤豊先生の批評—五四運動时上海罷工斗争的评价〉
- 狭間直樹 国民革命中の二つの五四記念日: “五四運動の研究”第二函附录 1983年12月
 〈国民革命中の二个五四紀念日〉
- 金子肇 1920年代前半中国の政治 情勢とブルジョア上海總商會の政治的動向を東洋史研究室報告5期14—25頁 1983年9月
 〈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形势与资产阶级—关于上海總商會的政治動向〉
- 土田哲夫 郭松齡事件と国民革命 近きに在りて 4期11—28頁 1983年9月
 〈郭松齡事件与国民革命〉
- 三好 章 秋收蜂起直前の中共中央と中共湖南省委員會 「増洲論集」157—192頁 1983年5月
 〈秋收起义前的中共中央及中共湖南省委員會〉
- 北村 稔 第一次国共合作の展開について 史 林 66巻4期 62—101頁 1983年7月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展〉

- 本庄 比佐子 国共合作とコミンテルン—最近の中国における研究から 近き在りて 4期40—46頁 1983年9月
 〈国共合作与共产国际—从最近中国研究来看〉
- 菊池一隆 陕西省の民众运动とその背景—土匪反乱の史的意义 『統民众乱』 359—402頁 1983年6月
 〈陕西省の民众运动及其背景—土匪反乱的意义〉
- 笹川裕史 湖南省における省自治运动と省宪法构想 东洋史研究室報告 〈廣大〉5卷1—13頁 1983年9月
 〈关于湖南省省自治运动与宪法设想〉
- 永井 守 1920年代广东省海豊地区における农民运动について 东洋史研究报告 〈东洋大〉Ⅱ17—33頁 1983年3月
 〈关于二十年代广东省海丰地区的农民运动〉
- 加藤直子 山东民政反对运动について 人文科学纪要〈お茶大〉36卷1—29頁 1983年3月
 〈关于反对山东民政运动〉
- 高綱博文 黎明期の青岛劳动运动—1925年の青岛在华纺争议について 东洋史研究 42卷2期 61—92頁 1983年9月
 〈青岛初期的工人运动—1925年青島市日本在华纺织业劳资纠纷〉
- 三谷 孝 大刀会与国民党改組派—1929年の溧陽暴動をめぐつ 『増洲論集』193—212頁 1983年5月
 〈大刀会与国民党改組派—1929年江苏省溧陽暴動〉
- 野口鉄郎 紅蓮教と哥老会 东洋史研究 1983年42卷=期 28—51頁
 〈紅蓮教与哥老会〉
- 馬場 毅 山东省の紅槍会运动『統民群反乱』 251—358頁 1983年6月
 〈山东省の紅槍会运动〉
- 俞 辛焯 満州事変と幣原外交 日本史研究253卷36—60頁 1983年9月
 〈満州事変与幣原外交〉
- 田中 仁 王明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論の形成について 史学研究 158期 32—47頁 1983年2月
 〈关于王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論的形成〉
- 安井三吉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运动 近きに在りて 3卷3—48頁 1983年3月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日本人的反戦运动〉
- 天光 慧 内戦期中国农村の大众运动—陝甘宁边区および晋冀魯豫边区の比較考察 『増洲論集』 287—312頁 1983年5月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的群众运动—陝甘宁边区及晋冀魯豫边区对比考察〉
- 内田知行 閻錫山の民众統制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増洲論集』233—264頁 1983年5月
 〈閻錫山の民众統制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藤原彰 南京大虐殺事件の今日的意义—洞富雄著“決定版南京大虐殺”について 历史評論 1983年10月号 110—113頁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目前意义—关于洞富雄著“南京大屠杀”〉
- 向山寛夫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の法と政治—民族法学の視点に立つて 国学院

法学21卷2期61—106页 1983年9月

〈日本统治下台湾的法律与政治—民族法学观点的建立〉

若林正大 总督政治と台湾土着地主资产阶级 アジア研究 29卷4期 1—41页
1983年1月

〈总督政治与台湾地方地主资产阶级〉

金森襄作 「满洲」における中朝共产党的合同と间岛五、三〇蜂起について 朝鲜史
丛 7卷3—40页 1983年6月

〈关于“满洲”中朝共产党的联合与间岛五、三〇起义〉

香岛明雄 新疆政变—国民政府の対応(1942—1943年) 论集<京都产业大>12卷
1期 209—246页 1982年11月

〈新疆政变—国民政府的对策(1942—1943年)〉

末次玲子 五、四时期の妇人运动素描(上) 历史评论 395期23—35页 1983年3月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概况(上)〉

末次玲子 五、四时期の中国妇人运动とロシア革命认识 历史学研究 513期 68—
76页 1983年2月

〈五四时期的中国妇女运动与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

前山加奈子 杨昌济と湖南妇人解放—「结婚论」の翻译と「家族制度改良ノート」につ
いて 通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15、16期 19—30页

杨昌济与湖南的妇女解放—关于“结婚论”的翻译和“家族制度改良笔记”〉

松本武彦 辛亥革命と神戸华侨—武昌蜂起直后における 中国研究月报425期
27—31页 1983年7月

〈辛亥革命与神戸华侨〉

三、经 济

西村成雄 「1982年、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术座谈会」を准备して—その私的メモ
近きた在りて 3卷2—14页 1983年3月

〈我预备参加“1982年、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术座谈会”的笔记〉

藤井 宏 一田两主制の基本构造(八)(九)近代中国 13期、14期 1983年6、11月
〈一田两主制(中国租佃制度)的基本结构〉

吉田宏一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の二つの见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ノート 近き
に在りて 4期 51—69页 1983年9月

〈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的二点见解—学习“中国近代农业史”笔记〉

浅田乔二 大上米廣の「満州型原始蓄积论」について 经济学论集集<驹澤大>15卷1
期 81—107页 1983年6月

〈关于大上米廣的“满州式的原始积累论”〉

高纲博文 把头制に関する—考蒙—龙烟鉄鑛の事例について 授信论业<日大通信
教育>2期61—76页 1983年3月

〈有关把头制的考察—关于龙烟铁矿的事例〉

末次玲子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に女性史をせぐる 通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15、
16期1—19页 1982年10

〈“中国农村概况调查”围绕妇女史方面〉

清川雪彦 中国纖維機械工業の発展と在华紡の意义 经济研究<一桥大、经济研>34
卷1期 22—39页 1983年1月

- 「中国纺织机械工业的发展与外国在华纺织业的意义」
北山謙次 旧中国の合額貢行—その权利关系を中心に 东洋史论集〈九大〉11卷94—116頁 1983年3月
「旧中国合額貢行—是以权利关系为中心」
野村 亨 淞沪铁道に关する—考察 「佐久間论集」 285—306頁 1983年3月
「关于淞沪铁道的考察」
石井摩耶子 1860年代の中国におけるイギリス資本の活动—ジャーディン、マヤメ
ン商会の制糸工場经营 お茶の水史学26、27卷 88—108頁 1983年9月
「1860年时期英国在中国的资本活动—怡和洋行经营的纺织工厂」
长井伸治 洋务运动期の官督商辦制度—直隶开平矿务局を例として 历史科学と教育〈千叶大、教育〉2卷11—22頁 1983年5月
「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制度—直隶开平矿务局为例」
味岡 徹 袁世凱政政財政の破綻と兌換停止令 「増洲论集」131—156頁 1983年5月
「袁世凱政政財政の破綻与兌換禁令」
加藤直子 民国初期の制錢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战後の山东を中心として 辛亥革命研究 3期1—14頁 1983年3月
「民国初年錢币制造問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後の山东省为中心」
佐藤明子 上海制糸女工に关する—考察1920年代前半における 通信〈中国近代史研究会〉15、16期 31—45頁 1982年10月
「上海纺织女工—二十年代前期考察」
金子 肇 パークス・M・カプル、J著 「上海財閥と国民党政政1927—1937年」史学研究160卷73—80頁 1983年7月
「上海財与国民党政政1927—1937年」
久保 亨 国民政府の財政と关税收入1928—1937年 「増洲论集」217—232頁 1928年5月
「国民政府の財政与关税收入1928—1937年」
吉田恵子 恐慌下における南京国民政府の原棉政策 东洋史研究室報告〈廣大〉5卷26—37頁 1983年9月
「经济恐慌下南京国民党政政的原棉政策」
久保 亨 中国国民党政政による关税政策決定过程の分析—1932—1934年 紀要
「东大・东文所 92卷 141—217頁 1983年7月
「中国国民党政政关税政策決定过程的分析—1932—1934年」
岩武照彦 抗日根据地における通貨および通貨政策—晋察冀边区および晋冀魯豫边区の实例 史学杂志 92卷4期 1—34頁 1983年4月
「抗日根据地通貨及通貨政策—晋察冀边区及晋冀魯豫边区の实例」
井上久士 边区における农业生产組織の性格について—とくに苗店子合作農場をめぐって「増洲论集」 265—285頁 1983年5月
「关于边区的农业生产組織性质—以苗店子合作農場而论」
田中恭子 中国の农村革命（1942—1945年）—減租、清算、土地改革 アジア经济 1983年9月号 22—53頁
「中国的农村革命 1942—1945年—減租清算、土地改革」
黒公明伸 清末湖北省に於ける币制改革—经济装置としての省人力 东洋研究41卷3期 86—122頁 1982年12月

〈清末湖北省币制改革——作为省内权力的经济设备〉

清代河南省の漕糧について 东洋史研究报告〈东洋大〉Ⅱ集1—16页 1983年3月
並木頼寿

〈关于清代河省漕粮问题〉

足立启二 清代苏州政下における地主的土地所有の展开 论 丛 〈熊本文〉9卷
24—56页 1982年 11月

〈清代苏州府的地主所有制的发展〉

仓桥正直 营口东盛和事件の裁判——清末における商事裁判の一事例 历史学研究
517卷42—58页 1983年6月

〈营口东盛和事件的裁判——清末商事裁判一事例〉

片山 刚 清末广东省珠江デルタにおける图甲制の诸矛盾とその改革〈南海县〉—
税粮、户籍、同族 海南史学21卷1—25页 1983年8月

〈清末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图甲制诸矛盾及其改革(南海县)—田赋、户籍、宗族〉

クリスチャン、ダニエルス 清末台湾南部制糖业と商人资本—1870—1895月 东洋
学报 64卷3、4期 65—102页 1983年2月

〈清末台湾南部制糖业与商人资本—1870—1895年〉

足立启二 清—民国期における农业经营の发展—长江下游流域の場合 『中国史像』
255—288页 1983年4月

〈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经营之发展—以长江下游的情况〉

平 智之 日本帝国主义成立期、中国における横滨正金银行 经济学研究〈东大〉25
卷 67—81页 1982年12月

〈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初期中国的横滨正金银行〉

四、军 事

光岛 督 清末の川边经略と川军入藏 『多贺论集』332—334页 1983年5月

〈清末的川边治理与川军入藏〉

中野克也 中国东北与における东北义勇军の抗日武装斗争 历史研究〈大阪教育大〉
20卷59—77页 1982年6月

〈中国东北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武装斗争〉

太田弘毅 战前海南岛における日本海军の统治组织 アジア文化 7卷107—103页
1982年10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海南岛日本海军的统治组织〉

五、文 化

古藤友子 张之洞の中体西用论—「西学」を学ぶ知识人の「伦理」について 论 集

〈驹泽大、外国语〉18卷末1—15页 1983年9月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知识分子关于学习“西学”的“伦理”〉

佐藤慎一 1890年代の「民权论—张之洞と何启の「论争」を中心 『中国における人間
性の探究』709—727页 1983年2月

〈1890年时代“民权”论—以张之洞与何启“论战”的中心〉

坂出祥伸 康有为初期の思想—「康子内外篇」の考察 文学论集〈关西大〉32卷1期53—
83页 1982年11月

〈康有为初期的思想—“康有为内外篇的考察”〉

- 坂元 ひる子 中国近代思想の——断面——譚嗣同の以太（Iーラル）论 思想
708期 52—67頁 1983年4月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侧面——譚嗣同的以太论〉
- 朴 鍾玄 19世紀末中国改革論者の聯盟論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 42巻1期 24—
61頁 1983年6月
〈关于十九世紀末中国改革論者の聯盟論〉
- 海老澤尚典 章炳麟における種族主義の形成——戊戌以後蘇報案にかけての理論 東
洋文化 復刊51巻 37—51頁 1983年7月
〈章太炎の種族主義の形成——戊戌變法以後直到蘇報案の理論〉
- 海老谷尚典 章炳麟における種族革命と無政府主義 哲 学 〈廣島哲学会〉34期
102—119頁 1982年10月
〈章太炎の種族革命と無政府主義〉
- 原島春雄 章太炎における學術と革命——「哀かり」「寂寞」まで 思想 708期123—
143頁 1983年6月
〈章太炎の學術と革命——从“忧伤”到“寂寞”〉
- 鍾清汉 孫文思想と三民主義教育の實踐（一）アジア文化 7巻43—48頁 1982年
19月
〈孫文思想と三民主義教育の實踐（一）〉
- 阿部 洋 清末における學堂教育と日本人教育——直隸省の場合『多賀論集』335—353
頁 1983年5月
〈清末の學堂教育と日本人教育——直隸省の情況〉
- 川上哲正 民國初年のアナキズム——劉思復の社會主義論 學習院史學20巻66—75頁
1982年12月
〈民國初年の無政府主義——劉思復的社會主義論〉
- 横山宏章 陳独秀ノート（最終回）陳独秀の女性解放論と三人の妻 中国研究
1983年11月号 52—62頁
〈陳独秀筆記（最後一章）陳独秀的婦女解放論と三名妻子〉
- 奈藤道彦 李大釗研究史覚書、中国篇 人文研紀要〈中央大〉2巻175—251頁 1983
年7月
〈李大釗研究史記錄、中国篇〉
- 后藤延子 中国におけるマルクス主義の受容——社會主義論戰を中心として 歴史評
論399巻 39—57頁 1983年7月
〈中国接受馬克思主義——以社會主義論戰为中心〉
- 多賀 秋五郎 中国における新學制實施前夜の族塾について 教育學論集〈中央大〉
25巻9—25頁 1983年3月
〈中国新學制實施前夕之私塾〉
- 石井洋子 辛亥革命期の留日女子學生 史 論 36期31—54頁 1983年3月
〈辛亥革命時期的留日女學生〉
- 小林善文 北京大学と軍閥——蔡元培の改革とそれをめぐる斗争 史 林 66巻3期
46—79頁 1983年5月
〈北京大学与軍閥——蔡元培的改革与斗争〉
- 坂出祥伸 清末における科學教育——上海、格致書院の場合 文學論集〈关西大〉32巻
3期1—33頁 1983年2月

- 「清末的科学教育—上海格致书院的情况」
坂出祥伸 清末民国初化学史の—側面—元素漢訳名の定着过程 「東洋の科学と技術」 298—324頁 1982年11月
清末民初化学史的一个侧面—化学元素漢译名称固定过程」
- 吉田 寅 入華宣教師フアーバーの「大德國学校論略」について「多賀論集」 309—321頁 1983年5月
「关于来華傳教士花之安的“大德國学校論”」
- 大野穂子 上海における戲園の形成と発展お茶の水史学 26、27卷50—70頁 1983年9月
「上海的戲園的形成与发展」
- 小島晋治等 いま、中国研究をふりかえつて 中国研究月報 1983年3月 1—32頁
「回顾现在的中国研究」
- 卫藤沈吉 辛亥革命研究の动向たつて—81シンポジウムを中心 学术月報35卷11期 6—10頁 1983年2月
「辛亥革命研究动向—以1981年座谈会为中心」
- 石島紀之 抗日战争史研究の課題と方法 近きに在りて 3期30—36頁 1983年3月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课题与方法」
- 榎木利夫 中国における国民革命史の研究—武汉政府期の「左傾」と「右傾」 近きに在りて 4期29—39頁 1983年10月
「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武汉政政时期的“左傾”与“右傾”」
- 加加美 現代中国の政治社会と社会学—中国における社会学の存立可能性 中国研究月報 426期 1—18頁 1983年8月
「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与 sociology—中国社会学的存在可能性」
- 俞 辛焯 中国におけ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の动向 历史学研究518卷35—39頁 1983年7月
「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动向」
- 吉田滋一 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动向（I）农业を中心として 新しい历史学のために 170号 1—12頁 1983年3月
「日本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动向（I）—以农业为中心」
- 奥村 哲 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近现代经济研究の动向（II）—资本主义关系の諸問題 新しい历史学のために 170卷 12—23頁 1983年3月
「日本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动向（2）—资本主义关系的諸問題」
- 林要三 战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洋务运动研究动态——以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为主 論集「帝塚山大」39卷末11—23頁 1983年12月
- 水羽信男 近年日本におけ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について 東洋史研究室報告「广大」5期 38—43頁 1983年9月
「关于近年来日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研究」
- 原 覚天 満鉄調査部の历史とアジア研究（31—37） アジア経済 23卷8、10、12期 24卷1—4期 1982年8—12月、1983年1—4月
「満鉄調査部の历史与亚洲研究」
- ドメ、プライス（久保田文次訳）
清末政治史研究の动向）ソ連における 潮新13卷93—104頁 1983年10月
「苏联清末政治史研究动向」

六、中外关系

- 喜田昭治郎 中国における「条约」一名称と意味 アジア研究 30卷2期43—60页
1983年7月
 <中国的“条约”一名称及意义>
- 井上勇一 安奉铁道をめぐる日清交渉—満韩一体化政策と日英同盟の変質 法学研究(庆大) 56卷3期309—336页 1983年3月
 <围绕安奉铁路的日清交渉—満韩一体化政策与日英同盟的变质>
- 味岡 彻 ロシア革命後の東三省北部における「币权回收」 历史学研究513期 56-67页 1983年2月
 <俄国十月革命后从东三省北部「收回币制权」>
- 笠原十九司 日中军事协定と北京政政の「外兴自治取消」—ロシア革命がもたらした東アジア世界变动の一側面 历史学研究 515期 18—33页 1983年4月
 <日中军事协定与北京政政的“反对外蒙独立”—俄国十月革命后带来东亚世界变动的一个侧面>
- 笠原十九司 日中军事协定反对运动—五四运动前后における中国民族运动の展开 人文研究纪要(中央大) 2期89—142页 1983年7月
 <反对日中军事协定运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族运动的开展>
- 判澤純太 五四运动期をめぐる中メ关系 政治经济史学 200期89—114页 1983年3月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苏关系>
- 坂野良吉 国民革命の展开とワシントン体制の変質—反奉战争前后を中心として 历史学研究 別册158—168页 1983年11月
 <国民革命的开展与华盛顿体制性质的改变—以反对奉系战争前后为中心>
- 家永三郎 日中战争についての中西功书簡 近きに在りて 3期49—55页 1983年3月
 <关于日中战争时中西功书信>
- 川本謙一 アチメンと中国—ヤブン、スプリンダ、ヤン—子けるコーイン報告関連して 島大法26卷2、3期1—22页 1983年2月
 <艾奇逊与中国—塞万·斯普林格中心—科恩的报告>
- 中田吉信 新疆ウイタル自治区と日本人(1) アジア・アフリカ資料过报 21卷5期 33—36页 1983年8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日本人(1)>
- 中国和仁 香港をめぐる英中间の確執 一桥研究 7卷4期 114—139页 1983年1月
 <围绕香港问题中英间之争端>

七、传记

- 原島春雄 林则徐小考 老百姓の世界 1卷 18—26页 1983年4月
- 井木頼寿 悲劇の提督丁汝昌 历史と人物 7卷150—164页 1983年7月
 <悲剧性的提督丁汝昌>
- 原田正己 康有为と日本・東南アジア 紀要(早大・文) 28卷37—53页 1983年5月

「康有为与日本以及东南亚」

波多野 善大 辛亥革命期の汪兆銘 紀 要 〈愛知大・文〉12卷末 18—48頁 1983年3月

「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

片岡一忠 清末新疆省官员考 紀 要〈大阪教大〉 31卷2、3期 119—138頁 1983年2月

牧角悦子 清末革命运动と周树人 中国文学论集〈九大・中国文学会〉11期 135—156頁 1982年10月

「清末革命运动和鲁迅」

井関军二 鲁迅と清党惨案(4・15)について鲁迅の革命生活 史学研究 159期 38—53頁 1983年6月

「关于鲁迅与清党惨案—鲁迅的革命生活」

横山宏章 陈独秀ノート(2)「实庵自伝」—陈独秀著わした唯一の自伝 中国研究 1983年10月 48—62頁

「陈独秀笔记(2)“实庵自传”—陈独秀所著唯一的自传」

久保田博子 宋庆龄关系略年谱 辛亥革命研究3期39—64頁 1983年3月

藤原康晴 中国における农民运动の一考察(1)—日本留学中の彭湃について 论集(大阪产业大)54期18—26頁 1983年7月

「中国农民运动—考察(1)日本留学时的彭湃」

小林善文 陶行知と山海工学团 「多賀论集」426—436頁 1983年5月

「陶行知与山海工学团」

岩崎富久男 东北烈士纪念馆と「东北抗日烈士传」 中国研究月报 1983年1月 48—51頁

「东北烈士纪念馆与“东北抗日烈士传”」

八、工具书、资料、书评及其他

林 要三編 洋务运动研究文献目录(战后日本编) 论 集〈帝塚山大〉 37卷末39—52頁 1982年7月

岡本嘉之 「千ベツト研究文献目录 日本、中国文篇1877—1977年」貞兼綾子編 亜細亚大学, アジア研究所刊。昭和57年4月东洋学研究17卷93—99頁 1983年3月

「西藏研究文献目录—日文、中文篇1877—1977年」

中村 义 介绍 既刊全集未收录の孙文论文 Judicial Refctm io China 辛亥革命研究3期 99—104頁 1983年3月

「“孙中山全集”未收的一篇论文—“中国的司法改革”」

市古宙二 辛亥革命に関する中国の新刊书 近代中国研究汇报 5期23—74頁 1983年3月

「有关辛亥革命的中国新书刊」

本庄比佐子 中国ソゴエト关系新刊参考书、资料集紹介 近代中国研究汇报5期75—89頁 1983年3月

「有关中国苏维埃新刊参考书、资料集介绍」

斯波义信 函馆华侨关系资料集 紀 要〈阪大・文〉22卷1—335頁 1982年12月

岩武照彦 中国のインフレーションに関する若干の文献资料 中国近代史研究3卷

末1—43页 1983年7月

〈有关中国通货膨胀若干文献资料〉

河地重藏 古岛和雄著『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东洋文史研究 42卷2期 155—161页
1983年9月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古岛和雄著 书评者 河地重藏

松本武彦 市古教授退官纪念论业編集委员会编『论集近代中国研究』史学杂志 9
卷7期91—99页 1983年7月

〈“近代中国研究论集”〉市古教授退休纪念论丛編集委员会编 书评者 松本武彦

河鯖源治 董蔡时著 太平天国在苏州 近代中国 14卷 1983年11月

〈太平天国在苏州〉董蔡时著 书评者 河鯖源治

河鯖源治 钱远谔著『李秀成“书供”原稿考弁』近代中国13卷 11—20页 1983年
6月

〈李秀成“自供书”原稿考证〉钱远谔著 书评者 河鯖源治

臼井佐知子 何烈著“清咸同时期的财政”近代中国 13卷20—27页 1983年6月

菊池贵晴 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 近代中国13卷 28—35页
1983年6月

今井 駿 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共著『“9、18”事变史』（沈阳辽宁人
民出版社1981年8月刊）を评す 近きに在りて 3期 56—60页 1983年3月

〈九·一八事变史〉易显石等著 书评者今井 駿

戴国辉 山田信夫编 日本华侨と文化摩擦 近代中国14卷 1983年11月

〈日本华侨与文化冲突〉山田信夫编 书评者 戴国辉

波多野善大 阿部洋编 日中关系と文化摩擦 近代中国 14卷 1983年11月

〈日中关系与文化冲突〉阿部洋编 书评者 波多野善大

著 作

一、总论、通史

講談社出版研究所編集 中国—世界の国シリーズ16 講談社 1982年11月 227页
〈中国—世界各国丛书16〉

山根幸夫编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 山川出版社 1983年9月 二册

今堀诚二编 中国へのプロローグ その历史的展开 劲草书房 1983年10月 338页
〈中国研究入门—其历史的展现〉

辻 康吾 转换期の中国 岩波书店 1983年8月 209页

〈转变时期的中国〉

小林 升 中国、日本における历史观と隐逸思想 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83年1月
481页

〈中国、日本の历史观与隐逸思想〉

二、政 治

原田正己 康有为の思想运动と民众 刀水书房 1983年5月 370页

〈康有为的思想运动与民众〉

池田 诚 孙文と中国革命—孙文とその革命运动の史研究 法律文化社 1983年11月

月 496页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孙中山及革命运动史研究〉

横山宏章 孙中山の革命と政治指導 研文出版 1983年10月 422页

〈孙中山的革命与政治领导〉

小竹一彰 国共内戦初期の土地改革における大対運動 アジア政経学会 1983年3月 158页

〈解放战争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平野 正 中国民主同盟の研究 研文出版 1983年12月 454页

〈中国民主同盟的研究〉

若林正文 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 研文出版 1983年3月 349页

刘明修 台湾统治と阿片問題 山川出版社 1983年8月 269页

〈台湾统治与鸦片问题〉

中山义弘 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女性解放の思想と行動 北九洲中国书店 1983年3月 415页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与行动〉

三、经 济

森 时彦 五四时期の民族纺织业 同朋舍 1983年12月 191页

〈五四时期的民族纺织业〉

川井 悟 华洋义赈会と中国农村 同朋舍 1983年12月 159页

〈华洋义赈会同中国农村〉

中村隆英 战时日本の华北经济支配 山川出版社 1983年8月 368页

〈战时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统治〉

福田英雄 华北の交通史—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创立小史 IBSブリタニカ

1983年1月 819页

〈华北交通史—华北交通有限公司创立小史〉

林原文子 宋则久と天津の国货提唱运动 同朋舍 1983年12月 93页

〈宋则久与天津提倡国货运动〉

内田直作 東南アジア华侨の社会と经济 千仓书房 1982年12月 286页

〈东南亚侨的社会与经济〉

四、文 化

坂出祥伸 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 同朋舍 1983年3月 606页

〈中国近代的思想与科学〉

小尾博士古稀纪念事业会编 小尾博士古稀纪念中国学论集 汲古书院 1983年10月 804页

〈小尾博士七十寿展纪念中国学论丛〉

五、中外关系

伊东六次郎满洲問題の历史上下巻 原书房 1983年12月 二册

黒羽清隆 日中戦争前史 三省堂 1983年8月 208页

古川万太郎 日中戦后关系史ノート 三省堂 1983年2月 328

〈日中战后关系史笔记〉

- 河林 一夫 近代日中关系史の诸问题 南窓社 1983年3月 238页
 〈近代日中关系史诸问题〉
- 马场 明 日中关系と外政机构の研究—大正、昭和期 原书房 1983年10月 408页
 〈日中关系与外交机构的研究〉
- 臼井胜美 中国をめぐる近代日本外交 筑摩书房 1983年9月 246页
 〈围绕中国的近代日本外交〉
- 宋川正道 第一次大战とパリ讲和会义 柳原书店 1983年4月 30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
- 内海爱子 田边寿夫 アジアがらみに「大东亚共荣圈」 梨の木舎 1983年12月
 〈从亚洲看“大东亚共荣圈”〉
- 山阳新开社编 话せばわかる—犬养毅とその时代上下册 山阳新闻社 1982年9月
 二册
 〈一说就明白—犬养毅及其时代〉上下册
- 伊藤 隆 昭和期の政治 山川出版社 1983年8月 400页
 〈昭和时期的政治〉
- 橘川 学 日本は侵略国ではない—元朝日新开记者の昭和史検証 晓书房 1983年
 12月 282页
 〈日本不是侵略国—原朝日新闻记者对昭和史的验证〉

六、人物传

- 横山宏章 陈独秀 朝日新闻社 1983年5月 272页
- 陈来幸 虞洽卿について 同朋社 1983年12月 127页
 〈关于虞洽卿〉
- 上法快男 横山臣平 石原莞爾の素顔 芙蓉书店 1983年7月 267页
 〈石原莞尔。本来面目〉
- 上法快男 东京裁判と东条英机 芙蓉书店 1983年5月 280页
 东京审判与东条英机
- 伊藤武雄他 われらの生涯のなかの中国 みすず书房 1983年12月 320页
 〈我们的生活与中国〉

七、资料、工具书

- 京大、人文研附属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中心）一编 东洋学文献类目 1980年度人藤
 文科学研究中心 1983年3月 673页
- 中国关系论说资料索引（第1号—第20号）论说资料保存会 1982年10月 308页
- 山根幸夫编 新编辛亥革命文献目录 东京女子大・东洋史研究室（燎原书店）1983
 年11月 317页

（周新民）

（本索引主编杨诗浩）

《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

各期目录

第一期 (总第19期)

毛泽东致范文澜的信

从历史看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骨肉联系.....丁名楠(1)

略论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形成.....肖银成(14)

抗战时期我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部署.....陈廉(29)

关于“党内合作”问题的探讨.....郑应洽(56)

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关于中国问

题的决议.....任建树(74)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苏双碧(84)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侃(109)

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彭泽益(125)

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构成.....张国辉(138)

南京临时政府的币制金融问题.....汤可可 尤学民(159)

试论“二次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王仲(173)

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段云章(197)

试论蒋冯阎中原大战.....李静之(21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历史特点.....吕明灼(248)

• 问题讨论 •

再谈《李秀成供》.....荣孟源(278)

遵义会议后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是不是党中央军委?.....费侃如(293)

红四方面军四次进攻战役性质的提法值得商榷.....廖国良(297)

• 读史札记 •

孙中山与法国.....王昭明(304)

秋瑾两次返国时间考.....郭延礼(30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何时正式成立.....章克昌(311)

吴佩孚秘书长张煌言是怎样被击毙的.....卢继东(312)

• 学术动态 •

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综述.....刘俐娜(314)

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举行第三次学术讨论会.....静岩(316)

全国毛泽东思想讨论会在南宁举行.....吴明(318)

第二期 (总第20期)

中国的司法改革..... 孙逸仙 埃德温·柯林斯(1)
历史的必然 革命的需要..... 陆 仁(11)
论大革命时期我党关于“国民会议”

的主张..... 李世平 陈廷湘(22)
民主革命时期党对私营工商业政策

的形成和发展..... 张孟莘(48)
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 黄慰慈 许肖生(68)
太平天国史研究述评..... 茅家琦(97)

问题讨论 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 苑书义(126)
关于官僚资产阶级问题的一些看法..... 黄如桐(148)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 陈旭麓(161)
康有为与《日本变政考》的几个问题..... 陈华新(176)
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 李华兴(198)
维新派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刘巨才(218)
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 陈长河(228)
援鄂战争之史的考察..... 邓 野(247)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陈宁生(269)

读史札记 关于《原道觉世训》的写作时间..... 沈茂骏(294)
高升号殉难爱国官兵人数考..... 戚其章(297)
“公车上书”新解..... 李正中(299)
对“共产主义小组”的质疑..... 曹仲彬(300)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商榷
..... 胡庆云 肖甍(306)
“二七”罢工是我党单独领导的..... 孔蕴浩(312)
陈独秀早期活动资料补絮..... 张湘炳(314)

第三期 (总第21期)

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 杨秀峰(1)
杨秀峰《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重印记..... 刘大年(18)
试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问题——兼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
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认识..... 林家有(24)

试论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得以成熟的条件·····	雷云峰(53)
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	何理(70)
关于我国土地斗争中的划阶级问题·····	董志凯(98)
罗易与中国大革命·····	李盛平(113)
建国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	
·····	龚书铎 谢维 孙燕京(148)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	
——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上)·····	章文钦(167)
《武略》跋·····	罗尔纲(198)
清政府是如何解决李昭寿的·····	贾熟村(209)
戊戌维新运动与近代知识分子队伍·····	吴廷嘉(215)
梁启超与时务学堂·····	朱荫贵(240)
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去病·····	杨天石(255)
· 书刊评介 ·	
罗津斯基著《中国历史》书评两篇·····	余绳武 张振鹄(281)
关于《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六种》·····	于世明(292)
· 读史札记 ·	
关于李汉俊答董必武的一封信·····	陈绍康 田子渝(297)
《向导》不应写作《响导》·····	龚炳南(306)
从《南游日记》说明两个疑问·····	夏东元(308)
订正《中西纪事》的一处错误·····	徐宏慧(314)
· 学术动态 ·	
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概述·····	吴明(315)

第四期 (总第22期)

近代中国农民的阶级属性问题·····	刘耀(1)
建国以来洋务运动研究述评·····	夏东元(33)
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	戚其章(49)
关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	王学启(88)
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龙秋初(104)
鲍罗廷在广东的几个问题·····	元邦建(129)
关于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吴克斌(166)
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常城 何健沙(195)
论抗暴运动·····	沙健孙(210)

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

- 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家族剖析(下).....章文钦(231)
- 近代苏州丝织手工业八十年间的演变.....段本洛(254)
- 白朗起义与反帝问题.....周源(271)
- 关于近代中俄关系的性质问题

——答纳罗奇尼茨基与齐赫文斯基.....薛衔天 李嘉谷(281)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简介

书刊 评介

-马敏 朱英(294)
- 简评《中国近代报刊史》.....何炳然(303)

读史 札记

- 关于红二十军及其领导人.....王阿寿(312)
-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三个问题.....周嘉厚(315)
- 关于丘逢甲的籍贯.....胡安权(318)

第五期(总第23期)

- 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董谦(1)
-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黄埔军校中的作用.....杨绍练 罗雨林(34)
- 关于红三军团一打长沙的问题.....苏士甲(50)
- 试论一九三二年陈独秀的被捕.....张君(63)
-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评述.....宓汝成(82)
- 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章开沅(113)
- 太平天国“租息局”考略.....李书源(122)
- 论自立军起义与会党的关系.....蔡少卿(137)
- 英国第二次侵略中国西藏地方的战争

.....《帝国主义侵略史》编写组(164)

一九三五年德国对调解中日关系的态度.....王益(180)

甲午冲击在思想文学领域引起的变化.....李侃(188)

重论康有为与今古文问题.....汤志钧(204)

论陈嘉庚倾资兴学及其影响.....林金枝(220)

·读史札记·

关于陈天华几件史实的考订和纠误.....迟云飞(243)

秋瑾就义日期考.....郭长海(249)

从历史档案看AB团组织存在的时间.....王阿寿(254)

也谈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沿江川军兵力.....白静(259)

一九八三年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书目索引(中文部分)

.....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261)

第六期 (总第24期) 见本期目录
《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五年一、二期目录》

第一期 (总第25期)

李大钊的三篇佚文…………… (1)
珍贵的历史文献

——读李大钊的三篇佚文……………韩一德(11)
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段云章 周兴樑(20)
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姜宏业(53)
评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影响……………刘志强(68)
论新桂系的形成及其统一广西的

历史意义……………黄宗炎 韦春景(101)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君(125)
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魏楚雄(136)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何志功(151)
竺可桢——中国近代科学家和教育家的典范……………许良英(163)
试论清中期的“夷欠”问题……………林延清(174)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茅海建(196)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日)井上清(218)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耿云志(245)

• 问题讨论 •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兼与胡绳同志商榷……………王来棣(275)

• 读史札记 •

也谈巴西会议召开的时间问题……………秦生(300)
关于决定创办《向导》时间的考订……………徐有礼(306)
读史札记二则……………伊杰(309)

• 史学动态 •

全国首届史学理论讨论会述要……………吴明(312)

第二期 (总第26期)

回忆抗战……………许德珩
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封建性……………杨培新

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	魏 明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和	
国共合作策略确立的几个问题.....	姜华宣
张闻天、肖楚女与《南鸿》周刊.....	程中原
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	黄友岚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	李 军
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	张静如 马模贞
《天父圣旨》《天兄圣旨》	
和太平天国历史.....	王庆成
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	王宏斌
从清末川滇边务档案资料看赵尔丰的治康政绩.....	陈一石
同盟会成立新论.....	何泽福
试析辛亥革命时期的谭延闿政权.....	杨鹏程
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及资料情况见闻.....	张振鹄
读史 俄界会议时间地点考.....	秦 生
札记 东海关设关考略.....	丁抒明

近 代 史 研 究

征订启事:

本刊(双月刊)今年因印刷问题(编辑部全都如期发稿无误),每期出版均有延误,敬请读者见谅。一九八五年将如期出版并将充实内容,欢迎继续向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国内代号2——54 国外代号:Q298。在邮局订阅不到可向本刊编辑部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订购。每期订价1.15元。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办理国外征订手续。

6

1984

近代史 研究

《近代史研究》

征订启事：

本刊（双月刊）今年因印刷问题（编辑部全都如期发稿无误），每期出版均延误，敬请读者见谅。一九八五年将如期出版，并将充实内容，欢迎继续向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国内代号2—540，国外代号：Q 298。在邮局订阅不到可向本刊编辑部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付款预订。每期定价：1.15元。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办理国外征订手续。

近 代 史 研 究

1984年 第6期

编辑者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印刷者	太阳宫印刷厂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国内代号：2—540		国外代号：298	（北京2820信箱）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138号

定价0.90元